

魯迅的書

歐陽凡海著



人文出版社發行



43.477

16

魯迅的書

歐陽凡海著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對人類往往有着最大決定性的童年境况

第一節 半生學問事業的最初的傾向

第二節 萌芽了對社會的批判的目光

第二章 走上市民意識的舞台

第三節 思想的雛基

第四節 初次實現中的理想

第五節 思想，文學觀，社會意識的初步檢討

第三章 流入冷藏器的熱情的變化

第六節 驅除寂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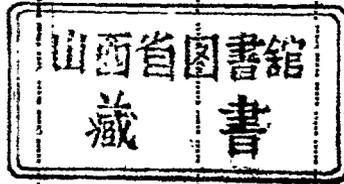
第七節 驅除寂寞(二)

第四章 奴隸意識奠定了以真理武裝思想的可能

第八節 革命的開花

第九節 孤軍獨戰

第十節 沈默而不可得



(一一九)

(一)

(四一)

(八四)

(一二三)

(三六五)

40513

自序

我這本書，是在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開始寫的。在開始寫這本書以前，我對魯迅先生的了解並不深，只在當中學生的時代一知半解地看過他底「吶喊」和幾篇「彷徨」，對他的印象還很淺；使我對魯先生抱着深刻的敬意的，是我在日本的時候，看見了他底「二心集」，這集子裏的文章所表現的他底偉大的精神與晶濤的人格，使我永遠也忘不了；以後便陸續看了一些雜感集，不過始終沒有系統地去讀他底書。一九三六年魯迅先生死後，上海的雜誌「文學」好像是打算在十二月號出關於魯迅的事號吧，茅盾先生寫信來叫我寫一篇關於魯迅先生的文章，我那時就先把「吶喊」和「彷徨」我來再看了一遍，另外看了一些別的材料和別人評論魯迅先生的幾本書，就寫了一篇「關於魯迅先生的幾個基本問題的商榷」寄出去。這篇文章我自知是不很成熟的，因為當時我所看的材料就不得很，但也大胆的發揮了我獨自的一些見解，這些見解，也為我今天所採用了的，茅盾先生看了這篇文章之後，來信說我在這方面可以研究研究，而此後，別日許多雜誌便也來約我寫這方面的文章了，這些情形，促成了我研究魯迅先生的動機。

一九三六年底，我就開始系統地閱讀魯迅先生底書，並且做摘記，搜集有關魯迅先生的其他各種著述。其時我正在翻譯保加利亞的作家佐夫底「軀下」，這本書也是茅盾先生介紹我翻譯給生活書店的世界文庫的。彷彿是在全國文藝家協會開理事會的時候，會畢，茅盾先生談起生活書店叫他譯的這本書，他說自己沒有工夫譯，想請別人譯，問有沒有人承受？我那時初到上海

變無鈔票，每天均有斷炊之虞，正需要一筆生靈來賣掉自己底勞動力，於是便滿口承擔下來了。我一面譯這本書，一面看魯迅先生的著作。要錢用，就把譯好的一部份稿子先送去換錢，又吃飯，又譯，又看魯迅先生底著作，一面做摘記，又提綱，其間當然還經過了許多別的事情，而最主要是我身體不好，我底女人要生孩子，住在金神父路的花園坊，生活糟雜，空氣又不好，一九三七年初就搬到徐家匯去住了，這樣，就少進上海，生活開始帶上蠅虻氣味，都爲我現在所不願回憶的了。

「輓下」是「八一三」之前譯完的，其時有關魯迅先生的許多書，我也都大體看完了，「八一三」之後，便搬到霞飛路與辣斐德路之間的靜安邨來躲避日本人的殺伐。從此我便好似一個帶孕婦人似的帶着幾箱研究魯迅先生的材料，行旅爲艱。那時我還不打算離開上海，買了一些麥粉和木炭放在家裏，以備戰時物價高漲，就仍舊每天伏在書案上，開始寫這本「魯迅的書」，一面再由茅盾先生介紹我去拜訪景宋先生，由她答覆了我許多關於魯迅先生生前的日常生活上的問題。我大約每星期去拜訪她一次，每次談一二小時，還準備接着每天去她那裏看魯迅先生底許多未出版的書信和日記，以便作爲研究的資料。可是後來戰爭的發展，中國方面日趨不利，我女人是浙江人，其時她帶着一個小孩，我們都覺得她還是趁滬杭路未斷之前，把小孩帶回家去比較的好。後來我送她回去之後，自己又來上海寫了幾星期的書，而其時別的許多朋友正計劃退出上海到內地某戰線後方去，我也極願同行，我底目的是想把生活改變一下，暫時離開書案和都市的生活，因此到景宋先生那裏去閱讀魯迅先生底未發表書信和日記的計劃便沒有實現。同時，我前面已經說過，我已經好似一個帶孕的婦人似的帶着幾箱關於魯迅先生的材料，已經行旅爲艱了。到靠近前線的地方去，這些材料當然更不能帶着走，而丟棄則將來再要讀寫，不但材料不易再得，而且這些材料都經我細讀過，勾出要點，畫了記號及註脚，用起來很便當，要是失掉，即使另找到新的材

料代替，再看一遍也不容易的，這樣，我便不能和朋友們一道起程了，我決定讓他們先走，我得把這些東西搬到某地去安頓起來再去追趕他們。

我在某地生了一場近於傷寒的大病，在病中也寫了一點，此後，我寫這部書的工作便停頓了一年多。去年春天，我才又在桂林，繼續此項工作，只是因為兼任其他職務，可以用來寫書的時間很少，所以像蝸牛赤路一般，走了一年，仍然離目的地還很遠，我非常駭怕此後生活再有變動，則交通不便，材料無處安頓，又不能帶走，所謂「爲山九仞，工虧一簣」，那時如何是好？所以今年春天，我便決然辭去一切職務，到現在，總算寫、改、抄、校，都弄好了。現在是原稿歸本都包成一包，飛機來時只要帶着稿子走，材料炸去也不管了，真所謂「如釋重荷」，心神爲之一快。

這本書寫到一九二七年初爲止，以後還有十年關於魯迅先生的生活，我本來打算作爲下冊寫的，但現在客觀環境不允許寫下去。而其實，所謂客觀環境不允許，也還是一句原諒自己的話，一定要寫，形式上改變一點，也不是絕對不能寫，不過我是決定不寫了。我開始計劃寫這本書的時候，還在抗戰之前，那時的環境雖然也不好，但總還可能作一年半載的寫作生活的打算，即使生活如何艱苦，還可能蒐集材料，還可能保存材料，而現在，一則是過寫作生活就不容易，二則交通不便，蒐集材料幾乎是不可能的了，三則現在的軍事及政治，隨時都可能有激變，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不提高警覺性來應付激變，弄一些材料來拖累着，我已經經驗了够多的痛苦了，萬一寫到一半而生活不能不變動時，今天的交通條件不允許帶着材料走，棄之不甘，而人地生疏，又無處可寄存，況且敵機天天來炸，材料如果多，也不能帶着躲飛機，所以今天如果要再做這種研究工作，不但生活和這戰時的氣氛不適應，並且連很低限度的研究保障也沒有，担憂不過。我覺得，中國也還需要真正的學究，只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如果再繼續做這工作，恐怕連做一個駱背

專究也不可，結果是只有睜着兩眼一天天被材料埋下去，積憂而死的。去年秋天，沈鈞儒老先生離桂時，大家饒他的行，記得在酒席上，長江先生說起，重慶一個大學裏的教授，有一部寫了十年的什麼稿子，被敵機炸毀了，言下大家都不勝感慨，而受驚最大的是我。這使我覺得，上述我對於研究工作的擔憂，不能算是杞人憂天。我在抗戰前既已開始了的這本研究魯迅先生的書，真叫棄之不甘，不棄又太苦，不得不硬着頭皮繼續弄完我預定的到一九二七年初為止的上冊，以後的事，我實在不敢預約了，因此，我這本書，也不叫作上冊了，省得讀者等待，等得頸額長了也等不着。我希望讀者原諒我，並且繼續我底努力，有一天能添補我底這個遺憾。

不過我相信，將來的人，假如並不能推翻我這一本書的論點，工作不必重新做過，那麼，繼續做下去，只是在比較能做研究工夫的環境下，我相信，以後的工作要比我所做過的容易得多了。因為魯迅先生底思想，意識，及文學藝術的趨向，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實在就基本上決定了。一九二七年以後，他底思想發展，比起一九二七年以前，要單純明確得多。所以在我看來，魯迅先生最後十年的戰鬥生涯，對於我們今天的人比較的熟識，而且大家對於他的歸結，也大致有了定評，重要的倒不是來重複這些定評，而是來向讀者分析魯迅先生經過了怎樣的獨特的路子，到達於他最後十年的光榮的頂點。我所做的就是這件工作。我相信我已經把主要的，最基本而且是最困難的工作做出來了，因此，我敢於在這裏放下我的工作。

不過以我底學問，和年齡不及魯迅先生一半的經歷來做這一本對魯迅先生帶評論性質的傳記，實在是非常慚愧的。我這本書裏，對魯迅先生底所有重要的作品，差不多都分析到了，從形式上說，我這本書原來很像評傳，只是我覺得，嚴格地說，對於一個作家的批評，批評者應該在學識與經驗的各方面都要比被批評者更強，更淵博，那眼光才會遠大鋒利，深刻透切，而我的學識與經驗的各方面，可以說都遠不及魯迅先生的一半，所以我不敢把這本書叫作評傳，我對於魯迅

先生的差不多是全部作品的或簡或詳的分析，也決不能稱為批評，只能够當作是一種註解。記得曾經有一個外國作家說過，魯迅先生底散文雜感內容之豐富與筆法之宛轉，是完全與當時的實際環境密切相關的，所以魯迅先生的雜文之生動與豐富，如果譯成外國文字，值得加三倍以上註解來說明當時當地的實際環境，以增益不了解魯迅先生底實際環境的讀者對魯迅先生著作的興趣。我覺得，這話不但是可以適用於魯迅先生的雜文譯成外國文的譯會；就是包括魯迅先生的創作，在中國今天的場合也是適用的。今天的中國二十五歲以內的青年，我相信，能够完全了解魯迅先生的創作，尤其是「阿Q正傳」，「風波」，「藥」，「孤獨者」，「高老夫子」，「傷逝」等與當時的社會變革的主潮怎樣相關聯的，恐怕不會多吧？尤其我相信，能够了解魯迅先生底雜文，特別是收在「華蓋集」與「華蓋集續編」中的雜文與當時的社會糾葛，與魯迅先生底戰鬥生活怎樣相關聯的，一定更不會多。因此我非常覺得快活的，是我追蹤了魯迅先生底實際生活來詳細分析了魯迅先生底這些主要作品，可以作為一個媒介使青年更能和魯迅先生接近起來，使魯迅先生更能深入中華民族底心之深處去，以灌溉，豐富，精鍊中華民族的靈魂。在全國民衆這樣熱烈紀念着魯迅先生的時候，我相信我底這種工作，可以使全中華民族對魯迅先生底熱愛與紀念，更加和魯迅先生底實際的血肉結合起來。我這本書的作用僅僅如此，大抵是只限於在今天作為媒介的應時的東西，談不上有永久性的批評的價值，我稱它為「魯迅的書」，就是「關於魯迅的書的註解」這名詞的簡稱，所以我希望讀者能够依照我這本書裏的次序，有系統的和魯迅先生底著作參照着看，這樣，一定可以得益更多。

由於我自己已在心裏，對於這本書的作用，有上述的單純的認識，增加了我寫這本書的勇氣不少，我記得魯迅先生在「憶韋素園君」裏面說過這樣的話：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被攻擊和被冷落，一歿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謾罵知已

，是非講起，既以自衛，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達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這些話曾經激起我反省，使我再三躊躇，和寫着這本書的時候，總是一面捏着一把汗，我這樣的工作是應該做的吧？爲什麼我們不應該把這樣一位前無古人的偉人魯迅先生在全中國人民前面，更具體地，更系統地加以介紹，加以分析，加以發揚呢？懷着這種的信念，我就寫下去了。到了現在，我已經聲明過，我這本書是應時的東西，況且下冊也並沒有寫，甚至不算寫，所以留給後來的人正還有不少的空隙，只要稍加努力，另外的有真正價值的關於魯迅先生底評傳便可以產生，那時我這本書即成廢物，所以我自知不過是大橋樑中的一小塊沙石，而且就要過時的，恐怕連較久較堅的磚柱也談不上，更談不上能「沽名」了。「獲利」尤其談不上，小本頭的書，大小書店都可出版，可走的地方自然要多些，而像我這樣大本頭的書，在今天的中國，只要幾個大托辣斯面孔一沈，我這幾年來的勞動力可以一錢不值，我想，今日中國作家底血汗，恐怕都只有廉價拍賣的吧？

現在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須加一聲明。就是魯迅先生生前對我並無一面之識，所以也就更加無從自衛是魯迅先生底什麼舊交了。非不願，乃不能也。恨不能早生十年，而魯迅先生又不能從棺材裏活起來，好讓我去拜訪一趟，這有什麼法子可想呢。但是本書節錄發表各雜誌時，朋友却轉告我說，有許多人很奇怪我對魯迅先生的稱呼不統一，又稱「豫才」，又稱「魯迅」，似乎有冒充魯迅先生底舊友之嫌。其實這是誤會。他們忘記了我是在寫歷史。魯迅先生並不生來就叫「魯迅」，這是他發表「狂人日記」以後成了名的筆名，因此在他發表「狂人日記」以後，通稱魯迅先生爲魯迅先生是對的，在他發表「狂人日記」以前，他所用的別些筆名並無多大重要性，我以爲還不如用他底本名通稱他，他本名「周樹人」，字「豫才」，照中國人的習慣，爲了尊敬對方，不稱大名，而常以字號相稱，所以我也就稱「狂人日記」以前的魯迅先生爲「豫才」。

對於地名，我也用此辦法，比方在「北京」未改稱「北平」之前，我也是用「北京」舊名的，這無非是爲了寫歷史的方便，可以避免這名詞與當時當地的別種東西產生關聯時不致混淆不清，並無什麼祕密，也並不是玩花槍，意圖假冒也。這本是普通的事，用不着什麼說明的，現在既然有人懷疑，就帶便說個清楚。

不過我這稱法，也只在書中主要的人物與地名身上，對書中次要的人物或地名，由於我底知識貧弱，又沒有工夫分心，便不管了。比方楊蔭楹有沒有別的什麼筆名或字號我就不曾研究過，只得通稱楊蔭楹。林玉堂從什麼時候起改稱林語堂的知識，我也沒有具體，只得亂稱一通了，餘類推。

我寫這本書的方法，還需要加以說明。我底工作，從開始到完成，計分十二個步驟：第一步將全體材料加以略讀，畫下記號，並研究魯迅先生底思想發展的幾個主要的時期與楔子；第二步，根據第一步的研究，草下計劃大綱；第三步，依照大綱，部分部分的詳細審閱材料；第四步，將部分審閱的結果，加以記錄；第五步，再將該部分的材料加以略讀；第六步，依照部分審閱的記錄，將可用的材料抄出來；第七步，再將抄出來的東西加以整理，分出次序及細目；第八步，就根據這整理過的次序與細目，將部分的材料加以詳細研究，考核可靠的程度；第九步就寫；第十步，改；第十一步，抄；第十二步，一面較勘，一面再補充添改一些材料。其實，說到補充和添改，我一直到現在也還在做，改得副本也一場糊塗了，但是我處在這樣局促的時代，而使女人和我一同抄，也要三五個月才能另抄一部分，那裏來的這些乾糧，好讓我慢慢弄呢？而且一延再延，生活一變動，說不定還要負稿逃難，遠不如早點送出去爲妙。已抄的一個副本，有一部分僅人抄的，在我是算大開銷一番了，再僱人抄，那有這麼多的資本呢？如果可以發財，算得是投資的話。

那麼我爲什麼要用這麻煩的步驟來寫這本書呢？這裏有我底不得已的原因，只要說了這本書便可以知道，我這本書所根據的史實，出於魯迅先生自己底著作中的，佔大部分。這一部分魯迅先生自己著作中的史實，是非常零碎地散見於各書中的，有的只見一句，下文便沒有了，有的只露出一點可作旁證的因由，需要用別處的史實來證明。要將這些零星的點點滴滴的史實，在時間上連貫起來，不下點麻煩的笨工夫，就辦不到。所以，我底研究，整理，考證的時間，實在比寫作的时间多四五倍以上。

敬見於魯迅先生自己著作中這些史實，有多少程度的可靠性呢？我的回答是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靠性。看了這本書，讀者就會知道。但在序文裏，我也得着重提醒讀者，魯迅先生是一可怕的自畫招供的舊社會的叛徒，他不但解剖別人，而且更無情地解剖他自己，他的雜文之所以有了不可磨滅的價值，就因爲他的雜文同時又是他底抒情詩，能够直抒他底胸臆毫無掩飾，因此魯迅先生底著作，於十分之七、八以上，可以說是解剖他自己底可靠而又可怕的口供，這些口供以片斷的零星的形式出現，只要加以整理，便是他自己底可靠的傳記。我底材料，因此就以魯迅先生自己著作中的口供爲中心，配合着各種旁證，展開現在的排場。

不消說，應該從魯迅先生所處的社會及國際環境中來說明他底個人歷史。這一點，我想是近代分析個人的公認的法則了，我這裏也用這個方法，用不着多贅。不過除此之外，我還嘗試了另一種企圖：就是我想用步步深入的辦法，由具體而進於抽象，再由抽象達於理論的具體化，使他底生活，性格，社會關係等與他底思想，著作，文學活動等交織成一個不能分離的可以直覺的主體的形象。爲了這個企圖，我大膽的把普通傳記的一些常見的公式置之腦後了，但願讀者讀了這本書，不但理解魯迅先生，而且感覺到親近了魯迅先生，能如此，則我即使在文學形式的使用上，未幾過分冒險，使讀者大覺礙眼，那我也是心願的了。

最後，這本書今天能够完成，實賴大家底幫助，除上文已經說到的幾個人之外，如琴他們幫助我保存了材料和稿子，蓬衣及另一些朋友幫我抄了副本，還有朋友們給了我一些意見，使我能够及時修正一些錯誤。但悲哀的是，我把稿子和材料交付如琴，分別之後，便再沒有機會見到他，現在書已寫好，而他早已是一抔黄土中的幾條白骨了。

既然如上所述，我的學識經驗不够，材料貧乏，那麼本書的錯誤，是一定在所不免的，希望讀者不客氣的隨時予以指教。

第一章 對人類往往有着最大決定性的童年境况



第一節 半生學問與事業的最初的傾向

一八八一——一八九三：一歲——十三歲

自然界的天真與當時人類社會的矛盾的表現

清光緒七年歲次辛巳（西曆是千八百八十一年），八月初三日，浙江省紹興城內東昌坊口一家姓周的人家生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底家庭裏有父母雙親，他底父親也有庶出兄弟，此他還有祖父母，曾祖母，祖父底妾，姑母二人，他們一家經濟上的責任，全由他祖父負擔。這位祖父名叫介孚，是前清的翰林學士。當孩子生下地的時候，他正在京裏作官，得到家書知道了孫子的時候，恰巧有一位姓張的來訪他，他便給他底孫子命名為張，曰樟壽，定字為豫山。豫山發音為雨傘，雨傘，很不好聽，家人只得又去請問祖父，老祖父就將豫山改為豫才。

曹靖華先生譯的一本『蘇聯作家七人集』內大書道『謹以此書紀念豫才先生。』那小孩子正是靖華先生所紀念的這『豫才先生』。可見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魯迅了。

豫才底父親性情不太溫和，喜歡喝酒，對小孩的關係很是冷淡，為此，豫才深以為苦。不過到了年紀稍大一點，豫才對他父親仍舊很有感情。小的時候，他底父親首先就有點嚴厲。有一回，他帶和家人一道去看賽會——這賽會是紹興那地方的孩子除了過年節之外，就是最盼望的東

西了。所謂迎神賽會，中國各地大約都有，主要的是出巡的神，僕仗，旗幟，鋼叉之類，紹興的大約也是這樣。倘若是禱雨迎龍王，就是十多人盤旋着一條龍，同時用村童們扮些海鬼——浙江有些地方禱雨迎龍王是這樣的：到深山靈泉去捉一個水棲或兩棲動物，頂好是蛇放在瓶臺中拾來，這有蛇的瓶臺前後有數百人手持鋼叉護衛，以防別人搶劫，據說這瓶臺被劫到那裏雨就更靈地會落到那裏，所以，天越早，護衛的人越多，有時甚至用刀鎗及其他的兵器武裝起來，倘是夜間才回來，大家就點火把，吹口哨疾奔，火光燭天，很是可觀。倘若是職司人民生死大事如城隍，東嶽，帝這類的神出巡的話，則又另有一番特別脾色：「鬼卒，鬼王，還有活無常」，即我們俗稱的地方鬼。「這些鬼物們，大概都由粗人和鄉下人扮演」，「鬼卒和鬼王是紅紅綠綠的衣服，赤着腳；藍臉，上面又畫些魚鱗」。「鬼卒拿着鐮叉，又環振得琅琅地響，鬼王拿的是一塊小小的虎頭牌」。對這些鬼物，看客並不很敬畏，只有念佛老嫗和稚底小孩子們照例要閃避一下，表示儀節。豫才和普通的許多人所最願意看的却是那位活無常。至於普通較盛的賽會「是一個孩子騎馬先來，稱為「塘報」；過了許久，「高照」到了，長竹竿擡起一條很長的旗，一個汗流浹背的胖大漢用兩手托着；他高興的時候，就肯將竿頭放在頭頂或牙齒上，甚至於鼻尖上。其次是所謂「高躋」，「抬閣」，「馬頭」了；還有撈犯人的，紅衣枷鎖，內中也有孩子」。不過東昌坊口這個地方是在紹興城內的偏僻處所，待到賽會的行列經過這個處所的時候一定是在下午，儀仗之類的熱鬧東西必定減而又減，所剩的很少了。這位孩子豫才往往伸着頸子在門口等候許多時候，到末了「却看見十幾個人抬着一個金臉或藍臉紅臉的神像忽忽地跑過去」便完了。因此他未免失望，可是他常常存有另一種希望，希望「這一次所見的賽會，比前一次繁盛些」，而結果總是「差不多」，只不過當神像沒有抬過之前，曾化一文錢——你看那時的生活程度——買下一個用一點爛泥，一點顏色紙，一枝竹籤和兩三根雞毛所做的，吹起來會發出一種刺耳的聲音

音的，叫作「吹噓噓」的哨子，「吡吡地吹牠兩三天」，算作紀念罷了。

在紹興，婦孺們是不許趕着賽會的，士君子之類的所謂讀書人，對於神鬼，比一般平民更多一些恐懼的心理，他們爲的「明哲保身」，也大抵不肯趕去看。只有遊手好閒的閒人，這才跑到廟前或衙門前去看熱鬧。所以豫才雖然很羨慕這種熱鬧，可是很少能夠跑到廟前或衙門前去親見盛筵，因爲他既是屬於「婦孺」一類，而他底家庭又是士君子一流的所謂讀書人的家庭，這就使這位有駢頭皮的孩子更加羨慕。他那時覺得倘是能夠到賽會的行列裏去扮一個紅衣枷鎖的犯人，那就是一種光榮的事業，能够與聞其事的大有運氣的人。與聞賽會這事的，大約都是鄉下農民這類下等人，士君子家庭中出衆的豫才，恐怕會覺得他底幸福遠不如野孩子底好罷？扮紅衣枷鎖的犯人的小孩子，是有的因爲生一場大病，他底母親到廟裏去許下一個「扮犯人」的心願的緣故。所以豫才也徬希希望自己生一場大病，好讓他母親到廟裏去許下一個「扮犯人」的心願，到後來也想去參加一次光榮的事業。然而他徒然這樣癡想，終於沒有機會去和賽會發生關係。

這一回他要和家人一進去賽會的地方是在「東關」。這可以說是他底時罕逢的一件盛事。因爲那會是全縣中最盛的會。東關離紹興城很遠，「出城還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裏有兩座特別的廟，一是梅姑廟，就是聊齋志異所說，望女守齋，死後成神，却兼取別人底丈夫的」；後年魯迅記其事道：「神座上醜態醜一對少年男女，眉開眼笑，殊與「禮教」存嫉」在禮教的中間，對於神常有許多地方特許，這也是例證之一。此外如城隍老爺也公然帶着太太，並排而坐。而五猖廟便是其中之一，據說還是五猖神。「神像是五個男人，也不見有什麼猖獗之狀；後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並不分坐」，魯迅批評道：「遠不及北京戲園裏界限之謹嚴。其怪呢，這也是殊與禮教有嫉的，——但他們既然是五猖，便也無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別論」了」。兇惡的神鬼雖是破壞禮教，也還受禮教社會尊敬，這是禮教社會的中國底更深一層的底面。魯迅自

小就從這底層中培養起來，因此，他長大起來，也和我們一樣，不以我們底社會中官僚軍閥董要幾十，秀才先生私通婢女爲奇了。

豫才要到東關去看的賽會就是這五福會。一清早大家就起來，前一夜「預備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經泊在河埠頭，船椅，飯菜，茶炊，點心盒子，都在陸續搬下船去了」。紹興的交通常用船，有時迎親結婚也用船，到鄉下去上墳，更是用船的時候多。紹興城內自然也有通船的河流，豫才家裏預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就停在城內的河邊上，豫才笑着跳着，催用人們要搬得快。「忽然，用人底臉色很謙肅了」，他知道有些蹊蹺，四面一看，他父親就站在他背後。

「去拿你的書來」，他父親慢慢地說。

這所謂書，是指他開蒙時候所讀的鑑略。他志忑着，拿了書來了。他父親使他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他一句一句地讀下去。兩句一行，他父親大約教他讀了二三十行罷，然後說：——

「給我讀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會」。

他父親說完，便站起來，走進房裏去了。

他似乎在頭上澆了一盆冷水。然而無法可想，只好「讀着，讀着，強記着，——而且要背出來」。

粵自整古，
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
聲聞混茫。

是這樣的書，那時人們說，「讀鑑略比讀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爲可以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那當然是很好的」，可惜豫才一字也不懂。他所能做的，單不過是讀下去，記住它。這便是中國舊時代的教育，他們不叫小孩子懂一點螞蟻，狗，貓這類的東西，却叫他們從那難懂的鬼符般的方塊漢字裏去學天文地理。他們不懂，便叫他們硬記。假如是一個

天才的腦子，在這樣的教育中生長起來，是多少也受過一點損害的。

應該搬下船裏去的物件已經搬完，豫才家中便由忙亂轉成靜肅了。「朝陽照着西牆，天氣很清朗。」豫才底母親，用人，豫才底長媽媽都無法管教豫才，只好默默地靜候着豫才讀熟，而且背出來。在死一般的靜肅中，他「似乎頭裏要伸出許多鐵鉗，將什麼『生于太荒』之流夾住；也聽到自己急急誦讀的聲音發着抖，彷彿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鳴叫似的」。這是多麼費腦筋的痛苦的事情！

大家都等候着豫才，太陽也升得更高了。

他「忽然似乎已經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來，拿書走進父親的書房，一氣背將下去，夢似的就背完了」。

「不錯，去罷。」他父親點着頭說。

「大家同時活動起來，臉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頭走去」。用人將他高高地抱起，彷彿在祝賀他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頭。

因了這一場波折，豫才對五猖會的一切興趣都失去了。「開船以後水陸中的風景，盒子裏的點心，以及到了東關的五猖會的熱鬧」，對於他都似乎沒有什麼大意思了。

後來豫才長大起來，說：「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

對這樣一位嚴酷的父親，魯迅不能理解的地方，恐怕還不止這一端吧？不過他父親叫他背書的這件事，以中國人底眼光看起來，也不能算太奇怪。舊時的中國讀書人對學生對兒子不近人情的地方處處都是，他們底職司差不多專門在摧殘兒童；至于怎樣教育兒童，怎樣品行爲對兒童才有益或有害，他們並不想過問。

據周作人和魯迅底老朋友許壽裳底意見，魯迅小的時候很聰明，親戚也因此很愛他。現在我

們看他背誓的這一節，一方面足見他們底話沒有脫離，另一方面則又可知道死讀自己所不理解的誓而且還要背誦這事，縱然是對於一個聰明的小孩子也有這麼艱苦。把豫才當作一個帶着自然界的天真走入人類社會的兒童看待，則他已經代表着自然與人類衝突了；把豫才當作人間的一份子，則他已經作爲一個個人與社會發生衝突了。

然而這一切，當時的豫才自己是沒有能夠給以解釋的。誰地在無意識中，爲一種看不見的力所支配吧？就是豫才底父親又何嘗不如此，他對於豫才，不過像對其他的許多人一樣，無形中代表社會的某種勢力罷了。（以上引號內文，出自「朝花夕拾」，「無常」及「五猖會」）

迷妄與虛偽的世界

大約不僅紹興，中國的大多數地方恐怕都有這種迷信的習俗：就是「中國有許多妖魔鬼怪，專喜歡殺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賤，他們才放手，安心」。所以中國有許多孩子都被取名「阿貓」，「阿狗」，尤以紹興這地方，取名「阿狗」，「阿貓」的孩子到處都是，用意是表示輕賤，魔鬼不來殺害，就容易養大。

「還有一種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爲師，也就是捨給寺院的意思，然而並不放在寺院裏。」「和尚這種人，從和尚的立場看來，會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從讀書人的立場一看，他們無家無室，不會做官，卻是下賤之流。」所以拜和尚爲師，意思是捨給寺院，是和尙了，從讀書人看來，鬼魔也就不會來殺害。豫才生在姓周的人家是長男，「物以希爲貴，」長男也特別貴重，他父親當然希望他能被養大，所以不到一歲就領他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爲師，得到一個法名，名作「長庚」。還有一件照理應該用各種破布拼成，而豫才底却是用軟襪形的各種小綢片縫就的百家衣，就是所謂「衲衣」。這件百家衣，非遇到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壓本，鏡子，銀飾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那麼你想，這一個小孩子被裝在迷妄之中，身上結綳綳影拖着那些令人厭惡的東西，立刻就

被那社會中的俗惡活埋得氣也透不出來了，誰能預料得到這小孩就是後年的魯迅呢？魯迅爲了要擺脫活埋着他的這些自小以來的俗惡，後年他簡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不止呢。

豫才拜他爲師的那位和尚，大家都稱他爲「龍師父」，對豫才很和氣，並不教他念經，也無須教他佛門規矩。他不過是一位剃光了頭髮的俗人。他雖說是豫才的師父，不過以一頓和尚的身

份到豫才家裏來，大約也只能受到外貌客氣的師父的待遇，對豫才，他未見得能像對他真正的徒弟一樣吧？豫才假使到他家裏去，他大約不過把他當作一個尊貴的客人。

和尚是不應該留鬚的，龍師父卻有兩鬚下垂的小鬍子，身子瘦長，面皮瘦長，高顴細眼，他還有一位老婆，這就是豫才底師母了，年少的豫才，對於和尚有老婆，覺得有點古怪，因爲他那小小的腦袋裏已經知道和尚平常是沒有老婆的了，不過他很愛他的師母，師母是胖胖的，豫才到她家裏去，她底孩子們就來和他玩耍，有時還給他水菓和點心喫。這也是豫才底童年世界的一部分。

師母底孩子們當然是豫才底師兄弟了。這些孩子們起來也做了和尚。有兩個比豫才大，算是豫才底師兄，有兩個比豫才小，就算是師弟了吧。對豫才感情最好的要算是比他大十歲的他師父底第二個兒子了。

豫才小的時候常去玩的另一個地方就是衍太太家裏。這位衍太太年紀還輕，只有一個兒子比豫才大三四歲，這大約是個心術不太端正的女人。「他對自己的兒子雖然狠，對別家的孩子却好的，無論鬧出什麼亂子來，也決不去告訴各人的父母」，因此豫才他們就最喜歡在她家裏或她家的四近玩。

「舉一個例說罷」，豫才自己說道：「冬天，水缸裏結了薄冰的時候，我們大清早起來一看

見，便喫冰。有一回給沈四太太看到了，大聲說道：「莫喫呀，要肚子疼的呢！」這聲音又給我母親聽到了，跑出來都挨了一頓罵，並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們推論禍首，認定是沈四太太，於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稱了，給她另外起了一個綽號，叫作「肚子疼」。

「衍太太決不如此，假如她看見我們吃冰，一定和藹地笑着說，好，再吃一塊。我記着，看誰吃的多。」

豫才和別的孩子比賽打旋子的時候，她就在旁邊計着數，說道「好，八十二個了！再旋一個，八十三！好，八十四！——」於是孩子們終於旋得跌倒了，衍太太便來「給你用燒酒調了水粉，搽在疙搭上，說這不但止痛，將來還沒有癩痕」。

這樣的一位太太對小孩不能不說抱有幸災樂禍的心思，而且我們以後知道她對小孩極力討好，說不定還有別種不良的企圖。這種女人在那時的中國社會中不是沒有地位，便是從有地位的階層中沒落下或正在沒落着的人物。她們常常從事各種不可對人言的事業，我相信這是造成此種女人底性格的主要條件。可是孩子們並不管她對他們的好意是出自什麼心腸，豫才自然也覺得衍太太是可親近的人。某種放蕩也構成衍太太底生活條件之一，她和她底男人一道看不知是什麼的圖，有一回被豫才看見。那是豫才很小的時候，豫才沒有顧慮闖進她家裏去，她正在和她底男人看什麼書。他走近去，她便將書塞在他眼前，說，「你看，你知道這是什麼？」原來那書上畫着房屋，「有兩個人光着身子彷彿在打架，但又不是很像。」豫才正遲疑間，他們便大笑起來了。這對於一個有自尊心的孩子，却似乎受了極大的侮辱，豫才因此很不高興，以後就有十多天沒有到那裏去。（以上引號內文，出自「我的第一個師父」與「瑣記」）

個性的表現

豫才小的時候有一個綽號，叫作「胡羊尾巴」意思是稱贊他聰明。一個人底性情趨向於那一方面，童年時代就看得出來。豫才不但聰慧，而且富於感情，九歲的時候，他底生後僅十個月的妹妹夭亡，（他有弟三人，四弟亦早故）曾使他傷心得一個人躲到屋角落裏去哭泣。我們可以想像他最初一定是個多情善感而有智慧的孩子，這些，在他童年的生活中決不難看見。

他們姓周的人家住在紹興已有十幾代，分成若干房，如「覆盆房」、「清道房」，「竹園房」等，都分住在不同的地方。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宗祠，地點在城內的狀元弄。男子上十六歲就叫成了，春秋二節都要到祠與祭，而婦女則只在結婚的次日上午，和新郎上祠堂去拜一回祖宗，普通是以後便不再去了。「覆盆房」是住在紹興城東的覆盆橋附近，又分作三房，叫作致房，中房，和房。致房的大部分移住在靠近「東昌坊口」的另一所房子裏，叫作「新台門」，一部分留在老屋裏。豫才他們一家就住在「新台門」。

無名在「魯迅的家世」一書中說：「會稽周家是一個大家族，大家族的維持依靠一種經濟的關係。各房的祖宗常留有田產，叫做祭田，由派下的各房輪流收租，輪流辦理「上墳祭掃」及做忌辰等事情。比方覆盆房公共的祖宗忌日這一天，由值年的叫工人向各房邀請拜忌辰。各房派下的男女老幼都須去拜忌辰，男女大約各有數十人。大廳的上方有一塊匾，寫着「堂名」叫做德壽堂。旁邊的柱子上有抱對，新台門的那副抱對的上下聯是：

「品節祥明，德性堅定」。

「事理通達，心氣和平」。

豫才一家人和「致房」的族人聚族而住在新台門的一大片宅子裏。豫才底家所住居的屋子不過這一大片宅子中的一部分，然而是最好的部分。他家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塊牌位，用金字寫

「天地君親師」五個字，這是五位封建的權威，那時候的人必須絕對服從。當時的豫才不過是屋子裏的一位少爺，他所能看見的大約是「大宅子裏和鄰近如衍太太，師母家裏的事物，此外就是屋後百草園裏的東西，再就是『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因此有一回當他知道了這些之外還有更好的，無窮無盡的希奇事的時候，他「不免神往，在他腦裏翻起了許多想像。那兒當他遇見一個擲下孩子的時候。這鄉下孩子和豫才底年齡相彷彿，是豫才家裏一個短工底兒子。他底名字豫才早聽到過，不過沒有見過面。有一年周家一件大祭祀值到豫才家裏。這種大祭祀要三十多年才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要勤偷去。』他「家底短工忙不過來，便對他父親說，可以叫他底兒子來管祭器。豫才底父親允許了，豫才因為早聽到過這短工底兒子所以也很高興。」

於是豫才「日日盼望新年」，因為新年一到，那鄉下孩子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豫才說，那鄉下孩子來了，他便飛跑去查看。「他止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是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前許下心願，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不怕豫才，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豫才說話，不到半日，他們便熟識了。豫才早知道這鄉下孩子能裝腔捉小鳥雀，所以他便要他捕鳥去。鄉下孩子說道：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才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吃時，我遠遠地將繩在棒上的繩子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鷄，鶉鴉，搗鷄，藍背……」

於是豫才又盼望下雪。
他又對豫才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撿貝殼法，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我們這裏不算偷的。要管的是攆豬，刺蝟，獐，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獐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豫才並不知道這所謂攆是什麼東西，不過憑他那少年的想像力，他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獐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這時候，豫才憑着天生的想像力，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他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他先前單知道西瓜在水菓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
這是多麼神奇的另一個世界，豫才開始陶醉在想像的大自然之中了。他底靈魂已經和大自然溝通。

可惜正月過去，這鄉下孩子須回家去，豫才急得大哭，那孩子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

那鄉下孩子所說的那捕鳥的方法，會由他底父親實際傳授過。回去之後他還託他父親帶給豫才一包貝殼和幾支很好看的鳥毛，豫才也會送他「兩次東西，但他和豫才之間最好的紀念，還是

那捕鳥的方法。一到冬天，百草園全被白雪蓋着，沒有平時那麼有味，豫才便只好到園裏去掃開一塊雪來捕鳥，本來將他自己撲在雪土印下一個全形的雪人，或者塑雪羅漢，豫才也歡喜的。不過百草園是一個荒園，人跡罕至，沒有人鑒賞，所以不相宜，他只好捕鳥。不過他捕得並不好，「明明看見牠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却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比起那鄉下孩子底父親小半天便能捉幾十隻裝在又袋裏叫着挽着，他是差得遠了。

這百草園的來歷如何，我不知道。據中國普通的情形，封建階級到了沒落的時候，後花園是常常變成荒園或菜園的。覆盆房最有錢的時候，三個台門共有三千多畝田和七八月當店，但洪秀全的軍隊到紹興之前，覆盆房的當店却全都關門掉了。豫才幼年時，他一家只有幾十畝田，和少許店面房子，只不過能够維持生活。但因為豫才底祖父總算還是做京官的，比起同族的別房，恐怕還要較勝一籌。但雖然如此，豫才他們一房畢竟也只是一個差可小康的沒落的富家，所以這百草園如今是個菜園，恐怕也非偶然。但這對於豫才有什麼大不了呢？他以百草園為樂園，而且只要百草園是他底樂園也就好了。這是一個小小的自然界，裏面有「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單是園子周圍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對豫才就有無限的趣味。「油蛉在這裏低唱，蟋蟀們在這裏彈琴」。他「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只要他「用手指按住牠底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竄出一陣烟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臃腫的根。他曾經聽見有人說過，「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因此豫才常常「起勁地去拔起牠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他「也會因此弄壞了泥牆」，可是那像人的何首烏根，他却終於不會發見。他是希望能够發見的，首先像人的根最再有趣不過的事了，而且假使吃了成仙，到月宮裏去，更是何等有趣？

那舊盆子，「像小珊瑚珠攪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好得遠」，倘使他不怕刺，他也可以去摘來吃。豫才並不很循規蹈矩，有些時候他也頑皮起來，拔何首烏藤自然不消說，而且會把泥牆毀壞，有時他還將磚頭拋到隔壁的梁家去，像他站到園子裏石井欄上去跳下來這樣的專，他家裏知道，就應該給他挨一頓罵的了。

只有那長草叢裏，他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有一回長媽媽曾經告訴他一個故事，說先前有一個讀書人住在古廟裏用功，晚間，在院子裏納涼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答應着，四面看時，却見一個美女的面露在牆頭上，向他一笑，隱去了。他很高興；但竟給那走來夜談的老和尚識破了機關。說他面上有些妖氣，一定遇見「美女蛇」了；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喚人名，倘一答應，夜間便要來吃這人的肉的。他自然嚇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無妨，給他一個小盒子，說只要放在枕邊，便可高枕而臥。他雖然照樣辦，却總是睡不着，——當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來了，沙沙沙！門外竟是風雨聲，他正抖作一團時，却聽得豁的一聲，一道金光從枕邊飛出，外面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那金光也就飛回來，斂在盒子裏。後來呢？後來，老和尚說，這是飛蜈蚣，牠能吸蛇的腦髓；美女蛇就被牠治死了」。

結末，長媽媽底教訓是：「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牠」。

這故事使豫才覺得做人的危險，夏夜乘涼，便往往覺得有些擔心，「不敢去看牆上，而且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樣的飛蜈蚣」。走到百草園草叢旁邊的時候，他也常常這樣想。不過長媽媽的結束的教訓，豫才倒並不佩服。因為這位長媽媽常常有許多討厭的教訓，使得豫才不耐煩，比方說「人死了，不該說死掉，必須說「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裏，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揀起來，最好是吃下去；曬褲子用的竹竿底下，是萬不可鑽過去的——」媽媽

給豫才的大道理，此外還有許多，豫才覺得都是煩瑣之至，非常麻煩的事情。

她是帶領豫才的女用人，說闊氣點，就是保姆。豫才底母親和許多別的人都稱呼她為保姆，只有豫才底祖母叫她阿長。豫才平時叫她阿媽，連「長」字也不帶，但到憎惡她的時候，就叫她阿長。她生得黃胖而矮，夏天和豫才睡在一牀的時候，她伸開兩腳兩手，在牀中間擺成一個「大」字，擠得豫才沒有餘地翻身，將他烤得火熱，推她也推不動，叫她也叫不響。

豫才便只好去向她母親訴苦，訴了多回之後，母親告訴長媽媽說：

「長媽媽生得那麼胖，一定很怕熱罷？晚上的睡相，怕不見得很好罷？……」

然而這樣的交涉一點效力也沒有，豫才熱得醒來的時候，「仍然看見滿牀擺着一個「大」字」。這大約是一個很粗鄙的鄉下的俗女人。童年的豫才得了這一位同伴日夜相處，已經明顯的感到覺得不舒服，他底個性在這時候已經很看得出來了。她不許豫才走動，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就說豫才頑皮，要告訴豫才的母親去。這也怪不得長媽媽，中國教育兒童的普遍方法是要把一個兒童教得拘拘謹謹大起來低眉順眼。景宋在「魯迅的日常生活」裏，說到魯迅一生「對於衣服極不講究，也許是一種反感使然：據他自己說，小的時候，家人叫他穿新衣，又怕新衣弄污，勢必時常監視警告，於是乎坐立都不自由了，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所以他後年對於他底兒子海嬰的衣着也不願意叫他費心。可見魯迅對於拘束他的舊教育反感之深。這確實等於殺害兒童底精神，有個性的兒童自然要反抗，長媽媽也因此很得不到豫才底尊敬，他甚憂心他家的一些小風波都和她底「切切察察」有些關係。原來她又喜歡切切察察低聲向人絮說些什麼事，「還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着對手或自己鼻尖」。這些都使豫才覺得討厭。

然而有一個時候，他也對她發生過空前時樣意。她常常對豫才講「長毛」的故事。她所說的「長毛」，「不但洪秀全輩，似通通後來一切土匪強盜都在內」，魯迅在「病後雜談之餘」裏記

辯道：「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得最多，但她並無邪正之分，只說最可怕的東西有三種，一種自然是「長毛」，一種是「短毛」，還有一種是「花綠頭」。到得後來，我才明白後兩種其實是有官兵，但在愚民經驗上，是和長毛並無區別的。有一回，她告訴豫才說先前長毛進城的時候，豫才家裏全家都逃到海邊去了，「只留一個門房和年老的煮飯老媽子看家。後來長毛果然進門來了，那老媽子便叫他們「太王」——據說對長毛就應該叫，——訴說自己的飢餓。長毛笑道：「那麼，這東西就給你吃了罷！」將一個圓圓的東西擲了過來，還帶着一條小辮子，正是那門房的頭，煮飯老媽子從此駭破了膽，後來一提起，還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輕輕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駭死我了，駭死我了……」

豫才那時倒並不怕，因為他覺得這事和他毫不相干，他不是一個門房。「但她大概也即覺到了，說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長毛也要擄的，擄去做小長毛。還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擄」。

「那麼，你是不要緊的」。豫才以為她一定安全了。她既不做門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況且她頸子上還有許多灸瘡疤。

「那里的話？」她嚴肅地說。「我們就沒有用處？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砲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這實在是在出乎豫才意料之外的。他一向只以為她滿肚子是麻煩的禮節罷了，却不料她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從此對於她就有了特別的敬意。

（以上未註明出處的引號中文，出自「接濟」，「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及「阿長與山海經」。）

故事想像的世界

豫才睡覺的牀前帖着兩張花紙。一張是「八戒招贅」，一張是「老鼠成親」。那張「八戒招贅」，滿紙都是長嘴大耳，豫才不大喜歡，却喜歡

那些尖腮細腿，像煞讀書人的，都穿紅衫綠褲的老鼠新郎，新婦，以至價相，價客，執事。他極其神往這「老鼠成親」的儀式，相信能舉辦這樣大的儀式的，一定只有他喜歡的鼯鼠。正月十個日的夜，他就不肯輕易便睡，要等候老鼠們底儀仗從牀下出來。但結果仍只看見幾個光着身子的鼯鼠在地面游行。

貓是要吃老鼠的，但吃老鼠最厲害的是蛇，童年時候，豫才底祖母常講謎給豫才猜，講故事給他聽，有一回他祖母講給他一個故事說貓是老虎底先生，老虎底一切撲，捉，吃的的方法都是貓教給牠的。貓教完了這些，老虎便以為本領都學到了，覺得只有老師的貓比自己強，便向前去撲貓，那知貓早曉得它底來意，一跳便跳上樹，老虎却只能眼睜睜地在樹下躑躅。原來貓還沒有將上樹的本領傳授給老虎。豫才聽了這故事，覺得貓有點妖氣。

有一回，豫才聽見一間空屋裏，有大家叫作「老鼠數銅錢」的「咋！咋咋咋！」的鼠叫聲。這聲音是表現老鼠遇見蛇追殺的可怕的絕望的恐怖。他推進門去，看見一條蛇伏在橫樑上，地上躺着一匹鼯鼠，口角流血，只有兩脅邊一起一落。他救起了那隻鼯鼠，給躺在一個紙盒子裏，大半天之後，就醒過來了。後來牠就復了原，但是不逃走，放在地上，也時時跑到人面前來，而且綠腿而上，一直爬到膝踝。給放在桌上，便檢吃些菜渣，舐舐盤沿；放在他底書桌上，「則從容地游行，看見鏡台便舐吃了研着的墨汗。」這使他非常驚喜了，原來他聽見他父親說過，「中國有一種黑猴，只有拇指一般大，全身的毛是漆黑而且發亮的。牠睡在筆筒裏，一聽到磨墨，便跳出來，等着，等到人寫完字，套上筆，就舐盡了視上的餘墨，仍舊跳進筆筒裏去。」原來這樣的小孩想像力很豐富，看了劍俠小說，很有可能去做劍客的，他父親說的這個故事，當然使他非常

憤慨，他「極願意有這樣的一個墨猴。可是得不到」，便以隱鼠來代替他憤慨中的墨猴，雖然這並沒有故事中的墨猴那末好，但也可以聊勝於無，況且隱鼠在某處客點上都這樣可愛，他一向對隱鼠又抱好感；他祖母恨兒子「鬧破箱子，偷吃東西」，而他却以為這算不得大罪，所以這隱鼠便成了他理想中的愛侶了。這能够辦那麼大的破觀義式的可愛的嬌小的鼠乎。

這位隱鼠大約做了他一兩個月的伴侶，後來有一天忽然不見了，這便惹起非常的寂寞，後來還有長媽媽看見他一天老是等着隱鼠，等得太苦了，才輕輕告訴他說隱鼠是在前一天晚上被貓吃去了。這消息即刻使他憤怒，悲哀，那在她早覺得有點妖氣的貓，便成了他底敵人了。

可是經過了許多日子之後，他又偶然得到一個意外的消息，說那隱鼠並非被貓所害，倒是緣着長媽媽底腿要爬上去，被她一腳踏死了。

原來踏死他底隱鼠的却是她，在這時候，他便不再叫她長媽媽，要叫他祖母底真氣，叫她阿長了。可是他種的感憤也終於並沒有緩和。公頭驪內文，鼠自狗，貓，鼠）

神佛的環境

紹興有佛神之國的確稱呼，講到這些迷信，全中國實在都一樣，紹興不過迷信更深一點罷了。主歷鈔傳裏的故事，在紹興特別得到信仰，因此，死後與來世這東西對一般老太婆的憫憐力也非常之大，所以紹興朝香的老太婆也特別多。和玉歷鈔傳不能分離的是城隍廟與東嶽廟，這兩個廟在紹興城內的地位很高。廟內都有泥塑的十殿閻王，每殿都按照玉歷鈔傳上的故事塑出人類經過各殿所受的醜刑。這十殿的醜刑不但能嚇中國人，而且還教會了中國人用酷刑的許多聰明，在中國曾經發生過很大的支配力量，廟中大殿的後面還有一間暗室，叫作「陰司間」，在才可辨魚的昏暗中，迎着各種鬼：吊死鬼，跌死鬼，虎傷鬼，科場鬼，而一進門所首先看見的是那一手拿着鐵索的勾魂使者「活無常」。有

些地方的「陰司間」門口還裝一塊活板，人一過門，踏活板的一端，那一活無常便會撲過來，將鐵索套在你頸子上，這當然非常可怕，有時甚至會嚇死人，所以近來大約是不再有什麼地方的「陰司間」裝有這種活板了。

這位活無常雖然是勾魂使者，却為地方上的鄉野農民所愛好，在看目連戲或大戲的時候，豫才也和其他的看客們一樣，坐在船上的心情，完全和平常兩樣。平常夜愈深愈懶散，這時却意起勁。因為這位無常雖說是鐵面無情的鬼，却有些近人情，當迎神賽會的時候，人們給他扮一個老婆，扮一個兒子跟在背後，並且有一個捧着一盤飯菜的小丑似的脚色走在後面，使他限定這脚色，搶盤中的飯菜吃，而那脚色却故意不給他吃，加上跟在他背後的老婆兒女，便成了一個很滑稽可親的場面。可見人們惟獨對於這位鬼最爲親密，最爲稔熟，「有人說，他是生人走陰，就是原是人，夢中却入冥去當差的」。離豫才家裏不遠的一個小屋子裏，有一個男人，便自稱是「走無常」的，「門外常常燃着香燭」。中國人迷信之深，而且有着這些特別的形式於此可見了。

迷信在中國社會中很深，很普遍，但堅決的，便裏便氣的信仰者却反而很少。這兩件事，照理是應該互爲表裏的。而中國却並不。比方豫才底龍師父就是一個討老婆養養子的和尚，和尙底大兒子也是一個有家小的和尚，不過他沒有他底父親那樣高明，敢於泰然無事地有着家小，而却對豫才保守秘密罷了。

師父底第二個兒子只比豫才大十歲，和豫才的感情還好。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兩排艾絨放在他剃得精光的額門上，同時燒起來，豫才早就很替他擔心，覺得他總不免要叫痛的，每一想到便十分心焦，彷彿受戒的是他自己一般。可是他底師父却有法子叫他兒子不叫痛，「他不脫戒律，不談教理，只在當天大清早，」叫了豫才的師兄去，厲聲吩咐道：「拼命熬住，不許哭，不許叫，要不然，腦袋就炸開，死了！」這個方法，「比什麼「妙法蓮花經」或「大乘起信論」還有力

，和尚也很知道他所相信的迷信沒有什麼大法力，但用牠來恫嚇小孩或年輕人，倒有力量，因此這大戒禮便得以順利地在許多善男信女觀光之下莊嚴地進行了。中國有許多哄動一時的什麼名寺名山的火戒儀式，恐怕也免不了這當天大清早的厲聲恫嚇吧？豫才底師兄「雖然兩眼比平時水汪汪，但到兩排艾絨在頭頂上燒完，的確一聲也沒有出。」豫才這才噓一口氣，「如釋重負，」，「善男信女們也個個「合十讚嘆，歡喜佈施，頂禮而散」了。」

師兄在恫嚇之下受了大戒，從沙彌升爲和尚，可是和尚見識一廣，還是不能永遠心服或駭怕他所相信的神佛，於是便想女人，作爲這「相思」或「單相思」的媒介的是「結」。紹興的閩人家，「一有喪事，每七日總要做一些法事，有一個七日，是要舉行「解結」的儀式的，因爲死人在未死之前，總不免開罪於人，存有冤結，所以死後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這天拜完經懺的傍晚，靈前陳列着幾盞東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盞是用麻線或白頭繩，穿上十來文錢，兩頭翻翻成蝴蝶式，八結式之類的複雜的，頗不容易解開的結子。一羣和尚便環坐桌旁，且唱且解，解開之後，錢歸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結也從此完全消失了。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誰都這樣辦，並不爲奇……不過解結是並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測，個個解開的，倘有和尚以爲打得精緻，因而生愛，或者故意打得結實，很難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個落到僧袍的大袖裏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結，到地獄裏去吃苦。這種實結帶回寺裏，便保存起來，也時時鑒賞……當鑒賞的時候，當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結子的是誰呢，男人不會，奴婢不會，有這種本領的，不消說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就不免親視恩人……」豫才的師兄曾經把這種結分幾個給豫才過，豫才親見過「有些實在打得精巧，有些則打好之後，浸過水，還用剪刀柄之類碾過，使和尚無法解散。解結，是替死人設法的，現在却和和尚爲難。」這明明是要給和尚吃苦，「頗有點虐待異性的病態的。」可是當時的豫才並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直到二十年後，他學了醫學，這才知道的。

「深閨的怨恨，會無線電似的報在佛寺的和尙身上，」中國的遺學先生是沒有預料到的。

這位師兄後來果然有老婆了。不過他也和他底哥哥一樣對孫才嚴守秘密，「道行遠不及他的父親」。孫才「不知從那裏聽來了和尙遵守清規之類的古老話，還用這話來嘲笑他，本意是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點不窘，立刻用「偷刪怒目式，」和尙才大喝一聲道：

「和尙沒有老婆，小菩薩那裏來？」

（引號內文，出自「無常」和「我的第一個師父」）

從大自然看
到了善與美

我們已經知道孫才看迎神賽會是很有勁的了。他也喜歡獼猴舞羊，石子變白鶴等等遊江湖的江北人變的戲法。而他最喜歡，對他的幼年生活有極大關係的是看戲。許壽裳曾經記下他母親底一段談話說：

「在十餘歲時，胡家祠堂裏演戲，他事先已經看好了一個地方——遠處的石凳。不料臨時母親所阻止，終於哭了執意要去，至期大門已關，不得進去。後來知道這一天，因為看客太多，擠得石凳斷了，摔下來，竟有被壓斷脛骨的。他之不得其門而入，幸哉幸哉！」

舊時候的中國，還沒有專門的劇場，特別是如紹興一樣的小城市或鄉村裏，凡做戲總帶着一點社戲性，供着神位，是看戲的主體，人們去看不過是切光。至於「大戲」或「目連」戲則不但請神，還要請鬼，尤其是橫死的怨鬼，儀式就更緊張，更嚴肅。看這種戲不用買坐位，地方是在空曠的田野裏，任你站着看，官紳或女人出來看戲，要想坐，也只好自己或托人預備好坐位。但看戲的大多數是鄉野的勞働者，所以這種戲如同迎神賽會一樣是大衆底娛樂之一，很原原始社會中的帶有祭祀性質的舞樂。供神與不供神的戲，鄉野的勞働者可以享受是一樣的，不過，不供神的戲，在上流的讀書人底眼精裏便地位低了，看的人就更是鄉野的農民爲多。

「大戲」和「目連」，雖然同是演給神，人，鬼，春的戲文，但兩者又很不同。不同之點：一在演員，前者是專門的戲子，後者是臨時集合的 Amateur——農民和工人；一在劇本，前者有許多種，後者却只好歹總只演一本「目連救母記」。然而開場的「起殤」，中間的鬼魂時時出現，收場的好人升天，惡人落地獄，是兩者都一樣的。」

目連戲「當沒有開場之前，就可看出這並非普通的社戲，偽的是台兩旁早已掛滿了紙幡……是給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內行人，緩緩的吃過夜飯，喝過茶，閒閒而去，只要看掛著的幡子，就能知道什麼鬼神已經出現，因為這戲開場較早，「起殤」在太陽落盡的時候，所以飯後去看，一定是做好了合一餐了，但都不是精彩的部份。「起殤」者，紹興人現已大抵誤為「起毀」，以為就是召魂，其實是專限於橫死者的。」——在薄暮中，十幾匹馬，站在台下了，戲子扮好一個鬼主，畫面鱗紋，手執鋼叉，還得有十幾名鬼卒，則普通的孩子都可以應募」。豫才「在十餘歲時，就曾充過這樣的護勇鬼，應上台去，說明志願，他們就給在臉上塗上幾筆彩色，交付一柄鋼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擁上馬，疾馳到野外的許多無主孤墳之處，環繞三匝，下馬大叫，將鋼叉用力的連連刺在墳墓上，然後撲又馳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聲，將鋼叉一擲，釘在台板上——就算完結，洗臉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頓竹篾——這是紹興打孩子的最普通的東西——以罰其帶着鬼氣，二以賀其沒有跌死，」但豫才却幸而從來沒有被發覺，所以不會因此挨過打。

「這一種儀式，就是說，種種孤魂厲鬼，已經跟着鬼王和鬼卒，」前來看戲了，「但人們用不着操心，他們深知道理，這一夜決不絲毫作怪。於是戲文也接着開場，徐徐進行，人事之中，夾以出鬼。」以後還出吊死鬼，出男的叫「跳男吊」，出女的叫「跳女吊」，到了收場，就是好人升天，惡人「惡貫滿盈」，閻王出票來勾攝了，於是乎豫才和看客們所最熱衷的「活無常」便

在台上出現。

普通的社戲，儀式比較的沒有這麼嚴肅。講到這社戲，又想起豫才底師母和龍師父愛上了的故事。原來龍師父年青時，「是一個漂亮而能幹的和尙，交際很廣，認識各種人。有一天，鄉下做社戲了，他和戲子相識，便上台替他們去敲鑼，精光的頭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風頭十足。鄉下人大抵有些頑固，以為和尙是應該唸經拜懺的，台下有人罵了起來。師父不甘示弱，也給他們一個回罵。於是戰爭開幕。甘蔗梢頭雨點似的飛上來，有些勇士，還有進攻之勢，「彼眾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只好慌張地躲進一家人家去。而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婦」。後來這寡婦就成了豫才底師母。豫才參加這種熱鬧的社戲還有一個好機會，那便是到外祖母家裏去。他母親每年都要到外祖母家裏去住幾天，這時他便也每年跟着母親到外祖母家裏去。母親和外祖母都很愛他，他在那裏得到特別的優待。那地方叫作安橋頭，亦稱安橋村，是聚族而住的一個小村坊，族人都是姓魯，大約有二十餘家，都以種田，打漁為業，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而且只有豫才底外祖他們一二家是讀書的，外祖父是前清舉人。這村坊離海邊不遠，非常偏僻，村前有一條小河景物風色都非常好，豫才在這裏，得以和他家長工底兒子口中所說的那美好的大自然相接觸。所以這外祖母家，又成了百草園之外的，他底另一個樂園。這大自然在他底心靈裏灌以養料，使他底生命豐富起來，以後在他底創作中放出令人神往的光彩。在他底多數創作中，我們看出他愛這大自然界的深切，他底心靈立刻以這為他底歸宿了，就是到了他底晚年，他也不曾將他底靈魂從這兒分開。作為封建社會及上流人物底叛臣的後年的魯迅，對他自己所從以出身的社會中的一切都抱憎惡，只有對這大自然，他永遠愛戀。對那大自然中的農民，他也永遠抱着憐憫與深切的愛。後年的魯迅，生活在近代的殺伐與帝國主義操縱的都市之中，使他和鄉村分離，並且他也知道了鄉村所處的地位，但他對於這都市却不感覺愛。他並

不高唱回到自然；像自然主義者所做的那樣，他就不會，不過他在沒有知道了罪惡底來源之前，已經看見了惡的對比物，那善與美的本身了。因此惡更在顯明彰著，而他也就更加深愛這善與美，從那時候起，他就不知不覺投入這善美的懷抱中，成爲日後的惡底不妥協，不屈不撓的死敵。豫才底靈魂因此更加得到豐富的力量與生的希望。將來的人類合理的社會，當然並不是單純的自然本身，不過從自然界中，就是一個小孩也不難得到樂園與天國的暗示，那裏面寓含着人類合理生活的原素，所以對於自然的無限的憧憬，無限的愛，是豫才童年生活底主要的一面。那時他到了鄉下，還得到許多農家的小朋友一同遊玩。因爲豫才是遠客，小朋友都從父母那裏得了減少農家工作的許可。在小村裏，大家親密相聚，一家底客，幾乎就是公共的。小朋友們和豫才底年紀都相彷彿，他們的「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來穿在銅絲做的小釣上，伏在河沿上去釣蝦」。其次便是去放牛。而他所第一盼望，還是到離開安橋頭五里的一個較大的村莊去看戲。從安橋頭到那村莊去所經過的是水路。船從安橋頭村前的河流出發，經過沿河的無限好景色，通過一個松柏林，——這松柏林，豫才也會去玩過——轉了彎，便到了。看戲的人可以坐在水裏的船上，所以他們底船一到，盡力把船駛進許多船中間去，擇定位置，下了篙，便只要在船上看了。這也可以說，紹興底特色。大家都坐在水裏的船上岸上的戲，在中國頗不易得。

豫才最喜歡看的是「一個人戴了白布，兩手在頭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頭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黃布跳老虎」。將他喜歡隱匿的事，和這件事加以聯想，豫才在氣質上多少受了點讀書人家的影響，這種纖細，嬌嫩的感覺，是神經質的，他後年觀人察物的那種細緻性與極端性，扶弱抑強的那種誠性，與他所取的那種曲曲折折，忍耐，堅持的戰鬥途徑，和他這種氣質，都有分不開的聯。

（以上引號內文出自「女吊」我的第一個師父」，「社戲」）

抄書和圖畫的
興趣之發生

豫才六七歲起，就隨他底慈母盧翁先生在穎川路。但這時候的讀書，實東還沒有很嚴厲，豫才自然還可以常到百草園和鄰近的地方去玩，到了十歲，他就被送進一個全城稱爲最嚴厲的書塾裏去了。這書塾離豫才家不遠，「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從「扇黑袖的舊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着一塊扁擔，三味書屋，屋下面懸着匾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舊塾的上學，總在正月裏的，學生們上學的時候，便對着那扁擔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天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名字叫作壽鏡吾，字懷鑑，「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豫才對他很恭敬，因爲他早聽到說這位懷鑑先生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而博學的人。

豫才不知從那裏聽來的，說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他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可是無從探問，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爲他知道她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麼一回事？……」他上了書，將要退下的時候，就趕忙問。

「不知道！」先生似乎很高興，臉上還有怒色。

這種態度豫才遇見過好幾次，年紀比他大的往往如此。他這才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

那麼他就只好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最初幾天，先生對他很嚴厲，後來才好起來了，不過給他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法，從五書到五音，終於到七言」。原來豫才是一個聰敏的孩子。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裏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幾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蟥，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裏去了？」

「人們便一個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談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讓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大齒缺曰狗寶太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厥土下上錯厥頁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大家底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先生還大聲朗讀着：——

「鑽如蠶，指揮備儻，一座皆驚呢——金巨羅，顛倒淋漓噓，千杯未醉嗎——」。

他讀到這裏，「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着，向後拗過去，拗過去」，豫才某心還是很好的文章。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對於學生是很便宜的。有幾個人便用紙糊的套甲套在指甲上做戲。豫才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荊州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寫一橫」一樣。可是這種事塾師是要禁止的，存心還要打手心。小朋友們如果專讀「人之初性本善」，讀得要枯燥死的時候，「只好偷偷地翻開第一頁看那題着「文星高照」四個字的惡鬼一般的魁星像，來滿足幼稚的變美的天性。」豫才底家庭裏，比書塾裏的禁令較寬一點，可以在大眾前面冠冕堂皇地閱看「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和「玉歷鈔卷」，「都畫着冥冥中窮善罰惡的故事，雷公電母站在雲中，牛頭馬面布滿地下，」這和現代的學校裏不准買看閒書，只許知道品行有甲

、乙、丙、丁是一樣的道理。

除了公開閱看「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及「玉歷鈔簿」之外，豫才還去找別的圖書來看，看了高興就描畫下來。他所看的那些陰間的圖書，都是家藏的老書，但他家裏原有的幾箱藏書，却多是經史及學業的正經書，有畫可看或是較有趣味的書，除這些陰間的圖書之外，便只有「聊齋志異」、「夜談隨錄」、「三國演義」，「綠野仙蹤」，「酉陽雜俎」，「素齋隨筆」、「數耕錄」、「池北偶談」，「六朝事跡類編」，「西堂叢書」、「金石存」及「徐霞客遊記」等。到了新年，他們要出城拜年，來回要一整天，一路都坐在船裏的。豫才和他底兄弟便將此類書本放在「帽盒」中帶去看，省得在船中枯坐無聊。帶去的書，也有的是從別人裏轉借來的，若看了這轉借來的書特別覺得欽佩，便回家來抄，豫才底抄輯書籍的興趣，起因於這些時候。

在豫才他們家族而住的宅子裏，藏書最多的，要算他遠房的一個叔叔，而且特別。「他是一個胖胖的，和藹的老人，愛種一點花木，如珠蘭，茉莉之類，」還有極少見的據說是從北方帶回去的馬纓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麼也莫明其妙，曾將晒衣服的竹竿擱在珠蘭的枝條上，枝折了，還要憤憤地咒罵道：「死屍！」這老人是個寂寞者，因為無人可談，就很愛和孩子們往來，」有時簡直稱豫才為「小朋友，」制藝和試帖詩，他自然是有的，但豫才却只在他的書齋裏看陸璣的「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和許多名目很生的書籍。他那時最愛看的是「花鏡」，上面有許多圖。叔叔，告訴豫才說，「曾經有過一部繪圖的『山海經』，畫着人頭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現在不知道放在那裏了」。

豫才很願意看看這樣的圖書，不過豫才雖說是一個天真的小孩，也初懂了一點人情世故，他知道他叔叔很疏懶，「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尋找」。問別人吧，誰也不肯真實地回答他。歷歲錢他雖有幾百文，要去買，又沒有好機會。買書的大街離豫才底家很遠，他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間去玩

一趨，那時候兩家書店都緊緊地關着門。

「玩的時候倒是沒有什麼的，但一坐下來，就記得『山海經了』。

大概是因為過于想念，後來連阿長也來探問，『山海經』是怎麼回事了。豫才向來沒有和她說過，他『總知道她並非學者，說了也無益；但既然來問，也就都對她說了。』

「過了十多天，或者一個月罷，……是她告假回家以後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藍布衫回來了，一見面，就將一包書給『豫才』，『高興地說道：——

「哥兒，有畫兒的，『三哼經』，我給你買來了！」

豫才『似乎遇着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趕緊去接過來，打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人面的獸，九頭的蛇，……果然都在內。』

這又使豫才『發生新的敬意了，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確有偉大的神力。謀害隱鼠的怨恨，從此完全消滅了。』

這四本書，是豫才『最初得到，最爲心愛的寶書』

此後他『就更其有勁的搜集起繪圖的書來』。

（以上引號內名未指明出處的，引自『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二十四孝圖』，『阿長與山海經』）

第二節 萌芽了對社會的批判的目光

一八九三——一八九七：十三歲——一七歲

資本主義侵入
腐敗的中國

當豫才初知人事的時候，正是世界史與中國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時期。歐戰就是在這個時候醞釀的。當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間，國際資本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九十年代的獨佔結合正是經濟生活的基礎。世界經濟的市場，資本爲了運轉剩餘價值，利用一切機會與手段，侵入經濟落後的諸國，將亞細亞及阿非利加諸民族加以征服與奴化。當時已有德、意、奧三國同盟的存在，三國同盟以較之歐洲其他諸國成熟得過的德國爲首，極力向既已將世界上大多數的殖民地納入手中的英法諸先進帝國主義爭鬥，德國當時的口號是 *Drang nach Osten*，即向東洋，不過這時候世界市場多已被分割了，德國底殖民政策要想毫無阻礙地向外施展却很不容易，所以他們雖說向東洋，但能够傾力經營的還只能限於近東。雖然一八九八年，德國在中國也佔去膠州灣，但在中國領頭的，還是要推英法各國。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以來，中國底門戶是早已被打破了。雖然，各處排外的自發的民衆騷動一時會甚高漲，但經過太平天國及捻亂，回亂之後，反動昏庸的清廷又復在國內暫時穩定了腐敗的統治，讓各帝國主義任意宰割中國，安南和緬甸就是正當豫才底童年時代送了的。帝國主義底商品，不消說已經普遍地侵入中國內地，這時的紹興民衆，也不免要用起洋貨來了。作爲帝國主義底先鋒部隊的教士跑入中國各處的鄉村，於是各種希奇古怪的洋鬼子的故事便在街頭巷尾到處傳

說，有的說洋鬼子要挖人眼睛的，有的說雞蛋裏與餅乾就是洋鬼子捉小孩去蒸裂的，種種傳說，不一而足，這都可以說是一種仇外心理所轉化而成對外人的恐怖心理；照相館當時也已在紹興城內出現，豫才一穿軍服要在照相館門前經過四五碼，對於「那尺寸長短不同顏色不同的玻璃瓶，又光滑又有刺的仙人掌，（『墳』）「輪照相之類」）「還有掛在壁上櫃子裏的照片。（同上）」——那也是也如現在對要人底相片一樣，是爲滿清屠戮中國解放運動有功的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鮑軍門等，這都使豫才看得流連不捨，走不開去。有一個族中好心的長輩會藉此教育豫才，「說這許多都是當今的大官，平「長毛」的功臣，你應該學學他們（同上）。」但與人都用一種懷疑的眼光去看照相，說精神要被照去，有些地方則說照相是攝取人血而成的，多照了，人必瘦去。就是到現在，還有些窮鄉僻壤的老太婆抱此見解，所以當時光顧的人是決不會多的。但不管對這些較希奇的東西，中國人抱着如何的不安心理，那廉價的外國布，把土布打爛了，玻璃器皿之類跑入中國人家家庭，火油也開始逐去了城市中一部分人家底光芒芒亞樣大的油燈。帝國主義底過剩商品既衝進了中國這個新開的市場，便盡力傾銷。把中國幾千年閉關自守的封建經濟加以外力的猛轟，於是一方面有最頑固最封建的讀書人與朝廷擁護着天地君親師，一方面却有着最新式的機械生產品來奪取中國固有的手工業生產底地位，在通商口岸，居然隆起都市底形式，還未到成熟年齡的女孩，終於大膽便便了。可是滿清政府仍然非特昏庸，地方與中央互不相顧，地方與地方更不相顧，比方拳匪初起的時候，袁世凱把它趕出山東境地，就不管了。甲午戰爭時，劉公島降艦之役，當事者致書呂軍，求放還廣西一盤。書中謂「此盤係屬廣東，此次戰役與廣東無涉云云。各關聞者莫不笑之。」（李鴻章傳）這就是當時各督撫心理底寫照。至於中國國民，在那時除了納稅，打官司，應科舉考試之外，可以說與政治毫無關係。

中央政治呢，操在宮廷女子和種宦底手裏，專事淫樂，搗亂國政，組織革新。他們利用滿清

設法四處找錢，從事淫樂，因此賄賂公行，上行下效，腐敗到了極點。光緒卅年所舉辦的新政，莫如興海軍。但當時的海軍衙門，被人看作是「新內務府」。海軍衙門添設一個輪船公所，願和國就要得一隻小汽船；海軍衙門添設電燈公所，願和國就裝置了電燈；李鴻章雖然想把海軍弄好，但西太后佈置一班專事獻媚的惡少與族人執梃子，百端掣肘，一心要把海軍費括來享樂，凡能獻媚太后的咨科員司都月領巨薪，大阻搜括，每年並照軍功異常獎給，開保一次，不許吏部設議。嚴復說：「甲午之辦國防也，水底魚雷與開花彈子，有以錢滓泥沙代火藥者。……」

不過，儘管滿清政府怎麼腐敗，下層民衆却漸漸覺悟，革新的傾向在這時候重新茁起。船底嫩芽。和外來勢力接觸得最早的是廣東。廣東民衆的排外騷動早在英法聯軍的時候就已發動，及法奪安南，乃有孫中山決志推翻滿清政府，同時康有爲也四處奔走，辦報，講學，宣傳變法了。康有爲辦時務報，創立各省學會，將勞力分佈各省，在京又得到重臣底奧援，驅讓戊戌變法。李鴻章等與外人接觸較多的人，這時也極力權辦洪楊平定之後創設以來的各項洋務：設機器製造局，設造船廠，開煤鐵礦，設輪船局，撰選學生赴歐美留學，辦海軍，設水師學堂，辦電報局，辦織布局，築軍港……等等，這就是所謂中國軍事工業底先聲，總之這時不僅洋貨已經進入中國，各種工業建設也已經過李鴻章等建設海軍的皮毛見解而輸入中國，同時通過康、梁、嚴復等底思想鼓吹，西歐思想也輸入中國，學校，報章，機械等從來少見的東西相繼在中國各處出現，而人民底改革思想也在這情況下針對着腐敗的滿清政府日益普遍。及中日戰爭之後，滿清政府底一切弱點更暴露無餘，改革的風浪就益發高漲，發才就在這個環境中生長。不過當時有新見解的人爲數極少，民衆多在無知的被愚弄狀態中，對洋人和本國政府，頂多只是懷着原始的仇恨與恐怖心理。大多數的文人學士，更不贊成李鴻章底辦洋務，認爲是不祥之物。現在抄錄郭嵩燾與李鴻章來往的兩篇信札，以見當時正在變化的中國社會中守舊的曠書人底面目：

郭氏在倫敦與李氏書，說：「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及至京師，折於喧囂之口，噤不得發。竊謂中國之心有莫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烟，英國士紳，每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攜釁中國之具也，方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來國家之恥，耗竭財力，無一人引爲疚心；鐘錶玩具，家皆有之，呢絨羊布之屬，徧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值，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難阻，至於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謂剛以家諱乘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譁，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陵吾人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莫不知其何心也。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以因而獎飭之曰公論。……嵩燕楚人也，生長愚頑之鄉，又未一習商賈，與洋人相近，蓋嘗讀書觀理，歷舉古今事變而得之於舉世譁笑之中，求所以爲保邦制國之經，以自立於不敝，沛然言之，略無顧忌，而始輩不相諒，實身七萬里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爲陳論矣。」

李鴻章回答他說：「……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議起，鴻章即滙陳煤鐵礦必須開採，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添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其時文相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子孝鳳，於紡運獨痛詆之。……而文人學士，動以崇尚異端，光怪陸離見責，中國人心，真有萬不可解者矣。」

豫才生在讀書人家，他底週圍，當然也都是這些守舊的士紳，所以當時要求改革的新思想雖然已經開始傳佈，少年的豫才能接觸的，恐怕仍不過是洋鬼子故事，呢、絨、鐘、錶，照相館，電報之類及洋學堂一類的傳聞罷了。

不過本乃伊已經接觸到空氣，少年的豫才起馬是必然地和空氣接觸着了。

巨大的生活變化中，豫才所表現的批判的眼光與藝術的興趣。

豫才正在這初知人事，和空氣一接觸就可能起化合作用的時候，豫才底生活發動了一種根本的變化。這僅僅是在他入三味書屋一年之後，其時他年甫十三歲，在京做官的豫才底祖父忽然因為一椿科場案子被清廷通緝。起初避開了，後來終於自往杭州投案，遂下獄；那時杭州的知府與豫才底祖父雖非知友，却是出力幫忙的一人。據說因為他力說豫才底祖父神經錯亂，才把這事攔起了的。周族是秀才舉人的家族，周家四週的人也是秀才舉人社會中的小私有者，他們底眼睛是勢利的，當豫才底祖父在京做官時，豫才底家庭自然不但是周族的台柱，也是地方上「有名有聲」的人家，可是他祖父一下獄，鄉親遠戚底眼光便立刻一變，從前來恭維的人，現在也許來落井下石，加之豫才一家全賴他祖父維持，他祖父一不能生產，那四五子敵水田和少許店兩灣子出患有根，而和豫才母又多，所謂坐吃山空，家庭經濟也事實上不能不漸露破綻，以加速鄉親戚友對他們的欺侮。此外豫才底祖父是個讀書人，吃不起苦，所以他在牢裏，家庭節省不來對獄吏的孝敬，而帶政專制時代獄吏的苛索則又是公開的私刑，所以為時不久，豫才家裏便破產了。

豫才底父親是不能生產的少爺，豫才自然不能再留塾讀書。不過他得到了一本「二十四孝圖」，使他非常歡喜。這是一位長輩贈給他的，上圖下說，又和「玉歷鈔傳」，「文昌帝君陰騭文圖」不同，圖內多數是人，圖本子又歸豫才個人所有，因此他很歡喜了。圖裏面的故事又誰都看得懂，「便是不識字的人，例如阿長，也只要一看圖畫便能夠滔滔地講出一段的事實」。他歡喜極了。

從這本「二十四孝圖」裏，我們看得出豫才底批判的天才。他請人講完二十四個故事之後，寫這二十四孝便發生反感，自然而然地因為不能贊同而覺得掃興。

我們從前頭知道他是「個活潑而傑敏的孩子，他底母親與祖母都很愛他，他也不會蓄意忤逆

，倒極願孝順。不過以他那小孩的直覺的頭腦來解釋「孝順」，以為是只要「聽話」，長大之後給年老的父母好好吃飯便罷了。那知他聽了這二十四個故事之後，才知道並不這樣容易，對於想做孝子的真心妄想便到了幻滅的地步。

對於「哭竹生筍」，「臥冰求鯉」這樣的虛立的奇蹟，他就懷疑，不肯相信，而其中最使他不解，使他發生反感的，是不近情理之極的「老萊娛親」與「郭巨埋兒」兩個故事。

童年看過「二十四孝圖」的人，現在假使細細地回憶一下童年看圖時候的感覺，或許有些人會記得起對那個裝着小孩模樣的老頭子，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快嗎？不過我們那時不敢相信自己底不快是合理的，我們只以為年長的人或者還有更多的理由為我們所不知道罷了。我相信只要是孩子，全世界的孩子不會對老萊子有好感的，不過有的隱藏些，有的強烈些，有的不自覺些，有些自覺些，有的微弱，浮淺些，有的濃重深刻些罷了。天才的豫才底感覺便是很強烈的。他覺得是羞辱，再也不看第二回，遇到這一頁，便急遽地翻過去了。

同樣是搖咕咚的人，但遇見搖咕咚的老萊子，他却閉上眼睛，遇見搖咕咚的郭巨底兒子，他却很同情。那時豫才家裏正一天天壞下去，常聽到父母愁柴米，他祖母又老子；豫才明白地覺得，倘使他父親學了郭巨，那麼該正是埋他的時候，存心教人埋兒成孝的儒者，這陸却帶繪作爲「兒」的豫才一種恐怖，他底父母愁窮，竟使他也更駭怕，而對於那白髮的老祖母，他也覺得對他底生命有妨礙，和他有點不能兩立，怕於看見她了。這情形一直繼續到她去世。這正是一種生之意志的表現。不過普通的小孩，雖然是誰都有生存本能，但像豫才這樣表現得強烈的，恐怕很少，這正是豫才之所以能够成爲後年的魯迅的特點之一。

豫才拿到這些圖畫本子，一方面仍然非常有興趣地描畫。後來他們底家境日壞，一家分散，他和他底兄弟被寄養在大舅家裏，在大家庭裏冷落與凌辱中，還去借些鴉片畫來，一張張地影攝

。他底描法非常仔細，不肯馬虎一下，「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洽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描了一半暫時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却畫壞了，豫才跑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周作人：「關於魯迅」）這是他從大舅父家回家以後的事情。原來他在那邊受不住人家底奚落，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所以他便決心回家了。他在舅父家裏看見過一本「毛詩品物考」，非常歡美，後來歷歲鏤——這是在年三十夜，長輩送給小孩的錢——等略有積蓄，不想再借抄，開始買書的時候，便去買了「花鏡」和兩冊石印——那時已經有石印了——的「毛詩品物考」來，此外如「爾雅音圖」，「點齋叢書」，和「詩畫舫」也先後買到，長媽送他過的那「山海經」，他又另外買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圖讚，綠色印畫，字是紅的」，比長媽媽送豫才的那木刻的「山海經」精緻得多了。「是縮印的郝懿行疏」。畫譜方面，那時的石印本如「芥子園畫傳」等也陸續買到。看了歡喜的書，豫才也喜歡抄，比方他托人去轉借來的唐代叢書裏面的三卷「茶經」和「五木經」，他就抄過，可算是他後來抄古碑的濫。他買書也有點吹毛求疵，偶然看見買來的書有點紙破或墨污便不滿意，要拿去掉換，「至再至三，直到顯計煩厭了，戲弄說，比比姊姊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關於魯迅」）但換來的書還有什麼毛病，怎麼辦呢？就減價賣給同窗，再貼補一點錢去另買一部。

他畫得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綉像，都有一大本。不過待他有了這些成績的時候，金錢上有時却免不了要自己張羅了，畫成的這兩大本綉像，後來他也就以一二百文錢——那時的錢，文計算，還通用銀塊。大約十幾文錢就可過一天，生活程度遠非現在可比——賣給一個父親是開錫箔店的同窗了。

後年他在吶喊自序上這麼說：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人世的真面目。」

這話的確不錯，比起到那長工底兒子所描繪的那海邊的月夜中去，則到這炎涼冷峻的世態中來，又只見得更加必要了。沒有這一段生活，此時的豫才能否成爲將來的魯迅，完全是疑問中的疑問。到過地獄而不上天堂倒無妨礙，但單上天堂而不入地獄，是不足以成大器的。這個時期的生活，對豫才整生的活動，有着決定的作用，他現在是看見人類了，看見人類的真面目，比起他所曾見過的大自然，是一個針鋒相對的比較；這麼醜惡，這麼吝嗇，這麼卑污，這麼自私，這麼殘忍，這麼淫蕩，這麼無聊！不親自走到地獄裏，是不能眼見這地獄中的實在情形的。豫才天生的批判的眼睛已經對考萊子發了第一次的光，到這段生活中，便處處是他底光力生長，壯大約機過了。從此你再也不用掉虛偽的花槍想欺瞞他，他會看破你！物質上的滿足，有如夾在金質中的砂石，只有將這些砂石從金子中提煉出來的時候，金子才會發光，豫才不但在這段生活中確定了他看透一切的角度，並且在意識上，不知不覺與歷史的先鋒部隊結了最初的遠緣。他後年之所以能夠毅然走上真理的路，只不過這種童年意識得了進一步的認識，從而自覺爲更深化的目的與意志罷了；同時，也只有在意識上與歷史的先鋒部隊有了若干共同之點，認識現實社會的眼睛才有銳利的可能性，才有照穿蒙蔽物的可能性。

豫才落在窮困中，寄居在舅父家裏，受盡奚落，決定回來的時候，他父親也正生着一種叫作水腫的大病。所以他底描畫抄書的生活，實在是就不很舒適的了。那時給他父親看病的是一位有名的中醫，診金是每回一元四角，隔天一回。那時的一元四角是一筆巨款，而且又是隔日一次，所以是很不容易張羅的。那時他家裏又沒有人能够生產，便只好將現成東西送到當舖裏去。這時候的豫才差不多天天要到當舖裏去。當舖的櫃台比他高一倍，他在侮蔑中，從這高高的櫃台上接了錢，再到櫃台和他一樣高的藥店裏去給他父親買藥。回家之後，又要忙着別的事。開方的是名醫，這大約是中醫欺騙黃帝子孫的好方法，凡名醫，總有名醫的神妙手段，紹興的名醫底神妙手

段就是藥引用得奇特，這便成了名醫。所以豫才回家來，同時又要忙着對付這藥引。比方說蘆根，要到河邊去掘，經霜三年的甘蔗，就很不容易找到的了。不過無論如何，豫才得要想盡方法去將這些寶物取到手，而且爲了希望他父親病好，他也很是踴躍，結果總還是找來的。正在這豫才底全家限於貧病交迫中的時候，中日戰爭爆發了。中國海軍大敗，日軍攻陷旅順，橫行遼東，受歐美各帝國主義橫殘豎踏的中國，這時又正式在東鄰的小國面前出醜。李鴻章等積年苦心經營的北洋艦隊既完全覆滅，中日馬關條約又割地賠償，於是全國騷然。滿清政府底窮弱至是暴露無餘，富國圖強的論調再行高漲，各種維新主義的老新黨及革命主義的英雄也乘機抬頭，與中會就在這年產生，康有爲也在這個時候大露頭角，全國各地競競業業，紹興的街談巷議也離不了中日戰爭前後的話題。豫才在這時候不但受經濟壓迫，不但受人輕蔑，不但受當店，藥店，醫生的壓迫，而且還要加上青年人所特別容易感受的外國的欺凌吧。就在這重重苦惱中，他父親底病，一天重似一天，到了兩年之後，便漸漸不能起床了，豫才對那些奇特的藥引也逐漸失了信仰，終於有一天這位名醫說：

「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裏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勸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可是，病是不緊的，不過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這不過是看出病已危篤，想抽身脫離干係的話罷了。所以這一天豫才全家都有些不歡，他父親更自覺到自己底病沒有希望了。但也無法可想，紹興城的名醫，除了他之外，的確就只有陳蓮河了，只好再請陳蓮河去。

「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同的名醫的險是圓而胖的，他却長而胖了：這一點頗不同，還有用藥也不同。前同的名醫是一個人還可以辦的，這同却是一個人有些辦不妥帖了，因爲他一張藥方上，總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總而言之，是要繼續從蘆葦中去拿

當店裏的錢，繼續去跑藥舖子。

「薑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註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還有「平地木十株」，蟋蟀到百草園裏去捉，倒不很難，這「平地木」却誰都不知道是什麼植物了，「問藥店，問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才記起了那遠房的叔叔」，就是那愛種一點花木的寂寞的老人，問到了他，才算知道。

陳蓮河醫師又用一種特別的丸藥，叫作「敗鼓皮丸」，這丸藥「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剋服他」。這樣的醫法，在中國是毫不足奇的，許我杜撰他們常以「形」以「義」醫病，破鼓皮能破鼓腫，取其「義」，小孩吃蛋白就要多流鼻涕，便是從「形」去推測的了。豫才自少就患牙痛，這是他父親遺傳給他的。中醫對牙痛最是束手無策，有一回豫才底一個長輩斥責他說，因為不自愛所以才牙痛的，醫生也無法可想。豫才當時不解其理，但也就自己好像蒙了一種恥辱，好久好久都不敢再向人提起牙痛。原來照中醫的道理，齒屬腎，齒損即陰虧，長輩斥他不自愛，就是由此而來的道理，而醫生也會說豫才的牙痛是因為「牙損」之故。但豫才是直到後來看中國醫藥書發見了這一節，才算恍然大悟了中醫的這番妙理的。

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對他們說：「我有一種丹，點在舌頭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你看，這是多麼神奇的道理。「靈苗！」

但點了這「心之靈苗」的苦頭之後，豫才底父親底病還不見效，於是陳蓮河先生也只得推辭了。他又說：

「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

是前世的事……。」

於是我們又想到那「玉歷鈔傳」，想到中國古時的巫婆和鄉下招魂許願之類的醫病法。中醫在束手無策的時候，便伸手將責任往神鬼一推，得到了最後的遁路，同時也是出路。豫才底父親就在這些名醫手中走入牛角尖，終於躺在床上喘氣了。豫才很愛他底父親，當他看見他父親喘了很長久的氣，很是吃力而不能死去的時候，少年的他，只覺得無法幫助父親，「竟至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又覺得這思想的不該，「因為中國的孝子，一到父母將死的時候，是要買幾斤人參，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即使半天也好」的。

正在這時候，鄰居的衍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說他們不該空等，便給他父親換衣，又將紙紮和一種叫作「高王經」的東西燒成灰，用紙包了給他父親捏在拳頭裏，便說：

「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

「父親！父親！」豫才便叫起來。

「大聲！他聽不見。還不快叫！」

這實在是給死者的最大的痛苦！但爲什麼要這樣做，當然是有一定的迷信或禮節作爲根據的。豫才底父親在這種痛苦中死去了。

他父親故去的時候，他剛才十六歲。英美俄法日德各帝國主義正勾心鬥角謀在中國劃定各自底勢力範圍，清廷又大舉外債，予他們以獲得勢力範圍的機會，於是俄國暗暗中以長城以北爲自有，英國視長江流域爲己物，日本亦正謀福建沿海，而當豫才十七歲，法國向清廷要求不割讓他國，租借廣州灣，儼然以雲南兩廣攫入勢力範圍中的時候，德國也深恐落後，急於在中國攫得根據地，便勾結俄國，藉口教士被殺事件發兵佔膠洲灣，帝國主義暗中瓜分中國的勾當，便又引起了舉國人士底震驚；不久之前因強學會被封閉而略受挫折的康梁新黨，這時便又在進步官僚與覺

悟知識份子同情之下，大地活動，倡立保國會。又在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以藉在京各省人底力量，將勢力散佈到各省去。感受維新運動最著的湖南並由譚嗣同、唐才常等與湖南當局的進步官僚同心協力，倡立了一個南學會，創辦時務學堂，又創辦了一個湘學報。天津方面，嚴復、夏曾佑等也發行了一種國聞雜誌，與康梁等底機關紙時務報相呼應，西歐學說如天演論等也由國聞雜誌輸入，維新變法的空氣，至是已十分濃厚。但豫才自父親故去之後，他家裏是更加窮迫了，他變成了一個窮孩子，正是動蕩的中國社會中的一個零丁無告的孤子。他也還常到衍太太家裏去不過已經不是和孩子時候那樣去找無憂無愁的歡玩，却成爲一個少年，可以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闊天了。窮酸的他，常覺得有許多好看好吃的東西想買，只是沒有錢。豫才十八歲的時候，有一天，他同衍太太談到這上面去，衍太太便說：「母親的錢，你拿來用就是了，這不就是你的嗎？」他說母親沒有錢，她就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他說沒有首飾，她又說：「你也許沒有留心。到大廚的抽屜裏，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

豫才聽了這些話，似乎很異樣，便又不到她那裏去了，「但有時又真想去打開大廚，細細地尋一尋」。此後不到一月，就有一種流言說豫才已經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了。這對豫才的自尊心是一個莫大的打擊。豫才雖然沒有做過這事，但「人言可畏」，社會既然認定你做過這事了，你就是做過這事。年輕的豫才又不知道去找衍太太辨解，向大家聲明也無從聲明起，大約只有他母親了解他的吧？可是他已經覺得彷彿是真的犯了罪，連遇見人也駭怕，對母親底愛撫也駭怕了。

人是逼到梁山的。

「好。那麼，走罷！」

走到惡裏去呢？紹興城的人們，他已經連心肝也似乎有些看透，不願再和他們一道了。他毋甯還是願意去找爲紹興人所詬病的人們吧？那時紹興城裏有一個爲全城所笑罵的開得不久的新式學校，叫作中西學堂，漢文之外，還教些洋文和算學。這當然是李鴻章辦洋務的結果。但這學校竟成爲衆矢之的，不容于熟讀聖賢書的秀才們，他們還集了四書的句子，做了一篇八股來嘲諷牠：

「徐子以告衷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朱聞變于夷者也。今也不然，鳩舌之音，聞其聲，皆雅言也。……」起首是這樣的，這文傳遍了全城，人人當作有趣的話柄，那舊勢力的濃厚，是無怪于幾十年的革新，至今還實效很微的。

豫才對這中西學堂也想過一想，但他因爲那裏面只教漢文，算學，英文和法文，所以不想去。「功課較爲別致的，還有杭州的求是書院，然而學費貴」。

在南京有無須學費的學校。于是他便到南京去了。紹興衰落了，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是做幕友或商人。豫才根本不願再留在那熱面人底心肝他早看透了，紹興，也不想做幕友或商人。他要到南京去找無須學費的學校，而入學校是學洋務，賣靈魂給洋鬼子，是只有加倍被人輕蔑嘲笑的。但他堅決要「走異路，逃異地，去尋別樣的人們」，他底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他自便。於是，她哭了。

（以上引號內文未註明出處者，來自「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圖」，「阿長和山海經」，「父親的病」，「瑣記」。）

第二章 走上市民意識的舞台

第三節 思想的雛基

一九九八——一九〇二：十八歲——二二歲

不消說，我們相信豫才到南京是能找到別樣的人們的。偏僻的地方，受時代潮流的激蕩，當然比較大的都市爲遲，爲微弱。當紹興的舊勢力還盤據着他們底堡壘似乎沒有動搖的時候，南京當不能這樣平靜了吧？豫才所找的別樣的人們雖然並沒有明確的輪廓，但總歸新的人物和舊的人物有不同是無疑的，這便好了。至於這不同的別樣的人，豫才不能中意，那是以後的問題，他會採擇；不用我們賞心。而且我們知道，他底生活條件，已經給他底行將執行的「採擇」指出一個大致的方向了。

到南京，他將樟壽這名字改爲樹人，字則照舊。考進一個官辦的海軍學校式的江南水師學校。一進儀鳳門，就看得見這學校內的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煙囪。這學校底功課很簡單，除了英文之外，就只有漢文：「君子曰，顯考叔可謂純孝也矣，愛其母，施及莊公」。做起文章來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類考叔論」，「雲從龍風從虎論」，「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等等的題目。學校內的高桅杆是給學生練習爬的，豫才在這學校內，比較歡喜的還是爬桅杆，因爲繩很高，「烏鴉喜鵲，都只能停在繩的半塗的木盤上。人如果爬到頂，便可近看獅子山，

這跳莫愁湖，……而且不危險，下面張着網，即使跌下來，也不過如一條小魚落在網子裏」；事實上自從張網以來，還不會聽說有人跌下來過。

甲午中國戰敗于日本之後，維新思潮很濃，有些自以爲覺悟了的讀書人，便是年齡到了三四十歲，也看「學算筆談」，看「化學鑿原」，「還要學英文，學日文，硬着舌頭，怪聲怪氣的朗誦着，對人毫無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書」，看洋書的緣故是要給中國圖「富強」。」這種舉動，並不受官庭禁止，恐怕到處都遇得見，即使紹興沒有，踏出紹興，恐怕就不難接觸到這種現象。以少年的熱血，感到帝國主義壓迫的豫才，當然也願意力求富強之道。因此水師學校雖然免費，不過那樣簡單的功課，顯然不能滿足他底要求，而且據他自己說，那學校有些烏煙瘴氣。所以到了第二年，他便另外去考入一個礦路學堂。這正值戊戌政變之後，代表市民意識的改良思想的康梁新黨既遭了嚴重的失敗，在豫才週圍的世界便展開了激烈的反動與更尖銳的民衆運動的糾葛。西太后臨朝訓政以後，光緒所頒示的所有改革條律一筆勾消，報館也遭禁止，官報局，農工商局也被廢除，各項考試仍舊恢復到八股文試帖經文策問，集會結社自然禁止，各省書院也停止改設學校。參與維新的人，殺的被殺，戍的被戍，禁的被禁，所有與維新有關係的官僚全被革職。一方面西太后佈置親信如剛毅，榮祿，啓秀等實攬軍權，于是就進一步力謀廢立光緒。但這一切反動的措施，不但不足以阻止改革運動的前進，反而逼着革新運動得到洗煉的機會。康有爲被逼海外，針對着西太后底廢立陰謀，倡保皇會，在橫濱，檀香山各地和與中會大起暗鬪，而延及于會黨。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的各種下層勢力，這時積極躍進，漸漸由于與中會的活動，帶上醒目的政治意識。這時的與中會正謀與三合會，哥老會等聯合，政治的革命活動，在與保皇派的糾牽中，漸從兩廣而發展到長江流域；在北方的民衆也因與帝國主義的接觸，生長了原始的民族獨立意識，埋下了拳亂的地雷。同時西太后所主持的反動政權對這些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既然無所阻

止，就是她自己底反動統治也脆弱得很。清末各省的督撫本來早已各自爲政，太后訓政之後，外重內輕之勢更甚，太后努力的結果，只抓得住直督與北洋軍事權，對南方各省就鞭長莫及；她底廢立之謀所以不敢馬上實行，這也是原因之一，當軍機處密電當時統治着豫才他們的兩江總督劉坤一，來探詢廢立意旨的時候，他底「君臣之義宜定，中外之口宜防」十二個字頗挫了廢立計劃，就是一個好例。所以報紙雖在嚴重摧殘之下，南方仍然繼續發行，在外人扶助下的廣學會編譯的許多科學及文學新書也遍佈南方各省，推動中國市民意識的進展，南京也公開流行此類書籍。豫才進礦路學校後第二年，礦路學校來了一個總辦，是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在礦路學校裏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豫才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作「天演論」。星期日就跑到城南去買了來。他從此知道世界上有一個赫胥黎，還有蘇格拉第，柏拉圖，斯多噶，還有所謂「物競」「天擇」。學堂裏又設有一個閱報處，時務報是看得見的，還有譯學處編也爲豫才所歡喜。他開始讀許多翻譯的科學書和文學書。豫才在這排新圖強的潮流之下，得到他底新天地了。

正是一個食慾盛旺的人，得到這些美味的饌餚，過去那些吃膩了的東西便難引起他底注意。他本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對功課不用溫習，到月考或大考，總是名列第一的回數多，所以他有充分的時間 閱讀新小說書，科學書，及當時新黨們底議論。

交際這件事，他是不太喜歡的。讀書之後，他底娛樂就是騎馬。他常常和同學們騎着馬到城人四近去示威，呼叫，有時甚至和旗人衝突。原來那時候的學生不比現在一樣，不是被目爲不韙便是不放在眼裏；他們穿着制服，好似兵營一般，人民也不加辨識，兵營也以他們是同道爲光榮，所以他們就是幾個人也得騎馬去向旗人示威一趟，不會失蹤或帶來了滿身紫條。路遇不平的事情，他們還能挺身而出，打抱不平。所以那時候的學生，比起現在的學生幸福多了，倒並沒有

鬧什麼亂子。

紹興人本來是不大喜歡吃辣椒的，但豫才的愛吃辣椒却不下於湖南人。這裏面有一段悲喜劇，是豫才到南京以後發生的。我們知道，豫才到南京去求學時，他母親只發落了他八塊錢，叫他自便。那時因為生活程度低，八塊錢自然不比現在的八塊錢這樣不經用，然而即使抵得上現在的八拾塊錢吧，出門一起一居都要錢，又能用幾天呢？豫才到南京後不久，八塊錢當然就用完了，入了學，再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做禦寒的棉衣，「而冬天來了，砭人肌骨的寒威，是那麽嚴酷。沒有法子，就開始吃辣椒取熱，以至成了習慣，進而變為嗜好」，（景宋：「魯迅的日常生活」，刊「新中國文藝叢刊」之三）這裏種下了豫才日後生胃病的根原之一，而辣椒也成了豫才終身擺脫不了的伴侶。

他間或也作點隨筆或詩文，今錄存於他弟弟舊日記中的二三條，以見他當時的心情及所注意的事物。他底富于感情的個性亦有流露：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皆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非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夷人呼茶爲梯，閩語也。閩人始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語也」。

「里低母斯，苔類也，取其汁爲水，可染藍色紙，遇酸水則變爲紅，遇鹽水又復爲藍，其色變換不定，西人每以之試驗化學」。

這所做的，是摘記科學知識，記敘自己感情，可見他當時研究科學與味的濃厚，同時也可見他性情的傾於文學。所以他讀科學書，也讀許多小說。不過這時他所受的文學的影響還不能明顯看得出，他自己也不甚自覺，惟有科學，給他許多新鮮知識，使他對外界事物得到許多合理的

認識，在思想上也自覺地得到了新的依據，這就如他自己所說的：「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藥方，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復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他還讀翻譯的歷史書，一刻不忘國事，所以「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這大約是一本誇大醫學功用的歷史書，把日本維新歸原於醫學，在今天的我們看來當然是一種偏見，可是這却使豫才日後的學籍列入醫學，就不能不說這種學說對他有重大的影響。但他這樣堅決地相信這一說不是偶然的，一個人學了合理的知識而單只知共為合理，往往不免取旁觀的態度，當合理的與不合理的發生鬥爭時，信仰也有動搖的可能；反之，深知不合理的弊害，則知道了合理的存在，便有比較，黑白分明，觀念分外清晰，信仰自然不容易動搖。豫才身受不合理的弊害，所以他一旦認識明白了這不合理，便立刻成為這不合理的死對頭，成為合理這一方面的衛士了。因此，這合理的一方面雖將其效用多少誇張，他也不覺其誇張。後日的魯迅之所以成為舊社會底死對頭，成為不屈不撓的科學底擁護者，真理的戰士，在此便已立下了顛撲不滅的根基了。

他在礦路學校裏是被分在機關科，功課有德文，地質學和礦物學，「漢文仍舊是預考叔可謂繕孝也矣，但外加小學集註，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是先前沒有做過的。」這都表現這礦學校比前一個好些，能够使他讀得下去。只是他對厭畫鐵軌橫斷面的圖，尤其討厭那平行線，在這點上，可見他雖然很有成爲一個科學家的可能，却還不能忍耐科學家所逃避不了的「一定的枯燥無味的工作，隨之他在文學的這一面，也就可能加上重量。生理學這門功課，他學校裏是沒有的，但這並不能阻止他去追求人爲什麼生病，病要怎麼才能醫好這等問題。那時已經有木板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的生理衛生書了，這些書，正可以解答他底問題。所以在東京讀了書之後，他底腦子，可以說裝滿了新的思想，無論在政治見解上

，在一般的知識上；而且科學與維新是兩個分不開的問題，所以科學聖徒的他，便不能不是堅決的維新主義者。他回到家裏，他家鄉的長老，看他不對了，便對他說：「康有爲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爲，有者，『富有天下』，爲者，『貴爲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有的就從報紙上剪下許應騷參康有爲變法的奏章給豫才看，說：「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孩子」，當幼小無知的時候，父老之輩摸着他的頭是真的慈顏滿面的，可是到這樣的時候，就大抵難免聲色俱厲了，再假使你再長大起來，到了能够和他們底十毛一髮發生衝突的時候，則砍孩子底頭的，也正是摸過孩子底頭的他們。並且談笑起來，還很自如地露出殘缺不全的牙齒吧？瞬刻以前的中國，這種事不是司空見慣麼？

可是豫才沒有必要去管這些老頭子。窮酸的他，却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喫餠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到他畢業的時候，正是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締結辛丑條約的這一年。他在這短短三年的讀書期中，中國正像在急流之下，社會發生激烈的變動，民族獨立運動急轉直下，保皇會雖作最後的掙扎，梁啟超的態度却已根本動搖，他底清議報，僅不過口頭上有「我皇上」，「我聖主」而已，實則排滿，革命，破壞，暗殺，他都視爲救時的良藥。與中會在和保皇會扭結中，北方的原始形態的反帝運動也正在發展，這就是義和拳。西太后積極推行反動政策，力謀廢立，先對南方各省的督撫下一番佈置，召劉坤一入京，以鹿傳霖代兩江總督，又以李鴻章任兩廣總督，準備鎮壓海外保皇會在廣東出事故，就再也不管反對的電報雪片樣飛來，單只恐怕外人不同意了，乃使人諷令外國公使入賀，廢光緒立溥儀。但外國公使置之不理，使西太后不敢舉事，她便憤不堪言，就有利用義和拳報復外人的舉動。恰恰義和拳的反帝運動非常原始，沒有正確政治綱領，以「扶清滅洋」相號召，就受了利用，結果是招致了八國聯軍，滿清政府底威信至此掃地無餘。辛丑之

後曹時被反動鎮壓着的維新勢力又大抬頭，西太后大有羞愧不能掩飾的樣子，就下諭不死不活的變法。科舉程式算是改變了，還有派官出洋考察，派留學生出洋留學的老調，也再由滿清官員使勁啼唱，這就是民國以來，軍閥起起倒倒，假做改革以騙人民的張本。豫才恰在這時候畢業於礦路學堂，江南督練公所在畢業生中派了五名到日本去，豫才就是其中之一。這裏面有一位因為祖母要他陪伴在身邊，或者死的時候不致沒有人送終，哭得死去活來，不能去，後來是只剩了豫才他們四個人去了。中國人的孩子，倘不能辭掉高堂上的這類慈愛，要想發展就很難。葬送在這類慈愛之下的中國孩子知有多少？（以上引號內文未指明出處的，均引自「瑣記」，「滄風月談」：「重三感舊」，「吶喊」自序，「華蓋集」：「忽然想到」五）。

算四節 初次實現中的理想

一九〇二——一九〇六、六月：二二歲——二六歲

和清末的革命思潮相接觸

在這裏，我得趕緊提醒讀者，少年豫才和我們今天的小朋友有一個在外觀上的絕大的不同點，那便是他頭上有一條豬尾巴，就是所謂辮子的東西。在前清，這辮子是滿清天下的標誌，是有一定的形式的。全剃了自然是和尚，全留了打辮子也是「長毛」，「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而且還要從辮子上玩出花樣來；小丑挽一個結，插上一朵花紙打彈；開口跳將小辮子掛在鐵杆上，慢慢的吸烟獻本領；變把戲的不必動手，只消將頭一搖，勢拍一聲，辮子便自會跳起來盪在頭頂上，他於是要起關王刀來了。而且還切於實用：打架的時候可以拔住，掙脫極難；捉人的時候可以拉着，省得繩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襟襟頭，一個人就可以牽一大串。」（『且介亭雜文集』：『病後雜談之餘』。）但豫才底辮子並沒有這樣幸運過，豫才底辮子不但不被豫才當作寶貝，發揮這麼多的作用，而且它在豫才那素樸純真的眼睛裏，一向就被厭惡，因此，他出到日本去留學，便把辮子剪掉了。他頭辮子，並不如太炎先生那樣在張園當眾剪髮，表示決絕，也並沒有慷慨激昂的抱負，據他自己說，是「毫不含有革命性，歸根結蒂，只爲了不便；一不便於脫帽，二不便於體操，三礙在額門上，令人很氣限。」魯迅先生很少說假話，這話也可看作是出於真心。因爲他底氣質確是這樣，斷指寫血書，削髮起誓這類悲壯而又自己也頗有點渺茫的事，他是不做的。他願改革，但他却不一定有領頭的野心。參加改革的一員，做他份內的事，他頗情願，

但若名稱有些好聽，在他看來，覺得內容還有點不太明瞭的計畫，他也還須設法多加，或者暫時站遠一點。只有那直接和他相關聯的不合理的存在，他就立刻不能容忍，必須除去而後快。所以他們往往先你們開始游擊，凡被他捉到的罪惡，雖是你還有點遲疑，他早已不假思索地打了。他常常給舊社會一些意想不到的打擊，看起來不聲不響，而效果卻很大。

可是他這點身邊的改革，也不能不遭到反對。有幾位辦子盤在頭頂上的同學便很厭惡他。大類有妒心，就是明知道剪了辮子是件好事，但在自己沒有剪之先，則寧肯好不要先剪。留學生團體也大怒，說要停學才底官費，送他回國去。

「不幾天，這位監督却已被人剪去辮子逃走了。去剪的人們裏面，一個便是做『革命軍』的鄭容，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學，回到上海來，後來死在西牢裏。」（「頭髮的故事」）

鄭容底「革命軍」，大約是不能再留學，回到上海之後做的。這篇文章，連續刊載在上海的「蘇報」上。那時候上海的報紙，還是用竹紙印的，申報上才開始有文藝似的文章。「革命軍」這本書是很帶有煽動性的通俗的宣傳推翻清清的書，會由章太炎作序，風行一時。第二章敘說：「披毛戴角之滿洲人，應予殺盡，可比登三十六天堂，昇七七二地獄，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第二章說：「革命革命人心不平，戴滿人而為君，滿人約五萬人，自不識了者係親王大臣，唱京調者係將軍都統……」看這些話，就可見「革命軍」一書，內容如何激烈，措辭歌曲一般，感情如何昂奮了。原來中日戰爭以來，中國政府底弱點雖完全暴露，帝國主義底侵略野心也越大，不過大多數人民還只覺得外人可惡，滿清腐敗，却不敢藐視滿清政府，及拳亂之後，中國大多數人民便由痛恨外人轉而對清廷切齒，越感覺外人可怖，就越覺清廷無能，所以辛丑之後，中國必須變法已絕無問題，決沒有人反對，而以前幻想變法的人，現在倒早已在無形中受革命者的煽動了，「革命軍」這本書，便因此傳播得很廣。

刊載「革命軍」的「蘇報」幾乎是那時宣傳革命的機關報。豫才到日本第一次所參加的一個集會上，「看見一位頭包白紗布，用無錫腔講演排滿的英勇的青年」，「因太炎先生而想起『三事』這青年便是吳稚暉，他頭上所以包白紗布，就因為他那時正和駐日公使蔡鈞大戰，名馳疆界，頭上負了傷的緣故。蔡鈞和中國留學生的衝突，已經不止一次了。辛丑以前，留日學生雖有所謂『書齋編』，『開智錄』，『國民報』等刊物，但人數尚不滿百，辛丑，壬寅（即一九〇一，一九〇二）二年間，中國留日學生驟增至數千人，豫才到東京的這一年，東京神田的駿河台便已有了留學生會館，會館開幕的那天，吳祿貞演說，把會館比作美國費府的「獨立廳」，三月，又發起一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想在上野精養軒舉行，由章太炎發起宣言，報名赴會的有數百，公使蔡鈞得到此種消息，要求日政府禁止，所以屆時就被日警干涉，赴會的留學生都憤激而散。後幾月有吳慕良，蔡鈞二人想自費入成城軍校，（士官學校預備校——凡海）蔡鈞不肯容送，湖北留學生監督錢洵和吳汝綸去替他們翻說，都沒有效果；吳稚暉便與孫揆均率同二十餘人強邀吳汝綸同往使署要求，堅持到夜半不肯出署；蔡鈞喚日警將他們拉出；留學生使連日結隊往使署爭鬧，吳稚暉大約是在這時候頭上受了傷的。三十餘軍之後，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和公使監督的對立仍然如舊，而且還變本加厲，可見做奴隸的仍然還是做奴隸。後來蔡鈞終於曠使日政府以妨害治安的罪名，把吳稚暉，孫揆均逮捕，要遞解回國，吳稚暉就在東京被解送着經過皇城外的河邊時跳了下去，但馬上就被撈起，押送回去了。他們被押送到上海的時候，恰好章太炎，蔡元培，黃宗仰等在上海創立「中國教育會」，「南洋公學」也發生學生全體罷學風潮，於是就由教育會人士章，蔡，黃，和吳稚暉共同主持，成立了一個愛國學社，南京陸師學堂那時有部份退學的學生，就也來加入愛國學社，這社便儼然成爲當時革命思想的匯合點，他們開會的場所是張園，發表言論的報紙便是「蘇報」。章太炎，鄭容是在第二年五月「蘇報」案發生時入獄

的。當時蔡元培、吳稚暉等也在拘捕之列，不過中西警探到愛國學社拘捕他們時，他們適外出，只章太炎一人在，所以捕去了他一個，都容是聞訊自往捕房投到的。後蔡元培走柏林，吳稚暉走倫敦，章太炎被關了三年，都容即死在西牢裏。「蘇報」案在會審公廳審訊時，清政府所延請的律師告辨「蘇報」的陳範稱：「……閏月初五，登論說界，「康有為與覺羅氏之關係」；五月二十三，登「滿人九世深仇」；五月初，登「客民篇」；五月十四，登「請革命軍」；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小不降，總之驅逐滿人，匡輔真主」；五月初五，登「章炳麟駁康有為書」；……五月七日，登「殺人主義即復仇主義，以四萬萬人殺一人，能不快心，……」觀此，我們可知道「蘇報」是怎樣的內容，那時新黨的言論聲勢已經多麼凶猛。庚子以前，上海經元善、蔡元培所領導的愛國活動，尙以光緒帝的存廢爲問題的中心，西太后佈置廢立的時候，他們也拍電反對過，而現在則竟呼清帝爲「小醜」，可想見這時中國民族與市民要求解放的思潮已推高到什麼地步了。愛國學社解散，「蘇報」被封，蔡吳等去國後，章士鈞，河澗施，張繼，盧和生等接着又在上海組織一個「國民日日報」聲勢與「蘇報」相同，後該報雖因內部問題停刊，但相繼而起的革命出版物，如「黃帝魂」，「蘇報案記事」，「國民日日報彙編」，「蕩廢叢書」，「換夷中國民族志」，「清祕史」，「陸沉叢書」，「慘世界」等，正如雨後春筍一般，不下百數十種。這一切都是以帝國主義的壓迫，通過華僑資本的意識，和國內幼稚的工業以爲依據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大有瓜分中國之勢，八國聯軍入北京後，俄國立即出兵強佔東三省；英，俄，本坐以西藏問題衝突很烈，這時更大有火併的聲勢；日本以伊國在中日戰爭時會拉攏德國干涉遼東半島的割讓，早已懷恨在心，這時看見俄國佔去了東三省，又顯然是阻止了日本向東三省發展的野心，因而日俄的衝突便很尖銳，就拉攏英國，成立英日同盟。英國以在遠東很孤立，便也樂意承受。盟約訂立後，俄國態度雖在外表和緩了一點，骨子裏仍然不肯讓步。所以盟約訂立

的第二年，即自一九〇三年以後，日本就着着準備戰爭，中國人民也因俄國佔領東三省，各處發動拒俄大會，東京留學生黃興等，在一九〇三年四月發起了「一個拒俄義勇隊，旋再稱國民教育會，舉藍天蔚為隊長，報名者達千人，每日操演不懈，後被日政府禁止；——到本年冬間，便有革命軍事學校的祕密組織，因為當時祇有政府派送的官費生可入軍校，凡有革命嫌疑的，都不得列入軍校的機會。孫中山有一位日本朋友日野少佐，是一個軍事家，恰好此時中山由安南返日，留學界有革命思想的人，共往就商學習軍事的問題，便由中山商請日野少佐主持，在東京青山附近，祕密組織軍事學校，開學約五月，因故解散——日本留學界的革命書報，如「湖北學生界」，「漢聲」，「江蘇」，「浙江潮」，「游學譯編」，「新湖南」，「登程頭」，「警世鐘」，「國民必讀」，「最近政見之評決」，「漢職」，「太平天國史」，「二十世紀之支那」——「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等，正是層出不窮，陸續擁出，豫才底「斯巴達之魂」，「說鎗」二文，便是在一九〇三年的「浙江潮」上發表的。豫才在東京時和同鄉人頗接近，他在東京，當然也通過接近的一羣人與當時的革命潮流相通。「浙江潮」創刊於一九〇三年，他底「斯巴達之魂」刊在七月的「浙江潮」第五期與同年十一月的第九期上。「說鎗」則刊在同年十月的第八期上。

自醫學
到文學

「說鎗」是一篇科學的論文，「斯巴達之魂」這篇文章裏已經流露出豫才底描寫本領索了。不過那種文章是受當時通行症的影響，我們頂好看他底自白：

「——一篇爲『雷鏡』的最初的介紹，（即『說鎗』作者）一篇是斯巴達的尙武精神的描寫，但我記得自己那時的化學和歷史的程度並沒有這樣高，所以大概總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不過後來無論怎麼記，再也記不起牠們的老家；而且我那時初學日文，文法並未了然，就急於看書，看書並不很懂，就急於翻譯，所以那內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

又多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達之魂」，現在看見起來，自己也不免耳朵發熱。但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頗熱抑揚，纔能被稱為好文章，我還記得「披髮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但我的文章裏，也有受着嚴又陵的影響的，例如「潛伏」就是神經的瘋了語的言譯，這是現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了一一（「集外集」序言。）

陳孝當說他批評解讀他自己，比他解讀別人更無價，這段他對他自己的批評，就是他毫無掩飾的證據。嚴又陵在當時是譯書界的權威，戊戌年前，他在天津辦「國聞雜誌」，與梁啟超常通聲氣，庚子拳亂時，他曾逃到上海，參與過唐才常假保國救時為名義，而其實是想在長江一帶起事的開手張圓的「國會」，嚴復就是副會長。我們雖然看不見當時陳才有什麼明顯的活動，但他和太世界一道呼喊這件事，只據此兩篇文章便看得出來了。不過東京的中國留學生雖然大體上大家都熱心於國事，無聊的公子哥兒也並不是沒有。所謂良莠不齊，有作有為的，固然歷年來多半是日本留學生，然而無聊到極點的留學生，在東京也不少，這可以說是日本留學生一貫的歷史，所以在沒有參入留學生的革命核心的陳才驤然看起來，仍不免有烏煙瘴氣的感覺，是親自然的。而這烏煙瘴氣，是陳才頂怕的東西。在弘文學院專修日文的他，常不免要遇見那些在中國留學生會館裏學習跳舞的，「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的留學生，因此他決定要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就到仙台進了醫學專門學校。這是一九〇四年八月。那時日俄戰爭已經爆發，打了五六個月了。

他所以要進醫學專門學校，我們知道了他在南京習科學時所發生對於科學的信念，就知道決非偶然。他自從有了生理學的知識，知道了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從翻譯的歷史書上，知道日本維新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他便決心學醫了。他給自己設定了一個很

美滿的夢，預備畢業回來，救治像他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又據他底舊友許壽裳先生說，他還有另一種癡想，就是「救濟中國婦女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謂『三寸金蓮』，使恢復到天足模樣。後來，實地經過了人體解剖，悟到已斷的筋骨沒有法子可以想。這樣由熱望而苦心研究，終至於斷念絕望，使他對纏足女子同情，比普通入特別來得大。」（『魯迅的生活』）

豫才在東京弘文書院讀書的時候，課餘愛讀哲學與文學書籍。他在那時候，日文還是初學，所讀哲學與文學的書籍，大約還不免大部是在當時流行的中文譯本，如嚴又陵底譯著；梁啟超，章太炎，吳稚暉等入底議論，及中國當時流行的出版物等。但所謂哲學，在中國那時還不見有什麼著作，大約都是政論一類的文章，要說當時中國本身的哲學著作，應推譚嗣同底仁學。這本書可說是那個時代陣容上的哲學方面的唯一的壘壘，虛無主義的色彩非常濃厚，惟否認一切威權具有氣吞一切的破壞力，在當時推翻滿清的思潮正在高漲的時候，這書的流行是必然的。不過這書並未即時出版，譚嗣同死後，稿子放在梁啟超那裏攔了好久，所以豫才注意讀哲學的書，有沒有機會看見仁學；我們不敢遽爾斷定。我們只知道他常常和朋友談國民性的問題，這表現他對於中國的傳統的舊社會正在企求理解，所以他學習醫學與科學的方面，就正包藏有批判舊社會的因素，這因素和他想解放被舊社會所摧殘的人們底痛苦那弘願是緊相連接的。不過當時他自己也還不能明白意識到他底思想上許多側面的內在關聯性，他正在摸索問題的核心，而他又似乎在無意中將問題的核心集中到國民性上去罷了。這件事，費了他半生的努力才有結果，現在距那結果還很遠，且再談他到仙台進醫學專門學校以後的事吧。

當時仙台還沒有中國學生，所以他就暫時走入一個陌生的地方。那邊的學校當局也因為他是唯一的中國學生，所以頗優遇他，不但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替他底食宿操心。他起初是住在一

個獄旁邊的客店裏，這大約是一九〇四（其時他二十四歲）年的九十月光景，在仙台的地方已不是頗有點冷的了，「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他生活刻苦的態度和能與環境相抗鬥，於此可見。那客店裏的飯食也不壞。但有一位先生却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底飯食，他住在那裏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豫才却覺得客店兼辦囚人底飯食和他不相干，這充分表現他是一個苦學生出身，久已失去了將自己從別人特別提高的那種生活根據，然而他對先生好意難却，便另搬了一個離監獄很遠的住處。

他在學校裏，遇到一個他永遠忘記不了的教解剖學的先生。那便是藤野嚴九郎。魯迅在「藤野先生」這篇文章裏紀念這位先生，在收尾的時候，一樣說：

「當每夜晚間疲倦，正想偷閒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藤野先生底照片——作者），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支烟，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絕的文字。」

他底照片能夠使豫才在疲倦中增加勇氣，在想偷懶的當兒「良心發現」，就是說，迫切感覺打擊「正人君子」之流，是良心的必需，這是多麼大的一種魔力！一個教自然科學的人，夢裏也沒有想到要幫助自己底學生從事社會鬥爭，而今底照片竟成為增加他底底勇氣，堅定他學生底意志以從事社會鬥爭的心靈上的援助者，難道是平常的人格做到的？那怕在一般上說，藤野先生底人格有沒有如此之大，還不得而知，但他感動於豫才的人格力之偉大，是不可否認的了。所以我們在這裏，為了豫才，有特別將他介紹出來的必要。

他是一位勤勞，懇切而不拘泥的學者。對他自已底學術，他大約很悉心研究，教學生也不苟且，下課是埋頭在研究室裏，聽見上課鐘聲便匆匆忙忙連領帶也忘記了戴，呆鈍跑到講堂的。

他在多不是一件舊外衣，寒顛顛在火車上或其他的公共場所，引誘投機心他是對的，辦次家小心他。這種人一定不善於交際，儘管不消說是落伍大家；他叫豫才到新教室裏去時，豫才會看見他坐在人堆和許多單獨的骨頭中間研究骨頭，他要豫才手抄的講義看，不但看，並且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不但增添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這樣一位懇切做學問，教學生的科學者，在市民社會走上的軌道的日本，一定不算罕見，所以在專門學校裏他們同時還能存在，可是在中國倘是你天天坐在骨頭堆裏，就不被入目為瘋子，也不會有飯吃；在中國是連要維持一個小學的教員的地位，都非能又幾手麻將應酬應酬同事不可的。再莫說要吃專門學校裏的豐儉的飯而能讓你專心去做學問的了。

有一回，藤野先生又將豫才翻到研究室裏去，翻出他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他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裏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原來我們說過，豫才從小就是畫畫的好手，他是要畫得好看的，所以他聽了這話，口頭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這一年，學年試驗完畢，豫才又到東京去玩了一個夏天，那時日俄戰爭已經停止，日本成了戰勝國，一躍而成爲東方的大國了。日本正式兼併了朝鮮，在中國的地位一天天提高，從此日本就一天天成爲籠絡中國的兇先鋒。日本戰勝俄國這一件事實，給中國人一個大教訓，使中國人對

立憲自由增加一番新信仰。日本的立憲政治，雖然並沒有充分實現真正的民權自由，但他們施行欽定憲法幾有多年，便以厭棄三島，折敗了一個龐大的專制中國，不過那時人們還不肯十分心服日本，似乎日本戰勝中國是出於偶然，並不是因爲牠和中國政體本國的緣故，私心以爲日本諾和法蘭西戰，日本一定失敗；現在日本居然戰勝了俄國，中國一般的進步官僚便大有以爲日本所以如此強夫，是全賴一紙憲法底力量了。所以日俄和議尚未成立，江蘇的新黨名士張謇便作書繼慮袁世凱，要他主張立憲，袁亦頗感動，孫寶琦在法公使任內，也以立憲的意向向政府奏請。國內的老黨和新黨名士，大部分都受了梁啟超底言論影響，互相唱和，因而二三疆吏，也相率建議立憲；滿清諸親貴，也知道立憲兩字沒有法子可以反對。於是中國統治者內部，便開始了不死不活的立憲運動，以敷衍終前的掙扎。可是正當中國政府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時候，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了。從此在另一方面，反政府的革命組織也有了統一團結的中心組織。孫中山在一九〇五年七月自歐洲回到日本東京，這恰是豫才也在東京的時候，那時留日學生底革命思潮，比較又增高了一層，而湖南人更其活躍，因爲湖南人前一年就由黃興、楊篤生等組織了一個革命團體，叫作華興會，接着便回湖南聯絡會黨謀義難，事雖未成，頗轟動一時，黃興、宋教仁等逃往日本，便特別在日本留學生中露頭角。當黃興還在當速成師範學生的時候，豫才已在日本，他描寫那時的黃興說：「因日本學監讓學生不可赤膊，牠却偏光着上身，手挾洋磁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歸。」（「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但同盟會成立時的黃興，已經是半個要人了，他們組織一種雜誌，名曰「二十世紀之支那」。中山到日本，黃興等即被介紹與中山會面於二十世紀之支那社，詳論組織革命黨問題。後十日，同盟會便成立於赤坂區檜町，黑龍會所，再二十日，即八月二十日，同盟會宣佈會章，開正式成立會，華興會便是同盟會中的主要構成部分。三半世紀前那「不救」同盟會機關雜誌，後因雜誌內有

文章觸犯日本遭禁，改名民報，於十月二十一日出第一號，這就是後來章太炎來主編的遼動一時的民報。

但當民報出版的時候，豫才已又回到仙台學校裏了。考試的成績早已發表，同學一百餘人中，豫才在中間，沒有落第。

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國民底自負與險惡的排外的風氣，至今還沒有完全消退，特別是弱國的「支那人」，在他們眼裏都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就不是自己底能力，所以他們對豫才底沒有落第很是疑惑。有一天，本校的學生會幹事便到豫才寓裏，要借他底講義看，翻了一通，走出之後，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就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字句罷，」以後年的魯迅說明道——但經托爾斯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他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豫才將這事告知藤野先生；有幾個和他熟識的同學也很爲他不平，後來這事便無形消滅了。但接着，豫才便遇到他放棄醫生的機運了。這便是他在「吶喊」自序中所說的在銀幕前參觀

槍斃中國人那回事。原來醫學專門學校第二年添教微菌學，細菌底形狀全用電影來顯示，「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面，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豫才，這一聲却別特別刺耳。平常看片子時，豫才在講

堂中，須常常隨着他底同學們底那些和他本來不很相干的拍手和喝采，已經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然而還忍得下，而現在的這一聲却正打在他民族的自尊心上，於是他底腦子不禁翻動，他要反想了。

想一想「阿Q正傳」的末尾的那槍斃阿Q的情形吧，試想一想「藥」這篇小說中的情節吧，魯迅說，「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到那些閉着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便可知道「阿Q正傳」的結束決不是偶然的，而這一喝采聲對他的印像的深刻也就可想而知。在他小說裏的那深切而悲憤的現實主義的批判力，在這裏得到最初的勝利。抱着一股熱望的豫才，現在碰在冰冷的冰塊上了，事實是何等的無情！」

他把滿腔熱望冷靜下來想一想，知道「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強，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這就是他以醫學轉入文藝運動的關鍵。到第二學年的終結，他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將不學醫並且要離開仙台了。

豫才離開仙台到東京來的時候，「民報」正在與梁啟超底「新民叢報」打筆墨官司，非常激烈。從此梁啟超在言論界遇到不可克服的敵人，他一直來「獨執牛耳」的地位便開始動搖。不過豫才底文藝運動，在那政治的昂奮性很強烈的革命思潮下，第一個困難問題就是沒有人推重。當時留學生共同的希求是救中國，而中國在近世文明諸國之間，大有令人發生遲暮之感，所以除了直接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們之外，支配留學生的是一種淺薄的性急的實用主義，這種淺薄的實用主義，是李鴻章，張之洞式的不求新道，單知洋務的二元論的延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

號，不是早已分裂爲反動復古的日實和科學救國的法實了嗎？這正是三元論底必然的歸宿，唯在當時，「復古」有排滿復漢作爲內容，「淺薄的實用主義」，也並沒有人能察其二元性的「淺薄」，即在冷日，不是仍然「察」儘管「察」，「淺薄」依然還在「淺薄」麼？何況早在清末；所以那時大家所學的都是警察、陸軍、農工、商、法政、醫學、教育這一類的功課，文學是在被輕蔑之列。因此，迎上他底新志望的，是一張冷面。不理解他的人都問他文學有什麼用？說學文學只有餓死。有別同鄉甚至傳消息到他家鄉裏說他已經和日本女人結婚，帶着兒子在神戶散步了。這種話實使他家裏非常驚訝，便接二連三來信催他歸國，有時一日甚至有兩封信來催，豫才竟憤怒麻煩得神經衰弱起來。但結果他在這一年的陰曆六月歸國了，那時候，章太炎已從上海出獄東渡到日本主持「民報」。他到家就由親戚和家族逼迫他和山陰的朱女士結了婚。

家人以爲他現在是一個新人物，當心他不拜祖宗，或者反對舊式婚儀，然而他却並沒有，家裏要他怎麼做，他就怎麼做了。只是結婚一禮拜之後，他馬上就再離開故鄉，到東京去了。這種婚姻上的打擊，對年輕人往往成爲精神上的致命的打擊。不過豫才是一個性格堅強的人物，這種打擊沒有使他底生活立刻起什麼根本的變化，然而這是一個打擊却沒有疑問。我們在他底童年時代，看不見他有什麼悲鬱的表現，就在他父親大病時的貧困中，我們也沒有看見他悲觀。他被衍太太所誣蔑而毅然到南京去的時候，在悲憤中，充滿着光亮的反抗性。他在南京也頗樂天，雖是飢寒交迫，亦視若坦途，然而他以後的創作中竟帶有那麼明白的悲鬱成分，是什麼道理？這根本的原因，當然歸之於中國革命的一再失敗，長期停留在黑暗狀態中，與他在文藝運動上長期的得不到反響，但這種婚姻上的不如意，在他精神上，一定成爲一個構成悲鬱的最初因素之一。在他那富於想像的美的生活前景中，無疑成了一個使他個人幸福上覺得心灰意冷的創傷。可是這一打擊在外表上雖然扮演着婚姻的形式，追本求源，還是當時淺薄的實用主義對他的文藝意志不了

漸而和傳統社會勾結着下手的一種打擊。因為他家裏的傳統把戲的擔保是以東京同鄉不了解他棄舊而學文藝的行動而產生的論實為根據，才促成功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他開始走上文藝之路的^{第一}步，便晦氣了。當時中國的社會是那樣的無可奈何，他底晦氣也不能逃避！現在中國的文藝運動者，外表上雖然有了多少的反應，可是根本還是在輕蔑與有形無形的迫害下面過活，所以也還是要晦氣下去。（以上引號內文，未指明出處的，均引自「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簡述題的『三事』」，「朝花夕拾」：「藤野先生」，「吶喊」自序。）

第五節 魯迅底思想，文學觀，社會意識的初步檢討

一九〇六——一九〇九：二六歲——二九歲

豫才底文學背景及其運動

豫才棄了醫學來提倡文藝運動的根本原因是爲的要想改變國民底精神，所以他底文學態度，從最初出發就是爲人生，爲社會，有目的性的。可是他爲什麼相信文藝可以改變精神，可以作爲社會活動的工具呢？這當然是和當時的文藝思潮有割不開的關係。原來十九世紀後半，是歐洲寫實主義文學橫溢的時代，和寫實主義一道的是小市民底自然主義。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就漸發達，隨之，與資本主義相應的諸文學樣式也逐漸出現，而特別是歐美各國的文學作品，先後都被輸入日本，到十九世紀末，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各巨匠底作品也先後被譯成日文，這些作品，對日本文學漸漸發生影響，到日俄戰爭的時候，日本資本主義已發展到爛熟的地步，本來這時候是應該在歐洲文學，科學與哲學思潮的孕育下產生適應於高度發展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寫實主義文學的。不過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較爲落後，當甲申戰爭時，日本資本主義正欣欣向榮，而西歐各國的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帝國主義的苦悶時代了。所以當日本資本主義發達的同時，資本主義的社會全般已矛盾百出。這種矛盾一方面軌跡日本的資本主義走上早熟的道路，同時也反映入日本社會，加速日本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發展，因此日俄戰爭的勝利，在日本發達不起像西歐那樣矯健的寫實主義，却助長自然主義的產生。這些自然主義者們看到了，出現於日本社會，特別是在日本農村中的諸矛盾現象，如資本的繁榮，却反而增加了全國的貧窮化，農村破產，尤其是日俄戰爭後，農村的失業流民

驟增等，致使他們開始用悲觀的態度來從事他們底評判。他們大抵出身農村，島崎藤村，風山莊，袋田國木田獨步，正宗白鳥這「自然主義的健將及其他的自然主義者，大多數是鄉村出身；其中也有少數都會地方出身的，可是從三「都市（東京、大阪、京都）出身的却可以說一個都沒有。所以日本的自然主義者比起他國的自然主義者更多帶一些田園氣味，當時反對自然主義的一部分人就罵他們的作品『土臭不堪』。這也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資本家大得其利益，都市也隨着繁榮，都市中的一般市民在生活上也得到一點小便利，然而戰爭之後，所不可避免的社會經濟的悲觀，由此而生的一切苦痛，日本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再像中日戰爭後一樣可能輕易調節。這一方面是因為日俄戰爭比中日戰爭的破壞力太多；另一方面是『爲到日俄戰爭的時候，日本資本主義已經走上寄生蟲的階段；所以一切繁榮，完全推給農村，就如自然主義的作家所感覺似的，在農村生活中橫存着寂寞與憂鬱，『德富蘆花底話來表現，就『感覺到『勝利的悲哀』。所以日本的自然主義者，已經開始批判資本主義的任務了。不過這批判者，是站在悲觀的小私有者底立場，這是全世界的自然主義者共同之點。同時，自然主義，究竟發生在資本主義最後一針興奮劑的時代，輻以寫實主義作爲傳統，承認文藝是爲人生，有社會意義的這一點，也是全世界的自然主義者共同的特徵。豫才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正是日本的自然主義的全盛時代，所以他能毫無疑問地相信文藝可以改變人們底精神。同時也因為他在日本的時候，自然主義的空氣特別濃厚，也促使他原來早已信仰了的進化論與生物學，現在更增加了信仰心，因爲進化論，生物學，遺傳學，實驗哲學，這些東西恰巧是自然主義底臟腑。

豫才後來進而爲現實主義的作家，主要的是因爲中國社會背景和日本不同的緣故，就是說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而這半殖民地的國家，正處在全世界的工農新主人翁英姿靡立的時代，所以牠底民族解放運動中必然地有反資本主義的成分，其民主革命，也不是站在資本主義式

的舊民主革命戰線上，而是站在反資本主義世界的 *Proletariat* 上，魯迅底現實主義的養料就取自這樣的土壤。同時魯迅受北歐與西歐寫實主義作家底影響也遠比受日本自然主義作家底影響為大，然而無論如何，魯迅在日本那環境中究竟是呼吸了幾年暹的，所以在他底全作品中，仍然找得出日本作家底血液。這血液，不全來自自然主義的作家，反自然主義的夏目漱石與森鷗外，在魯才底作品中所留的痕跡尤其明顯。這些我們待以後的機會來說吧。

他那時所最歡喜的作家有匈牙利底彼得斐 (Petőfi Sándor) 俄國的果戈理，波蘭的顯克微支 (H. Sienkiewicz) 和日本的夏目漱石與森鷗外。總之，大體是叫喊和反抗的作者底作品，這是因为當時排滿，民族復興的怒潮很高的緣故，所以反抗詩人拜倫，雪萊，普式庚，萊蒙托夫等也為他所歡喜。他銳意搜索被壓迫民族中作者底作品，因此他底目光自然注視到北歐，東歐，巴爾幹諸國去了；他還去搜求過印度和埃及的作品，可惜找不到。不過反抗與叫喊也有種種不同，豫才除愛好反抗與叫喊的成分之外，還愛好切實，深刻與藝術加工很完美的成分；他所愛的反叛作家，沒有一個不同時是巨大的藝匠，而以後，他底這種傾向跟着環境愈益發展，所以對拜倫那一些帶有浪漫性的反抗作家，他漸漸疏遠些了，同時越是寫實主義的作家，晚年也趨向他接近。果戈理，契訶夫這些作者，就始終是和他一道的。

他底文藝運動，就注重于想把他愛好的這些作家底作品紹介到中國來。但是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那時中國留學生大抵都抱着實用救國的思想，對文藝很冷淡，從軍革命的，除實行者之外，雖然出版物也很多，不過大抵是關於科學，叢書之類的論文，此外還刊載清朝的叢書，當時的南社中人，就很努力於在日本圖書館中找那記載明末清初滿州人屠戮中國人這類的在國內的禁書，抄寫下來印成集子，「湖北學生界」出了一本特刊叫做「漢聲」，就是這種文字的專集。此外如「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紀略」，「朱舜水集」，「張蒼水集」，等都先後翻印了。可是這班

人譯文學還很遠，他們底目的只在於促漢族的青年反省滿人從前如何殘虐，將忘却的舊恨復活，以助革命成長，豫才在這一些人們中間要找到文學同志來共謀文學運動，就很不容易。不過中國留學生也並不絕對不注意文學，比方拜倫，因為助過希臘獨立，就很爲中國青年所注意，他那熱情的詩，怕也不難惹年輕人愛讀，有些竟被譯成中文，『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就曾傳誦一時，蘇曼殊先生也譯過他底詩，此外如波蘭的復仇詩人 Adam Mickiewicz 匈牙利的愛國詩人彼得斐，爲西班牙政府所殺的菲列濱文及厘沙路，都曾打動過中國青年底心，也同樣打動過豫才底心；此外之嚴復他們早前也譯過西洋文學書到中國，另一方面還有抱着文化侵略的目的的西洋人也在國內扶助一兩個少數學術團體介紹西洋文化，其中也有一部分文學書；才子佳人的小說已時常在申報上出現；申報館裏也開始出一些明，清小品書，自己立文社，出燈謎，入了選的，就用這些明，清小品書作贈品，所以流通很廣。又用大部的如『儒林外史』，『三寶太監西洋記』，『疾心編』等，所以也不能說那時候的中國，在新文學方面一點機運都沒有，不過機運小得很。這談不上萌芽，只能說在胚胎中，在這胚胎中，看新文學的人也許一天天加多，不過有意識的想來做文藝運動的人就很少，幾乎沒有；就如翻譯過外國文學書如嚴復，蘇曼殊等，也各有不同的興味，或把牠當作附業，像豫才那樣以全力來從事文藝運動，去著作品，看文學史和批評，認真地去考究什麼作品應否介紹給中國這樣的人物，可以說絕無僅有。所以他後來雖然算終於找到了幾個同志，選擇了必須的幾個人來商量辦雜誌，可是只產牛了一個雜誌名堂便算是結果了。

雜誌名堂叫作『新生』，『新的生命』的意思。（刪去一段）

『新生』的出版日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魯迅自述道：『創始的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也都爲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

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豫才固已後來當然也很知道當時的情勢還沒有給文學的正規軍具備好客觀條件，他所說的「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就是這意思。

「新生」底書面圖案以及插圖等，當時都預備好了的，一事不苟；然而現在都擱淺了。這是從事文學運動以來所受到的正面的一個打擊。

我和一位朋友隨便談起文學的時候，他曾經說文人最悲哀的事莫過於寫了文章，沒有反響，縱使稿費拿得到，賣文而不至於餓死，但文章投入社會，猶如墮落大海，聲音也聽不見，那就是最痛苦的了。他以為這樣的情形，倘使繼續三四年，在一個作家，是免不了要悲觀的。

這話我覺得很對，人生最痛苦的事，莫過於呼號奔走於人生而老死沒有反響。不過這也不能說就可以阻止一個作家前進。世界上的作家，我相信十分之九是經過這種經驗的。「鳴就能驚人的天才，在文學史中極少，有的是他們的歷史的命運特別湊得好，或者遇到偶然的機會，被人償識罷了。就是所謂天才，出馬的時候久而得不到反響的天才作家也正是很多的，在這兒，我覺得就要靠意志堅決了。意志堅決，不但是成爲一個作家，就是要成爲一個舞女，也是少不了的條件。所以革命家與大學者底意志，是最令人寒心的，他們奔走呼號，有時過了大半生世也應者寥寥可數，有的甚至臨死還只有攻擊，沒有贊同，這算得什麼。

魯迅說他「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辦「新生」失敗以後的事。他說：「他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

這是一個傷痛。不過我還相信，這一點事，並不足以使他失掉勇氣，他所說的「寂寞」，在

那時我相信只不過是一種出發，不到事後細想，甚至還未必覺得到。他底「寂寞」還要待以後繼續不斷的失意，才會跟着增長起來吧。

現在他仍然用功他底文學，讀書，翻譯和作文章。他所翻譯的，除了抱着改造國民的志願而介紹的文學之外，也翻譯一些比較通俗的讀物，以換金錢。他又譯一些科學小說和冒險小說之類，這大約目的也是爲了換錢，不過也儘可能加一點他所懸望的副作用，如提倡科學之類吧？還是普通的心理。現今的我們，在寫換錢的文章時，也還是一樣用心很苦的。一方面，豫才也給雜誌寫文章，在「墳」裏面所收的「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四篇就是他在「一九〇七年寫給「河南」雜誌的稿子，根據這幾篇文章，特別是根據「文化偏至論」，我們知道他這時的思想，和以前不同了。他底文學趨向，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這篇「摩羅詩力說」，正是他底文學趨向的一個表現。他那時受「民報」章太炎底影響很深，所以文中的怪句子和古字很多，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他那時的文章，裏面有一部分怪句子和古字是被豫才自己後來印成集子時，爲了排印的方便改了的，所以不能看見廬山真面目，但也不打緊，總之，我們知道他底有過這種風向，這和他們辦「新生」時所謂帶些復古的傾向。後來他底「域外小說集」裏也多古字，同時他爲了譯「域外小說集」特地去聽章太炎底講等等，都有連帶關係，所以應該知道他有過這種風向。還有「河南」雜誌底編者「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因而這四篇文章也有故意拉長的地方，他自己說，『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硬』。這和他寫「說鉛」「斯巴達之魂」那樣，因當時的風向要激昂慷慨激昂慷慨是不同的。因爲一者是追隨時勢，一者是爲迎合編輯先生底意思，在作者起馬是兩個不完全相同的精神狀態。（以上引號內文，未指明出處者，引自「吶喊」自序，與「憤」題記）

思想上矛盾對立的諸因素

看「人之歷史」知道豫才相信進化論的堅決，他對於生物進化論不但很理解，對於學說底發展，也知道得很詳細。「科學史教籍」，「文化偏至論」及「摩羅詩力說」三篇文章，論鋒就有點不同，豫才很明顯的表白對現狀的不滿，他攻擊中國人淺薄的急性實用主義，不但是練民掘鑿爲他輕蔑，就是立憲民主，他也用力貶斥，這時候，他已露出門爭者底面目，不于沉默了。這之中，尤以「文化偏至論」爲最激烈。他攻擊民主，攻擊唯物，這當然是因爲十九世紀後半以來，資本主義的世界已經根根暴露，民主與唯物會是資本主義底兩個武器，如今資本主義世界病害百出，這兩個武器無能爲力，而且增加了社會的矛盾，所以西歐的學者或羣起攻擊資本主義本身，圖另謀人類的出路，或僅悲痛於資本主義底痛苦，講述醫治之法。德國的尼采（Fr. Nietzsche）和叔本華（A. Schopenhauer）丹麥的契開迦爾（S. Kierkegaard）和挪威的易卜生（Henrik Ibsen），特別是尼采和易卜生循着日本資本主義底破綻，日俄戰爭後，在日本風行一時。易卜生底劇本經數次公演，很受人歡迎，豫才底思想，發展到現在爲止，（以後的自然更不必說）。如我們所說過的，無論從他相信生物進化論的觀點上說，無論從他重視日本維新，疾恨滿清專制上說，無論從他同情被壓迫者，並同情婦女，渴求民族解放上說，無論從他底重視理性的科學精神上說，都和尼采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儘管他和尼采有這麼大的根本上的不同，他却爲尼采那氣吞河海的反偶像精神所影響，是毫無疑義的。他底文藝觀，本來是以爲文學好改造精神的，這在對文學作用的認識上，並沒有錯，不過還有兩種看法，一種是科學的文藝觀，認爲文藝可以作爲改造社會的武器，却並不是決定的因素；另一種認爲文藝可以改造精神，而精神被改造，社會就被改造了，這就變成精神決定一切的唯心主義。豫才本來認爲文藝可以改造社會，但他初有這種認識的時候，不過一種渾渾糊糊的觀念，在那時，更談不上以科學的文藝理論爲依據，現在尼采主義盛行，尼采底個人主義，縱使

本質上，反露家的貴族主義，却被實際生活中，其實是早已養成平等精神的豫才利用來作為精神改造說（其後擴大為攻擊一切反動神貴與封建文物）的工具，作為他底文藝觀底暫時的有力支持者，使他能够堅持他底戰鬥，（尤其是文藝運動）藉以通過他日後那長期的驅除寂寞的生活；雖然，以後豫才從寂寞生活中再跳出來時，尼采對於他已漸漸疏遠了，然而尼采在豫才底生活歷程上，確實是一個暫時的，少不了的同盟者。我們必須從矛盾的發展中來理解豫才底思想：唯物論與唯心論的矛盾的存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虛無情調與戰鬥精神的消長，這等等，在魯迅底初期思想中，尤其明顯，要緊的，是我們要從這些矛盾中去看出一種制約力，規定了他底思想發展的基本去向。

他以爲文藝能改造社會的信仰，非常堅決，而幾乎發展到極端。他底「摩羅詩力說」這一篇文章，就是有力的證明。他力認文藝可以救國，在這篇文章中所舉的許多詩人，都被他誇張爲拯救祖國的動力，所以他拿了許多浪漫主義者進來和寫實主義者一道，認定他們同樣是蔑視庸凡，排闥擊衆，唯我獨尊的撒旦，所以他們能將祖國救了。他以爲第一要恬淡，第二要剛健不撓，抱誠守眞，第三要不取媚於羣，以隨順舊俗，那麼「發爲雄聲」，便可起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他甚至認爲法國大革命時攻破聯軍的孟嘗（Monge）與加爾諾（Carnot）這些科學者底全力，是成敗的樞紐。這當然未免太單純，把科學力誇張得太大，然站在他底文化改造精神說上看，則這種唯心傾向的結論，正和他接近尼采一樣是當然的。

思想矛盾，及其基本制約力

不過他並沒有發展爲絕對的唯心論者。他底科學信仰，對唯心論與尼采式的（這時甚至是「要不取媚於羣」的）個人主義，正是一種矛盾的_的存在，而且他以爲科學成就了法國革命軍，這裏面就隱伏着物質主義。無論他底個人

主義也好，精神主義也好，其根本的出發點在於「救世」。所以他底唯心傾向，被制約着不能發展為空想的極端唯心論者：第一，有人說他有虛無思想，自然，我相信以為他晚年還帶有虛無思想的人，一定不多，不過他早期的思想是否帶有虛無主義的成分，則至今恐怕還沒有人敢於斷定吧？但其實只要了解魯迅底全思想過程及生活過程，就並不難斷定他根本不會有過虛無思想。豫才底全人生是鬥爭的人生，通過他思想的全面找不到半個「無為」的細胞，這已經是誰都知道的了。自從他幼年時代以至他在南京讀書的時代，他一貫的趨向是反抗，改造中國與救濟人生。到日本進醫專，也完全是抱的救世的願望，後來學文藝，更是這種願望的發展。虛無的思想，對他的人生觀不能兩立。晚年他在「出關的關」這篇文裏既已明白表現過，就在這最早期的他底作品「摩羅詩力說」裏，他就早向我們表示過了。他說：

「老子書五千語，要在不擾人心；以不擾人心故，則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無為之治；以無為之為化社會，而世即於太平。其術善也。然奈何星氣既凝，人類既出而後，無時無物，不稟殺機，進化不能停，而生物不能返本。使拂逆其前征，勢即入於苓落，世界之內，實例至多，一覽古國，悉其信證」。

他這話說得明白明白。世界有進化，生物有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宇宙之內，無時無物不稟殺機。所以從他相信進化論這點上說，他也沒有同時相信「虛無」的可能，貫穿他這篇文章全體的，是競爭，「不爭之民，其遭遇戰事，常較好爭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腐亡，亦視強項敢死之民衆」。

這裏應該注意的是魯迅在「寫在墳後面」說過這樣的話：「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這句話，不能作為他有虛無思想的證明。因為嚴格講起來，由莊周韓非底思想所混合成的思想，就不是純粹的虛無思想，其次，他在這裏所說的「就是

思想上」的「思想」，我相信不是嚴格意義的「思想」；這句話裏所着重的還是「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十個字。就是說他受莊周韓非的影響，我決不否認，不過所謂「影響」不必一定同時就直接作用於「思想」。因為思想是意識界的事，某種學說，不能為我底思想接受，要看牠是不是直接受我底有意識的批判。批判之後，覺得牠對（這所謂「對」當然是主觀的「對」）這才加入我底思想體系中。但即使覺得牠不對，有時因為牠某種側面還為我所佩服，打動我底感情，加以牠文章底魔力，而那時若適在我底思想掘掘不住堅強力的時候，則他底思想感情無意的，不定形的反映於我底言行中，便叫作影響。以小說為例最易明白：「西線無戰事」這本書，縱使你知道牠底描寫是有害的，但牠底文章魔力很大，而且你底感情也確有被牠底某些側面打動的可能，所以只要您了解牠底害處不深刻，批判不堅決，您看了之後，起馬會引起戰爭的恐怖。所以受影響和正面出現在思想並不一樣，豫才在思想上去堅決把握力的時候很多，所以他受莊周韓非的影響這可能性很大，不過一待他在思想上有了確切的批判力，他便不容許牠在言行上存留了，所以他這裏也認為是「中莊周韓非底『毒』」。

我們前面所說的「虛無情調與戰鬥精神的消長」一語中的「情調」二字，此地必須指明，用意正是與「思想」等較為輪廓明顯的字眼區別開來，因此所謂「消長」也就是說，他在思想上失去堅決把握力時，黑暗，寂寞與苦悶，可能招致他暫時的隨便無為的情調，這好似代替了他戰鬥的疲勞一般，為「無不短暫，而佔着制約的基本地位的，在魯迅底生活裏，一貫的是戰鬥的精神。這雖然是額外的話，但藉此，我們更進一步的了解豫才正面思想沒有和虛無主義妥協的可斷。他底思想與行動又打擊很多，一時的消極未始沒有，這也是他受莊周韓非影響的主觀可能性，但他虛什麼，貫穿他底全思想過程的是現實的社會鬥爭。在他，離開這個目標，一切都沒有意義。

第二他對於浪漫精神，並不認為是絕對的真理。「其將來之結果如何，蓋未可以牽測」。他說：「然作舊弊之藥石，造新生之津梁，流行方長，曼不遽已，則粗其本質，察其精神，有可得而徵信者」。他以為浪漫精神發展的將來結果如何，雖然預料不到，不過目前可用，就用他。這話適合與不適合當時中國的情形，且不必管，我們所能知道的，是他底思想過樣不但不離開現實的社會鬥爭，而且他所執意的社會鬥爭，不是空洞抽象的社會鬥爭，他不幻想一種永遠的仙方，他底浪漫精神，從目前的具體事像出發，目的也在對於目前有利，所以這種不離開現實社會鬥爭的具體性，也制約他，使他不能走到極端的唯心論上去。

第三，前面已經說過，橫存在他底思想的根底裏的，是救世主義，換言之，這也是所謂社會的目的。無論他底個人主義也好，精神主義也好，全以此為歸依。但個人主義與精神主義在救世這上作條件下，走不通的毛病，隨時可被發現，所以不管他怎樣熱烈地論述尼采，反對羣儂，可是他終究以為「將來之結果若何，蓋未可以牽測」，他對個人主義，精神主義的接近，所以是不堅決的。

他底思想底出發點因為有這樣的現實性，所以不管他底個人主義也好，精神主義也好，在他底論文裏却仍然到處有許多光輝燦爛的片斷，在「科學史教篇」裏，他論希臘學術的時候，已經把大學教授底形式選擇好得多了。他自先主張看希臘學術，應該「自設為古之一人，返其舊心，不思近事，平意求索，與之批評，則所論始云之不妥」；若據此立言，則希臘學術之極，為至可褒而不可黜；其他亦然。這就是主論評人論物，應該不離開時代環境。在「摩羅時力統一第二節」開首，他就這樣說：「平和為物，不見於人間。其強謂之平和者，不過戰爭方已或未始之時，外狀若寧，暗流仍伏，時劫一會，動作始矣。故觀之天然，則和風拂林，甘雨潤物，似無不以降福祚於人世，然烈火在下，相為地齒，一旦俱興，萬有同壞。其風雨時作，特暫伏之現象，非

能永劫安易，如亞當之故家也。人事亦然，衣食家室邦國之爭，形現既昭，已不可以掩掩；而二士室處，亦有呼吸，於是生顯氣之爭，強肺者致勝。故殺機之防，與有生憎；平和之名，等於無有。他這種生活鬥爭的認識，前面已經提起過，現在特別再提出這一段，指明他對字相萬物的觀察，能够在發展過程中，把握外發靜止的變動的實質，已經不是形而上學，而用學者所能企及的了。這一方面基因於他相信進化論，另一方面基因於我們綜合上述三點的他底思想的現實性，所以他毫無疑問地認定宇宙是變動不息的，而且通過他「摩羅詩力說」這篇文章的全體自始至終是一種鬥爭精神。

此外如他在辦「新莊」的時候，就帶有的復古傾向，這篇文章裏表現得很明白，我們却也有說一語他這種復古傾向本質上和這年的復古派是如何不同的必要。

他在「文化偏至論」裏說：「夫方賤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可見他仍然非難「賤古尊新」；他在辦「新生」的時候帶有復古傾向，益可無疑，爲什麼要復古呢，他底意思很明顯，就是要求新。求新必須懷古，他底爲這兩件事分離不離，他在「摩羅詩力說」裏說，「今日置古事不道，別求新聲於異邦，而其因即動於懷古。這兩件事相互關聯，他底以爲「夫！民發展，功雖在子懷古，然其懷也，思理朗然，如鑿明鏡，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其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悅，則長夜之始，即「斯時。」所以他底着重點還在於前途，還在於上征，決不像現在的復古派一樣「薄夸耀以自悅」。所以他底懷古，根本離不開求新。他堅決反對神往往古，以爲是太平盛世的那種迷信思想，他說「吾中國愛智之士，獨不與西方同，心神所注，遠遠在於唐虞，或適入古初，遊於人獸雜居之世；謂其時萬禍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悲濁貼危，無以生活。其說照之人類進化史實，專正背馳」。至於今世國粹家底所謂精神國粹，他也毫不贊成，說：「昔英人設水道於天然，其

國人惡而拒之，有謂水道本創自天竺古賢，久而術失，白人不過竊取而更新之者，水道始大行，西國篤古之餘，每至不惜於自欺如是。曩且死抱國粹之士，作此說者最多，一若今之學術藝文，皆我數千載前所已具」。所以他底懷古傾向，和現在的國粹家可以說毫無共同之處。他有這種傾向，主要的是因為當時反滿復漢思想很膨脹，憧憬民族過去的光榮，也是進步思想之一。而且「懷古」如真真的如豫才所說是爲的「時時上征」，「時時念輝煌之舊有」；如果真的是爲的「時時進光明之長途」，而並不是「漫夸耀以自悅」，那麼，這也就是正確的「懷古」的態度。今天的黨聯，就是用這態度來研究歷史與古代文化，資本主義社會各作家的。然而在舊社會制度正在崩潰的過程中，除守舊社會制度的社會集團，是無所謂「長途」的，因此他們底懷古，就一定是守舊的口實，是反對進步，革新的工具，因此他們底「懷古」也必然是「漫夸耀以自悅」；所以只要進入社會鬥爭中，那麼，只要「長途」，遇見這類以「懷古」爲守舊口實的「懷古」，就不能不反對，而爲了這「反對」的鬥爭在陣容上劃出敵我的明確界線以正視聽，要「長途」的這些有正確態度的「懷古」者，便往往不能不暫時放棄了「懷古」。豫才後年之所以成爲反對復古的不妥協的戰士，就因為他這種要「長途」的「懷古」，必然會遇見中國的「漫夸耀以自悅」的「懷古」家，不能不發生鬥爭，而鬥爭一發生，充滿戰鬥精神與進化思想的他，自然不會屈服，便必然走上反復古的征途了。所以憧憬民族過去的光榮，當豫才在日本時，雖然出發點很純正，但就以此爲解放民族的唯一手段或目的，不能及時看守護舊社會制度者底陰謀，那就大錯特錯，然而却有許多人循各各不同的方向，或者自動的走上這條錯路，或者在與目的是守護舊社會制度的復古家鬥爭中屈服了。豫才獨能得免于此的，他底思想底裏的現實性，使他底戰鬥態度能依照具體的歷史條件來轉變，實與有最大的力焉。

他一方面非雜物質與實利，反對羣愚，主張精神改造，一股腦兒精神主義與個八主義，而另

一方面，他底視線又始終固着在現實社會的鬥爭問題上，結果，他一方面不消說不是個唯物論者，同時也就不能是個真正的唯心主義者了，他有時正圖調解此種矛盾，而結果是毫無效用，他在「文化偏至論」裏，曾明白表示說，就是對個人主義與精神主義，也應該「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就是調和折衷的意思，然而結果呢？他不但調和不出更光大的路子，都只不過是把自己底結論陷到糊塗，無力的地步罷了。他這四篇文章，篇篇如此，不管大小結論沒有一處不令人生氣，令人發笑的。他底論調，有些地方，竟弄得依然只好求救於二元論去，所以他雖然非難實利主義，可以說是對李鴻章一類皮毛風尚的反動，却不能給它以致命的打擊。他這四篇文章，那怕是如何洋洋大篇，說了許許多多，我們終于看不見他找到一條有力的方案，可靠的路子。——他確會想到過社會，可是他決沒有想到人類底精神最後決定於歷史條件與社會生產力，所以縱使他偶然碰到「社會」，馬上就啣接不上，又復回到精神主義裏去了。

所以他在當時那怕是怎樣相信尼采，那怕是怎樣相信只要有新文化介紹入中國，雄聲一發，中國就可轉弱為強，但問題的命根究竟不在此處，而潛藏在他此種信念中的他底社會實踐的態度，對他底信念，恰巧成為矛盾的存在，這矛盾的存在，軌碾出他許多片段的，單獨存在的精關見解，但也因為這矛盾妨礙了他思想上的各側面得到統一的體系，因此也就不能將這些精關的片段聯合成爲一個有機體。他始終陷在不堅定，調和的狀態中得不到銳利的思路，而淪爲庸俗的論調。他底思想，前途正多危難呢。

尼采主義 與豫才

豫才底個人主義精神一直留在他生活裏，漸漸的被削弱下去，經過一個相當長久的時期直到他參加了左聯之後，才完全被消滅。尼采底個人主義到底是普魯士型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牠代表着以君主制統一德意志發展資本主義的意識形

態，尼采底個人主義是和貴族特權結合着對抗工農大眾的地主與資本家中最反動部分的意識形態。尼采主義只有在暴露了資本主義的道德，民主，自由，平等，宗教偶像等底虛偽性這一點上帶有革命性，然而這只是尼采主義底光輝的外衣，在這外衣下隱藏着的是一把高高在上的權力的劍，這把劍上，現在已經刻上法西斯主義的烙印了。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要反對帝國主義，同時又要像尼采這樣，將個性和那勾結帝國主義的封建特權相結托，是不可能的，所以尼采底個人主義要想和出身于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戰士豫才做長時期的伴侶也就沒有可能。當尼采式的個人主義在豫才以後的思想中逐漸稀淡下去的時候，這種個人主義倒在魯迅自己底獨特方式上被利用了，他變形為一種強烈的抗俗精神和反中庸的態度。這種尼采精神的變質，使他獲得了捨棄紳士與封建文物的無敵的銳氣。

浪漫主義裏隱藏着現實主義，及其矛盾

現在再回頭說到文學方面，當時豫才底唯心傾向很濃厚的個人主義，表現在文學上成為浪漫主義。他底「摩羅詩力說」這篇文章裏雖然也拖進了幾個寫實主義作家，但作為這篇文章底核心的，是拜倫。

豫才並不把那些寫實主義作家當作寫實主義者來理解，而却把他們當作拜倫影響下的浪漫主義底連系以論述浪漫精神影響力之大。不過有這許多寫實主義作家被牽入旋渦，却也是大可注意的一件事，豫才當時不必一定認識他們底實在價值，但對於他們的偉大，豫才算是把他們劃歸他所最崇拜的一類文學家中去了，這就說明了他同時也不能不受他們底薰陶。所以和他底個人主義被他底社會鬥爭的現實性制約着一樣，他底浪漫主義裏，正也埋伏着寫實主義的傾向。因此，他底浪漫主義並不為形式主義所拘囿。他反對形式主義說「劉彥和所謂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麟辭，吟諷者卿其山川，崑崙者拾其香草。皆著外形，不涉內質，孤偉自死，社會依然，國語之中

幽深哀焉。」而且拜倫底缺點，他也知道得很清楚，說他「或以不平而厭世，遠離人羣？事與天地爲儕偶，如哈洛爾特(Harold)，或厭世至極，乃希滅亡，如曼弗列特(Married)；或被天天之毒，至於刻骨，乃威希破壞，以復仇歸，如康拉德(The Corsair 中之主人公)與盧希飛勒(Cain 中之魔鬼)；或棄斥德讓，窺視淫海，以嘲弄社會，聊快其意，如堂祥(Don Juan)。」這都因爲他底浪漫精神裏，潛藏有現實眼光的緣故。但應該注意的是他底浪漫氣派非常之盛，雖然他底浪漫主義從救世主義出發，希望以這種力量來解救人生與中國，却帶有多少悲痛的成分，可窺見他從事文學運動遭受失敗以來的情感，但此種悲痛的成分很微弱，比起全篇文章那盛大的氣派，簡直等於無有，因此，我們也可以知道他以前的失敗，到現在爲止，並沒有很大的挫折他底希望，摧毀他底精神。

還有一點，我們應該回轉頭來，再正面問一問，原來豫才是一個相信科學的人，他怎麼同時又會反對物質，主張浪漫文學呢？這兩者，在我們覺得很難調和，不過豫才不會將科學擺個老朋友放棄掉，所以在他的邏輯上，無論如何，就是不合式，也得把此兩者同時兼有，這也是他底矛盾之另一面。他以為「智力集於科學，」是「思制天然而見其法則，」並非爲了實利。他說「侯契赫(J. H. Schell)暨拉布拉(S. De Laplace)之於星學，揚俱(The Young)暨弗勒那爾(A. Frisnel)之於光學，歐思第德(F. Oesied)之於力學，蘭麻克(J. De Lamarch)之於生學，迭兀冠耳(A. De Candolle)之於植物學，威那(A. G. Werner)之於礦物學，哈敦(Ch. Hutton)之於地學，瓦特(J. Watt)之於機械學，其尤著者也。試察所儀，豈在實利哉？」這當然是只從科學者個人而不從社會的要求去理解科學發達的錯誤觀念，但以此觀念，減少了科學的實利性，科學便能和他底精神主義的浪漫傾向相安無事了。而在浪漫主義的文學這一面呢，這時爲了把它拉來放在科學一道，却只得勉強削弱了他文藝改造精神的原有立場，把文學底

作用減低到科學的輔助物，就是科學底調節劑。約翰穆黎曰：近世文明，無不以科學爲術，合理爲神，功利爲鵠。大勢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養吾人之神思耳。涵養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人們天天科學科學，他以爲如「嚴冬永留，春氣不至，生其軀壳，死其精魂。」所以必須要有文學，才好像一年有四季，人類得有全生命的調節而不至枯萎。文學與科學的關係既然是這樣的，那麼，浪漫主義的文學，自然不但不會和科學矛盾，而且更調和了。這種砌合方法，很是勉強。但在他沒有能够追尋到統一的思想體系之前，也實在是沒有法子可想的。

實際的戰鬥精神
中豫才底創傷

「摩羅詩力說」洋洋義餘言，所得的結論，却不過是「吾人所得，則有介紹新文化之士人。」辦法仍然平常不過。但從這裏面也看得出豫才底思想始終避開空想的性質，他大叫着「今索諸中國，爲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授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可是他並不以拜倫自命，他也並不勸人家都做起拜倫來；固然，他明明希望中國有拜倫一類的摩羅詩人，然而他不知道勉強去學或自命爲拜倫，並不一定就能成爲真正的拜倫；不深刻了解他們底精神，徒學取他們的外形，則恐怕不但于中國無益，反而給世人留下許多笑資罷了，所以他滿口摩羅，到底沒有自己也瘋起來，還是切實地說：「吾人所得，則有介紹新文化之士人」，就是把新文化介紹到中國來，供給廣大的中國人民去吸收，讓他們自己吸足了養料，自然然而產生詩人。這說明了他把希望完全安置在廣大的羣衆身上和尼采底個人主義；一開始，在本質上就並不能完全一致了。至於他自己呢，他要挑選腳踏實地的工作來做，那便是作爲中國新文化底施肥的一份子，從事於介紹新文化。也就是他自己親身來負起他所期待的事業。這就是「域外小說集」

的翻譯。

他和他底同伴當初出版「域外小說集」的計劃，「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七冊的。」這小小的計劃，他們頗爲認真，豫才和他底兄弟，爲了推蔽翻譯的字句，還特地去聽章太炎講語言文字之學。這是一九〇八年的事。這年，豫才不但努力翻譯新文學，並且直接加入光復會爲會員。推翻滿清的革命，到這幾年已經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概了，革命派與立憲派都從理論的論爭移向實際運動；滿清政府看見大勢不可阻遏，在表面上算是同意立憲了，因此各省的新舊官僚大事活動，然而實際上滿清政府只不過是藉口立憲，陰謀推行中央集權的，並沒有立憲的誠意；而同時，革命的怒潮，就是有真正的立憲，到這時也未必能阻止得住了。一九〇七年一年裏面，革命軍一連起事了五六次，雖然都失敗，但影響却非常之大，其中尤以安慶徐錫麟之役激起民衆公憤，仇恨滿清的觀念因此更深刻。徐錫麟是浙江紹興人，和豫才有無來往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和徐錫麟一道組織光復會的陶成章，陳伯平，馬宗漢等，都和大捕黨人，人心極憤，在東京的紹興同鄉便也開同鄉會哀悼，打電報到北京去罵滿清政府。這種直接和紹興相關聯的革命怒潮，便必然地激到豫才身上。光復會裏的同鄉既然大體和他認識，革命波及紹興，紹興同鄉之間的激憤，自然更和他息息相關。開同鄉會的時候，他就是一個熱烈的發言人。革命的怒潮已同着每角落裏衝蕩，是在這樣的時候，豫才便也被捲入光復會裏去的。那時的光復運動者有兩派不同的主張，一派主張以行動推翻滿清，一派主張改革思想爲最重要的工作。這兩派底主張，一見之下，好像前一派正當些，其實，辛亥革命的失敗，歸根結底還是因爲缺少向新時代邁進的諸社會條件的準備，思想改革雖然並不是應該準備的諸社會條件之全部，但在當時的豫才底見解上，會把這思想改革估量作根本問題，是當然的事，因此，他必然屬於後

一派。然而當時滿清的腐敗，帝國主義的熾緊壓迫，人民推翻滿清的政治情緒已經到了高潮，要阻止這種政治的迫切要求緩慢從事準備，實為勢所難能，問題只在怎樣利用這種大勢，在暴力的瞬間將激社會諸關係的變革。可惜當時並沒有這樣明確的指導，辛亥革命結果是仍舊改革不了社會的實際，所以辛亥革命前的民衆底迫切政治情緒，幾乎是白費了，但無論怎樣，這種情緒在當時是壓倒一切的，主張先從事思想改革的一派，就很難有顯著的作爲了。然而對於豫才我們能够知道的是：在革命的前夜，在統治者臨終的狂暴中，豫才開始作爲預感暴風雨的海燕，不再在邊際的地方飛繞，而終竟投入旋渦中了。

一九〇九年二月『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出版，在東京和上海兩處地方寄售。這本書的裝訂很優美，紙質甚佳，書名用篆文題寫，毛邊不切，可以說是以後魯迅底新書裝訂的先聲。

他底書籍裝訂法，力求美感，每頁的上下都留有相當多的空白，書前書後也必定留幾張空紙，這一方面是為了讀者不致於覺得太束縛，二方面讀者倘看完了書之後，有意見不致沒有地方好寫。這種爲讀者着想的美感，魯迅未曾一時忽略過。他在華蓋集『忽然想到』裏這樣說：「校着苦悶的象徵的排印樣本時，想到一些瑣事——

「我於書的形式上有一種偏見，就是在書的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後，總喜歡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時候，一定明白地註明。但待排出來，却大抵一篇一篇擠得很緊，並不依所註的辦。在套別的書，也一樣，多是行行擠得促促的。」

「轉印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牙地頭也很寬，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很短，想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什麼，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匝匝的數字，加以油真排集，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減少讀書之樂，且覺得彷彿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可是在資本集中，社會的一般趨於

貧窮化，讀者購買力疲憊不堪的資本主義世界一樣，尤其是半殖民地中國，讀者購買力更低！而教育又不普及，書買爲了廣銷出版書籍，不能不儘量減低價格，節省成本，這結果，魯迅所主張的許多書籍裝訂上的美感，都不能和書買節省成本的政算兩立，所以不管魯迅底努力，到底只有他自己底書靠着他底聲名才能勉強使書買依照他底裝訂法，其他的書籍，除了較貴族一點的少數昂價書之外，普通的出版物，終究還是滿書擠得密稠稠的。這件事，並不說明魯迅底空白留多的主張不合實際，却相反的，說明以金利爲本位的社會，排斥合理的美的人生，對讀者如此些微的一種快美之感，也極力剝削，在這地方，魯迅底美的精神是和現社會對立的。但另一方面，魯迅底毛邊不切的裝訂法沒有通行，却並不是因爲和書買底生意經有礙，而實在是由於讀者不歡迎，因爲讀者不歡迎，所以書買簡直不敢出毛邊不切的書籍。這道理很簡單：不便當。我們看他自己敘述提倡毛邊所得的結論吧：他說「附帶還要談幾句關於毛邊的牢騷。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復香爐燭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於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電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得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與李老板約：別的不管，只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邊確是毛邊。不過在書舖裏，我却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面光滑的「傍徨」之類。歸根結底，他們都算徹底的勝利。」據魯迅自己推測，最初反對他底毛邊的，似乎是一位圖書館員，但感到毛邊不便的我相信一定不單是圖書館員，所以他底毛邊不但最早被攻擊，而且引起他所定下的其他兩樣改革，到底還更不通行些。毛邊不切，在一本書底外觀上確實有一種美感，讀起來的時候要親手裁開倒也並不費時間，只要是一頁一頁挨次讀下去的，並不怎樣感到不便。

但若不一頁一頁挨次讀，要翻查什麼地方，就非常不便了。光邊的書，可以用手指摸着書口，書頁就一張口彈過去，不會有多大的脫漏，我們也就可以很快地一頁頁翻看，一會兒就可追尋得到要查看的在那一頁了。毛邊的就不然，書頁不齊，摸着書口就不能很均勻地一頁頁彈過去，有時半天掉不下來一張，有時十幾張二十幾張一齊掉下來，所以就是單純地找某一頁，也不能摸着書口看頁端的數字，而不能不一頁一頁翻，麻煩實在不小，至若要在書內的某篇文章，那就是你明明知道那篇文章在某幾頁先後，或某文章之前，某文章之後，在光書只要隨手摸着書口一翻就找得到的，在毛邊書也不能不先翻書前去翻目錄，確定是在第幾頁，然後再順次找到第幾頁，才找得到。一本毛邊書，假使有數處地方要翻查，那就麻煩之至了。所以我覺得毛邊書雖然美觀，但爲了顧全實用，起碼書口不能毛。魯迅底書三面都毛邊不切，很不合實際，這表現了在他底美的觀感的全體中，相當存在着閃避現實的成分，證明了他從事社會鬥爭的實際精神中殘存着的莊周韓非的情調，還沒有完全被克服。——然而這是以後的事，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他在受了人類的冷遇與舊社會直接間接的打擊後，他底生活確實帶有相當悲鬱的色彩。這種悲鬱，因爲客觀社會繼續不斷的無情，所以始終沒有完全脫離猶豫才。那怕他底奮鬥堅毅不拔，那怕他相信進化論，以爲將來必定好於現在，那怕他鼓勵青年前進時，不惜將自己底一切悲鬱隱藏起來，那怕他後來是明明白白看見人類底進趨了，然而已經沒有法子補救，這已經是舊社會在他底心靈上留下的一個創痕」。他底毛邊不切的美感，正是他底帶悲鬱性的美學的表現，這悲鬱性的美學興味裏，帶着孤傲性。而這種孤傲性，同時又正是他藉以和四面八方的敵人孤軍獨戰勇猛的根源。

但他也並不是不知道他自己帶有這種悲鬱，因此，這種悲鬱，常常受他有意識的壓迫。比方「忘却」，抄古碑麻醉自己，還都是他抵禦他心中的憂鬱的辦法。他自己稱這種悲鬱爲寂寞，這是舊社會給他的創痛，抵禦這種創痛，正是他全部戰鬥生涯中重要的一面，因爲他是「個實際的鬥

爭者，他不能容許此種成分的存在。他曾經一步步對牠佔了勝利，不過這勝利的昇進是極其曲折的。同時牠也常常趁魯迅不備的時候，出來作祟。

回國

「域外小說集」第一冊的銷行，顯然又將是對豫才精神上的一个打擊吧，六月，他歸國的時候，「域外小說集」第二冊也出版了。兩本書底銷路如何，恐怕他回國的時候，已經大體有點數目了吧？

他在日本曾經想往德國去，不知道怎麼失敗了。他自傳中說：「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人很希望我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他二十九歲，結束了他底學生生活。他回到中國，革命的爆發就在眼前了。

第三章 流入冷藏器的熱情的變化

第六節 驅除寂寞(一)

一九〇九——一九一一：二九歲——三一歲

豫才從日本回國的時候，嘴上留着向上翹起的鬚子。他底辮子是在出國留學的時候就早已剪掉了的，那時他雖然托身國外，也受了有辮子的同胞底輕蔑；現在，他要帶着無辮的頭回到全國都有辮子的中國來，問題自然更大了。他到上海，便首先設法裝了一條假辮子。那時上海有一個專裝假辮子的專家，他底大名，那時的留學生大約都知道的。豫才也到他那裏買定了一條假辮子，市價是二元，帶着回家了。辮子「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裏要防擠掉或擠歪，也不行。」（病後雜談之餘——且介亭）豫才帶着這樣一條辮子回家，他母親倒不說什麼。「然而旁人一見面，便都首先研究這辮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聲冷笑，」（頭髮的故事）將他擬為殺頭的罪名；「有一位本家，還預備去告官，但後來因為恐怕革命黨的造反或者要成功，這纔中止了」。（頭髮的故事）

豫才回國，就由他在東京時的舊朋友許壽裳介紹他到杭州兩級師範學校教書。「那時兩級師範學校有許多功課是聘用日本人為教師的，教師所編的講義要人翻譯一過，上課的時候也要有人

在旁翻譯」。(魯迅翁雜憶)豫才就在那裏担任這翻譯的職務，和他同事的，還有現已知名的夏丏尊，和一位沈鈞儒，豫才担任生物，化學方面的翻譯，還兼任幾點鐘生理衛生的功課。他在學校裏很受學生尊敬，翻譯的講義，也因有修養的古文，而很被人稱贊。

夏丏尊在『魯迅翁雜憶』裏說：「周先生教生理衛生，曾有一次，答應了學生的要求，加講生殖系統。這事在今日學校裏似乎也成問題，何況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時代。全校師生都爲驚訝，他却坦然地教了。他只對學生提出一個條件，就是在他講的時候，不許笑。他曾向我們說：「在這些時候，不許笑是個重要條件。因爲講的人的態度，是嚴肅的，如果有人笑，嚴肅的空氣就被壞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見。據說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別班的學生，因爲沒有聽到，紛紛向他來討油印講義看，他指着剩餘的油印講義對他們說：「恐怕你們看不懂的，要求，就拿去。」原來他的講義寫得很簡，而且還故意用着許多古語，用「也」字表示女陰，「了」字表示男陰，用「女」字表示精子，諸如此類，在無文字學修養未曾親聽過講的人看來，好比一部天書了。這是當時一段珍聞」。這裏可以插進一句後話，就是：打渾與以真話爲笑話的害處之大，他那時候，已經知道了。

他底假辮子裝了一個多月，大約到兩級師範去教書的時候，他便把假辮子除掉了。他底意思是：「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病後雜談之餘)他以為做人要做得真實。可是這真實的代價就不便宜。當他在路上走過的時候，便有許多人欺着，有的冷笑，惡罵。小則說他偷了人家底女人，「因爲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大則指爲「裏通外國」。(病後雜談之餘)但他在杭州做教員的時候，還可以在沒辮子的頭上配上洋服，算是洋鬼子。因爲杭州比較的風氣開一點，兩級師範有日本人當教員，穿洋服的就起馬不致於沒有伴了，而且杭州認識他的人也不多，罵起來也就不容易追本求源。孫福照底「

我所見於示衆者」裏面說：「他在教室試驗輕氣燃燒，因為忘記攜帶火柴了，故於出去時告學生勿動收好了的輕氣瓶以免混入空氣，在燃燒時炸裂。但是取火柴回來一點火，居然爆發了；等手裏的血濺滿了白的西裝，硬袖和點名簿時，他發見前兩行只留着空位：這裏的學生，想來是趁他出去時，放進空氣之後移下去的，都避在後面了。」這大約是他到兩級師範不久以後的事，這裏面就指明了他那時正穿着挺括括的西裝。穿西裝在那時的中國也不容易，一踏上走去也追隨着笑罵的聲音，有的還跟在後面罵『這胃失鬼！』『假洋鬼子！』所以不久之後，豫才終於連洋服也不能穿，改穿羽紗，當年叫作洋官紗的長衫。這洋官紗的長衫以後就一直穿在他身上好幾年，成爲他素樸的徵象。一年之中，他總有半年是穿這洋官紗的，端午前就穿起，一直要穿到車陽邊。

但是他改穿了長衫之後，人們罵得只是更加厲害些。無辦確也是一場大災禍。

豫才在那時候很會吸捲烟，已經是有名的了。他晚上也睡得很遲，每晚搖鏗鈴以前，齋夫照例要替他買好強盜牌香煙和條頭糕，遇到星期六晚上，則因爲翌日可以起得遲一點不要緊，香煙和條頭糕就備得更其富足了。他就吃着條頭糕，吸着香煙，讀起小說來有如他從前吃餠，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一般。就是說，他這種生活，和他從前的生活習慣正是一脈相承的。不過這裏應該注意的是他底這種生活內容，已經相當帶有頹廢成分了。他底『域外小說集』兩冊，在東京寄售處結了賬，第一冊只賣去二十一本，第二冊賣去二十本，以後就再也沒有人買了。至於上海的寄售處呢，一直無從知道，如墮落大海，後來聽人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便不再有人要。於是想收回成本再印第三冊的希望只好拋棄，已成的書，都只好堆在上海寄售處的貨棧裏。

豫才底好夢，連最後一個泡影也破滅無餘了。

他自己如置身無邊際的荒野，『無可措手了』：『吶喊』自序到這時候真是『無可措手』了。

他底寂寞一天天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他底靈魂。

他自己說：「……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方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回到古代去，」（『吶喊』自序）這所謂『沈入於國民中』正是他在『摩羅詩力說』中寄希望於廣大羣衆這一意見的進一步的實踐，指明了他底實際生活（特別是歸國以後）驅使他更進一步的與他受應響於屈采則原來就不完全一致的個人主義背道而馳；而所謂『回到古代去』的，就是他接着要來的抄寫古書的生活。他說『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同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爲我所不願追憶，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聯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代『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的確，他是再沒有慷慨激昂的意思了。他底满腔熱情，碰來碰去都是寒酷的冷壁，這無情的現世界，使他頹唐，也使他不能不更冷靜下來些，觀察自己，觀察別人。他成爲現實主義者的第一個條件是因爲他最初時出發點是爲社會爲人生命的，第二個條件是因爲他由進化論出發，生活是戰鬥的，思維是不脫離實際意義的，第三個條件應該是他底感情經過冷壓，不再能，也不肯空洞地奔放或激昂了。這第三個條件，說是救了他，還不如說是給了他許多痛苦更爲妥善。他受到這冷壓，在他主觀上僅不過是一天天加重了悲哀和苦悶。他無法解脫他自己，不能夠打出這現實的圈子，於是於他於萬不得已時，便用種種方法來麻醉自己底靈魂，然而這僅是消極的一面，而在這消極的一面，豫才自己是覺察得到的罷了。還有積極的一面，他自己沒有覺察到，那便是他漸漸習於用冷眼來看世界了。他漸漸要求更深一層，進一步去理解世間的現象，無論怎樣動聽的名義，他漸漸堅定起來要看一看牠內面的，那深藏在底層的究竟。這種追求現象底本質的性格，在他

童年時代，如看二十四孝圖之類，本來就已經有點顯露，現在是他底這種天性受着現實世界底壓迫，在他底不知不覺中，更用力向前發展罷了。他對人類的熱烈的愛，從此也漸漸變成一種秘密的慈心了，這是因爲他底熱烈的愛，不能不繼續不斷地遇到殘酷世界底反擊的緣故，他所謂『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樑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爲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就是出於他意想之外的歷史的殘酷吧？這樣，他底愛，在和不太合理的私有社會和歷史的殘酷互相矛盾之下，便一方面使他底愛變成秘密的更深切的慈心，但是不隨便顯露了，另一方面，軌鑿出他對惡，對那想消滅一切大公無私的愛以自利的惡發生勢不兩立的恨。——只是這一切，都不是一時一日能形成的事。目下，他僅不過是被壓抑在無情的現實世界底重担之下罷了。他在苦悶中摸索着，寂寞中自求生機。他完全憑着他底天稟，在苦痛中掙扎。

要說到豫才對人類的愛，我們以後隨時可以遇得見，他對國家，對民族，對人類全體幸福的關心，我們是早已知道的了。即如前面孫福熙所說的豫才試驗輕氣燃燒的一段故事，也正表現他儘量愛人而忘記了人反而可以欺侮他。夏丏尊先生底『魯迅翁雜憶』裏，也有一段話指出了他底慈憫的心懷。他說：

『周先生曾學過醫學，當時一般人對於醫藥的見解，還沒有現在的明瞭，尤其是關於屍體解剖等類的話，是很新奇的，閒談的時候，常有人提到這屍體解剖的題目，請他講講海外奇談。他都一一說給他們聽，據他說，他曾經解剖過不少的屍體，有老年人的，壯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經驗，最初也會感到不安，後來就不覺得什麼了，不過對於青年的婦人和小孩的屍體，當開始去破壞的時候，常會感到一種可憐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屍體，更覺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氣，拿不起解剖刀來。我曾在這些談話上領略到他的人間味。』

教了他底寂寞生涯底慰安的，除了蒜頭糕，香煙和文學書之外，還有科學的研究。在目前，

還是他消耗他自己底生命，麻醉他自己底靈魂的方法之一，然而在實際上，他却是不知不覺靜地在給自已增進學問上的修養。他白天自己研究植物學，往西湖等野外採集植物，壓制標本。他以爲這很有趣，也很重要，在科學設備很貧乏的中國也可以研究，材料又隨地隨時採集得到。因此他也常寫信給他底三弟，叫他也學植物學。

周作人底『關於魯迅』裏說他歸國後他就開始抄書，那麼埋入古代去以麻醉自己底靈魂的方法，想他這時已經開始應用了。原來清代樸學極盛一時，他既然是書家子弟，便不免受清代學者的濡染，況且他在少年時代也會有過抄書的習慣，他在日本時又會就學於太炎先生，受太炎先生影響很深，對國學自然興趣益大了。所以他所輯集的佚書，如『全稽郡故事』，『密康集』，『謝承後漢書』等，都完全是用清儒家的方法的。他決不是勉强的用抄古書的方法來麻醉他自己，只因爲他對於輯集古書，本有興趣和心得，所以他採用這方法來麻醉他自己，也不是偶然的。這裏值得注意的是他並且是一個深究科學，酷愛藝術，博通當時的世界各進步學說的人，所以他決不願爲清儒所囿，認爲抄書並不能代替他底人生，因此他雖然對抄輯古書本有心得，却仍然以爲這只能當作是麻醉他自己的一種方法。他在學校裏是一個幽默者，平時不太露笑面，很嚴肅，只在談話的時候才笑一笑；對於官吏，他似乎特別憎惡，時常摹擬官場習氣，引人發笑。兩級師範底校長是一個身爲地主的偽道學先生，豫才很不滿意他，後來這校長因受反對而被換掉了，繼任的就是沈鈞儒。但這時，豫才恐怕已經離開兩級師範了。他在這學校裏只教了一年，第二年八月，他便回到故鄉的紹興中學堂當教育兼監學。這年陰歷四月，他底祖母去世，年六十九歲。

他在夏天從杭州回家的時候，帶着許多採集所得的標本，暑假中就沒有乾燥的加以整理，把已乾燥的貼上台紙。秋天，他到紹興中學堂做監學的時候，就兼任一部分的博物學功課，同時繼續採集植物標本。在學校裏常常做顯微鏡下的工作。可見他對科學的興趣非常濃厚。世界上的

文學巨匠，十個有九個是大有成爲科學家的可能的，只因爲歷史的命運限制他們，把他們置諸水深火熱中，使他們不能向科學發展，而強迫他們起來呼號，大叫着解放人類，反對不合理的世界。他們底目的仍舊是爲人類謀幸福，不過他們底手段是不同的了，他們深知道：必須先除掉人類幸福的少數自私的障礙物，然後科學才能爲人類謀福利，不然，科學家只不過是被少數人利用幾害多數人而以自肥的傀儡罷了。

他既然回到故鄉的紹興，他底無辨之災就又更大了。因爲故鄉裏的人都認識他，就無論他如何裝束，由於他底沒有辨子的頭，總不失爲「裏通外國」的人。他底同事避之惟恐不遠，官僚防之惟恐不嚴，尤其那滿洲人的紹興知府底眼睛，使他感到不快；這知府每到學校裏去，總喜歡注視他底短頭髮，和他多說話，他終日如坐在冰窖子裏，如站在刑場旁邊，這都並非爲了別的，只因爲他缺少了一條辮子。

學生們裏面，也忽然起了剪辮子的風潮，有許多人想把辮子剪掉。豫才是做監學，他自己已沒有辮子的，照理他應該贊成剪辮子，但他連忙禁止了。學生就舉出代表來詰問他究竟有辮子好，還是沒有辮子好？他驚惶地答道：「沒有辮子好……」

「你怎麼說不行呢？」學生們於是更不明白地詰問道。

「犯不上，你們還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罷」這是豫才底回答。

看他底這些答話，很明顯地我們知道他所以禁止學生剪髮，並不是如一班戰戰兢兢唯恐飯盤打破的教育家一樣是爲自己的地位打算，而却是爲了愛人，愛學生。學生們雖然不滿意他底回答，撇着嘴走出房，終於把辮子剪掉，並且把豫才斷定爲「言行不一致」，看，起了，但他并很心願就在這些地方言行不一致；因爲那時還是滿清的天下，辮子就是腦袋；軒亭口離紹興中學並不遠，那就是秋瑾小姐就義之處；慍他人底腦袋之慨，以給自己博得言行一致的美名，在豫才似

乎有點躊躇。他後來自己在鬥爭之中，時常說生命是他自己底隨時準備失去最後抓着的「一株稻草」，但大膽勸別人就義成仁，尤其是勸他當面的人，他總很少這勇氣，這也是他底仁愛心的表現。

好了，許多學生把頭髮剪掉了，人言嘖嘖；豫才並不開除他底學生以表示服從上司，並犧牲學生底學業以保全個人飯盤。他不，他裝作不知道，一任他們光着頭皮，和許多辮子一齊上講堂。這剪辮子的風氣傳染開來了；第三天，紹興師範學堂裏的學生也剪下了六條辮子，晚上便開除了六個學生，這六個人其實犯了什麼罪呢，只是爲了自己底便利，因此妨礙了學校當局底飯盤，竟弄得留校不得，回家不能。好在不久之後革命成功了，若不然，留辮子的惡勢力存在，低附這勢力以圖一飽的混蛋們也一定不放緊這些無辮學生的，而懦漢充斥天下，他們只不過是助凶作惡的火上之油罷了。

實在說，滿清政府底動搖，就是有些無知的人民，有時也敏感得到了，豫才底有一位本家看見豫才沒有辮子想去告官而終於沒有去告的，就是此種敏感的表现。革命運動在宣統元年雖然因爲載灃底僞立憲在表面上推行得很熱心，初則下諭決行立憲，繼則下諭成立各省諮議局，又頒佈廳州縣自治章程及法院編制法，動搖了一部分革改心較爲薄弱的國民心理，蒙蔽了一部分淺見的眼睛。但滿清政府投降帝國主義，滿清親貴腐敗昏庸，藉公肥私的情形，却到底不能長久欺騙人民。載灃雖然極力掙扎，以皇室大攬軍權，使親貴分任要職，可是這班親貴不爭氣，載灃所恃以爲元老大臣的奕劻，根本就是一個貪吝無用的人才，由一班貪婪的少年親貴擁戴着，互斂私財，他們聽到一班獵官的新人物說可以「利用外資，開發實業」便歡喜的了不得，內外勾結，設法大舉外債，干願將全中國直接置於帝國主義刀俎下，只要私囊能够飽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以日本爲中心，互相勾結，節節進逼，日英既於一九〇五年改訂同盟，日法又於一九〇七年成立協約，同年日俄亦成立協約，計劃囊括滿蒙。美國想牽制日俄協約，向列強提出「滿鐵中立案」，失敗

豫才底監學地位，到辛亥年就沒有了，這年他想到一個書店裏去當編譯，結果也沒有成功。直到武昌起義，浙江光復，紹興也掛起白旗來，豫才才又得到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盤。

武昌起義，數月之間便席捲了滿清政府半壁天下，原不是偶然的。滿清底弱點本來早已暴露無餘，西太后死後，載灃底偽立憲初雖騙住了一部分人心，繼亦漸漸露出真面目，加以帝國主義底加緊壓迫，滿清政府濫借外債，國內商人既忍耐不住，知識分子，立憲派及進步官僚，這時都在暗地裏希望革命了，加以帝國主義外強中乾中國經濟，農村手工業破產，失業農民及中國整個下層社會被捲入國際資本底災禍中，痛苦呻吟在死亡線上，成了革命的有力基礎，反帝與反滿清的情緒，從下到上幾乎大家都一蹶，非常激昂。立憲派到了辛亥年，只不過在口頭上不叫出革命罷了，實際上，武昌一起義，他們立刻站到革命這一方面來；各省督撫也因爲受不住滿清明爲立憲，實則是中央集權政策的壓迫；所以武昌革命一爆發，他們也就立刻和進步官僚，商民及知識分子同聲影響了。但也正因爲辛亥革命雖然經過軍事上的流血，可是參加的份子如此複雜，而且辛亥革命的成功，僅止於上層統治形式的變換，並未深入到社會的下層成爲一種社會革命，所以參加辛亥革命的許多投機的官僚與封建軍閥，不久就能集中力量，向革命的民主勢力反攻，而革命的民主勢力，因爲在革命時，根本沒有破壞封建的基礎，它根深蒂固，力量毫未動搖，所以一面反攻革命，革命的集團馬上便呈現出崩潰的形勢，這情形，處處都明白看得出來，以紹興一地而言，外貌上雖然是滿眼白旗，內骨子裏都是依舊，軍政府裏還是幾個舊鄉紳。後來這軍政府經過幾個少年一鬧，招來的仍然是一位綠林大學出身的都督。他帶兵進了紹興，馬上就被地方上的仍舊是那班鄉紳包圍着，同時革命黨也去包圍，把一個綠林大學出身的王都督擁得很高。『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穿布衣來的衙門裏的人物，不上十天，雖是天氣並不冷，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他們『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

，動手刮地皮」了。

光復給豫才以師範學校校長的地位，決不是說奮勢力已經真心誠意和新人物表示好感，這不過是暫時的甜果。這甜果只徒然使豫才一時忙得放棄了採集植物和顯微鏡下的科學工作罷了。接着新的和舊的馬上發生裂痕，紹興的少年不滿意王都督，開始辦報攻擊軍政府，攻擊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而不幸的是紹興這些少年辦的報，會借用過豫才底名字作為發起人，豫才不能推却，於是便必然地捲入鬥爭的旋渦中去了。

十多天之後，便有一種消息傳到豫才家裏，說都督因為他們詐取了他底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鎗打死他們了。這消息豫才自己並不怕，倒害得他母親很着急。

所謂「詐取」，豫才初以為是指學校經費而言，後來才曉得，原來是指另有送給報館裏的一筆款子。王都督被罵了幾天之後，便叫人送給報館五百元，於是那些少年便開會商量，決定收下款子仍舊罵。理由是「收錢之後，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豫才即刻到報館裏去探問這事真相，果然是真的，他貽說了幾句不該收錢的話，便有一位名為會計的不高興了，質問他說：

「報館為什麼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麼？」

豫才自己說道：「我就不再說下去了。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面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為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抖的記載」。豫才已經有相當深的世故了。反動的力量是這樣雄厚，而對抗反動勢力的，僅不過是一些毫無經驗的小孩子，憑着熱血在做無益的掙扎而已。這正是一個辛亥革命的縮寫，這

該感謝葛喬先生底努力，使我們能够在「希望」雜誌上重新看見，今天我們才有可能來談一談：這篇小說，不知爲什麼沒有被收入魯迅自己底集子裏去。我想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找不到吧？這篇小說，充分表露了豫才底天才。他底描寫手腕，他底諷刺的天稟，他底赤子的心腸，他底創作方法，在這裏都一一的顯露；並且在這篇小說裏，我們看得見他創作慾的盛旺，文內充滿青春的豐盛與橫溢的現實材料。這是當然的，因爲一個人對小說倘是早有修養，有處理題材的能力，則他第一篇小說所開掘的題材正是處女礦，應該充滿青春的豐盛，但也正因爲題材過於豐盛，初次寫作的人，往往不免野心太大，想把自己所有的全包羅進去，結果便失了主題的重心，使主題模糊；這篇「懷舊」也是有這毛病的。「懷舊」以一個小孩子底立足點，寫他底四週，他一開始就用諷諷的筆觸詳述就他讀書作對的禿先生，然後說到隣居的富人來找禿先生，他一方面寫出這富人雖然是低能兒，却懂得祖傳的筆食靈藥以迎王師的權術，另一方面嘲笑孔教，寫出連隣居的用人也看不起的這位富人，孔夫子底聖徒禿先生却偏和他最要好。他和禿先生就很認真的談着如何迎降將要進城的不明的革命軍的事，再則，他又諷諷地寫出路上逃難者的情狀，甲村的人逃到乙村，乙村的人逃到甲村，而富家姨太太則視逃難亦如春遊，不廢口紅眉黛。這雖是寫的辛亥革命前夜的事，卻如同道着今日國人在日本帝國主義炮火下逃難的實情，嗣後他寫閩人王叟與李嬭談的長毛故事，襯托出當時鄉民底見識，其中他描寫第一人稱的那兒童自己的心理，動作，尤爲詳盡活潑逼真。我們每觸到理論的分析，就相信我們以前詳細描寫了豫才底環境，並不白費氣力。第一人稱的那兒童，顯然是以他自己爲模範兒的，王翁李嬭所談的長毛故事，就是他幼年時代常常聽得很熟的那些阿長說的，或者祖母說的故事，禿先生和隣居的富人，當然也是他自小以來很接近的人物，這些都是他隨手拿得的材料，描寫起來容易逼真，本來無足奇怪，但這裏有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將這些熟習的材料，結合在社會變革前夜革命軍進城這件事故上，加以

編織。這事人家做起來，很容易，但有許多小說家卻換了一生世還不能意識地知道這方法。這就是從社會人生的見地來寫創作的的方法。他那時已經知道抓住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斷面，往往能照出全社會的經絡這個道理了。這裏標明出了一出發就是為人生的豫才底藝術觀所到達的一個實質的前進據點。能到達這樣的據點，豫才底創作之向高度的現實主義發展的前途，是已經顯示出來了。現在這篇「懷舊」底社會價值，也完全是由這據點以確定，倘不以革命軍將要進城的風傳作為中心，其他的各部分，縱使能結合在另外的主題上，其意義與力量就差得多了。他利用十餘年前的材料，卻不妨礙他刻劃出當時的社會真實。革命軍的風傳，實際成了構結這篇小說的核心，在作者主觀上，也確是這篇小說底主題。不過可惜的就是作為主題的材料太薄弱了點，而襯托的材料，如秃先生，兒童自己，長毛故事等，而很豐富詳盡，所以主題不明顯。這是因為他對當時的歷史事變的正面材料不很豐富，而取為襯托用的少年時代的材料反而橫溢的緣故，加以他赤子之心的燃燒，創作的青春慾，他便不知不覺沒入他自己，即沒入作為第一人稱的那兒童生活中去了。初次創作的人，總免不了駕掣不住材料，反而常有被材料支配的危險，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們看，他具有如何的一個童年的心，他是如何純潔而赤誠，簡直像火焰一樣照耀在我們面前的。偉大的作家，是一定有赤子之心的。當他底赤心塗上金油的一天，也便是他底創作生命死滅的一天。到老都偉大的作家，就因為他到老都是孩童的緣故。

豫才底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顯露，在這里解剖他自己的那種大胆與毫無隱諱的態度。固然，他這篇小說，已經全體都有着現實主義的色彩了的，但尤其刻骨的是這兩點，關於後者那兒童希望秃先生死，巴不得秃先生被長毛殺掉的那種赤誠而在中國社會却普遍地被認為不道德的心理，豫才竟大胆地吐露出來了，這在社會價值上說，是孩子對道德的反抗，是人性對非人教育的反抗，而在文學上說，則是對於靈魂的大胆的發掘，是現實主義的深。我又要脫句題外話，近代有幸

弱的孩子，對於這種充滿仇恨的反抗，也許有很多是不太懂得的，但我相信，還有大多數是能懂的，因為就是近代的新教育，能不戕害兒童的實在也不多，而況且中國內地，私塾還到處都是呢！

我願意抄下豫才描寫秃先生的那精闢，驚人的一段在下面，作為本節的結束，而豫才底諷刺寫實或白描的天才在這一段中也確實有令人神往的表現：

「明日，秃先生又按吾論語，頭搖搖然釋字義矣。先生又近視，故屢幾觸書，作欲嚙狀，人常咎吾頃，謂讀不半卷，篇頁便大零落，不知此咻咻然之鼻息，日吹拂是，紙能弗破爛，字能弗漫漶耶。予解極頑，亦何至此極耶。秃先生曰，孔夫子說，我到六十便耳順，耳是耳朵，到七十便從心所欲，不踰這個矩了……余都不之解，字為鼻影所遮，余亦不見之，但見論語之上載先生禿頭，爛然有光，可照我面目，特頗模糊隱遁，遠不如後園古池之明晰耳。」

（以上引號內文，未指明出處的，均出自「病後雜談之餘」，「頭髮的故事」，「華蓋集」，「這個東那個」，「范愛農」。）

第七節 驅除袁實(二)

一九一——一九一七：三一歲——三七歲

「南京市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地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呵。』」(華蓋集：補白)

豫才到南京之後二三星期，紹興那篇都督的報館終於被一羣兵們搗毀了。舊名字給這報館作爲發起人的，除豫才之外還有另外兩個人，一個叫作子英，一個叫作德清，報館被搗毀的時候，那叫作子英的適在鄉下，沒有事；叫作德清的那人適在城裏，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便「脫下衣服，照了一張照片，以顯示一寸來寬的刀傷，並且做一篇文章敘述情形，向各處分送，宣傳軍政府的積暴」。《朝花夕拾：范愛農》但照片底尺寸太小，刀傷縮小得幾乎等於無，倘不加說明，是沒有人看得出來的。

豫才在南京，得免於難，這也是那時軍政府底寬大；不然，拍個電報去，起馬失業是免不了。但豫才居盤安安穩穩在南京教育部當起辦員來了。並且他還能够在公餘之暇，和許季弗一道影抄圖書館裏借來的舊本，抄「沈下賢集」和漢譯的 C. Hart 的底「地學淺說」(Principles of Geology)。南京的臨時政府，正如聖克初生，却由袁世凱挾着以北京爲巢穴的軍閥官僚和享有東交民巷特權的帝國主義外交團爲巢穴，裏籠這初生的嬰兒投入自己底那翼下了。當時的日帝國主義很希望中國南北分裂，這也成爲袁世凱挾持南京政府的重要力量。官僚立憲派的人物，一向和袁世凱很親密，而且十分迷信他，臨時政府的參議院竟以大多數決議設政府於北京，可見他們還

不明瞭袁世凱不離開北洋軍閥的巢穴北京，對革命的可怕。後經孫中山底斡旋，參議院復議，總算否決了。然而那時的革命派到底因為社會基礎不雄厚，武昌起義的時候雖然轟轟烈烈，南京臨時政府一成立，暫時結合的各派勢力就已露出相互猜忌的端倪，所以革命派駭怕南北分裂，孫中山眼光遠大，他堅決主張袁世凱南來，袁氏拒絕，孫又派蔡元培、汪精衛、宋教仁、魏震組、鈕永建等去歡迎袁氏南下，但蔡、汪、宋等到北京，袁世凱暗囑兵變，日本首先分調千餘名山海關及南滿駐屯軍來京，一下子就把革命派人駭駭了。這主要的原因，固然是因為革命派底社會基礎薄弱，但革命派人沒有堅固的政黨和洞察社會諸關係的堅決政綱，也是主要原因之一。那時的革命派人，還不知道創立共和的社會使命，所以也不明白革命底任務並不在於民主政治這形式，而在於以民主政治變更社會諸物質條件成爲民主政治之基礎以鞏固民主政治，所以南京政府底臨時民主政治底前途，正是任務繁重，非把當前明明暗暗的敵人一一克服，是不能貫徹民主政治底真正任務的。所以當時革命派人應該抱定不怕內戰的決心，去貫徹革命任務，則辛亥革命，庶幾不枉。可是他們以書生似的潔癖，經敵人一駭，就輕輕將政權奉給敵人，以求得苟且的妥協了。革命在各省掛了白旗之後，本來在南京政府尚未北遷之前，就已復由舊勢力代替各省的新人物了，但這還可希望於南京政府健全之後的工作，而現在連南京政府這中央政權本身也輕輕投入北洋軍閥懷抱中了，於是辛亥革命底最後一層屏障也從此喪失。

南京臨時政府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五日，經參議院議決遷入北京，五月，豫才也跟着臨時政府教育部的遷移而到北京去了。他這時縱使沒有看清楚所謂民國是什麼東西，但到底，他終於是會明白出來的。在「墳」的「燈下漫筆」裏面，他就說：「中國固有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爲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這裏豫才所說的中國固有精神文明，就是指的封建文化，他深知道民國和滿清所不同的僅僅是滿人已經退席。

豫才到北京的時候，北京自然還有不少的人沒有剪去辮子，這些沒有剪辮子的人，就要罵剪了辮子的人，因此豫才也就難免被罵。這是新人物走入封建的老巢中所應得的一點辣味。豫才在紹興當師範學校校長時，會聘他底一位留日同學范愛農爲學監，後來豫才到南京去，代替豫才做校長的是一位孔教會會長，及至豫才從南京移到北京的時候，那位范愛農底學監也被孔教會會長的校長設法去掉了。這位范愛農是時代的犧牲者，他自從在日本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回到故鄉之後，受着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這當然是那時不受政府青睞的留學生一類的接近外來思想的新人物所常遇的苦痛與無形壓迫。這無形壓迫是很厲害的，倘若你不是一個堅強不屈的戰鬥者，你一定會死得無聲無息。范愛農底個性，我們雖然不詳細知道，但根據魯迅所做的「范愛農」，我們略能窺知的，是他大約不外是個肯努力做事而有個性的青年，但不會應付環境，到處被人厭惡，而且因爲有點消極，也不能猛然衝破環境，此之謂小私有者出身的空想家。他是不滿於現狀，不肯於應付現狀而其實是不能應付現狀，又不敢毅然與現狀正面鬥爭，結果是變成孤獨者，終生悶悶不樂。范愛農在壓迫之下，只好躲到鄉下去，教讀幾個小學生糊口。他是一個穿着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酸的書生，他覺得氣悶的時候，就乘船進城和豫才喝酒，醉後談些瘋話，及到豫才請他去做學監時，他穿的還是布袍子，不過境遇改好點，不太喝酒了，辦事也很勤。這回范愛農底學監，又在反動的攻勢下，被孔教會會長去掉了，於是范愛農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他祇好到一個熟人家裏去寄食，景況是更困難了，他還喝酒，如果有朋友請他（他自己當然沒錢買酒了）。人們很討厭他，他也很少和人來往，剩下的幾個後來認識的年輕朋友也不願多聽他底牢騷，以爲不如講笑話有趣。終於他又走出這熟人家，後來是掉在水裏，被淹死了。魯迅有「哭范愛農」的詩三章，茲抄其第三章如下：

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團猶酩酊，微醉合沈淪；
出谷無窮夜，新宮自在春；
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

這位范愛農，是值得在這裏提一提的。人們往往輕視歷史車軌下的時代犧牲者，殊不知在他們身上，也能找到爲了顧全大局的史書中所沒有的最真確的時代的影子。他們底身世，往往代表著時代臨產的苦痛的一系列。在中國社會的變化過程中，被軼碾出來的這些苦難，我們應該爲此分去一些注意力，而且在豫才底著作中，也分明存在着這一類人物，（如魏連受）因此，我們爲了理解豫才，在這裏既經遇見范愛農這樣的人，那是不能不把這樣的人請進來的。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北京吧。豫才入北京後，被任爲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藤花館裏。他仍舊續在他底古書裏消耗他底生命，公餘之暇，就寫輯謝承後漢書，因爲當時的情形，他看得很清楚，寂寞上所增加的只是一些更悲哀的事。臨時政府北遷，代表民主勢力的許多政黨份子，有的以爲民國已經成立，共和已經實現，所缺少的只是一紙正式憲法了。進步官僚和立憲派的人物此時都如同微醉了似的，對一切封建軍閥笑迷迷，有的移轉眼光到文化教育與實業上去，以爲共和政體已經實現，此後一切民主主義的建設，只要在袁世凱底共和政體下和平進行就能實現理想了。「中山先生退職矣，欲率同志爲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之大計，而盡讓政權於袁氏；吾人又以爲空涉理想而反對之，……」只有黃興一派，雖然並不如此清高，然而他們實現理想的方法，却更其忠厚老實，想把北洋軍閥同化！他不分青紅皂白，盡量把各派人物拉入己黨，甚至想請袁世凱來做黨首，當時革命派人底眼光可想而知。只有宋教仁知道有爲革命的黨盡力爭取政治權力的必要，所以他還能挽着同盟會中一部分中堅分子進行敏捷的合法活動。但僅以他這點力量來和社會勢力

雄厚，又有帝國主義做背景的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做門爭，實在等於拿「劍刃九十九」來抵抗那克軍隊。由宋教仁領導的革命黨人深知袁世凱的不可靠，但也並不預料他會正面反叛民主；只是覺得他個人頗有野心，所以要能制衡他才行。他們制衡他的方法，是臨時約法上的責任內閣制，並選對直隸省的省議會（參議院在南京議決接收北方統治權時，改各省督撫一律稱都督，諮議局改稱省議會）。公舉革命黨要人王芝祥為直隸都督，以監視袁世凱。袁世凱清楚得很，他早已不把約法看在眼里裏，責任內閣也好，議會也好，由你們去玩，他祇在暗中發笑，惟有府革命黨人放在北洋軍閥巢穴中做都督，他是不肯退讓的。「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正如孫中山讓臨時大總統位於袁世凱時提出的三項條件，第三項要他遵守一切約法，他無條件的答應了，只有一、二兩項要他離開北京那巢穴他却不肯退讓。我們回頭看臨時政府北遷時，就也議定唐紹儀為內閣總理組閣，唐閣組成後，第一個難問題就是財政；清末組織的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後來又加英日俄二國，成六國銀行團，這個帝國主義集團，極力想壟斷中國借款，藉此致中國財政的死命；唐閣的財政困難，當然只好向外借款，但他欲衝破六國銀行團底羅網，向比國銀行交涉小借款，觸怒帝國主義，怕事的中國人，就很恐慌，攻擊唐內閣，財政總長熊希齡與唐的借款意見本不合，因此問題，唐熊之間常不和，熊竟欲以辭職倒唐內閣，所以唐內閣一開幕就動搖了；袁世凱與唐紹儀的關係本來很深，唐紹儀因為內閣總理，原是出於袁世凱底意思，袁世凱滿望唐紹儀做他個人底工具，那知唐組閣後，與袁時有齟齬，袁對唐也就不滿，及直督王芝祥問題發生，唐內閣便坍台了。原來以王芝祥為直督，算是革命派退兵以後想制衡袁世凱的一個能生實效的辦法，袁當然知道，不肯上當，唐入京請於袁的時候，袁以過於民意，併作許可，唐便電王芝祥入京，並以王督直之說報告直省紳民，但王芝祥一到京，所謂直隸的五路軍界忽然通電反對王芝祥，袁世凱便以此為口實，發王赴南京去通敵軍隊，唐紹儀以為政府不宜以軍隊反對的緣故，失情於

民，拒絕副署委任狀，袁竟以不會副署的委任狀交王，於是唐就在元年六月十六日提出辭職呈文，不告而去。臨時政府北遷後，約法上的責任內閣終於明白地表明了抵不過北洋軍閥底武力，內閣總理不副署的委任狀；總統竟拿出來用，可見總統已公然表明沒有約法在心中了，然而競競業業於反對同盟會的各參議員和新聞記者，只知道苟且於北洋軍閥底淫威下，並不知道此事關係國家政體的重要，對唐的辭職出走，反加嬉笑諷刺，即使同盟會的議員，也祇以王芝祥不能督直爲恨，對副署的責任問題和王芝祥不能督直的內幕也好像看得很等閒。議員們對於這黨問題熟視無覩，却忙着鉤心鬥角去經營繼任內閣的人選了。同盟會派的人和反對同盟會派的各政黨都深恐內閣不能掾入己黨手中，我們也並不反對宋教仁領導他底同盟會派在議會中做鬥爭，但宋教仁忘記了一件極重要的事，那便是把民衆置之不理了。沒有民衆力量的擁護，沒有社會的一定勢力或諸勢力作爲根基的政黨，單在軍閥底淫威下作合法活動，還不是與虎談皮麼？牠高興談就談，不高興談一口吃了你完事。這種經驗，只要是革命的政黨，不忘記是總會用得着的。

參議院的各派在袁世凱面面相互爭奪，雖然我沒有敢沒發態度的權利，但看了歷史，實在有令人覺得是在演戲之感。唐紹儀辭職出走後，同盟會的四閣員也聯袂去職，教育總長蔡元培便是同盟會四閣員之一，他召了豫才來，自己倒去職了，但豫才底官職並沒有馬上更動。同盟會的四閣員去職後，財政總長熊希齡和交通總長施肇基也不能安於其位，依願免官，於是爲了補充這六位閣員袁世凱又要叫參議院當點利害看看了。宋教仁是一向主張組織政黨內閣的，這回看見混合內閣（唐內閣是各黨和袁氏親信人物混合組成）不能維持開議的一致，便明白倡言組織政黨內閣。可是當時的共和黨知道自己已沒有組閣的希望，生怕內閣被同盟會奪去，便主張超然內閣主義。袁士勳歡喜得很，就從當時的實辦外交家裏選出一位馴順如羊的陸徵祥來充國務總理，同盟會議員極力反對，共和黨則極力贊成，統一共和黨議員也對陸投贊成票，陸便在六月二十九日被任命爲

國務總理了。民初的政治形勢，總括一句話，是清室遺留下來的北洋封建軍閥和同盟會派的革命民主勢力的鬥爭。在這兩大鬥爭力之間，存在着許多立憲的中間派，這些中間派只有在被壓迫得不能活動，如武昌起義前那樣，才偶然站在革命一邊，但時局一定，他們只要能活動，便仍舊會依附舊勢力，托庇權貴以圖苟安的。給他們一點小惠，他們都可俯首遷就舊勢力以助長軍閥壓迫革命黨人的氣焰，這事實，以後我們還繼續看見了，直到舊勢力在他們底幫忙之下壓倒了革命派，他們自己也就壽終正寢。民初溫和派底歷史如此，法國大革命時溫和派底命運也是這樣，他們像豬羅似的做着迷夢，助凶做惡，令人恨他們，也令人可憐他們。然而小視他們是不行的，社會改革，可怕的並不是正面敵人，倒是他們，而且無論革命成功失敗，得利益的，總而言之，常是他們。我們且在這裏同時看一看他們底歷史吧；陸徵祥被任爲國務總理後，承京意向參議院提出補充的六國務員，並親自到院宣佈政見，原來他只不過是一個外國語說得很流暢，應酬交際圓滿週到，極能令人喜歡的柔順的人物，毫無政治的骨頭，到參院來宣佈政見時便大露馬脚，於是連曾經投票同意他任國務總理的統一共和黨也皺眉叫苦了，對他所提出的六國務員，遂以大多數投票否決，表示不信任他。但這間接是得罪了授意他提出六國務員的袁世凱，因此他們要逼得老虎不肯談皮了，恰好第二天日俄同盟與英國在西藏自由行動的宣言在各報上刊布，這帝國主義的壓迫，又把昏頭昏腦的中國人打了一針興奮劑，外交上也大起震撼。但中國人是只知道興奮，很少能在興奮之餘，睜開眼睛看一看或用點腦力想一想的。袁世凱很明白這道理（他到底是中國人）便大胆利用他們底衝動，唆使北京軍警特別聯合會通電各省，以參議院不顧國家危急爲口實，痛罵參議院，這不僅是對參議院進攻，並且是很有把握地利用國民底衝動與興奮以掩飾自己對帝國主義投降行爲。這時帝國主義經濟的膨脹已經到了不惜冒一切戰爭的危險爭奪殖民地時代，歐洲戰爭的危機已十分危迫，英法已決然成立協約，準備以武力抵制德意，奧三國的進攻，只缺少

一個俄國沒有拉在一道了。想帝國主義對東方殖民地的爭奪並不因此放鬆，所謂日俄同盟，英國在西藏自由行動的宣言，便是俄帝國主義極力想吞併蒙古，英帝國主義極力想吞併西藏的表現。蒙，藏在帝國主義威利誘下大有涉朝鮮，緬甸的後塵，弄出獨立花樣來的模樣。可憐的中國，徒然成了世界經濟危機的犧牲品，而中國的封建遺孽還洋洋得意，任帝國主義利用。袁氏對英國主義所提出的關於西藏的四條苛刻條件，因為想向帝國主義借款以進攻革命派，所以一點也不敢表示反抗，只一心夢想權勢利慾。中國人民在遠世界危機之前，在與北洋封建軍閥底淫威下奄奄一息，但他們謹防帝國主義的愛國心有餘，和封建軍閥鬥爭的方法，却混亂得可以。大多數工，農，一向被目為愚民，他們不問政事，而紳士與知識份子們，却糊塗得可以，這只要看袁氏稱帝前的各種所謂輿論與新聞紀事，便可以知道。袁世凱一面用北洋軍閥出名通電痛罵參議院，一面用半惡嚇半規勸的公函直達參議院，接着又收買南方軍人鄧玉麟，閻鴻飛等聯名通函責罵參議院，「到二十三號，袁世凱又另外選出國務員六人，交參議院求同意。二十六日，參議院終於將第二次提出的六國務員（除了工商總長蔣作賓一人外）通過了，於是袁世凱的目的達到」。這是民主政治產生的第一年，在軍閥武力之前第二次的屈膝。所謂「中華民國」已明明白白是軍閥底「民國」了。

次日參議院提出陸總理失職案，只不過是遮遮面子並以自慰的把戲罷了，從此陸徵祥稱病入醫院，連續請假至再至三，於是便以代理國務總理的内務總長趙秉鈞正式任命為國務總理，其他國務員一例照舊。陸徵祥只不過是一個無用之物，而趙秉鈞則是袁世凱底親信，對袁有更積極的幫助，所以弄來弄去，還是袁世凱勝利。從此國務院成為總統底工具，可以進一步向民主進取了。

此時正式國會組織法及兩院議院選舉法，已遲制定公佈。袁世凱想做正式大總統，已開始威

有利誘革命黨人，並積極謀劃大示借款以圖攻毀革命黨人了。但此時誰能破袁氏心術的，幾乎是絕無僅有。參議院的議員都忙着預備國會選舉運動去了，同盟會派也奉全力於選舉競賽，宋教仁運用敏捷手腕，拉攏統一共和黨，國民共推會，國民公黨，共和協進會等幾個小黨與同盟會合併而改組成爲國民黨。宋教仁運用這政治手腕，爲的是要在國會選舉中得到勝利，極極要想組織政黨內閣，充實責任內閣的機能，但黃興先生却對同盟會擴大成爲國民黨抱另一種幻想，他勸袁世凱來當國民黨領袖也在此時，又去勸民主黨的全部領袖加入國民黨，都沒有生效。他真是逢人便勸，以爲這樣便可以化舊爲新，國務員也有好多被拉入國民黨中，於是袁世凱底國務院也在外形上似乎是國民黨底國務院了，當時譏諷國民黨的新聞說這不是「政黨內閣」實是「內閣政黨」真是一句中肯的批評。所以一方面宋教仁忙着準備國會選舉，一方面國民黨已在參議院中停止對袁世凱進攻了。是當時國民黨兩個不同側面的表現。前同盟會領袖孫中山則仍抱在袁氏政權下，率黨員盡力於社會的培養與開化事業的主張，所謂二十萬里的鐵道政策，便是他此時得到孫大砲的渾名的理由。其實這種理想，在現在看起來，並不希奇，但喜歡保守的中國人，看見別人遠見一點，是總要設法阻止的，贈人以渾名，也便是一種看不見的槓刀。孫中山想在袁氏政權下建設二十萬里鐵道，自然是不可能的，但看他坦然辭臨時大總統的職，以後又清高地抱着這在野思想，及見袁氏真面目，又毅然反袁，其態度的大公無私與堅決徹底，實足令人欽佩，所以他底政治人格實在是非常皎潔可敬的。

最爲袁氏所忌畏的，當然是宋教仁。宋是政黨內閣主義的急先鋒，他並不反對袁氏，且以爲正式大總統非袁氏不克當選，只不過堅持內閣必須由政黨組織，才能發揮責任內閣的精神。他欲以政黨內閣與總統的合作，實現新舊的合作，這在當時是只能如此主張的，而且只有真的有強力的政黨內閣，新的和舊的合作才勉強有點保障。但在那中間黨派看起來，這已經是了不得的強

橫主張了，他們之於舊勢強權，百般遷就，而對於新生機運，則防範之惟恐不力，因此宋教仁一派，竟被目為暴民黨。袁世凱是當然不願意照宋教仁底計劃與新派合作的，對責任內閣，他已經不大舒服，況且要有政黨責任內閣呢？宋在北京時，袁會以其銀行支票簿遺宋，叫宋自由支用。這是袁世凱要想收買宋教仁，當時被袁世凱用金錢賄買的黨人實在很多，袁世凱想收買宋教仁也不過是一貫的伎倆，但宋略支少許表示謝意後，即以原簿還他，於是袁益忌恨他。及國會選舉，國民黨獨佔優勢之後，宋教仁底死也就被袁世凱秘密判定了。這是中國革命人士當初估計錯了北洋封拜軍閥，就是以宋教仁底政治天才也挽不住的失敗命運。北洋軍閥那裏肯在憲政軌道以內行動呢？國民黨選舉勝利後，宋教仁由湘而鄂而皖而滬，到處演說，對政黨內閣的得失，盡意發揮，仍主張以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以在國會中占有多數議席的政黨組織內閣，於是國民黨大有組織政黨內閣的危險了。和北洋軍閥有歷史淵源的唐紹儀所組織的混合內閣，軍閥尚且不能容忍，何況他們所目為暴民的國民黨來單獨把持內閣！所以宋教仁縱使不死，倘把國民黨時政黨內閣組成，那所招致的壓迫不過是更為悲愴些罷了。好在袁世凱的黨羽也並無等待政黨內閣組成的耐心，在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午後十時，宋教仁搭乘滬甯車北上的時候，在滬甯車站被刺了，延至二十二日逝世，二十三、四等日，凶犯先後被捕，並在凶犯家中搜得謀殺文證多種，才知道國務院秘書洪述祖和內閣總理趙秉鈞，大總統袁世凱都是參與謀殺的。這消息傳佈後，舉國人心震動，袁世凱的真面目因此暴露，而全國的政治情勢也以這個教訓變動起來了。

自此暗潮日急，袁世凱知道戰事必不可免，便秘密促成大借款，預備作為用兵及賄買各方的資金，四月二十六日，宋案證據宣布的那天，二千五百萬鎊的大借款合同也就簽字了。

原來在唐紹儀組閣的時候，大借款就已開始向六國銀行團進行了，但年餘以來，因為各帝國主義之間本身的矛盾與參議院的一時決定不下，所以沒有成功，及借款合同將簽字以前，美國和

其他五國的矛盾更深，竟至退出六國銀團，並英勸便宜投機，與其他五國衝突，五國團也顯恐慌，假使不是袁世凱急於要借外資以舉反革命之旗，這時正可以趁帝國主義自相矛盾而在財政上減少一點銀團底羈絆，但一切反動者們，都是甯可向外國稱臣，不肯分惠家奴的，久延不能成立的大借款，宋案發生後數日內，袁世凱竟不求參議院通過，忽然私自簽定了。於是國民黨議員大譁。溫和派的各黨議員雖承認簽訂手續不合法，但還是疾首蹙額於國民黨的反袁行動，及到七月間又發見袁世凱在大借款簽定以前還向奧國簽訂了一宗秘密借款，參議院簡直沒有夢知過，溫和派的各黨這才無話可說，袁世凱才算將趙秉鈞，周學熙依願免官以敷衍了事。而同時，袁世凱積極備戰，毫不游移，堅決的集團，總會產生堅決的意志。這時的北洋軍閥，是中國封建集團行將分裂前的最後一個龐大而堅決的集團。袁底行為簡直斬釘截鐵，不愧是當時北洋軍閥底一個奸雄領袖。而在反袁的國民黨方面卻形勢非常混亂，宋案發生後，國會即正式開幕，許多溫和黨派懾於國民黨的優勢，合併而為進步黨以抗國民黨，而國民黨內部則自宋教仁被刺，失去駕馭力後，即被袁氏威逼利誘加以破壞，許多人都被收買，宣言脫離，另組織了許多小團體，如相友會，政友會，癸丑同志會，超然社，集益社等等，於是國民黨四分五裂，國會遂為進步黨所控制以為袁用。此時的孫中山和韓督李烈鈞雖已恍然覺悟，決心用武力倒袁了，而國民黨中的許多名流却還主張袁世凱自動退位。國民黨所能指揮的贛，皖，粵三省的武力（皖粵二省很薄弱）也游移混沌得很。而當時的一些盲目言論家，則對宋案的經過熟視無睹，毫不理解所謂國會與參議員早已失去自由意志，還主張以正當法律手段彈袁，反對用武。但當他們還在猶豫紛爭的時候，袁世凱早已預備好了，他就先發制人，把國民黨可以指揮的三個都督——安徽柏文蔚，廣東胡漢民，江西李烈鈞——免職，又賄奸細炸毀湖南軍械局，同時派兵向九江進兵，直迫國民黨底中堅武力李烈鈞；李，柏，胡知勢不可抗，遂命解職；上述三省被袁世凱解除了武裝之後，國民黨才另布置好一點武

力準備。但已經遲了，所謂討袁軍，既歸於敗。討袁軍與北洋軍開槍的時候，許多溫和派混合而成的進步黨竟在國會中提出「征討案」向袁討好，大太祖護袁世凱，盲目的所謂言論家又反對戰爭，這是當時一般國民底要求，他們經過辛亥革命一點戰爭，便覺得痛不可當了，於是爭不開青紅皂白，極力呼籲和平。現在且把上海商會致南北兩軍關於攻打製造局的公函抄在下面，就可知道中國的所謂市民，是如何的軟弱，如何的沒有自己底立場了。

「敬啟者贛省事起，風潮驟急，商界首當其困，本日宣傳南北軍去製造局將有戰事，商民恐慌，要求設法維持。頃聞全體開會，決議上海係伸國商場，既無戰地，製造局係國民公共之產，無南北軍爭持之必要，無論何方先聲奪端，是與人異為敵，人民即視為亂黨。為特函告台端，約束麾下，勿與吾民為敵，輕啟釁端，衆商感戴。」

中國市民雖然這樣沒有骨氣，帝國主義却雖恐其生出力氣，極力袒袁，五國銀行接到孫中山底忠告，雖然允於二星期內暫停付款，但實際已在四月二十九日（即簽字後四日）付過二百萬鎊了（合中國二千萬元），倫敦太晤士報對中山底反對借款通電反加擲擲。袁世凱既有了帝國主義底金錢，又有了溫和派底擁戴，加以國民的苟安怕事，不問真相，與北洋軍閥原有的實力比南軍雄厚，討袁軍的失敗是當然的。這是過去對袁妥協所必有的結果，革命派不是短時間內能再爬得起來的了。怕事苟安的國民，從革命黨人此次失敗後，也要在北洋軍閥底蹂躪下，受更長久，更難堪的痛苦了，這種教訓，是每個國民都應該記得的。

討袁軍失敗之後，從前攝於革命勢力假裝維新的一切封建殘餘，就露出了本來的滑稽面目，一齊向革命黨人進攻了，民國從此走入黑暗世界。「九二五年孫才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寫這時的情形說：「紳士們先所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得可以；於是「咸與維新」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總願他們爬上來罷。於是他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

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然出來薰着袁世凱咬死了許多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裏……」。對袁軍的失敗，是辛亥革命不澈底的必然的結果，這些落水狗爬出來薰袁世凱咬人，就是鐵證。民國成立，王金發是浙江的都督，他曾捉到了殺害秋瑾的謀主，當時所謂民國成立，不修舊怨的空氣很高，南京的紳士，都說我們原來都是帥字頭一家，所以王金發終於也把謀主釋放了。待到討袁軍失敗，王金發竟被袁世凱鎗決，參與其事的是他所釋放的殺害秋瑾的謀主，這難道不是一副時代的寫照？進步黨為舊立憲派名流集中的淵藪，行動言論極其溫和，在暗無天日的時代是只有他們才最洋洋得意的。豫才在「三不四集」裏「錯殺了人異議」一篇中描寫當時的北京道：「於是殺，殺，殺。北京城裏，連飯店客棧中，都滿佈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只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却從不見他們活着走出來；還有，「政府公報」上是天天看見黨人脫黨的廣告，說是先前為友人所拉，誤入該黨，現在自知迷謬，從此脫黨，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又說。「袁世凱掌大權，天天殺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然而進步黨人是例外，所謂黨人脫黨的廣告，是指的國民黨，袁世凱此時為了抑制國民黨，就暫時借重他們喝喝道，同時國民黨底溫和派駭怕環境的險惡，不脫黨的也就隨處屈從他們。所以當討袁軍正在吃敗仗的時候，進步黨就正洋洋得意在組織所謂「第一流內閣」。因為那時袁氏底秘密借款被發覺，趙秉鈞，周學熙已依願免官，進步黨滿意了，所以在討袁軍伸討袁世凱的時候，他們却起勁地在助袁組閣。他們幻想制定一種完善的憲法，引導北洋軍閥底舊勢力走上憲政軌道，故討袁軍失敗後，他們就拼命把袁世凱舉為正式大總統了。但袁氏在十月十日坐上正式大總統底椅子後，立刻就叫進步黨看看利害，他壓迫國會制權限等於皇帝的憲法，於是便和國會衝突，接着下令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的國會議員，進步黨底內閣，只想向袁討好，竟副署了這命令。於是把國會中大多數議員都當作國民黨議員加以驅逐，國會遂不足法定人數，在這命令發佈的同時，袁世凱招集了一

個行政會議，這也是進步黨底內閣促成的。可憐的內閣總理熊希齡在討袁軍失敗後提議要進步黨軍人蔡鍔去督湘，袁世凱那裏肯將自己趕了國民黨人開出來的地盤輕易讓給進步黨而不放在自己底北洋軍閥勢力之下，只是他那時還想利用進步黨人，所以不明白反對，佯表同意，另由北洋軍閥的段祺瑞，段芝貴來反對，仍舊用王芝祥要來督直時候的手段，徒使蔡鍔離漢來京閑廢。財政方面，熊又沒有辦法，陸軍部和各省督軍請發軍費的文電如雪片飛來，「人若無錢，又瘦又黑」，熊在登台不久，已得到這渾名了，但此時還有進步黨在國會中叫好，他和他底第一派閣員也就盡力扮演。梁啟超也是當時的閣員之一，熊希齡和他還在計劃大政方針，預備向國會宣佈。他們底大政方針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改革省制，意在廢省以固袁世凱底中央。袁比自然領略他們底好意，但他們忘記了袁世凱是站在什麼上面，袁氏要鞏固中央，也不能顧到他脚下的北洋軍閥的地方權力的，梁啟超底計劃顯是空想，但袁並不說破，只說問題太大，須招集地方長官底代表來會議才能決定，熊也以爲然，因此招集了個所謂行政會議。國會不足法定人數後，北洋軍閥的各省都督聯電呈請總統遣散國會殘餘議員，總統真是慎重，不即行遣散，將這問題交給都督代表所組成的行政會議討論，行政會議當然同意自己底都督呈請的意見，結果在民國三年一月，國會便被解散了。這解散命令，當然也是由進步黨底一流內閣副署了的，然而北洋軍閥並不感謝第一流內閣底好意，他們底所謂大政方針拿到行政會議這特殊造法機關去宣佈時，也不過是使熊總理在會議上受盡種種揶揄而退罷了。袁世凱底總統已做成功，解散國會，停止省議會，停辦各地方自治，特設造法機關政治會議等等命令，都經第一流內閣柔順副署了之後，袁世凱既用不着國會，（從前希望人選他做正式大總統時，當然還能用得着國會），此時也不再必要有一個進步黨人底第一流內閣殘留在旁礙手礙腳了，於是總統府裏恭維過第一流內閣的要人，現在都對他們表示十分厭倦，總統也說「內閣辦事太遲緩」，而向內閣要錢的各省電報紛至沓來，袁總統把交通

銀行捏在自己手裏，由熊總理「又黑又瘦」也不管。這樣，溫和派人底一切幻想，歸於破滅。但到這時才覺悟已經遲了，他們助袁斥革命派於前，現在他們才看出，原來自己底末路也到了。第一流內閣裏的第一流人物熊希齡，梁啟超，汪大燮三人連翻去職，從此袁世凱底面前也就不再有換步黨人政治活動的立足地了。

人類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的，就在於人類底眼睛看得比其他動物遠一點，不一定亟待屠刀刺入頸脖子才叫喊出來的緣故。

一九二五年的革命，有不少詳細的分析和有價值的紀述，那血的經驗，是一定還在人們腦子，沒有全忘了的。可是辛亥革命，對我們似乎大有遼遠之感了，敘述這一革命，書籍也許不少，但重視這幾年革命失敗的經驗的敘述，實在不多看見，這裏面，有的是不暇顧及，但總免不了令人猜疑是對辛亥革命的經驗帶有輕視的心理。妥協，是革命家底死刑，雖然在一定的場合，不妨和某種勢力合作，可是在骨子裏，若有一分鐘忘記了絕滅「底敵人，你便有一分鐘的失敗的危險。倘是早早學習過辛亥革命底經驗，我們也許可以免去許多可怕的錯誤吧？而如今，我們底前途還正多難，這一段可寶貴的經驗，是還應該牢記在心裏的。這往時的革命先烈用血換來的一杯苦茶！

當時的北京，烏烟瘴氣得多麼厲害是可想而知的，梁啟超（可憐他入第一流內閣時，也不比其他動物更高明！）有一段話描寫袁世凱當政時的四年情形可使我們窺得見一點北京的內幕。他說：

「——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爲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求而不可得。四年以來，北京政府，曷嘗有所謂政治，惟此二物之魂影，縱橫披猖，盤旋重灼於人人心中而已。夫無論何國，皆中人資居大多數。中人云養：導之善，則可以向善，導之惡，則可以向惡。袁氏據一國之最高權，日日以黃金誘

人於前，而白刃得人於後，務使硬制軟化一國之人以爲之奴隸，——蓋四年以來，我國士大夫之道德，實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爲無庸諱言者也。——袁氏窺破人類公共之弱點，乃專務發達此弱點以資其利用。其自制之弱點而不甘受彼利用者，則必設法屠殺之，驅逐之，寤蹙之，使其不能自存。……」

豫才之所以能在北京生存的是因爲他不聲不響，在那瀟灑的空氣中，一股腦兒沉着氣，只管抄古書的緣故，民國二年宋案發生，豫才有進步黨正蒸蒸日上上的六月，暑假由津浦線回家省親了，待到八月他由海道入京的時候，進步黨第一流內閣正在產生。但這些對於他都是不聞不問較爲不苦痛。辦了公回來，他就校他底『稽康集』。到民國三年，國會也被解散，第一流內閣也坍台，民主精神不再存留，袁士凱止洋洋得意，他老先生，也使只好讀佛經了。豫才是信仰科學的，封建社會中的一切舊信，在他都早已是死屍了，對佛經，他當然不會特別鍾情。許壽裳說他對於佛經只作人類思想史的材料看，這話自然是對的，但豫才偏在這黑暗的頂端來讀他底佛經，我們在另一方面也可能想見他底麻醉靈魂與消耗生命的苦心已經用到極點了。天下烏鴉一般黑，良心只能保存在污溝陰墓裏面。世間的兩脚禽獸正在長着血口，各帝國主義者在歐洲磨拳擦掌要開始爲了爭奪而火併了。這年（民國三年）袁世凱站在勝利的基礎上，再接再厲，積極準備高登皇位，新約法出現，把總統的權勢擴張到等於皇帝的地步不久，歐洲大戰也在西方爆發了，於是在東方只剩下一個日本帝國主義，獨張巨爪對封建軍閥荼毒萬里的中國垂涎萬丈了。這時候，袁家的帝制運動也就由祕密的變爲公開的，×××

其所見略同也。這時日帝國主義正利用袁氏想做皇帝的野心，想以助袁氏稱帝爲條件，擯去整個中國，而和袁世凱一鼻孔出氣。韓先則佔去了山東膠濟一帶德國底勢力，繼於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震撼全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袁氏爲了稱帝，五月九日就予以承認，其中稍微改了點不關緊要的地方。袁家臣僕認爲是外交成功，大舉慶祝，北洋軍閥底電報紛飛，國人大譁。但袁家底帝制運動急轉直下，八月間成立所謂籌安會，策動國體變更運動，到十一月末，全國各區的國體投票便告完竣，一致主張君憲，接着就上書推戴，袁氏故意推讓了一番，就承認帝位了。老實說，這是袁世凱的失策。他這回也忘記了他是站在什麼上面了：他把最高權位集於一身，不但宣佈至老不放鬆，並且還要到死都傳給他底子孫，使其他的北洋軍閥，溫和派的勢力英雄，清室的遺老等這些一向擁戴他的人，永遠沒有爬上最高權位的機會，於是北洋軍閥的兩太武臣段祺瑞，馮國璋都消極不肯幫忙，清室遺老也一樣；一般的人民本來不太過問政事，討袁軍起來的時候，曾大加厭惡，已不得袁氏亂平亂黨，從此可安心做奴隸，那知北洋軍閥底更大野心打破了他們底太平夢，而官吏的搜刮，也使他們連做奴隸也有點做不下去，這時，袁氏又要稱帝，又要招惹革命黨來反亂了，更使他們底奴隸地位感受威脅，這才開始埋怨袁世凱了，便也不再像討袁軍發動時的那樣起勁幫助袁氏。進步系的溫和派人被失寵於袁，便掉轉頭來向孫中山組織起來堅決反袁的地下政黨中華革命黨竄笑，舊國民黨的溫和派遂與進步系打成一片，一齊來反對袁氏底皇帝夢。

當袁世凱欲稱帝以前，真是不可一世，日本人已不得袁氏稱帝，可以對他利誘威嚇，利用他做傀儡，吸盡中國人民底血。但到南方的護國軍一起，反對袁氏的聲浪普及全國，日本看定袁氏大勢已去的時候，這狡猾的帝國主義立刻翻過面來向革命派討好，幫同來壓迫袁氏了。真是天曉得！

x x x

x x x，這不過是袁氏不聰明，動搖了他自己底基

礎。損失了他個入底地位置了，至於北洋軍閥，清室遺老及一切溫和的投機派，不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損失，進步系的溫和派，並且因袁世凱坍台，得以重新在北洋軍閥面前過起實爽生活來。原來進步系的溫和派在袁世凱面前得不到存身之地以後，就積極與革命黨人合作，甚至中華革命黨人，他們也不以為是暴民了。但袁世凱一倒，段祺瑞一組閣，溫和派的進步系人立刻把袁氏所賜與他們的苦經驗忘記得乾乾淨淨，又倒入段祺瑞底權勢中去了，這真所謂官僚政客。這些官僚政客之中也有不少舊國巨黨系人，因為政治家與政客的相差，雖然有天壤之別，但眼睛一為些少利益所引誘，稍一不堅定，政治家與政客之間所隔的，就僅僅只有一張紙了。一切中間的溫和派，從古到今，都是螻蛄一般兩面倒的。不過他們底動機並不專在於投機取巧，他們究極的目的，毋甯說是附炎趨勢，在地位危急的時候，專門利用革命黨人底熱血以鞏固他們底政客生涯，待到地位一穩固，他們便不再想到你們底血汗，却只恐怕你們妨礙他們底煊煊饗宴了。

豫才繼續將他底生命埋埋古書裏，袁世凱將要做皇帝的民國四年，他蒐集金石拓本而加以研究。因為這年一月，他已將「百喻經」翻刻成功。他多年來所輯集的「會稽郡故事雜集」也輯成了一冊，用他二弟周作人底名字出版了。周作人說豫才做事全不為名譽，他一貫的精神是不求聞達，稱此為求學問弄藝術的「最高態度」。不過我以為豫才底成功並不在此所謂「最高的態度」。他在後年會極力反對作書藏之名山的態度，並再三聲明，他底文章是為「了想有人看而寫的。這是他為人與寫作的一貫精神。這就是所謂為社會而寫。他決不會忘記社會，而他個人的是否願意出名，正面的表現這個人對他當時社會的一種態度，就是說，對當時的黑暗社會，他採取規避的態度，他悲觀，他甚至於讀起佛經來；而側面看，我們知道豫才那現實主義的切實的限力，我們相信，浮躁這樣的氣質，在他是幾乎沒有的，他底不求事功只求實際效果優點，我們應該尊重承認，然而周作人的所謂「最高態度」却不是這樣的。所以造成他不願用自己底名字出版「會稽

「我敢『彙集』」的心情。不過是以上兩種因素結合起來的結果。我相信，就是在那樣黑暗的環境中，縱使他悲哀，痛苦無論到怎樣的程度，他仍然忘記不了社會和人羣。縱使他以為彙集拓本只是爲的消耗時間，他還是要看四週的真實性態而痛苦的。因爲如此，所以他才需要抄佛經之類來麻醉自己。清高思想，在他底心田中，我們相信是一點養料都得不到的。

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被全國反帝制的呼聲弄得羞憤無以自解。兩廣護國軍底軍務院在五月成立，僅一月間，袁氏便死了。有羞，有憤，當是受良心的責備。袁氏尙且有良心，這是後代的軍閥所萬萬趕不上的。軍務院在廣東成立，北京是早已密佈着偵探了，殺、殺、殺！黑暗的地獄中，少不了謀殺，所以更少不了這些鷹犬到處追嗅的。這時南京北洋軍閥的柱石馮國璋袁世凱底故技，出面調停，想從中取利。豫才恰在這時候從紹興會館的藤花館遷到同館的古槐書屋裏去。馮國璋的調停沒有成功，但以此調停爲機緣而集合於南京的北洋軍閥却無形中準備了他們底領袖袁世凱死後的新的團結。這集合於南京的北洋軍閥的會議，後來在袁氏死後，段祺瑞任內閣總理時移開於徐州成立所謂省區聯合會，也爲日後直系北洋軍閥與皖系北洋軍閥分裂的先聲。但以當時的情形說，毋甯是封建軍閥在袁氏死後，立刻大團結起來，共同協力對付國內的民主勢力。那時有皖系軍閥底首領段祺瑞底親信活動於省區聯合會中，以張勳爲省區聯合會的領袖，也完全是段氏底主意。然而對抗這軍閥底大團結的民主力量，却薄弱得可憐。南方護國軍底武力並不能完全爲革命黨人利用，國會中的舊國民黨系非常混亂，中華革命黨底地下勢力很小，而國會中的退步黨系這時由分裂而又結合成爲研究系，如從前的進步黨捧袁世凱一樣只是想在段政府下苟安偷生，希圖段政府寬大，讓他們實現一點改良夢。蓋段民登台後，立即投入日本帝國主義懷中，同時積極向民主派挑戰。民國五年尙未終了國內政治的明爭暗鬥，實在就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了。豫才對這一切不聞不問，在古槐書屋裏繼續蒐集造象及拓本加以研究。十二月又請假由津

浦線回家去了一次。到民國六年二月初旬，對德潛艇戰策的抗議事件發生，段祺瑞力謀取得日帝國主義底金錢與軍械以鞏固北洋軍閥底地位，主張和日本一道對陷在歐戰中的德國宣戰。國會中因此發生爭執，研究系這時也和他們底祖宗進步黨幫助袁世凱解散國會一樣，極力贊助北洋軍閥底督軍團解散國會。惟有黎元洪不肯幫凶，反於五月二十三日免了段總理底職，北洋軍閥就此擊起攻擊黎總統。黎在免段祺瑞的職以前所設想的北洋軍閥內部的分裂，這時竟尚未成熟，黎只好請人調停，張勳遣人向黎氏自荐，黎不禁張勳處心，允他帶兵入京，於是康有為便也刺了鬚子潛入京內躲在張勳私宅裏了。不久辦子兵便在北京出現，七月一日張勳宣佈復辟。康有為滿希望張勳勢力下再去托庇滿清，實現他底君憲夢。那知他所擬的「有復辟登極詔」「開國民大會以議憲法詔」「召集國會詔」「保護各教詔」「免拜跪詔」「合新舊詔」「親貴不許干政詔」一篇也沒有被張勳採用，托庇舊勢力原來如此可憐！豫才在這年一月初，已由家鄉回到北京。七月看見張勳竟復辟，又要叫他留辦子，他是再也忍耐不住了，就辭了教育部的職。可見他到底關不住他關心社會的心，到不能忍耐時，他是不辭誓一嘗飢餓與偵探底獵補的。好在復辟派底好夢，不到半個月便也傾覆了。七月中旬段祺瑞帶兵入京，恢復了共和，豫才纔重新回到教育部去。可是這種變動，仍舊無害於北洋軍閥底根基。張勳復辟在鬥爭形式上說，只是段祺瑞對張勳的一場騙局。因為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職後，很想再取得國務總理的地位而無所藉口，張勳對段提出復辟意見時，段曉得機會已到，便急急張勳復辟好像可以幫忙，待張勳一宣佈復辟，他竟在馬廠誓師討伐張勳自為總司令了。因此，他便可以藉恢復共和的功勞，復任國務總理。不過實際上，他底總理委任令是否假造，現在還是疑問。在社會情勢上說，張勳復辟可算是清室遺老最後一次的掙扎。原來在袁氏稱帝之前，清室遺老宋育仁，勞乃宣輩就發動過復辟了，雖然受袁氏打擊而失敗，復辟派的活動並未因此停止。康有為和張勳相勾結已非一日，所以張勳底復辟根據出來已久，決非偶

然；也決不是段氏一人底陰謀，他不過利用張勳復辟的心思，順水推舟，以提高他個人底地位罷了。張勳倒後，黎元洪辭去大總統職，由馮國璋繼任。馮初不肯遠離南京地盤，及到暗中接洽好直系各督的佈置地位之後，才於八月一日到京就任。從此研究系附庸在北洋軍閥兩首領之下各得其所，共同來與南方興起的護法政府糾旋了。北洋軍閥馮、段兩氏之間的暗鬥也就一天天尖銳化。北京仍然在軍閥盤據下，唯私利是圖，毫無希望，且和往日一樣烏煙瘴氣。這民國幾年來的烏煙瘴氣，不知道豫才以為比他在那南京水師學校讀書時的烏煙瘴氣，濃些還是淡些。那時學校烏煙瘴氣，他離開學校；現在全政局烏煙瘴氣，他無處可躲，便只得躲到古書裏去了。他繼續蒐集拓本來研究，他青年時代的熱忱經了這長期間的慘酷，黑暗的壓縮，全躲藏到心之底層去了。這躲藏在心之底層的熱忱，越受壓縮，越燒得熱。但這熱的外面，也從此永遠被迫上一層酷寒，寒得像客觀的現實世界一樣，使他有着更大的膽量與無情去面對着現實世界。並且從而深入，帶着他藏在心之底層的熱忱深入，而成為堅忍不拔，永不妥協，百折不撓的戰士。

豫才底感情遭受冷壓是豫才後來成為百折不撓的戰士的主要前提條件之一。這條條件使豫才底進化論變為人生社會而出發的現實主義的精神對他底個人主義與唯心傾向的制約，決定了不可動搖的勝利的基礎。在這基礎上配合他自小以來的聰慧，天賦的批判力，對自然美的愛，生活上的困頓，此後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所發展起來的奴隸思想及其認識，就造成了中國的革命文學家魯迅先生。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所說的S會館，便是豫才現在所住的古槐書屋。這裏有三間屋，院子裏有一株古槐樹（北平的屋子大體都有院子），相傳往昔槐樹上曾經死過一個女人，所以那屋一向沒有人敢去住。但豫才住進去的那時候，槐樹已經高不可攀，距女人縊死在樹上時候當然很長久了。豫才就在這冷屋裏鈔他底古碑。他自己說：「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聲和

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唯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密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韓愈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一個單身漢孤零零住在一間冷寂的大會館裏，不啻這會館的四週如何拂籬，如何血腥，如何你爭我奪，他却只把這會館當作一座墳墓，作為暫時讓自已從辦公室回來時死在那裏，冰結在那裏的靈魂的避難所。這正是心如古井這個形容詞出場的時候了。他底人間的情與熱，被當作一種潛流，深深藏在這古井底下。

還有一句很重要的話，我幾乎模糊過去了，非重新聲明不可。就是我前面說過袁氏稱帝失敗，是他底不聰明，這話假使誤以為袁氏是一個沒有才幹的妄想家便是大錯特錯，而且簡直是抹煞袁氏做北洋軍閥首領的價值。清末他在拳匪之亂時對清室的態度，他從戴鴻慈手裏奪取實權的經過，民國成立他對革命黨所玩弄的一切手腕，他對民主勢力的大度的忍耐和鎮定的態度，他到快要稱帝時還口口聲聲說擁護民國這種種歷史的事實，都表明他是一代的梟雄。他所獲取的總統的權力，就是拿破崙也趕不上。而且他獲得了這總統的獨裁權力之後，統治地位仍舊非常鞏固，就使他不能稱帝，他早已是事實上的中國唯一的獨裁元首了。只要中國的社會經濟趕得上法國，或德國，或意國，他就可以成爲東方的拿破崙，也可以成爲希特拉，可以成爲莫索里尼。同時也是因爲中國社會落後的緣故，反動的攻勢包圍袁世凱，才使袁世凱走上稱帝的路子的。袁世凱的失敗，只是一種時代的犧牲，那一代的英豪脫得了時代的圈套，不過有的成爲時代的寵兒，有的成爲時代的犧牲品罷了。袁世凱看不清稱帝的前途，決不是他個人應該負責的。——但歷史的事實，也夠是有力的教訓，後代的許多竊國奸雄都知道靈電將權勢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決不戴上皇冠，還靈力運用許多好聽名辭的，袁世凱應該是他們底主要教師之一。我讀了袁世凱，實在非常驚異於他們處處像袁世凱却很少復踏了袁世凱底錯誤。我不惜相信他們是熱懂袁氏底鬥爭史的人。

當然，袁氏不但教訓了後人不敢再稱帝，而且事實上，從袁氏執政到張勳垮台，封建軍閥雖然陣容整然，節節向新勢力進攻，但閉關自守的中國既然和世界接觸這麼久，社會機構畢竟漸漸發生變化了。封建軍閥在他們所恃以立腳的社會基礎既無可補救的一天天在受浸蝕，他們在政治上便必然的遇到了永遠的不可克服的屢仆屢起的死對頭。所以從民元以來，代表新勢力的革命黨雖然屢戰屢敗，封建軍閥雖然始終把持統治地位；但袁氏稱帝失敗到底也促成封建軍閥的分裂，張勳失敗，到底也根絕了復辟的可能。所以封建軍閥現在雖然還把持中國大部份的統治權，但他們底基礎到底動搖了。而助長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以動搖封建壘底基礎最爲有力的外在因素，實在是一九一四年——即民國三年——發動的西歐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

原來中國一直在各帝國主義共同壓迫之下，民族資本家底咽喉被緊扼住，掙扎不起來。而中國的封建餘孽恰巧被帝國主義所利用，在政治上妨礙民族資本的發展。現在歐戰發生，各帝國主義都跑去忙於戰爭了，雖然東方還有日本帝國主義繼續壓迫中國，而軍閥也還可以在日本帝國主義底蔭庇下向中國民衆進攻，但中國市場上到底少去許多帝國主義商品了。中國民族資本家得因此透得一口氣過來，各大都市的工商業也就急劇發展。這是讀者都早已明瞭了的事情，現在只要在此提一筆，我們就立刻會想像得到軍閥宰割着的那幾年的中國民族資本家怎樣的活躍起來，怎樣地慢慢生長着相當普遍的意識形態這些情況了。這實在是在接着要來的五四運動的決定的原因。自然，歐戰結束之後，帝國主義重新運輸入大量的商品，金錢，軍械來把中國民族資本壓得服服貼貼了，然而這幾年民族資本的發展對封建軍閥的加速度的腐蝕作用，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它並且在思想意識上振起了中國社會關係，使之發展到另一對此形態上去的必要的前提條件。因此，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承認日本二十一條的五月，在全國的沸騰中，冷冷清清產生於上海的新青年，後來就成爲領導五四市民思想的大本營。文字改造運動，本來在甲午戰爭（一八九五）之後就已

發端了，後來跟着中國民族資本的困難逐漸的生長，教育普及這要求繼續爲人重視，改造漢字與國語運動也繼續發展；民國成立，這國語統一運動便列入教育部的議事日程繼續推進；到「新青年」創立，就和「新青年」的思想運動匯合，成爲中國市民文化意識的總潮。同時這總潮裏也伏下了中國市民底死對頭底思想因素，還將豫才從寂寞中拖出，捲入這文化的總潮中，使他成爲中國民族著名的偉大戰士之一，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中給中國爭得光榮的一頁。

我們以後又要看見豫才挺身而出，爲真理而奮鬥了。

第四章 奴隸意識奠定了以真理武裝思想的可

第八節 生命的開花

一八二八年——一九二四年：三八歲——四四歲

五四之前的暗潮

（刪去一段）那時候，段祺瑞照舊不改他張勳復辟前的賣國態度，一要和日本帝國主義勾結，想借日本底金幣來擴充自己底勢力，任意蹂躪國會。同時，黎元洪免段祺瑞職時所期待的北洋軍閥內部的分裂，正以皖（以段祺瑞為領袖）直（以馮國璋為領袖）二系暗鬥的形態，逐漸顯露出來。孫中山一派大鑒於段祺瑞底賣國禍民依然如舊，在廣東組織軍政府，以反對北方國會的改組為名義，重申護法之議。可惜的是絲毫得不到西南軍閥底實力贊助，不到一年，竟被西南軍閥排斥掉了。中山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辭去軍政府大元帥職後，廣東的軍政府此後便有名無實，變成西南諸軍閥底合議政府了。

中山辭職的同月十二日，留日學生罷課回國，組織救國團體。——那就是北方皖系軍閥和日本帝國主義勾結，訂立共同防線條約，成立參戰借款，以擴充已派兵力所激起的風浪。皖系軍閥用日本借款，招練參戰軍，並且用日本軍官教練，大有舉全國以投諸日本懷中的形勢，非常引起了國民底危懼心。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各大學專校學生全體到總統府請願廢止中日共同出兵的協定。自此皖系軍閥領袖段祺瑞賣國以殘害同胞的勾當完全暴露，全國商民紛紛通電反對。但段氏



底參戰軍照舊進行，就造成了此後塗炭生民的直皖戰爭，而段氏此後也還是一直作着日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動力的走狗。

很明顯的，由於中國民族工業的相當發展，以及十月革命的影響，留日學生的罷課回國與五月二十一日的神願等等反對封建軍閥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行動，是以更加覺醒了的意識作爲前提的。所以它不但在政治行動上發動鬥爭，而且同時也在思想領域上發動反帝反封建的全面的鬥爭。可是在思想意識領域上，封建勢力幾乎一向來就沒有受過打擊，它底力量是很雄厚的。主張人性的解放，以實驗主義作爲武器，想把中國的一切老朽的封建文物重新估價的「新青年」，便是在思想領域上站出來向一切老朽文物直接進兵的一支生力軍。這一年「新青年」所出的「易卜生號」，就是在思想領域上向封建文物應戰的一個陣容。打先鋒的是胡將軍底「易卜生主義」，胡、羅（家倫）合譯的「娜拉」（至第三幕）；作中軍的是陶履慕底「國民之敵」和吳弱男底「小愛友夫」，而以袁振英底「易卜生傳」爲殿軍。這是針對着當時在文學上代表着封建意識的卿卿我我這一類才子佳人鴛鴦蝴蝶派，針對着當時盛行於北京的崑曲而發出的號砲。可是封建殘餘的一切思想意識領域上的力量，也正如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軍閥以及其他一切軍閥官僚們一樣，並沒有表示退讓，相反的，也從四面八方來和新思想對抗，盡力攻擊並嘲笑「新青年」。所以當時的新青年，其實是陷在四面受敵的重圍中；它選了易卜生來作爲實例，恐怕也就有表示像易卜生一樣敢作敢爲，敢於獨戰多數，難以孤軍而陷重圍也敢於攻擊社會的意義的吧？同時，我們知道，易卜生底劇本是世界有名的問題劇，它選了易卜生正表明它所要戰鬥的對手是整個舊社會的全面，這種英勇的姿態和五四那一天火燒趙家樓的英勇的一幕是正相照應的。

要在思想意識上否定封建文物，建立新思想，便不能不有適合於新思想的文字工具來代替並推翻代表封建內容的文字工具。五四新思想的主要內容是科學與民主，適合於此種思想內容的文

字工具，必須有嚴密的組織，新鮮豐富的辭彙，能表達明確的意義，及容易學習，負得起普及教育的民主任務。文言文的含糊與艱澀，不易容納新概念，都只能適合封建的遲鈍性，游移性，保守性，排他的狹隘性，與貴族的獨佔性。以陳獨秀底話來說，就是所謂山林文學與貴族文學，決不能適合五四的新思想。因此，從甲午戰爭以來就已發端了的文字改革運動，繼續發展生長，成爲教育普及，改造漢字及國語運動等，到這時，恰好是獲得思想內容的時候了；便和五四思想革命運動匯合，成爲五四運動之一面的文學革命的大潮。這就是白話文學。這種文學革命，由於中國市民對帝國主義的附庸性，雖然是無論從反對文言文方面看，從白話文本身的限制性上看，它都是不澈底的。因此遺下了許多問題，至今還沒有被我們解決。然而當時也確實發生了一場不算小的戰鬥，已經不是輕而易舉的了。白話文的呼聲震撼全國，迎頭痛擊了支持文言文的一些守舊者，這是文學革命的席捲全國的姿態。只是在白話文學的創作方面，如歷來的建設工作一定緩於破壞工作一樣，一時也並不能與理論上的席捲全國之勢並駕齊驅。自從胡適底「改良文學芻議」發表以來，創作上其實是有胡適底詩文是白話的。後來白話作者雖然加多，但大抵都是翻譯的劇曲和小說，良好的白話文創作仍然一時看不見。使白話文對四面八方的敵人表示了決定的優勢的，是「易卜生號」出版之前，豫才在五月號的「新青年」上發表的「狂人日記」。這一篇白話文的天才作品與世人見面的時候，中國人民正在北洋軍閥底虎視眈眈下，爲了反對參戰借款而在奔走呼號中；他們正在醞釀一個巨大的浪潮來配合這篇白話文的天才作品在文學上所奠定的勝利的基石。

豫才的抬頭吶喊

豫才日常在窩裏的工作，仍舊是搜羅拓本，繼續研究。他所以寫起小說來，是受了「新青年」雜誌裏的提倡廢除漢字的健將錢玄同底勸誘。我們

知道，他住在古槐書屋裏很是寂寞，我昨天偶然看見章衣萍底一本『枕上隨筆』，說到豫才在會館裏曾經把壁虎養在匣裏，天天拿東西去喂養過，這話是否確實，可不必問，但這逸話正充分說明了他底寂寞。那本『枕上隨筆』上還說，有人問豫才爲什麼要抄古碑，他底答覆是『等於吃雅片』。這句答話我相信得過是真的出於豫才口裏，因爲豫才是並不滿足於自己抄古碑的生活的，他底深刻的思想力又善於用簡單的言辭揭出現實的本質，這短短一句話，可說已把他底寂寞的，心之痛苦刻畫殆盡。他一個人在會館裏，去看他的人很少。他在吶喊自序裏說：『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爲怕狗，幾乎心房邊在怦怦的跳動』，『這位金心異，就是主張廢除漢字，成爲衆矢之的的錢玄同。但白話文是好在他把敵人吸引開去，守舊的中國士君子，看見錢玄同主張廢除漢字，爲了要攻擊這更激進的敵人，才暫時弛懈了對白話文的攻擊，而白話文便趁此殺進一步了。

所以將來倘說要漢字廢除，取好在提倡拼音字而同時有人來主張鞭打古董底守護者，於是大家急急乎要去提防鞭打，拼音字也許可以減少一點壓力。

『吶喊』自序裏接着告訴我們說：有一夜，錢玄同翻着豫才那古碑的鈔本，發出研究的質問說：『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那時的『新青年』還沒有能引人很注意，豫才馬上就知道錢玄同底意思了，他底答覆是：『假如有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

，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倘是我們把晚年的魯迅放在概念中的話，那我們是無論如何不能相信這是出諸魯迅口中的，然而當時的豫才正是如此，他底心境的悲涼，豈是空言。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這是錢玄同底答覆。兩人底對話很有點神話傳說中的風味。

其實，說到希望，豫才是根本不會丟棄過的，正維其不能絕望，痛苦才更加厲害。於是他終於答應做文章了，就是這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他底天才含了這十數年的苦菴，終於要待中國的新興勢力在歷史舞台上準備掀起狂浪的前夜，才能開出燦爛的花。這決不是偶然的，「狂人日記」決不能在辛亥革命前後產生，辛亥革命只能產生文言之「懷舊」——天才根本是歷史的產物；對中國一切古舊封建的文物制度抱着澈底的敵意的豫才底天才，倘使不遇見反封建的社會勢力走上歷史舞台給他做有力的聲援，他只有被封建的臭氣窒息而死，他底一切才能，將和他底肉體一起腐爛在泥土裏。但現在他遇到和他一樣的傻子們，這些傻子們現在趁着民族資本家底湧潮表現為最勇敢堅決的歷史底先鋒部隊，向着豫才底所謂「希望」滿腔疾駛，這不但使豫才底天才得到土壤以開花，並且將他捲入這先鋒部隊，成為戰鬥員之一了。不錯，這是必然的，毫不足奇！

寂寞中的豫才，從此抬頭吶喊！

論「狂人日記」
及豫才的思想

然而他底悲哀到底是深切的。因為一直來，而且現在，世界都還整個兒沉在黑暗裏。豫才所抱負的一點光亮的希望，比之這無邊的黑暗，簡直等於

深夜中的一點螢光。『狂人日記』廣價激蕩帶着滿紙的悲切，那反抗的熱情，只是令人越看越傷心。他在我們心中所引起的悲哀，和憤怒一樣多！

如果說一九〇七年豫才寫給『河南』雜誌的『文化偏至論』是他底初期思想的相當重要的結晶，則這篇『狂人日記』，可以說是他從『文化偏至論』時期過度到下一期的思想上的一個結算。所以這篇『狂人日記』一方面能够具體證明出他經過這許多年的寂寞生活，他底熱忱通過冷壓所起的變化和他對外在世界的認識的進步，另一方面充分暗示了他此後的思想的 pathway。這是一篇承前啓後的分水界，豫才此後的主要思想，在這篇『狂人日記』裏全找到伏線。現在讓我們先說明在認識上的他底思想意識吧。第一，這日記裏面的狂人代表着豫才底沒有止限的憤激與憤慨。鷄過約所謂古文先生底陳年流水簿子，就是中國舊文化底化身。狂人說：『照我自己想，雖然不是惡人，自從踏了大家的簿子，可就難說了。』這就是說，照他自己想，他所以爲世所不容的，就是因爲他非難中國舊文化的緣故。但雖然如此，狂人並沒有表示對舊文化退讓。相反的，『狂人日記』裏仍舊處處在攻擊舊文化。並且，他所運用的手腕非常巧妙，他運用他古文的修養來攻擊舊道德，將『易子而食』、『食肉寢皮』這些話巧妙地鉗在瘋子底口裏，對古道德加以詭譎的側擊。對國醫豫才當然也不會忘記他底仇恨，當瘋子對醫生起着變態猜疑的時候，他還是不放棄狂瘋子心裏拿出本來的中醫面目，巧妙地引上『本草綱目』上的句子，用他們自己底話證明他們也是吃人的。豫才又將習俗請出來加以審問，說『從來如此，便對麼』，習俗回答他的是說：『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這便是豫才過了許多年的寂寞生活所鍛鍊出來的戰鬥的綱領，雖然，我們剛才說過的，他在『狂人日記』裏說明他因此受迫害，但他却並不畏縮，反而加強地再舉起上述的舊文化的諸方面來，這說明了『狂人日記』承繼豫才過去的思想與意識，而且此種思想意識正在加強，發展，指明豫才此後的路。第二，『狂人日記』說

明豫才從日本回國後數年來對外在世界所增進的深刻的認識，我們看下面一段話吧：

「他們——也有給如蘇打糊過的，也有給紳士打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兇」。

這就是所謂奴性，也就是他此後數十年所熱心攻擊的中國人底根性。他在日本就開始研究國民性的問題了，以他繼續不斷的研究，再加上他回國後幾年的觀察，達到這樣的認識，當然也不能算奇怪的。這種奴性，多麼令人短氣，但又是多麼真實！他們，他們受盡種種侮辱與虐待，但遇到有人要來解救他們或遇到別的什麼敵對他們底主人的人，他們却幫同他們底主人，像豫才所說的這麼怕人，這麼兇了。不過我們還須注意，我這裏所說的奴性，和我們以前，並且將來還要說到的所謂豫才底奴隸思想，並不是同一的東西。前者是中國民衆過了數千年奴役生活的劣根性，後者是這些過奴役生活者要求解放的思想體系。這是統一在同一主體中的兩個對立的對社會的態度，兩者相互排斥，而對於前者的深刻的了解，却正是加強後者的活的養料。豫才此後對奴隸的觀察從未懈怠，我們可以在他著作中看得見他對奴隸的各種側面的深切的理解，站在這理解的基礎上，他憎惡這些奴隸奴性，加以無情的攻擊，同時，由於了解的深，便不可避免的從心底裏同情這些奴隸底處境及他們底歷史的重担——奴性，以使他底奴隸思想充滿了不可妥協的鬥爭的熱情。這事，在這裏已經充分暗示給我們了。第三，他鈔古書，研究佛經，對他也並不是沒有益處，他在「狂人日記」裏已經最初表現他讀歷史的心得了。他明明白白看出，並且毫不遲疑地斷定說：「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讀過唯物史觀之類的書的現在的人們，假使說這種話，並不能算是了不起的聰明，但那時的豫才還沒有研究唯物史觀的機緣，他竟然能夠剝開歷史上的一切欺瞞，隱瞞，將血淋淋的歷史底本來面目示給我們看，這是多

麼使我們驚異於他底深刻！他過去幾年的寂寞，在這裏說明了決不是徒費歲月的，而此後，他之成爲徹頭徹尾的歷史唯物主義者也在這裏找得出伏線了。第四，反動統治者底一切走狗鷹犬底具象，在「狂人日記」裏已多次出現。我們知道，五四運動過去之後，「新青年」社裏起了分化，留下豫才一個人成爲洶勇的時候，他底打吧兒狗是舉世聞名的。然而這吧兒狗在「狂人日記」裏已經現身出來作爲狂人底敵對者之一了。牠底形貌在豫才筆下相當的具象化，所謂「獅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似的狡猾……」便是，這形貌，在以後的豫才描寫吧兒狗的時候是要一再出現的。民國幾年來，軍閥戕害異己，用大批鷹犬馳騁民間，豫才是親眼看見，並且親身經歷過的，他將這些鷹犬具現在吧兒狗之中，現在做了狂人底第一個敵對者，此後也正是他痛加攻打的对象。在「狂人日記」中，吧兒狗底主人是趙貴翁，這人在「狂人日記」裏，驟然是一個地方的豪紳，然而透一層看，這正是豫才心目中的一切權貴底化身。豫才之要成爲不合理社會的支配者底不兩立的叛徒，在這裏便告訴我們了。第五，「狂人日記」裏不但攻擊舊有的一切文化，並且攻擊對面的家長制度，正如許壽裳先生所說，狂人底哥哥所代表的是家庭中的舊式家主，這也是狂人底敵對者之一。「狂人日記」在這裏提出了家族鬥爭的問題。但最後，頂要緊的是我們要知道，在「狂人日記」裏，這各色各樣的豫才日後底死敵，不僅是被狂人個別地指摘出來便完了，牠們在狂人眼裏，並且作爲一個度動的集團表現出來。狂人走到堂門口和他哥哥說道理的時候，他描寫他哥哥一夥人說道：

「大門外立着一夥人，趙貴翁和他的狗，也在裏面，都探頭探腦的挨進來。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戴着囑笑。我認識他們是一夥，都是喫人的人。可是也曉得他們心思很不一樣，一種是以爲從來如此，應該喫的；一種是知道本該喫，可是仍然要喫，又怕別人說破他，所以聽了我的話，越發氣憤不過，可是越發緊要。」

所以他不把他所痛心疾首的種種奮勢力，作偶然的孤立的存在，而深切知道他們是「一羣」，是一個壞人的集團。他認識他們是一種社會的勢力。「狂人日記」一面指明這勢力的存在，一面又刻畫他們底手段說：

「我看他話中有毒，笑中全是刀。」

「況且他們一翻臉，便說人是惡人。」

又說：「他們這羣人，文雅與人，又是虛虛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

「現在聽得他講道理的時候，不但聲聲透透抹着人油，而且心裏滿装着吃人的意思。」

這就是說，他們底手段不但是這麼險惡，戴虛偽的假面具，而且是卑劣懦怯的。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捷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祟。所以他們大家連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最好是解下腰帶，挂在梁上，自己緊緊勒死；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又償了心願，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噙噙咽咽的笑聲。否則驚嚇憂愁死了，雖則略瘦，也還可以啃幾下。」

這就是他後年所以「聲明要吃魚肝油，不肯就死掉，二聲明甯願被殺決不自殺的道理。原來他是早已明白他們心理所懷的毒意的了。」

「他們是只會吃死肉的！」這樣，他輕輕一擊，就將他們底傷疤擊中了。

他們「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各目單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

這裏的所謂「各目」，在豫才心目中是包含清末用的毒黨，民初用的亂黨等等的。×××

×××。在「狂人日記」裏，這些罪名都借「瘋子」這罪名來代表了。

那麼對這些反動勢力底惡劣手段，那狂人怎樣對付呢？他「有的是義勇和正氣」。他看見他們底卑劣，「忍不住，便放聲大笑起來，十分快活。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當橫梁和

樣子都在他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大起來倒在他身上，萬分沉重壓着他的時候，他曉得那是要叫他死了，但他看穿了那沈重是假的，便掙扎出來，出了一身汗，終於不肯死。從這裏，已經很明白的看得出作爲戰士的豫才日後的戰鬥姿態了。他底戰術是什麼呢？就是所謂壕塹戰，野戰。別人想他死，希望他自殺，他偏不肯死，別人覺得他礙眼，他偏要生存下去，堅持到底。這種戰鬥姿態，在『狂人日記』裏也預示出來了。不過我們要知道，豫才雖然痛恨他所處的黑暗社會，可是他從來就沒有一刻放棄過他對人類的熱切的愛。他帶着眼淚寫道：

「自己想喫人，又怕被別人喫了，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他用這樣簡單的幾句話把今日我們人類底醜惡面目活生生畫了出來之後，便懇切的勸人類說：

「去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喫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徑，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這狂人就是豫才自己！你試將『狂人日記』讀到這裏看看？那瘋子不倦地，熱切地勸勉他們說：

「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喫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這就是他在『吶喊』自序中所說的他在沙漠中助青年吶喊的聲音了。這聲音是懇切真摯的，如此打動我們的心。

這裏可以注意的是他在大喊着叫他們從心改起的時候，他提出了『將來』，還提出了所謂『真的人』。這『將來』的『真的人』到底是怎樣一種人呢？我這裏應該指出他那時實在是並不明確知道的。當他答應錢玄同寫文章的時候，對將來，他本來是並不抹殺的，但自從他『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

額唐得很了。」（「自選集」自序）所以說到他底希望，只是如他自己接下去所說的：「不過我却又懷疑於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自選集」自序）

豫才在「吶喊」自序裏說過，他對於那時的「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大半倒是爲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也來吶喊幾聲助助威。「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吶喊」自序）所以這「狂人日記」裏的「真的人」，所謂「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一方面是聽將令裝點上去的歡容，但另一方面我必須着重聲明，這決不是虛僞的不誠心的粉飾，更不是後年發生的所謂尾巴主義者似的不是從內心中暴茁出來的那種政治概念的生造。他在「答國際文學社問」裏面便有這樣的追述：「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望着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所以這「狂人日記」裏的希望雖說是聽將令的歡容，却也是因爲覺到了舊社會的腐敗，而自發的企望着的；是從腐敗黑暗中湧現出來的，這正是「狂人日記」中的「將來」，而同時正因爲他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所以「狂人日記」中的「真的人」和「將來」也僅僅是一種希望的閃爍，而沒有表現任何生造的輪廓。所以無論從這希望的來由上說，從這希望的本身上說，它仍然是「狂人日記」全構成中的很自然的有機的一部分，決不是勉強的粉飾。

以上，我把「狂人日記」中豫才底思想意識做了一個大致的分析，並且指明了這些思想意識的來源和對豫才日後思想發展上的關係。現在，我們再來看他底創作方法吧。單是暴露與呼號，在豫才還是不夠的。因爲他自從寫「懷舊」的時候起，就表現他底現實主義的精髓了，他嚴格地解剖週圍的現實，並不會忘記無情地解剖他自己，在「狂人日記」裏，他解剖他自己說：

「四千年來時時喫人的地方，今天纔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喫了我妹子的瘦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的履歷的我，當初當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

他又說：

「喫人的是哥哥！」

「我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喫了，可仍然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這說明什麼呢？這是說，他隨時隨地都不會忘記他是人類的一份子，社會的一份子。他暴發這社會，攻擊這社會，希望社會改正，可是他決不忘記他自己原來也在社會之中，這結果，使他底喊聲完全從社會內部發出來，成為實實在在的人間的東西，像「摩羅詩力說」裏那種飛離人間或站在人類之上來看人間的羅曼詩克的精神，到「狂人日記」裏便站不住腳跟了。

所以「狂人日記」裏對人類的抗議聲雖然充滿狂狂的感性，却不失為現實主義的作品。而他底現實主義的手腕，最足以令人驚嘆的，是他將內心的全部熱情貫注在狂人口裏，把自身也轉化為瘋子，可是一觸到瘋子身外的世界，却始終沒有忘記外在世界本來的面目。以瘋子底變態神經而影響到他日記中的外在世界也變了質這種錯誤，「狂人日記」裏能免掉，是現實主義底決定性的勝利。舉個例：倘使以為日記是出於瘋子底口氣，便把瘋子以外的旁人的底說話也由瘋子底心情加以轉移，塗上瘋子的色彩，則這篇「狂人日記」裏就再也找不到真實世界了，「狂人日記」勢必變成狂世界日記；諸位不要以為這種錯誤是太大的錯誤，其實，這是很容易犯的毛病，因為那變一來，並不見得就完全使這篇小說不可讀，當作着底熱情野馬似的奔騰而稍一忘記約束的時候，他自己既經在執筆時候確實瘋了，則他全心投入瘋狂狀態中不再記得回頭，用瘋了的眼睛看起世界來也很可能的，這處一來，文章說不定還更能激動人，然而與實世界是難得遠些了。浪漫變

義和現實主義的相差，其實也並不怎樣遠的，——不過，『狂人日記』竟立住調，不至於纏綿得客觀世界也瘋了，毫無疑問的，我們應該歸功於豫才底百餘篇外國小說的修養，和他自小以來不肯放棄事物本質的那種氣質，經過了周旋到現在這般生活過程而在悲憤寂寞中生下了牢不可拔的根，我前面說這篇『狂人日記』能具體證明豫才底熱情經冷壓所起的變化，就是指的豫才『摩羅許力說』時代以來的熱情，經過他所處黑暗社會數年的冷壓而達於現實主義的決定點這種變化。如果我們要問那些文化上的勞力會對這個變化起過發解作用的話，那麼我底答覆是在他那時候，理論的指導，幾乎等於沒有，他底成功仰給於方法論上的便利是很少很少的，除了對實世界的深刻的理解和腳跟站在社會內部的精神之外，便輪到哥戈里是他最大的教師了。我們以前說尼采後來倒在豫才自己底獨特方式上，變質為一種強烈的抗俗精神和反中庸的態度。這事在『狂人日記』中可以看出局部的端緒，這就是『狂人日記』中的主人公，正是在豫才底獨特方式上中國化了的尼采底 *Nihilismus* 所謂豫才底獨特方式是什麼呢？其主要點是正和尼采相反的豫才在青年時代的實際生活中就養成了的平民的精神和他最近在寂寞生活中所到達的現實主義的決定點，這使『狂人日記』中的主人公比尼采切實，不像尼采那樣高超人世，恰巧成為豫才抗俗和反中庸（反對封建道德文化）的一個活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像。

他在文藝運動上，一向的目標是介紹和翻譯，『新青年』社叫他做小說的時候，他手邊沒有參考書，也沒有翻譯的底本，所以要他做論文，要翻譯都不可能。於是他只好利用過去已裝在腦子中的東西做起小說來。然而他這一篇小說底社會效果之所以遠過於別人翻譯一篇世界名著的，他對中國社會的深刻理解和他年長月久被壓抑在內心的悲憤實在是在決定的原因。這原因的存在是看不見，觸不到的，所 牠所生的效果，也遠出豫才自己意料之外。『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時候，很激動了一部分青年的心。這首先不能否認『狂人日記』內的熱情，而徹底形式，

在世界文學史上，雖然並不希奇，比方哥戈里就曾寫過「狂人日記」，梭羅古勃底「小鬼」也是描寫變態人物的。可是在中國當時「文學革命」的荒地裏却確是一朵怪花，同時憑藉豫才底文學修養所產生的那優秀的白話文，也對古文顯示了決定的成功。不過「狂人日記」雖然激動好些青年的心，各種反動的復古派別倒並沒有馬上就注意。鎗與砲打出去馬上就會引起反攻，但生力軍加入作戰，敵人倒未必馬上會覺察得到的。倘使能覺察得到，那便是更了不起的敵手了。我常常私自想，那些想永遠保持高位的支配者，時時刻刻駭怕新機運的生長，他們在位幾天，新機運也就流血幾天，但是他們所殘殺的，大約都已經生長而能與他們為敵了。我總覺得很為他們抱恨太遲了點，倘使不待敵人生長，敵人還沒有能與自己為敵的時候，就殺害了他，不是以後可以少許多麻煩麼？豫才之將為舊營壘的死敵，為黑暗的反抗者，從上文看來，我們知道，在「狂人日記」裏是特徵畢露了的。然而當時的反動諸派別竟不知道注意！倘使那時候就能將豫才以至於和豫才相類的人都縛而殺之，豈不大妙？

作為詩人的魯迅
及其短文的分析

給「新青年」寫了「狂人日記」之後；豫才底文思便一發而不可收拾。同時他也就和「新青年」這個文學革命的集團發生關係。那銳不可當的思想家陳獨秀，時時孜孜不倦地來催促豫才替「新青年」寫文章了。一九一八年他三十八歲，寫「狂人日記」這一年，他雖然沒有另外寫小說，但却寫了許多短文和詩，於今收在「熱風」中的一大半短文都是這年他給「新青年」寫的。還有一部分詩和短文收在「集外集」和「墳」裏面。「狂人日記」發表的時候，他所用的筆名，就是後來那名聞全球的「魯迅」。從此，本書的主人公也就以「魯迅」通稱，不再借用「豫才」這名字了。魯迅以前，恐怕主要的是在日本的時候，還曾用過自櫛，索士，令飛，迅行等筆名，但「狂人日記」發表時「新青年

「編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所以他便借用了他母親底姓「魯」，承「迅行」這筆名，改爲「魯迅」這名字以後就常常在「新青年」上出現，署這名字的文章，也特別受青年人注意。但也有很多數的短文章是不署「魯迅」。這筆名的，那時他常用的別一筆名是「唐侯」。據他底朋友許壽裳先生說，當時教育部裏有長官某很想擠掉魯迅，他就安靜地等着，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這情形，可以縮寫爲「俟堂」二字，魯迅是把「俟堂」二字顛倒過來，堂又和唐字同音，可以互易，於是便寫成「唐侯」二字作爲筆名。

原來他底文章是在「俟命」擠掉之中寫出來的。

他的做詩，據他自己在「集外集」自序裏說，他其實是不喜歡的，無論是白話詩，古詩。他說：「只因爲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稍爲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做了」。

他所謂「詩壇寂寞」的那時，就是一九一八年，那時「新青年」提倡文學革命，其實是並不只詩壇寂寞的，整個白話文學的園地，都還是一片荒野，先驅者們想從各方面開闢這片荒野，來和舊文學比賽，其中比較容易做的，要算小說戲曲的白話文的翻譯和白話論文，最難的要算白話文的創作了。白話文的創作，在小說方面，魯迅底「狂人日記」已能奠定基礎，在詩歌方面，還只有胡適底「嘗試」，魯迅底所謂「詩壇寂寞」，大約是指此種情形而言的。爲了幫同開闢這一片園地，魯迅也來寫了幾首白話詩，計有「夢」等五首，發表在「新青年」的四，五兩卷上，魯迅自述爲「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其實，他何嘗不希望白話詩的體式上貢獻他自己底一分力量。而且我們只要讀過他底「摩羅詩力說」，就知道他對於詩歌的研究和熱愛了。匈牙利詩人裴多斐底詩，並且是爲他所終身熱愛的。魯迅本來是富於熱情的人，雖說他底熱情是經過冷壓的了，然而這只能應響他底詩底體式與內容，如對他小說的應響一樣，却並不能根本阻止他對於新詩的努力。他後來在新詩方面，所以只寫了不多的幾首打油詩和時事歌謠，而並沒有繼續努力，

原因在於他所處的歷史環境和他疾惡如仇的戰鬥的氣質，而新詩又還是一種舊軍械求的體式，在體式本身就需要下專門的工夫磨練；然而他底歷史環境中戰鬥任務的迫切和他底疾惡如仇的氣質，使他不可能去精心於文體的追求，而不得不選擇一種慣常應手的武器。舊詩不能負起這一繁重嚴肅的戰鬥武器的任務。而且魯迅雖然在私生活上幾乎是延亘一生都常用舊詩來抒遣情懷的，然而他從反對復古的立足點出發，絕不願以舊詩來妨礙新詩的生長，那裏，他所能慣常應手使用的武器，便是他通過散文詩（野草）而終於到達的幾乎是他獨創一格的散文雜感了。這種散文雜感，如果從它內在熱情的強烈與吐露形式的凝鍊上說，也可以算是詩。從一點上說，魯迅實在是個大詩人。舊詩是他常用的，雖然他如同不願別人稱許他底古文修養一樣，他絕不願別人看重他底舊詩，但無論如何，這也是作為詩人的他底全勞作中的一部分。從他寫了許多舊詩，散文詩，從他對新詩的嘗試，又寫了時事歌謠與打油詩，從他翻譯了幾多裴，翰斯，邁伊爾（奧國）底「中國起了火」，G. Apollinaire（法國）底「跳蚤」，藤谷虹兒（日本）底「坦波林之歌」等詩，翻譯了武者小路實篤底「論詩」，野川白村底「東西的自然詩觀」，鈴木虎雄底「運用品語的概詞」等關於詩歌的理論，和他散見在許多散文內的保衛和指示新詩的道路，抨擊舊詩的不良傾向等的意見，如「詩歌之敵」，「辱罵與惡味決不是戰鬥」，「漫興，詩和預言」，「音樂」等，而尤其重要的是從他青年時代的詩論「摩羅詩力說」上看起來，理解魯迅底散文雜感為一種詩，而說魯迅是詩人，那是一點也不勉強的。

魯迅底散文雜感雖大大發揚於他試用散文詩（野草）之後，但他這一年所發表的最初的短文比起他這一年發表的白話長篇論文「我之節節觀」，就已經將他寫散文雜感的技術上的特點顯示出來了。他不但用「狂人日記」將「文學革命」奠定基礎，並且從這兒開始運用他底匕首勇猛地攻擊當時氣炎囂張的神鬼之說，（那時的所謂靈學派所提的一些莫明其妙的鬼說怪理，我們今日

的人真是難以相信的。爲科學做忠實的辯護人，將借科學的外衣混入思想界的一切神學，精神與道德學暴露出來；他攻擊國粹學，攻擊那精神文明學所變形的學術思想；將折衷主義的，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守舊派加以分析，暴露；同時爲孩子們要求正當的教育與愛，這種救救孩子的呼聲，正是「狂人日記」中的呼聲；他從各方面爲提倡改革者「一掃蕩」，當時上海有一種反動的諷刺畫，用未成熟的技術，滿裝些陳舊卑劣的思想，這是不能不引他攻擊的；原來這位新報作家魯迅先生自少以來，對圖畫就很有興趣，他底注意力不會放過這反動的哨兵的，而且他底知道這種鴉片爲害的力量；在這些文章裏，我們看出了他對繪畫的知識，知道他對畫的興味一直沒有減退，對西洋藝術也已經有令人吃驚的修養了。他又剝開那些玩古弄文者底假面具，一一剔出中國國民性底弱點，成爲當時想要屈起的市民思想底愈先鋒，「文學革命」集團中的一支生力軍。

他這時的思想上的憑藉，仍然還是進化論，在他底有幾篇短文裏，並且表示對於進化論的很堅決的信念。尼采底個人主義色彩之於他，這裏留下了強烈的痕跡，表現了他還不能像我們在分析「狂人日記」時一樣經常地在他獨特的方式上從各方面控制尼采，就是說，在他對某些具體問題缺少獨到見解的時候，尼采還可能突然跳出來表現部分的獨自的色彩，以暫時底護魯迅尚未充分發展的思想力：從「我之節烈觀」來說，魯迅明明還把羣衆看作是節烈救世說的惡原，在「熱風」「三十八」裏，他底話更說得明白：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祇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羣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不過，這種個人主義思想的突然顯出獨自的色彩，到現在已經只能對魯迅發生微小的庇護作用了，牠偶爾有時閃耀一下，並不能站住穩固的脚跟，魯迅底文章裏分配給牠的地位已經非常之小了。因爲：我們已經說過，中國的實際情形是容納不下尼采思想的，而魯迅又生長在中國的事

際情形中，更加之他又不是一个背離實際情形的人，他底眼睛的習於步步深入現實世界，當他在日本和個人主義接觸的時候，那眼睛就早已成爲個人主義底矛盾對立物了。這矛盾對立物，經過這幾年寂寞苦痛的實際生活，到此已發育成長，對個人主義取壓倒的優勢了。所以不管「我之節烈觀」行文如何平舖，在技術上如何比不過魯迅日後的纏綿，但思想的週密是和他日後的纏綿一樣足可令人吃驚的。和「我之節烈觀」同一年寫的收在「集外集」裏的那篇「度河與引路」尤其是魯迅看穿過一切形式的改革，尖銳地主張從本質上改革思想的此時的張本；這雖說是他一向來要求改革思想的一貫主張，但那種揭穿分散注意力到形式上去的毛病，却正是只有他底深刻的眼力才能達得到的結果。而且，以這種揭穿形式主義爲內容的思想改革的深刻要求，比起魯迅原前在日本時所主張的精神改造的唯心傾向，已經在客觀上具有戰鬥的辯證法的因素了。

「我之節烈觀」取着一種激情的勸說的語調，那涵湧的風格，宛如還有「斯巴達之魂」那樣的血統，和以後魯迅白話文章幾乎全然兩樣。然而那行文組織上的虛鬆，却正指明了「斯巴達之魂」中那樣的激昂慷慨的風格遇到了魯迅底腳踏實地的思想而不能相稱了；因爲前者需要奔放，後者需要沉着，其發生不調和是必然的。從文言的長篇大論過度到白話的長篇大論而發生的技術上的不熟練，並不能全然歸罪於魯迅還不習慣白話的長篇大論，其本質的原因，實在起那種激昂慷慨的奔放形式碰到沉着的週密思想這塊岩石所應該招致的起花現象。過度了此種起花現象，以後接着要來的，是那種週密思想進一步集中起來，漸漸地壓服他與表現形式之間的矛盾。——當然，他在思想上的矛盾性，是也跟着他底週密切實的思想的集中而一步步被克服的。但這情形要在將來的歷史有了決定的轉運，才有決定的結果。

五四運動及魯
迅的生活

不管國民的反對，段祺瑞在一九一八年的總理任期的數月之中，和日本帝國主義陸續簽訂了如下的許多借款：

- 四月三十日簽 有線電信借款二千萬
- 六月十八日簽 吉會鐵道借款一千萬
- 八月二日簽 吉黑金礦森林借款三千萬
- 九月二八日簽 滿蒙四鐵道借款二萬萬
- 同 日簽 山東高徐順濟鐵道預借款二千萬
- 同 日簽 參戰借款二千萬

數月來簽訂了這大宗的借款，一天內簽了三宗大借款，真是舉世罕有的事。段祺瑞和北洋軍閥們毫不想一想日本並不是他們底爸爸，背出這許多錢給他們招兵練馬以消滅異己，而在肚皮裏不別有好打算。但國民底反對，他們如同沒有聽見，一方面招練參戰軍，一方面極力縱兵壓迫南方軍閥底軍政府。這就是所謂段氏底武力政策，也就是投降日本的賣國政策。中國民衆反對段氏的聲浪甚高，但所以能够予北洋軍閥底賣國政策以相當阻擋的，還是幸虧那時同盟國已節節敗退，協約國底勝利近在目前了。英法各帝國主義，於是趕緊回顧東方，看見中國的權益幾乎全被日本侵佔去了，便向北洋軍閥政府下警告。十月十日馮國璋繼任總統期滿，操縱在皖系軍閥手裏的安福系國會選舉了文治派的北洋軍閥領袖徐世昌爲總統，美國政府向中國的南北政府下勸告，叫中國各派領袖犧牲意見，速謀統一，日本看見這種情形，便也稍稍改變了一點積極援段的方針，於是南北和議的空氣驟增濃厚；十一月中旬歐戰宣告終止，中國南北政府也在這時下令停戰了，於是南北和議漸漸開始，一九一九年一月，歐洲各國議和於巴黎的時候，中國南北政府底代表也

陸續到上海來議和了。但中國人議和了一年多，終無結果，巴黎議和了數月，協約國相互分贖，却把幫助協約國的中國人底國家主權，分給日本了。這便是所謂山東問題。原來一九一七年英法已經密約，允將青島讓與日本，美國雖然不願，但日本以退出和會相要挾，和會便答應日本了。這消息傳到中國，全國沸騰，及隨中國段政府會在一九一八年落入日本圈套而將山東權利喪失的時候，全國愛國的知識份子對總督的賣國賊便痛恨入骨。五月四日北京學生集合三千餘人舉行大示威運動，向總統府請願，要求懲辦給日本政府拉皮條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為警察所阻，羣衆就擁至東城趙家樓焚燒曹汝霖住宅，毆打曹，陸等，同時組織演講團，四出宣傳，抵制日貨及焚燒日貨運動也隨之展開，接着天津，山東，山西，河南，江蘇，湖北各省人民相繼響應，上海學生，工人，商人亦罷課，罷工罷市援助北京學生，於是反日運動擴大全國，這外交問題，一變而擴大到要求外交公開及言議，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的一般解放運動了。這是中國市民底一種覺醒。「新青年」既然一向是進步思想的刊物，到此便成了領導五四運動的理論中樞，全國白話文的刊物也相繼出版，正如雨後春筍一般。

次於「新青年」的刊物，就要算「新潮」了。「新潮」底生命雖然不長，但在文學方面說，「新潮」上養成的作家，以數量論，比在「新青年」上養成的還要多些。如汪敬熙，羅家倫，俞平伯，葉紹鈞，歐陽予倩等都是從「新潮」上出來的作家。他們裏面也有一部分作家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這「新潮社」裏的人們，在以後的幾年中，也是進步力量的一個形成部分，如周作人等，在一九二六年以前，都還是反對章士釗整頓學風的進步人物。不過他們裏面，始終跟着時代前進的人不多，十分反動的也少，可以說，是只能保持舊生本色的一部分人。其次「少年中國」也是鼓吹新文化的一個重要刊物，這裏面的一部分是國家主義者，一部分如南漢等，後來轉移到共產主義方面或其他方面如文學研究會等去了。再次還有「星期評論」，「建設」，「解放與

改造」(後改名「改造」)等都是用白話文的刊物。日報副刊中著名的白話文刊物有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等，此外還有各地學生團體出版的無黨小報紙，都是全用白話的。次年，幾個持重的大雜誌如「東方雜誌」，「小說月報」，也都漸漸白話化了。從文藝方面說，那時的作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便是認為文藝是改革社會的武器，不是無所謂的。自然，在那樣熱烈的思想文化運動之中，還有誰敢說為藝術而藝術呢？中國文學上的現實主義，在那時已經植下很深的根了。了解中國文學的人都知道，五四時代的作家，是一直到後來都抱着為人生而藝術的態度，而這些作家中的代表的作家便是魯迅。

趁帝國主義忙於歐戰之際，中國民族資本得了獲弱的發展，帝國主義戰爭結束，再要回頭來壓迫中國的時候，中國所回答帝國主義的是這個普遍全國的解放運動。但因為中國市民到底沒有在帝國主義底血口中掙得獨立的可能，不能領導民族解放運動貫徹下去，而能領導民族解放運動的其他社會集團，此時又尚未成熟。所以在解放運動的意義上說，五四運動是流產的。但牠却具有了劃時代的思想運動的內容，同時由於中國市民遇見帝國主義立刻失去了自立性，隨後就有帶上那傳統的買辦意識，因而變節，就從這思想運動中向後退却。而勞動者却正在帝國主義，本國封建殘餘，本國買辦資本家三層壓迫下逐漸生長了，便成為五四思想運動的主要繼承人。所以這劃時代的思想運動，也就是中國歷史的分水線，五四思想運動成為中國思想界的分岔處。從此中國思想跟着中國歷史的轉進，走入一種空前所未有的鬥爭中去了。

「新青年」的兩個主要領導者，陳獨秀和胡適的分道而走，最具體地說明五四思想運動的分化。胡適從美國帶來的市民思想，跟着中國市民買辦性的加強，也漸漸帶上買辦色彩。陳獨秀則轉向共產主義，其他的「新青年」社中的份子也各有各具思想，「新青年」社內部的矛盾也聚隨着五四運動的展開而日益加深。

魯迅在五卅運動之先，除了「狂人日記」之外，還另寫了兩篇小說，一篇是三月寫成的「孔乙己」，一篇是四月寫成的「藥」。五卅運動極盛的期中，他沒有寫什麼文章，這是普通的現象，因為他對這巨大的民族解放運動是一定心神爲之神往的，他並且直接參加「新青年」社的編輯會，他底精神在五卅運動的中樞機關直接應響之下。所以我們是能够說，他確實被捲在五卅的狂濤中，在這狂濤的激盪之下，照普通的情形，要靜下來寫文章是一件難事。所以歷史的事變，總要到事變過去之後，才能較爲完美地被反映出來。不過魯迅同時又是個飽經世故的人，人心的離合，風雲的變幻，他這幾年來見得多了，所以雖在狂風暴雨中，他大約不致於衝動，他能够用鎮靜沈着的態度防止他底熱情濫用，他底生活是可以照舊的。雖然他是在高昂的潮流下與「新青年」的戰士們一道作戰，但他對拓本的搏鬥和研究並未中斷。不過那時候，他家庭裏起了點小事故。我們以前說過，他們周姓一族在紹興是合族而住在一個宅子裏的，各人雖然分得一部分房產，但房子是相互連通，不相分隔的。這種大宅子，在中國很多，大家不分畛域地住在一屋，倒也並不擁擠，但要將各自分得的一部分房子分割出來，屋子就不像屋子了；那時候，魯迅同族的人都很窮，大家都想將各自分得的一部分房產拿去出賣，可是單賣一部分，簡直等於只賣一隻屋角或半間屋子，不成其爲屋子，所以是沒有人承受的。要賣必需全族人同意，把整幢大屋一起賣掉，魯迅家裏的一部分，爲全屋中較好的一部分，尤其非共同出賣，沒有人要。於是族中人以生命的危念，迫魯迅家裏將分得的房產一起出賣，魯迅家裏沒有法子，只得答應把分得的一部分和族中人底一起賣掉。八月，將賣了這部分屋子所得的錢，由魯迅和周作人在北京的八道灣另外買了一間屋子，這件事算是告了個解決。到十月，魯迅寫了一篇關於家庭改革與子女解放的文章，題曰「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刊在「新青年」六卷六號上。關於這類家庭改革的意見，他在以前的「新青年」隨感錄二十五，四十，四十九中（收熱風中）也曾約略發表了一點過，現在算是再加以

很遠。「新青年」裏的論題這時候被家庭問題佔去許多篇幅了，解放子女的聲浪很高，魯迅底「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就是站在此種客觀情勢上的一個過去的發展。他這篇文章的寫法，和前一年的「我之節烈觀」一樣，是問答骨子的說明體，諄諄不倦，苦口相勸，文章的组织上比「我之節烈觀」雖然進步一籌，但魯迅正面的說明到底比不上他底側擊文章來得有力，就如這同一篇，前半部側重攻擊的，來的有力，後半部要積極的述敘自己底意見，則就有點瑣碎無力了。這是因為他對黑暗勢力的壞處知道得多而深，說起來有條有理。至於到底應該如何才能改變，為什麼非改變不可，為什麼應該如此這般改變，他底思考上的唯一武器是生物進化論，要做積極的說明是不夠用的。他底優秀的積極說明專理的文章，要在他得到辯證唯物論的思维方式之後。不過他在這時候，很願意做積極的說明。因為他正是集體鬥爭中的一份子，對於改造人類，這時頗為樂觀，還可能帶有說教者的勇氣。所以他作文的題目也以「做父親」來遷就保守者的意思。他是在他做游勇的時候，他一定覺他底特長用在發露方面了。而如果是在那樣的時候，運用他平日的深刻的觀察，他底文章就是「把尖利的匕首」。「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前半，有此種特色，攻擊中國的所謂「倫常」反乎人情，非常警敏有力，為這篇文章最出色之處。

✕✕✕，還有重新提起「徹底進行」一方面竭力攻擊，一方面將人親之間的關係加以正當的指示的必要。倘使再這樣來一次反對道德的運動，則這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便是我們底急先鋒，有使每個人重新讀一篇的必要。果然魯迅所反抗的一切舊東西，至今還幾乎那樣存在，所以魯迅底文章也幾乎篇篇都還如新寫的。這樣有現在與將來的生命，而這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却更有生命，因為近年來，連許多稱為進步青年的也常常以孝子自詡，或者默認孝的存在，以為無可厚非，實在是一件寒心的事。拿起十餘年前魯迅底這篇文章來看一看吧

應該羞恥的，進步在那裏！

在這篇文章裏，魯迅此後數年的思想中樞已經有得表露，那便是「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這個世界觀是立足在生物學的見解上的，但和鬥爭的辯證法，却已有了進一步的接近；他此後數年，都以對世界的究極不得而知，但相信「要溫飽，二要生存，三要發展」不錯的，這便是所謂保存生命，延續生命，發展生命的另一說法。他底所謂要溫飽，要生存，就是說要鬥爭，要發展一語，在這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裏還有個括弧，注明「就是進化」。到了後年，他就進一步解說為要改變，要流動，進步，甚至革命。所以我說和鬥爭的辯證法有進一步的接近就是這意思。加以他在日本的時候，本來早就知道歷史的進步是螺旋形的了，有了這些思想上的根底，他後來會「進一步，成為不協調的唯物主義者」是當然的。

魯迅寫「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的時期，中國政治上的所謂南北和議已經破滅，山東的利權也落入日本帝國主義手中了。西方各帝國主義為了恢復戰後的疲勞，加緊了對弱小民族的壓迫。在中國，英國爲了要抵抗日本黨歐戰中所擴展的在中國的影響力，一面以助中國謀統一爲美名，在外交上抵制日帝國主義操縱下的皖系北洋軍閥底北京政府；一面暗中與直系「洋軍閥」勾結，以實力對抗日帝國主義底皖系政府。五四的波紋潯在民間震盪，全國民心的昂奮還沒有停止，帝國主義底商品不但已經潮水般湧入中國，而且在商品後面帶來了軍火，到十一月，魯迅修繕了八道灣廢置的屋產，和周作人搬進去的時候，直皖兩系行將爭奪地盤的火藥氣已經很濃厚了。但帝國主義者們雖然各自努力勾結封建軍閥準備在中國火併，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這便是要中國從帝國主義宰割之下解放出來的中國民衆。五四運動正是一個反帝反封建，要解放中國的民族自覺運動。這對於無論那個帝國主義都是不利的。所以帝國主義雖然在中國準備了相互的火併，對他們底共同敵人却能够相互默契，一致唆使他們底走狗軍閥加緊了對中國革命民衆的

迫害。所以到了這年年底，五四運動的發祥地北京便高騰起殺氣，參加五四運動的許多戰鬥者都隨時有密探跟在背後了。「新青年」自然大受壓迫，而戰鬥力較弱的「新潮」中的同人便大抵都只好退走到外國留學去了。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準備火拼也正在加緊進行。

十二月魯迅請假暫時離開了北京那黑黯逐漸加厚，火藥氣逐漸加濃的環境，由津浦線回紹興去接他賣掉了屋子的家屬，到他謀食的北京來。他收拾了紹興舊屋內的一點家具和他底母親三弟一道回到北京，住入八道灣的屋子裏。他這次回鄉的情形，在他底小說「故鄉」裏給了我們一個詳細報告。他這樣描寫他坐船逼近故鄉時的冬天的情景說：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往外一看，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在他故鄉裏接待他的又是炎涼的世態和無情的爭奪。魯迅從北走到南，到久別的故鄉，所遇到的，仍不外是他幾十年來所常遇到的這個冷酷世界。他才到家不久，便遇到那些買木器的了。這是怎樣的買木器的人呢？他母親告訴他說：「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隨後，他就看見進來了一個楊二嫂，薄嘴唇，凸額骨的女人。她底年紀有五十上下了，她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的細腳圓規似的站在他面前說：

「不認識我了麼？我還抱過你咧！」

魯迅驚愕着半日答不上。她便又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的事……我——」魯迅惶恐地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闊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關哩。我煩實了這些，再去……」

「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關？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棋門便是八拾的大轎，還說不關？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魯迅無話可說，便默默站着，她就又說道：

「啊呀啊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匪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他母親底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魯迅自己的這些描寫，是非常美麗而刻骨的。原來這位楊二嫂是魯迅家門對面的一位開豆腐店的女人，魯迅小的时候曾看見過他瘦着滿面的白粉，終日塗着黃豆腐，有豆腐西施的稱號。她是自從魯迅家裏收拾行李準備搬往北京去以來，每日必到的。每到一回，大約一定要順便拿點東西，飛起小腳，很快的跑掉。

這種場面是令人不快的。

但更其使魯迅不快的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們還記得魯迅少年時，家裏一個長工底兒子麼？這人我們會說這，他是魯迅少年時代的一個小朋友。他曾經把那月夜下海邊守瓜的美麗的自然說給魯迅聽過，他曾經第一次帶魯迅到大自然的無限美麗的想像中去。這在魯迅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人在「故鄉」裏，魯迅稱他閩土，閩土幾乎是大自然的化身，他底名字，在魯迅看來是和許多自然間的美麗分不開的。但魯迅這次回家，當他再看見閩土時，他底想像中的美麗完全破滅了。閩土底手，經已不是他所記得的紅潤圓實的手了。他底手又粗又笨，而且裂開像松樹皮一樣，他底面也不是先前紫色的圓面，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了很深的皺紋了。但魯迅看見他的時候，仍然湧出了一連串的角難，跳魚兒，貝壳，燈……之類的自然界的東西在腦中轉動，他正說不出話來的時候，閩土却很嚴肅地開始了。

「老爺」

這是多麼冷酷的答覆！當魯迅問起閻土底景况的時候，閻土只是搖頭。他面上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彷彿覺得太苦，却又形容不出，只是沉默着，默默地吸烟，想着什麼地方都要錢，什麼都要捐，稱出來的東西要抽幾回捐，賣了還折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他總是不夠吃。

一切美麗的幻境變成許多許多生活的苦悶的皺紋了。魯迅這次從北京回到故鄉算是做了一次悲涼的巡禮。在北京等着他的是更殘酷的鬥爭，但那裏的殘酷卻不像故鄉的冷酷一樣可怕，那裏伴隨着殘酷鬥爭的還有廣大的青年們，魯迅底學生們以及朋友們底獻身真理的無我的溫情，這種溫情在期等他，當他再回到北京的時候，他又又要投身更大的悲哀與更大範圍的憤激中去了。我們看吧，中國人民要在帝國主義操縱的軍閥內戰之下過更慘苦的生活了。

「孔乙己」

「狂人日記」是用抒情的方式攻擊黑暗，「孔乙己」是從黑暗中描寫出一個人底形貌，前者是站在第一人稱的，作者注意力的集中點，是在舒寫出自己心目中的黑暗並予以攻擊；後者用第三人稱描寫主要對象「孔乙己」，作者雖然不能

不着重孔乙己底環境，但他底筆力有孔乙己作為集中點，其他的許多配景有此集中點，就很容易旋轉自如。實言之，這兩篇小說底藝術形式都很單純，嘗試起來，較為容易成功。所以「狂人日記」和「孔乙己」這兩篇小說在藝術上都很有聲譽。「藥」就免不了有毛病了，因為「藥」所描寫的範圍比「狂人日記」和「孔乙己」都廣闊些，小說中作為軸心的已不比前兩篇小說那麼單純。單說「藥」中的場面也比「狂人日記」和「孔乙己」多得多，所以在描寫上也比較困難得多，如果把「狂人日記」和「孔乙己」當作 *Sketch*，那麼「藥」就是不能不費心結構與布局的小

說。魯迅由「狂人日記」而寫「孔乙己」，就是從舒情的進而為描寫的之嘗試，進一步說，「孔乙己」是「狂人日記」中的那冷靜描寫的成分的提煉，與進一步的發展，而「藥」則是這種冷靜描寫手法企圖網羅廣大世界的進一步的嘗試。這就等如寫短篇小說的人，進一步嘗試長篇小說，所增加的困難，是遠比從「狂人日記」到「孔乙己」的困難多得多的，因此「藥」在藝術上帶有初寫小說的人所具有的通病：那便是概念的欠明快。原來我們不看到第三節，到底還是不能明確知道「藥」中所寫的是怎麼回事的，而「藥」共總不過四節，要看了一半有餘才明瞭這小說中的真實事象，則對讀者能積極吸引的，怕只有靠後半了，這樣，從藝術效果上說，這篇小說受了這種不明快性的損失是不能不算大的，因為以「藥」本身的優秀性為基礎，倘能使讀者早點明瞭內容，比方說殺人的事情也頂好是在第一節就點明，那這篇小說所收的效果一定要高好多。日本入底小說——要是說森鷗外底也可以——大都欠概念的明快，「藥」底主要手段是動作的描寫，然而却有點擺脫不了心理主義的影響。日本的作家，至今擺脫得了心理主義色彩的，為數寥寥，而俄國的安特列夫是有名的心理主義作家。應該直說說出來的地方，他倒要使我们猜一猜，這是現實主義的作家所該當避忌的。

在瑜兒的墳上憑空添上一個花園，是草率的迂就。他在「吶喊」自序裏說：「……但既然已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園……」但我堅決相信，那花園的來路之必須指明，是起馬可以免掉那種神秘性的，不過這麼一來，小說又得另加一番工夫布置，而還應該注意的是「藥」中的心理主義的影響對那種倘使猜不到花園的來源而可能產生的神秘性並沒有特別顧忌，所以這番工夫，自然省掉了。

讀者也許以為我吹毛求疵？因為在魯迅底天才的筆下，不管這些毛病，「藥」畢竟是一篇動人的傑作。魯迅對那冷酷的現實世界的認識，簡直駭人。在「狂人日記」裏他曾說：去年城裏殺了

犯人，還有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吃。」這事實就在「藥」中具體告訴我們了。但我們是再也沒有想到，那人類刻骨的冷酷，會也如此刻骨地照原照樣擺在我們眼前的。只要看這一段對話就好了：

「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剩下來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拿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掙叔運氣（賺來了血吃——凡海）；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紅眼睛原知他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榨不出一點油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指被殺者在牢中勸紅眼睛革命——凡海），便給他兩個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够他受用了。」

沒有一個人同情被殺者的，這分食人肉的自供，誰也不以為奇。原來這樣的事，在我們這人類中，早已司空見慣！倘使我們覺得「藥」陰冷，那是因為我們在實生活中面對着殘酷的同時，還伴隨着市儈式的自滿而覺得溫暖的緣故。現在，因為魯迅把這市儈式的自滿揭開，赤裸裸把那真實世界指給你看，你便覺得冷不可當麼？

「藥」裏人物的刻劃，也得到最好的成功。它和「孔乙己」之中的，為刻劃的筆觸，不但也和「狂人日記」一樣是奠定白話文的基石，而且到了現在，也有誰能趕上他底白話文筆。白話文學有了「狂人日記」，「孔乙己」和「藥」這三篇小說，前途不但不再能搖搖，而且以後的白話文學也上了頂好、榜樣在前了。

但「孔乙己」和「藥」就單只是冷雋刻劃麼？假如單這樣想，就一定是忘記了我們以前所說

的魯過子。這狂人日記裏的熱情，在「孔乙己」和「藥」裏是不過是更明白些潛藏到現實世界的冰塊底下去罷了。但那潛藏的熱情如今更加堅實，牠現在的使命，不再只是給你一種興奮，而是給你一種正確的指示。這所謂指示，既不是官樣文章，也不是歐幾式誇誇，而是革命家底理論。既是那麼無情，又是那麼熱烈。凡偉大的革命家與偉大的文學家，其貌一樣：他們底行動看起來那麼冷酷，無情，却隨時準備爲真理，爲愛人類而粉身碎骨。

狂人，孔乙己，是人類底沈淪，尤其是孔乙己，簡直是將來的阿Q的伏線。他「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他生是人類取笑奚落的材料，死了便誰也記不著。但在魯迅底筆下，我們知道魯迅底同情是坐在孔乙己這邊的。孔乙己是個無害而純真的人物。他之所以不能在社會立足，只因爲他不能進學，不會營生，好喝酒，懶做事，有時不免偷入一點小東西，除此之外，他對旁人，對社會確實沒有什麼大害處，所以我們看得出來，就是那些在酒店裏奚落他的短衣幫，對他也並沒有什麼惡意，甚至酒店老板對孔乙己欠的十九個錢也並沒有表示什麼懷恨。至於小孩子們呢，他們因爲還沒有走入社會的勢利中，接人待物，除了跟大人底榜樣之外，還能保留赤子的純真，所以對孔乙己已是很能看得出一種無形的親切的，這反過來，襯映在孔乙己對那些不講利害的孩子們的懇切態度上，使我們感覺孔乙己的可愛，而小孩們也願意接他給的茴香豆吃，即使小孩們也笑他吧，即使「孔乙己」中的第一人稱，即那十二歲的學徒也似乎看不起他吧，但那完全是學大人底榜樣，在魯迅筆下，這些天真的小天使永遠是他裏心的代言人，有如在「懷舊」中所寫的天真小孩一樣，在這「孔乙己」裏，這些小天使正是代表魯迅底心誠出場對孔乙己已傳達魯迅底脈脈同情的。但無害而可憐的孔乙己却不幸觸犯了地方上的權貴了舉人虞私產，他偷到了丁舉人家，那完全出他意料之外，想回鄉他的就不再是普通農民底靠他的黃了。怎麼樣？先寫服藥，後來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藥」裏的犧牲者是踐踏在人類

脚下的青年革命家，有人分析「藥」就是以秋瑾殉難為題材的，「瑜兒姓夏」就是秋瑾這名字的簡稱。我想：無論此事是否屬實，「藥」裏面儘儘摻雜了辛亥革命運動的某一斷面，是毫無疑問的。這事在魯迅毫無足奇，只不過是在翻過第廿冊小說裏就已顯示了的魯迅那為社會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底當然取材方法之一。『藥』裏對這標題的擲詞，比越『懷舊』却又逼近一步。『懷舊』中的社會還只是口傳革命，談虛色變，而『藥』中的社會却已經照入革命者底血光中去，露出各自底血淋淋的面目了。不過『藥』裏也並沒有正面描寫辛亥革命前的革命運動，其主要點，也僅止於革命者底血光中照出來的封建思想支配下的血淋淋的社會底勢利面目。瑜兒他以身殉國，僅有的身上一件衣服，頸頸子裏流出的注血也不免被人類拿去分肥。作者底憤怒只是太深沈，然而是很明顯的。他所著的，僅不過是沒有像在『狂天日記』中一樣呼喊出來，而是感到發冷的罷了。

我們還記得吧，魯迅自己是在塗落壓迫與命運中長大的。

『孔乙己』和『藥』內描寫人物的逼真，比『懷舊』有過之無不及。孔乙己和咸亨酒店裏的那班人物自是不必說，沒有一個不是活靈活現的中國人，而尤其令人心服，是魯迅描寫『藥』裏瑜兒底母親，卽夏媽奶奶清明日到瑜兒墳上去的時候，看見瑜兒墳旁，別人墳前有人，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憤的顏色，但終於硬着頭，走到左邊的一座墳前，放下了籃子。』她為什麼躊躇？為什麼羞憤？因為她底兒子是犯死罪死子的，她並不知道她底兒子的死是爲了什麼，她當然更不知道她底兒子爲國而死的價值，她只知道犯死罪是可恥的，所以她怕別人知道她是死刑犯底母親。這種對世俗與法律的盲目屈從，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民做了數千年奴隸所養成的服從性；中華民族做了數千年奴隸所帶的這種痕迹，是千數無幾的許多作家都囿於所謂積極性的強調而不敢正視的。可是魯迅早在民國八年就能把這種道地的中國性表現在他小說中的人身上。

上了。總不會有人說，現在的中國人已經沒有這種根性，所以現在的文藝作品中也就找不到這種人了吧？說這種話的，除非是沒有到過中國的人。中國能有這麼一日，中國就得救了。

最後我這裏應該不要忘記，魯迅和咸亨酒店在「孔乙己」裏已經出現了。這個魯鎮和咸亨酒店是他以後的小說中常常出現的。魯迅小說中的農村背景，和他底外家有割不斷的血緣。我們前面第一和第二節裏不是說過魯迅小的時候每年都要跟他母親到他外祖母家裏去玩麼，他底外祖家是在鄉裏，外祖母又很愛他，他在那鄉間的美好風景裏和鄉村孩子們爲伍，我還會指明過，魯迅在他外祖家和大自然接觸，在那時候，是百草園之外，魯迅底另一個樂園，這樂園要在他以後的創作中放出令人神往的光彩。現在，我們在「孔乙己」裏就找到證據了。「孔乙己」裏的鄉村背景，如其說是魯迅到外家去吸收來的營養，或者還不如更正確些說是魯迅寄食在舅父家裏的時候吸收來的營養適當些吧？但這只是指的此種營養的主要根原，從全體說，魯迅當然是魯迅所熟識的農村加上小市鎮的滲合物。我們以後還有機會遇見這種滲合物的。它總是強烈地使我們想起魯迅底童年時代。童年生活對於一個人印象的深，以及它在一個人的底數十年生命中有着這麼深刻的意義，真是令我們吃驚。

封建軍閥聽命帝國主義步步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對五四遺留下來的文化思想運動進攻的結果，「新青年」終於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在北京出終刊號，移到當時政治環境較好的廣州去出版了。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剝削，盡力在中國爭奪勢力範圍，各帝國主義者相持不下，經過了半年餘的醞釀之後，中國的軍閥內戰，也終於在這年七月第二次開打了。這便是英、日、帝國主義所指的直皖戰爭。當時的直系在外表上很有點得民心的樣子，因爲北京政府一直來幾乎全在皖系操縱之下，北京政府底一切禍國殃民的業績，幾乎都出於皖系軍閥之手，而最近

又簽訂了投日賣國的借款，國民極力反對的參戰軍，段氏也還是另外換了定國軍的名義，不肯取消，人民已經十分憤慨，這回直皖大戰，數日之內，皖系不但一敗塗地，參戰軍所變相的定國軍也全軍覆沒，人心背離，實乃與有力焉。

不過直系軍閥終究是軍閥，他們底勝利，對百姓大約只有害處沒有好處：魯迅在「華蓋集續編」中「無花的蔷薇之三」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開手；八月，皖軍潰滅，徐樹錚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館。這時邊點綴着一些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現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說直派武人，請他殺戮改革論者了，……試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報，還可以看見一個大廣告，裏面是什麼大英雄得勝之後，必須廓清邪說，誅戮異端等類古色古香的名言。」

魯迅是能够做我們底證人的。看了這說話，這場戰爭後是怎麼一種烏烟瘴氣，更使我們知道得具體些。原~~來~~那些溫和派，守舊的紳士，復古派的政客，從前在政治上活動，雖然也無非是逢迎於權貴之門，但總還有政團的形式，還免不了要一張叫得出聲的招牌，行動還有點集體性，發出政治的言論就也不能不受集體監視，受招牌拘束，要顧點廉恥。可是近數年來，南方護法政府，徒為西南軍閥把持，護法只不過是個美名，政客們底動聽言辭，人民早不相信了，因此政團一類的活動也根本不能替軍閥編輿望，政黨式的招牌便漸漸破產，到了這一年，直皖戰爭爆發，皖系軍閥極力拉攏西南軍閥，並密向中山先生輸誠，中山爲了要打倒桂系軍閥，得廣東爲根據地，也虛與段祺瑞底密使委蛇；那時陳炯明還是中山底同志，皖系軍閥在北方戰敗，段祺瑞對西南的勾結便沒有發生實效，而閩方的皖系軍人李厚基倒和陳炯明底粵軍成立了協定，以軍餉助粵軍收回閩南了；粵軍於九月八日再由閩南進兵粵，桂系軍閥便跟在皖系之後被破於中山底粵軍；桂軍失敗，所謂護法的軍政府也坍台，於是連政客們所恃的動聽招牌也被打破，中國此後的政

治清勢，便一天天向兩個對極轉進：一面是暗無天日的許多軍閥相互混戰，一面是不再走護法的路。謀從實力上剪除封建軍閥的革命民衆，這麼一來，政客們所恃以欺騙民衆的外衣也穿不住了，久失民衆信仰的政團外形，也漸漸沒有了。從此之後，除了正在進化中醞釀改組以代表革命民衆的國民黨××之外，其餘的政團則一概讓他們底政客各自去獵官附勢，作爲小走狗逢迎挑撥於軍閥底野心之間，寡廉鮮恥，一切卑鄙醜態都應有盡有了。接着，直皖戰爭之後的奉直戰爭，雖然一面照例有帝國主義作爲背景，但要舉例，則交通系政客的挑撥正是一件隨手拈得到的事實。

這樣看來，魯迅以上的一段話，不是一個時代的小照麼？此後數年，中國歷史的黑暗內幕正是這樣。我們堅信不疑，魯迅雖然照舊還是從教育部回來就在家裏研究金石拓本和翻譯『一個青年的夢』，『工人綏惠略夫』等，然而跟着中國社會，歷史呼吸而呼吸的他，却正是生活在中國人之中的一個中國人底觸角。

一九二〇年魯迅的作
品及新文學之成長

武者小路實篤底『一個青年的夢』，一月裏（一九二〇）就譯成了，阿爾志跋綏夫底『工人綏惠略夫』十月才譯成。前者出版於一九二二年，後者出版於一九二一年，起初兩者都是文學研究會的叢書，後來又改爲未名叢刊。他在這年（一九二〇）還寫了兩篇小說，兩篇散文。這就是六月寫的『明天』，十月寫的『風波』，和七月寫的『一件小事』，十月寫的『頭髮故事』。這些優秀的作品，助成了『文學革命』的建設，也大大提高了他個人底聲譽。所以這年秋季之後，他便被聘爲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講師了。這之後，他個人底生活可以說比從前好點起來，而且他有了聲譽，地位也不怕不穩固了。照許多往上爬者底公例，此後他正可以掉個面開輛車，把從前的話

忘記乾淨。可是魯迅並不，在鬥爭的一面，他作為中國民族的戰士，此後反而愈戰愈烈，實在是許多有了小地位便忘其所以然的聰明青年所趕不上的。

前酒講到文學研究會。這裏應該提起的，是「新青年」自從移到廣州出版之後，內容便主要的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文章了。「新青年」所提倡的文學革命，經過五四運動，聲浪已經波及全國；起初是給古文及鴛鴦蝴蝶派的卿卿我我以猛烈的攻擊，喚起了青年對新文學的興趣，在中國這塊「古色古香」的土地上，極力想開闢一片荒地。接着是產生了「狂人日記」，「孔乙己」這類光輝燦爛的結果，增加了青年底信心，和舊文學成了毫無愧色的對敵，於是創作新文學的青年接踵而起，新文學作品也前後出版。國外資本主義各國的文學作品及文學思想，也源源輸入。這就促成了一九二〇年文學研究會的成立。發起人是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朱希祖，瞿世英，蔣百里，孫伏園，耿濟之，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等，會員網羅五四以來幾乎是所有新文學的作者與介紹譯述者，達二三百人，得商務印書館之贊助，改組小說月報。由文學研究會主編，並在各地日報附設週刊，旬刊，刊佈新文學作品，攻擊禮拜六派等代表封建意識的文藝，介紹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安特列夫，易卜生，莫泊桑等俄，法，北歐諸國的作家，並介紹被壓迫民族的文學，鼓吹為人生的藝術，標示為實主義，着重暴露黑暗，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巨大的純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成立的同年，日本留學生郭沫若，張資平，郁達夫，成仿吾等組織創造社，亦為中國新文學史上與文學研究會分庭抗禮的純文學團體。唯創造社雖於一九二〇年成立，却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創造日」等刊物，大形活躍。那時文學研究會的工作，在中國已有相當影響，故「創造季刊」一出版即與文學研究會斷文壇，對文學研究會取挑戰態度。他們底文學主張，與文學研究會相反，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主張唯美主義，反對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藝術，反對寫實主義，主張浪漫主義與自我表現。這兩種相

反的文學傾向，其實都是五四運動的狂潮過去之後，帝國主義重來宰割中國，而軍閥內鬪，官僚誤國之情形，比之往日，有過之無不及，於是代表這一種殖民地與封建意識的歐美紳士派及禮拜六派等也對五四新文學運動所遺下的果實加緊進攻，面對着這黑暗的現實，與民族解放的苦悶，於是文學研究會的寫實主義，主張暴露黑暗，表示對現狀不滿，從人道主義的立場來訴苦，進而介紹各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作家與弱小民族文學，以為聲援；同時有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帶着感傷主義的調子，發出熱烈的反抗之聲。這兩者底模樣雖各殊異，而在本質上，其實都是代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壓榨下的中華民族底資本主義性苦痛的。由於中國市民沒有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因此，反映到這兩種文學上，也只是對現狀不滿，想反抗，然而是不堅定的，是感傷的；想暴露黑暗，然而不是徬徨，猶豫的。可是這裏必須指明，日後中國勞動者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所謂革命文學，是以創造社為始導的。文學研究會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直接繼承者，所以它集合了五四文學革命的大成，而創造社則是以強烈的輸入形式來接受不能遂其自然生長的中國市民底命運。從這種命運的自拔，創造社以注射強心劑的性質始倡了革命文學，這是創造社的功績。而文學研究會，則組織渙散，沒有強烈的集中活動，只是文學研究會所代表的文藝思潮，在中國文學的範圍內，是以比較健全的自然發展性向革命文學推移的。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兩者最後只以集中於一點，所以從文學的發展上來說，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所走的路雖不同，但其歸趨則同為革命的現實主義，而作為這歸趨的集中的形象是魯迅先生。

「頭髮的故事」
與「一件小事」

「頭髮的故事」和「一件小事」，特別是「頭髮的故事」，我把它歸到散文小品一類去。這篇「頭髮的故事」，實際是用一種近於獨白的對話體述出一個人底感想。對於頭髮，我們早知魯迅是有一些特別的關係的。

「頭髮的故事」中的N，實際是他自己。經過清末民初的人，大約都要受一些頭髮的災難，魯迅最早就感覺頭髮的不便，一到日本就剪了頭髮，親眼見了許多人爲頭髮而吃苦，又聽了許多剪辮留辮的從前的故事，後來回國又親自領受了沒辮髮的苦痛，發到頭髮的問題，他總不免感慨系之。張勳復辟時要留辮子，在他也是無可再忍的達於頂點反動，所以他便決然辭了教育部的職。這回是寄住在他寓裏的一位小姐考進了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因爲沒有辮子，不能梳盤髮髻或鬢，竟不能入校，他見了民國成立已九年的北京還是這種情形，便很憤懣，隨手寫了這篇「頭髮的故事」。「一件小事」中所記載的是民國六年冬天的事。那時候張勳復辟之亂已平，宰制北京政府的仍舊是北洋軍閥和一些無恥的政客官僚，這件「小事」是正當魯迅在這時候過着鈔拓本的生活，中飽太魯迅腦子裏的。真理決不是勞苦大眾自私的偏見，牠常常用鐵一般的事實啓示我們。我們倘使相信這一事變化到那一事，不是有絕對的鴻溝的，那麼，魯迅以後之所以成爲勞苦大眾底不二的忠將，民國六年冬天的這「一件小事」上實在就有根源了；或者說得合適些，這「一件小事」不過是最具體的印象，被魯迅捕捉到，並且記載給我們看，讓我們知道，以爲是他日後的思想底根源罷了；實際上，不具體，不完全，不清晰的，局部的，不湯不下把捉到然而無形中啓示他將來的途徑的，那一天，那一處沒看，再說進一步，他其後的最終思想之所以能够取得最進步的內容，是完全依靠於這一進步思想內容所根據的客觀事實的不斷啓示，才使魯迅達於這一結論的。這是魯迅底思想發展的基本形體。他走他自己底獨特的路子，達到和我們一樣的目的地。他這獨特的路子，和他底現實主義的精神，正是互爲裏表的。我們不否認他從書本中得到思想，但我却更看重他底思想先從現實生活中，從事實的觀察與對惡勢力的鬥爭經驗中早已發軔了。他底思想變化的主要過程是和實際的鬥爭生活合成一體的，他底思想完全滲透在他底生活裏，而書本只不過在他底思想變化過程中，助他組織，助他達於體系之完整，助他達於完全的認識而確信不

疑罷了。這篇『一件小事』就是他底獨特的思想變化方式的一個明明白白的自述。他，魯迅，在民國六年，也許在民國六年以前，原來零觀的存在就已作用於他底腦子而使他在抄古碑的生活中另有所思了。但這所謂『另有所思』的『思』，正因為是模糊而不明確的，正因為是或隱或顯而未必可靠的，所以沒有立刻改變他抄古碑的生活。由生活以達於認識，其外表往往是這樣的。

『一件小事』，實在說，是簡勁而有寓意的素寫，是一篇結構美麗的象徵詩。

爲什麼我要說這篇『頭髮的故事』中的N就是魯迅自己呢？因為從這篇『頭髮的故事』裏，從N身上，我們看見了魯迅自己。第一，N所說的因頭髮而受苦的歷史主要的是魯迅自己底歷史，比方『我出去留學，便剪掉了辮子，這並沒有別的奧妙，只爲他太不便罷了。不料有幾位辮子盤在頭頂上的同學便很厭惡我，監督也大怒，說要停了我底官費，送回中國去。』

『……我一到上海，便買定一條假辮子，那時是二元的市價，帶着回家。我的母親倒也不說什麼，然而旁人一見面，便都首先研究這辮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聲冷笑，將我擬爲殺頭的罪名；有一位本家還預備去告官……』

又如『宣統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學做監學，同事是避之惟恐不遑，官僚是防之惟恐不嚴，我終日如坐在冷簞子裏，如站在刑場旁邊，其實並非別的，只因爲缺少了一條辮子。』這完全是魯迅自己底歷史，是毫無疑問的。

可是我也並不是說，全部都是魯迅自己底歷史，我只敢說，主要的是魯迅自己底歷史，我們看下面這一段吧：

『在這日暮途窮的時候，我的手裏才添出一支手杖來，拼命的打了幾回，他們漸漸的不罵了。只是走到沒有打過的地方還是罵。』

『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還時時記得哩。我在留學的時候，曾經看見日報上登載一個游歷

南洋和中國的學本博士的事；這拉博士是不懂中國和馬來語的，人問他，你不懂話，怎麼走露呢？他拿起手杖來說，這便是他們的話，他們都懂！我因此氣憤了好幾天，誰知道我竟不知不覺的自己也懂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像這樣的事實，在魯迅沒有出國以前，當他在南京積習的時候，由於他的少年盛氣，像他為人打不平或騎馬去向旅人示威一樣，他或許也可能帶手杖打人。可是他說的是在以後從日本回國以後，頭上沒有辮子的時候的事情，在這樣的時候，假如說這位N就是魯迅，我是有點不太敢相信的。因為那時候的魯迅世故已經相當深，他雖然不必少年老成，但也未見得能這樣盛氣凌人，不在中國人看起來是出乎常軌的行動，這種行動之能否在中國人面前得到勝利，像那位多本博士所說，（能否在馬來人面前得勝我不知道。）我看是未必的。魯迅留學歸國之後，既已有相當深的世故，那麼以他底戰鬥精神及他歸國之後正在煎煉中的現實主義精神，他是決不會採取這樣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的。N底這段自敘，我毋甯信以為是魯迅借N底口敘述自己底憤慨，正如同我前面所說的鞭打主義一樣，這自然並不是推行新文學的真正方法，是不必信以為真的。大凡真心有意於革新，進步的人，或者都不免有這種感覺，就是對這班守舊的冥頑不靈的人，真有無從迴避之苦，他們底頭腦彷彿全是石灰質了，正如教一個呆學生，有時真低不得想打一個巴掌過去，不過平心一想，打當然不會增加一個人底聰明，不能算是靈方。

第二，從N底說話姿態裏，我們也看得見魯迅自己。魯迅描寫N說：

「N忽然現出笑容，伸手在自己頭上一摸，高聲說：『我得意的是自從第一個雙十節以後，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罵了。』」這正是魯迅自己得意時候說話的姿態，像他在「病後雜談之餘」及「因太炎先生前想起的二三事」中所說的，我們前面在第六節裏已經說過了。

第三，從N底思想方式與憤慨裏，也很明顯的看得見魯迅自己底思想方式與憤慨。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明。首先是他的思想方式：

「我們的很古的古人，對於頭髮似乎也還看輕。據刑法看來，最要緊的自然不是腦袋，所以大辟是去頭；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宮刑和幽閉也是一件嚇人的罰；至於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來，正不知會有多少人們因為光着頭皮便被社會踐踏了一生世。」

「我們講革命的時候，大談什麼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實也不過一種手段；老實說：那時中國人的反抗，何嘗因為亡國，只是因為扼辮子。」

大概研究魯迅的人，誰都知道，魯迅底雜感文中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他對歷史的熟習和歷史材料的靈活運用。這篇文章裏，N口中所表現的這段話，正是魯迅底雜感文中的這種特徵。雖然能靈活運用歷史材料的並非魯迅一人，但配合着其他各點證據，這點證明便更旁證了其他各點的確實性了，而且從這裏，我們認識了魯迅底短文原來有這樣一個特徵，而這特徵，在這篇文章裏，已經就露頭角了。

其次從他底憤慨方面說。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底憤慨是一向和他底苦痛密相聯繫的。北洋軍閥統治下的黑暗的北京，使他底憤慨常常不能不溢於言表，而中國的舊勢力，自從戊戌政變以來，革新多少年，仍然安如山，大有礙難動搖之概，魯迅在這種動黑暗的壓力之下，雖說是憤懣，也就和蒼涼的悲痛分不開了。於是，在他這篇充滿憤慨的文章裏，他照例運用他那麻醉自己底方法了。但他在這裏所運用的麻醉方法，並不是抄古碑，這是一個特別的方法，而這方法，深刻地表現了他憤世的痛苦，而且這是他自己底獨特的方法，這方法在他不幸的一生遭遇中，他是一直到老都運用着，藉以從痛苦中解脫，再度抖擻精神以與敵人搏鬥的。這是什麼方法呢？說出來簡單得很，就是「忘却」。他要忘却他底痛苦。從這裏可以知道他底感受性的強烈，他底痛苦之大，之深刻，是遠非常人可比的。但他為什麼還能生存，還能和舊勢力戰鬥呢？就是這方法救了他。他是不願意讓敵人輕易勝利的，他不願死在痛苦中而要用「忘却」來從痛苦逃脫，以

便與敵人繼續戰鬥，他底戰鬥方法的強悍，從此可以想見。

但我們從他底文章裏看見他告訴我們運用「忘却」這個戰術，這還是第一次。他底憤懣之尖銳，可從N口中說的以下這段話中看出來：

「……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底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裏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縱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裏去了。——他們都在社會的冷笑惡罵迫害傾陷裏過了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却裏漸漸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紀念這些事。」

所以他說：

「……好在明天便不是雙十節，我們就可以忘却了。」

中國歷史的轉進，塗滿着殷紅的血腥，魯迅是這些血腥，這些野蠻的見證人。希望改革的人在書上寫着什麼手杖打人啦，鞭打啦等等，實在都是小孩子做鬼臉，而守舊的歷史倒車，却已在暗暗轉動把許多青年底性命要去了。我抄到這篇「頭髮的故事」裏的這些話，不覺想起十餘年後魯迅所寫的「爲了忘却的紀念」，真似乎這相隔十餘年的兩篇文章是在同一天寫成的一般。他努力要忘却這悲愴的歷史，而歷史偏在他面前重復扮演着血腥的黑暗故事，使他不能忘却。他就這樣戰鬥着，在忘却中祇乾他傷疤上的血痕再去戰鬥，我們以後會看到他這種精神一貫的發展。現在我們找到他用「忘却」來逃脫痛苦的這種戰鬥精神在文字上最初的表現了。

「明天」和「風波」

如果說魯迅在一九一八年寫的「狂人日記」和一九一九年寫的「孔乙己」所取的題材還有點特別，有的人會覺得那是不太容易遇見的事，那麼

，他在一九二〇年所寫的「明天」裏演的題材，就是平凡中最平凡的事象，只要不是高官太吏，是任誰都能常常遇得見的事象了。

同樣的，如果說魯迅從「狂人日記」到「孔乙己」，然後進到「藥」，像我們以前所說的，因為「藥」是魯迅底冷靜描寫手法企圖網羅廣大世界的進一步的嘗試，還不免帶有概念欠明快，在布局上結構上次純熟的毛病，那麼，他在一九二〇年所寫的「風波」，就已經把「藥」中的毛病完全克復過來了。作者已經能够很圓熟地把握他底對象，把他底人物與景場巧妙地配合得天衣無縫，成爲一個完整體了。

無疑的「明天」和「風波」都證明魯迅在創作上的進一步的發展。「明天」和「風波」的思想內容，不消說是「狂人日記」「孔乙己」和「藥」的繼續，但無疑的，「明天」和「風波」比起「藥」更冷靜得多了。「明天」和「風波」裏的魯迅底憤激和同情完全取着一種更潛藏的性質。在「明天」裏，單四嫂子像「藥」中的瑜兒，孔乙己等一樣是犧牲者。如果金錢是巴爾扎克底人間喜劇底無言的主人公的話，那麼在魯迅底作品裏，金錢這東西也往往是無言的要角之一。「藥」裏的老栓是一出場就到枕頭下去掏錢包的，那一幕把瑜兒底最後一滴血也分肥了的駭人的人間惡劇，也是以金錢爲分肥者底具體利益的。孔乙己也是爲金錢犧牲。不過魯迅底小說裏的金錢不像巴爾扎克小說中的金錢一樣閃亮奪目，而是更直接地帶着凍方式的落後的殘酷性，以血肉模糊的本來面目來出現罷了。「藥」裏底分肥者不是坐在清潔美麗的賬桌旁邊寫着血腥似乎不再聞得出的數目字，却是拿着原始的人類所用的殺人武器去對犧牲者底肉體直接下手。這是一種鮮血淋漓的榨取的本來面目，是在落後的殖民地普遍存在的資本蓄積的原始形態，魯迅筆下的金錢，就常常是取着這種血肉模糊，鮮血淋漓的形態的。「明天」裏的單四嫂子被榨取的情況，也是以這種落後的原始形態出現的。分肥的大部分人都取着趁火打劫的行徑向單四嫂子進攻，而這種趁火

打劫的行徑之所以可能，是要以單四嫂子底兒子死亡爲前提的。當單四嫂子的兒子死亡了之後，來替她料理喪葬的事務的人就很多了。他們都爲的是要來她家裏好吃一頓飯回去，如果單四嫂家裏沒有錢備飯的話，他們就替單四嫂子借錢，把單四嫂子的家裏的櫥子和衣服拿去作抵。這種公開的劫掠，因爲在習俗上完全是允許的，所以他們一絲也不放鬆。他們喊着要還要那，裝着一些很慈悲的面孔，考究又考究，推敲又推敲她有沒有把小孩子的葬事弄得十全十美，好叫她拿出最後的金錢來唸經，燒紙錢，算是爲她的兒子盡責，他們就可從中榨取了。她僅有的銀耳環和裏金的銀簪也終於交出來，拿去半現半賒的買一具棺材。是在單四嫂子的家裏動過一下手，開過一下口的都吃了飯，然後才懶洋洋的回家去。當單四嫂子被榨乾了，只剩下一個人守着空屋子，感到兒子死了異常空寂的時候，他們是够心滿意足的了。

×××

×××

在「風波」裏，對金錢雖然沒有正面的描寫，但我們也能看得出，魯迅在他創作的時候，是怎樣地沒有忽視社會經濟情況。魯迅輕輕地把七斤補盪所用的金錢數目一提，我們就很容易地了解當時的社會經濟情況了。而趙七爺在那鄉鎮中的地位，七斤嫂和村裏的人們對七斤態度的變化，都能够告訴我們，「風波」中的社會是一個什麼社會，在這社會裏的人們對人們的關係，及他們對一個人評斷的標準，是夾雜有相當多的封建成分在裏面的，就是說，他們之間的關係，這人的關係，如果說在「風波」中表現成爲一種「勢利」的話，那麼這種「勢利」的大小，是以你底家財和功名（封建榮譽）的混合物爲前提的。此類社會經濟情況的重視，是魯迅底作品底特色之一。

「明天」和「風波」跟魯迅過去的作品一樣，刻骨地描寫出中國社會中舊勢力的作惡。「明天」中，大家對犧牲者單四嫂子的趁火打劫，我們已說過了。可是他們並不止於此，舊社會的惡勢力在魯迅底筆下是無惡不做的。當單四嫂子抱着垂死的兒子正坐在床沿上担憂的時候，隔壁的

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却在那裏想她的心思，拿她尋開心。第二天單四嫂子抱着孩子去診過病回來的時候，藍皮阿五路過單四嫂子，要代單四嫂子抱孩子，單四嫂子知道他不懷好意，但推諱不開，而藍皮阿五的目的却不是想從單四嫂子的乳房與孩子之間，把手直伸下去，他何嘗真心同情單四嫂子呢？所以他達到目的之後的抱孩子，對他是不感覺任何真正興味的，他抱着走不多時，便又托故不抱了。這位藍皮阿五，雖然也是一個普通的農民，雖然我們不能斷定他本人是否代表一定的舊勢力，但我們却在藍皮阿五身上找得到中國舊傳統底無賴思想與行徑，他處於鄉村中的較低地位，但他底思想與行動却學着上流社會士君子的無賴。對單四嫂子的藍皮阿五的無聊與冷酷，如果不是藍皮阿五底責任，那起碼是中國士君子們底罪惡。這種罪惡，在「明天」裏，現在是借藍皮阿五以人格化的。

我最愛的是下面一段對話：

「先生——我家的寶兒什麼病呀？」

「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麼？他……」

「先去吃兩帖。」

「他喘不過氣來，鼻翅子都扇着呢。」

「這是火尅金……」

單四嫂子還想問下去，但醫生說了上面這半句話便閉上眼睛，單四嫂子也不好再問了。

犧牲者如果是病人，醫生是少不了也有一刀肥好分的。這，半點疑問也沒有。醫生直到現在，一直參加着分肥的一份。不過那時的單四嫂子還不能親破醫生底這把看不見的刀，她還是全心靈相信醫生，雖是自己伸頭去給醫生宰割，還自以為是有活命罷了。把醫生底這把刀子用幾個字

表現得一清二楚的是上面那段對話。對話裏只用這麼簡單的幾個字，就把中國醫生底面貌勾畫得這樣活靈活現，我們不能不驚倒於魯迅觀察中國醫生的深刻。關於這一點，只要我們想起魯迅在少年時代，因父親生病而受中國醫生的一切痛苦，我們就知道它底來歷了。

單四嫂子是在這多方面的刀俎之下做犧牲的。榨取單四嫂子的並不是那幾個人，而是整個舊社會的惡勢力從四面八方來下手的。「藥」中如此，「孔乙己」中如此，「狂人日記」中更是如此。我們已經說過，魯迅對舊社會的惡勢力是當作一個相互聯合的社會集團來理解的，這種精神，一貫地強烈地浸透在魯迅底小說中，把魯迅底小說燒作灰，這種精神都是存在的。

不消說，「風波」裏也貫徹了這種精神。舊勢力的作惡，在「風波」裏，是借趙七爺以人格化的。這位趙七爺底面目就是張勳復辟當時的鄉下舊權貴底面目。魯迅在「風波」中所寫的是張勳復辟在鄉村中的反映。這位復辟派的趙七爺在魯迅筆下是有點被漫畫化了的，他完全是一個殘酷而空虛的無賴。我們對於魯迅底這種漫畫化趙七爺，毫不主張非難，而是認為十分正當的。如果你只看見過道貌儼然的鄉村權貴，那是因爲你只看見了他們一個外貌，你還沒有窺見他底靈魂的緣故。趙七爺是他底靈魂的人格化。他底靈魂是確確實實像趙七爺一樣醜惡的。趙七爺就是「明天」中的藍皮阿五和「孔乙己」中的丁舉人兩種舊社會精神的統一體。現在，藍皮阿五的無賴和丁舉人的殘酷都集中在趙七爺一人身上，一看似乎把趙七爺太描寫得過火了，其實，趙七爺底精神，就是在今日的許多士紳中都還是根深蒂固的。趙七爺才真是張勳復辟時代的典例鄉鎮權貴，遺老。這些權貴與遺老們底精神，在魯迅以往的小說中曾部分地存在過，沒有成爲一個明顯的性格，到了今天，在「風波」裏，我們看見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把魯迅以往的小說中所會部分地存在過的那些鄉鎮權貴底精神具現於一身了。

在「風波」裏被欺凌的，現在不是某幾個人物，而是多數無知的農民了。他們被欺凌的情形

，在魯迅筆下是非常具體的。因為那時的農民，就是現在吧，他們對社會上的各種事象，還不能
 在原則上有什麼一致的見解，相反的，他們被舊社會的惡勢力利用或操縱，受封建思想的毒，完
 全在勢利的支配下。所以他們就變成一些勢利代表者，鄉鎮權貴們所操縱，所威脅，所欺騙的
 可憐蟲。當七斤嫂聽見趙七爺弄災樂禍地說皇帝坐龍庭，七斤沒有辮子的危險時，她也叫七斤「
 囚徒」，並且再也對七斤沒有好聲氣了。村人也一樣迴避七斤，不再像從前一樣尊敬七斤，來聽
 七斤底新聞了。七斤沒有辮子的危險，是沒有任何人同情的，甚至他底老妻也如此勢利，一直到
 後來證明了皇帝沒有坐龍庭，七斤嫂和村人才又給七斤相當的尊敬。這種在世俗支配下，被勢利
 所欺凌的農民是如何可憐！他們自己是被欺凌者，但他們底思想與行為却完全是欺凌者底思想與
 行為。他們是可憐的，但他們又這樣愚蠢。阿Q底生命是這樣地一直在胚胎着的。但在「風波」
 裏，我們特別看得出被欺凌者底精神是怎樣厲害的受世俗的勢利，受封建的一切中國士紳底思想
 所控制。

「明天」和「風波」是魯迅在創作上的進一步的發展。我們前面說過，他已經能够復舊地
 把握對象，他在藝術上的手腕已經達到了成熟的時期，另一方面，他底熱烈的感情受着繼續不斷
 的殘酷世界的冷壓，比從前更有聲色地蒙上冷酷的外形了，這便是表明魯迅底最大特質已經成熟
 ，而這一特質成熟的同时，恰好適應於這一特質的魯迅底表現手段已經成熟了，產生「阿Q正傳」
 的一切前提條件具備，現在只要等待時機到來了。

產生「阿Q正傳」時的魯迅

「阿Q正傳」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寫的。我希望多用一點篇幅來分析這
 篇名著並且敘述它產生的經過，雖然這些也許是老生常談，但在理解魯迅一生
 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為我們前此把魯迅底歷史，魯迅底環境與思想

說得這麼詳細，都爲的是要理解魯迅底戰鬥生涯和創作。我們從魯迅底創作中看得見魯迅，也從魯迅底戰鬥中看得見魯迅底創作之生長，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假如我們這樣做，過去真的沒有錯，那麼，我們對魯迅底這篇名著『阿Q正傳』也許是不用費什麼思索就可以理解的，因爲我們早已知道，這篇『阿Q正傳』的胚胎已經很久了，我們對於這篇名著的產生是不須驚奇的，那麼，我底敘述或者用不着過分囁嚅。不過我們要知道，魯迅寫了『阿Q正傳』並沒有馬上就死，他以後的生涯還正長呢，爲了理解他以後的更重要的生命的日子，我想，一些必要的努力恐怕還省不了。我們爲了敘述『阿Q正傳』的產生，『阿Q正傳』產生以前的許多情形，還不能不先來說一說。

一九二一年，『阿Q正傳』產生之前的兩個月光景，魯迅寫了另一篇值得我們注目的文章，這便是『知識即罪惡』，這篇『知識即罪惡』和『阿Q正傳』的產生時間隔得很近，我們如果把這篇文章和『阿Q正傳』連繫着想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阿Q正傳』產生之前，魯迅底思想又在發生變化了。我們單以爲『阿Q正傳』是集合魯迅底藝術與世界觀之大成，是很不夠的，我們必須同時了解，『阿Q正傳』產生的同時，魯迅底世界觀已經從原有的地位上向前移進了，這一點，在『阿Q正傳』的藝術形式中我得到相當的破綻是一個證明，我們以後是要說到的。現在，我們先來看一看魯迅寫『知識即罪惡』與『阿Q正傳』這兩篇文章時所處的環境吧。

魯迅在寫『阿Q正傳』之前的生活，比較還算平靜的。他一面在教育部任事，一面仍然兼着北大與北京高等師範的講師，在家裏有空，就校稔康集。他進北大之後，一直都是講中國小說史，據周作人說，當初好像是北大中國文學系的主任馬幼漁找周作人教中國文學史，周作人答應了，後來叫魯迅去講，自己又去和馬幼漁商量，換了別的功課的。魯迅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的造詣很深，他到現在已經有十幾年的努力了。像我們已經知道了的，魯迅自小就喜歡抄書，描畫書上的

綉像，那時候還沒有白話文，他能接觸的不但都是古書，而且因為他家裏也尋得出一些經史之外的『野書』，他又銳意搜尋，這就無形的使他由抄寫閱讀而漸漸對中國古代文學發生很深的關係。清代樸學盛極一時，魯迅從日本回國後選擇了抄書的方法以為麻醉手段的，實因為他對這方面也頗有心得的緣故。他抄的種類實在多得無從計算，如『穆天子傳』，『南方草木狀』，『北戶錄』，『桂海虞衡志』，程瑤田底『釋蟲小記』，郝懿行底『燕子春秋』，『捧衙小記』與『記海錯』及『說郭』等。他一面抄，一面輯，周作人說魯迅大約很受了張介侯底『二酉堂』的影響，他輯錄『會稽郡故事雜集』，『謝朓後漢書』等，和『涼州記』『段穎陰鏗的集』這類鄉邦文獻都有很密切的關係。『古小說鈎沈』大約是他到北大教書後，花費了很長久的歲月所輯集的大量的古代逸小說。魯迅很愛晉朝的稽康，他現在所校的嵇康文集，是十年前，革命政府初成立，他在南京教育部任事時就開始抄輯的了。關於這位嵇康先生，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裏會說得很詳細，讀者可以去參閱。從那篇文章裏，我們看得出他對嵇康了解的深切，他對古代文學研究的透闢。那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是一篇講演，內容的生動與具體，簡直使我們不覺得是一篇研究古代文學的很深奧枯燥的東西，假如有人能把魯迅在北大所講的中國小說史都一句句照樣記錄下來，那我相信一定是一本很生動的書，要比他自己不得不盡量求簡而甚至用文言編寫的『講義』『中國小說史略』有趣得多吧。我們只要看他在北大講『中國小說史』時，聽衆的擁擠，就可以想見一斑。王魯彥關於魯迅在北大講書時的情形，有過這樣的記載：

『他身材並不高大，常穿着一件黑色的短短的舊長袍，不常修理的粗長的頭髮下露出方正的前額和長厚的耳朵，兩條粗濃方長的眉毛平輪在高出的肩稜骨上，眼窩是下陷着的，眼角微微朝下垂着，並不十分高大的鼻子給兩邊深刻的皺紋映襯着這才顯出了一點高大的模樣，濃密的上

唇上的短鬚掩着他闊的上唇——這種種看不出來有什麼奇特，既不威嚴也似乎不慈和，說起話來，聲音是平緩的，既不抑揚頓挫，也無慷慨激昂的音調，他那拿着粉筆和講義的兩手從來沒有表情的姿勢幫助着他的語言，他的臉上也老是那樣的冷靜，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

「他敘述着極平常的中國小說史實，用着極平常的語句，既不讚譽，也不貶毀。」

「然而，教室裏却突然爆發笑聲了。他的每句極平常的話幾乎都須被迫地停頓下來，中斷下來。每個聽衆的眼前赤裸裸地顯示出了美與醜，善與惡，真實與虛偽，光明與黑暗，過去現在和未來。大家在聽他的中國小說史的講述，却彷彿聽到了全人類的靈魂的歷史。每一件事態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疊疊的外套都給他連根撕掉了。於是教室裏的人全笑了起來，笑聲裏混雜着歡笑與悲哀，愛戀與憎恨，羞慚與憤怒……於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來了一盞光耀的明燈，燈光下一條寬闊無邊的大道……大家抬起頭來，見到了魯迅先生的蒼白冷靜的面孔上浮動着慈祥親切的光輝，像是嚴冬的太陽。」

「但是教室裏又忽然異常靜默了，可以聽見脈搏的擊動聲。魯迅先生的冷靜蒼白的臉上始終不會露出過一絲的微笑。」

在表面上看來，魯迅這時的生活，似乎確是平常而安靜的。但實際上，魯迅的內在生活，魯迅底思想與靈魂，正在發生着一種潛伏的變化。魯迅週圍的政治環境也是一樣，這是一個奉直第一次戰爭正在醞釀的時期，中國軍閥混戰的局面方興未艾，在五四運動後，展延了一個相當長久的沈悶時期，一直到五卅，國民革命軍北伐，才算把這個悶葫蘆似的軍閥混戰的局面根本改變過來。不過在這個長久的沈悶時期中，許多潛伏的變化正在進行，將來改變這一個沈悶的軍閥混戰局面的諸先決條件也在醞釀。魯迅在中國大革命後，思想上大變化的諸條件也是在這軍閥混戰的沈悶局面中漸次形成的。經過直皖戰爭後，五四之後的新文化運動，如我們前面所說的，既然是

在退潮中，那麼反動的濃度是一定會加強的，這些情形，我們前面都已經說到過了，現在我們應該指明的是以前壓迫新文學運動的，還只有暗探，陷害，和一些固有的舊文化堡壘。這些固有的舊文化堡壘大多數都被五四的激流沖得五離四散，就還有一些殘存的部隊，也是潰不成軍的了，可是到了現在，新文化在退潮之下受了黑暗勢力幾年的進攻與壓迫，那些舊文化的殘存部隊又能漸漸集合起來，重新組織他們底攻勢了，於是便有盡反動之能事，與新文學久戰不厭的學術派產生。

自然，當舊文化的勢力重新組織起來向新文化進攻的時候，魯迅是不會妥協的，以後我們要說到魯迅對學衡派的英勇的戰鬥。只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這時候，魯迅對反動文化的戰鬥，已經不是作為集體的一分子站在戰場上，而是作為一個新文學的游勇出來和成羣成隊的舊文化集團搏鬥了。所謂「兩間剩一卒，荷戰獨徬徨」的魯迅底游勇時期，嚴格的說，已經在開始了。那麼，他心裏的苦痛，是可想而知的。在這苦痛開始的時候，雖然他還保留着稱當的勇氣來寫「阿Q正傳」，但他是不能不加緊思索，嚴加反省的了。他不能不開始審問自己，痛苦的摸索，他對於這世界的看法，需要再冷靜些，他甚至走到悲觀的地步，「阿Q正傳」裏的悲鬱是顯而易見的，但魯迅是不肯放棄希望的，他以為失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同，所以他失望，他又不肯失却希望。而畢竟他對這世界得到較為進一步的解釋了，這就是表現於「知識即罪惡」中的思想。

「知識即罪惡」寫成以前的九個月光景，魯迅寫過一篇小說，叫作「故鄉」。我們先來說說魯迅在這篇小說裏所表現的「希望」，然後再來看「知識即罪惡」吧。「故鄉」是一篇回憶一九一九年他回紹興故鄉變賣房屋，迎接家眷到北京來的抒情體的小說，關於這篇小說，我們在前面會一再提起過，其中所敘述的他和閩土的關係，會使我們得以了解魯迅在童年時代和大自然發生密切的關係的一個重要關鍵。我感謝這篇小說供給我們的一些實貴材料，現在，我們要想到這篇

小說在末尾所說的話。這篇小說的末尾，魯迅寫他底姪兒想到閩士底兒子水生家裏去玩，正和他自己童年時代想到閩士家裏去玩一貌一樣。——這是藝術家常用的襯比手腕，——於是他發感慨說：「他不願他底後一輩的人們也都和他一樣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他們像閩士一樣辛苦麻木而生活，又不願都如別人一樣辛苦愁難而生活，他希望他們有新的生活，爲他所未經生活過的生活。」可是一說到希望，他說他忽然害怕起來了。他覺得他所說的希望，也在如閩士裏香爐燭台拜偶像一樣可笑，而且還覺得閩士底願望切近，他自己底願望反而渺茫。

從這一點上看，「故鄉」裏自然留着魯迅底以往的思想痕跡。可是再往下看，看他在這「故鄉」裏最後的幾句話，就知道他所以想到希望就害怕，原來並不是因爲覺得希望空虛，而是知道，希望並不是徒托空想，輕易可以得到的。他說：「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樣的哲理似的思想上的結論，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這需要對現實的深刻的觀察與分析，他原來已經知道，希望是需要用鬥爭來實現的，這正如地上的路，若能號召大多數人來走，路便有了。從這點上看，他是跨進一步了。這種以鬥爭來追求希望的態度，可能是「知識即罪惡」裏的思想伏線。

「知識即罪惡」裏的思想，說起來，原來也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魯迅底小說，從「狂人日記」一直到「風波」，每一篇裏都有兩種不同的人，一種是犧牲者，一種是代表舊勢力的勞肥者。這兩種人物的社會糾葛，是魯迅底小說一貫的中心。因此，從魯迅底小說裏，可以推測一種晦澀不明的傾向，這便是各式各樣，形形色色的兩種人物的鬥爭，可能從一種個別的，偶發的形式中認識出人類社會兩大勢力的必然的對立，進而將此一系列的複雜鬥爭，概括爲兩大主要社會勢力。不過我們必須着重聲明，這種傾向確是十分晦澀，而且，假使不用任何旁證，單從作品本身說，那我們一則就不能斷定這種晦澀傾向的可能存在，二則，就使確認這種晦澀傾向的存在，

也無從推測此種傾向在作者主觀的思想上，是否有何種程度的確定性。因為表現於創作中的作者底思想，往往是簡接而不必十分明確的，有時甚至出乎作者主觀思想底控制之外，而直接從作者所處理的事象本身底必然性中湧現出來，這就說明了單從創作本身中去論斷作者思想的困難，和難於明確。可是，現在我們有了『知識即罪惡』這篇文章，這類困難，我們都解決了。我們還可以想到其他的旁證，比方魯迅寫於他正創作着『吶喊』中諸小說當時的『一件小事』中的民國六年他所受的印象，『故鄉』裏那種追求真理的鬥爭態度等，都證明出魯迅可能在他底兩種人物的鬥爭中認識兩大社會勢力必然的對立，雖是晦澀到了極點，然而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確認這種晦澀性為合理，因為在魯迅底思想上，確實還沒有達到能够以榨取者（在中國的榨取者，包括和帝國主義勾結着的反動的，罪惡的全淵藪。）與被榨取者的鬥爭來解釋人類一切社會糾葛的可能，他有這種感覺，但是他還不能利用此種感覺作為思想的武器，這類情形，在我們以前所講到過的魯迅底創作中是很明顯的，但是他在『知識即罪惡』這篇文章裏，却把他在創作中的很晦澀的感覺，表現為榨取者與被榨取者兩大主要的社會勢力相互鬥爭的概括認識了。我們曾經引用過這篇文章，知道魯迅對虛無哲學並不同情，現在，我們還要說明，魯迅並且把虛無學家認為『知識是罪惡』的話，斷定是代表榨取者的說話。他明白地認識，榨取者與被榨取者之間的利害衝突，已經不是口舌可以解決的了，現在需要一種鬥爭，而且是一種決死的充滿感情的鬥爭。我們在『故鄉』裏已經看見他那種追求真理（希望）的鬥爭的態度了。他模糊地覺得人類要向好的方向走，這就是他所說的『進化』。可是總有些人在拼命阻止人類向好的地方走，這是些什麼人呢？他見得很多，各色各樣的守舊者，自私自利者，頑固派，他見過他們底實在形貌，並且他一直沒有停止地都在和這班人鬥爭着。但這班人到底是為的什麼要阻止人類往好的路上走呢？他們之間有什麼共同之點麼？他們在這社會裏可能依據什麼條件成爲一類或一個無形的集團麼？這些，都

是必然要來的疑問。魯迅從觀察現實社會的經過中，是似乎對這問題有點頭緒了，這就是如我們所說的，在他底小說中可找到的痕跡。現在，在這篇『知識即罪惡』裏所達到的觀點，是很自然的結果。即如知識是否罪惡這個問題，他也以為權取者有權取者底看法，被權取者有被權取者底看法，用知識也解決不了，恐怕還是要『用感情來決一決』的。這種明確，堅定而胆大的思想，在魯迅過去的文章中，一向不曾見過。他在一九一八年所寫的『我之節烈觀』一文，還帶點烏采色彩，他在一九一九年所寫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也還是立腳在生物學上的，只有這篇『知識即罪惡』沒有帶一點生物學的論調，（自然，這還是暫時的。由於這篇文章短，并未包括魯迅此時思想的全面，所以決不能說魯迅此時已完全控制了生物進化論。）而完全從一種嶄新的觀點出發，所以我們可以說，這雖然在政治環境上，在魯迅個人生活上，是一個沈悶的時期，表面上，魯迅底生活似乎平常而安靜，但奮勢力在各方面，特別是在文化方面的反攻，使魯迅感覺很大的苦悶，他底思想却在苦悶中，在作爲一個游勇的失望中，潛藏着一種很大的變化了。不過這種變化現在距離成熟期還很遠，它將跟着中國歷史的演進而演進。中國歷史上，社會諸關係的變化也正在軍閥長期混戰的苦悶與麻木中潛進，魯迅在思想上的潛伏變化，是完全和中國歷史上社會諸關係的變化配合着進行的。當中國歷史發生決定的變革，把軍閥混戰的長期苦悶打破的時候，中國社會生活中兩大主要勢力的新的對壘隨之露骨，魯迅底思想也就要發生決定的變化，結束他思想上潛伏變化的沈悶時期了。現在，距離這種決定的變化還早，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還只是一個雛型，這個雛型的思想，一般地說，往往不能自成一個系統的，因此，也很難澈底清算過去的一切思想，換句話說，過去的思想和新起的思想正在交替，矛盾與蛻化中，過去的思想雖然在新起的思想改造之下，但過去的思想也還能腳接新起的思想，常與新起的思想相互消長。一般地說，在這種情形下，思想者是苦痛的，如果是作家，那反映在作品中的，

往往是消極的結果。怎麼叫作消極的結果呢？就是說，新起的思想，並不能被作者加入創作中去，因為思想本身並沒有十分確定，要應用此種不確定的思想到具體形象上去，或者用以處理具體事象，或者從具體事象中去捉捕此類本身並沒有確定的思想，都是困難而沒有把握的事；但另一方面，此類新起的思想雖然不十分確定，到底已經存在了，它又不容許舊有的思想單獨支配作品，因此，反映在作品中的新舊兩思想的鬥爭，結果往往是破壞作品在藝術上的完整。可是這種消極的結果，在魯迅底作品中表現得倒並不強烈。因為我們知道，魯迅在思想上的變化，原來是一種經常的程序，只不過有時進行得緩，有時進行得快，有時進行得明顯，有時進行得不明顯罷了。而且，魯迅底舊有思想與新起思想的交替，自有他獨特的徑路，他由生物學的思想，個人主義的觀點，走到「要生存，二要繼續，三要發展，而到達於在『發展』二字之後加個括弧，括弧內註明是『改造』」，他實際已從生物學的物競天擇的自然觀接近鬥爭的辯證法了。XXX

得有什麼飛躍或分裂之感的。他底思想進步非常自然，在他底獨特徑路上建成了前後的腳接，所以在『阿Q正傳』裏，作為此類消極的結果而出現的，是在思想上仍舊找不出明顯的新成分，只在藝術上有微小的一些破綻罷了。新起的思想在創作中被賦與生命確是不容易的，它不但需要思想的成熟，而且需要新起思想體察之下的相當寬廣的生活經驗，魯迅在新起思想沒有成熟以前所寫的諸小說，自然在思想上大致都找不出很大的差別，因此，我們決不能用『吶喊』與『彷徨』來說明魯迅在這時期，思想上並沒有什麼變化，相反的，這一個時期，正是魯迅在思想上發生一種根本變化的時期，雖然這種變化並沒有表面化，突變而成爲決定的形態，但却是無可置疑的，不過這種變化沒有可能充分反映在魯迅底小說中罷了。

魯迅底『阿Q正傳』最初發表在晨報副刊上。那時孫伏園當副刊編輯，晨報裏忽然要添一個

稱爲「開心話」的，每過出版一次，孫伏園便去請魯迅給「開心話」寫文章。據魯迅自己說，阿Q底影像，在他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了，可是他一向沒有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過伏園一提，他便想起來了，晚上，他就把第一章的序寫了起來。「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時，魯迅所用的筆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這篇文章在晨報副刊上連載的時候，社會上忽然惹起了一陣恐慌，許多人因爲不知道「阿Q正傳」是誰寫的，都疑心是和自己相識的人在罵自己，或者諷刺自己，而感覺不安。高一涵有一段話把這情形敘述得最清楚了。他說：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爲只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爲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爲「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他和他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大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

據周作人說，當時教育部裏也議論紛紛，猜不出巴人是誰，有的人疑心巴人是蒲伯英，却沒有推測到魯迅身上，大家說長道短，變態不一，魯迅就站在旁邊，茫然相對，是很有意味的一件

事。

從這些傳聞裏面，我們可以知道，「阿Q正傳」在日報上發表的時候，就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影響了。直到「阿Q正傳」收在「吶喊」裏，也還有人問魯迅究竟是在罵誰。這實在是魯迅所最感不快的。一篇諷刺小說在社會上出現的時候，假如是真正的諷刺小說，真的是打中這社會底通病，社會上會人人自危，覺得作者必定是在罵誰，那是無足奇的，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社會，簡直不懂什麼叫作小說，更不懂小說底社會意義，那裏還能懂得諷刺小說底價值，和作用呢？魯迅

「阿Q」其實並不是影射誰，他是有意識地要指出中國民族性的弱點。而且中國人善於察隱，他是早已料到了的，所以在他底小說中，地名與人名都極力避免牽涉到實際的地名與人名，他說：「我的一切小說中，指明某處的却少得很。中國人幾乎都是愛講故鄉，奚落別處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這脾氣。那時我寫一篇談諧小說，指定事情是出在某處的吧，那麼，某處人便得不共戴天，非某處，却無異隔岸觀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齒，一班人却飄飄然，不但作品的意義和作用完全失掉了，還要由此生出無聊的枝節來，大家爭一通閒氣。」對於人名也一樣，他說：「古今文壇消息家，往往為有些小說的根本是在報私讎，所以一定要在書上掛誰，就是實際上掛誰，為免除這些才子學者的白費心思，另生枝節起見，我就用「趙大爺」，「錢大爺」，是百家姓上最初的兩個字；至於阿Q的姓呢，誰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時還是發生了謠言。還行排印，因為我是長男，下年兩個兄弟，為豫防謠言家的毒舌起見，我的作品中的環腳色，是沒有一個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魯迅為了使他底小說獲得社會的作用，其用心之苦，於此可以想見。中國人底劣根性，恰巧被他猜中，所以也不愧他是一個「阿Q正傳」底作者。

那麼阿Q這個名字如此奇怪，和魯迅底苦心，大約是也有些關係的了。他鄭重地指明說：「並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滅各種無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較能集中，發揚得更強烈，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換不着在讀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讓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一條新路。」

從魯迅的這些自述裏，我們可以知道，魯迅底阿Q，絕對不是影射某一個人。實際上這樣的人是沒有的，同時也到處存在。這就是說，阿Q是中國人各種劣根性的結晶體，是每個中國人，都不是任何的一個人。所以阿Q是現實的，但同時是概指的。我們中國人，每人大約都多少有一點

阿Q性，和漢存一個人體兼備阿Q的全部劣根性於一身，這是很明顯的。我們從魯迅下面的一段遺稿裏，能證明這個意見的完全正確：

「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過的理由，但決不全是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發覺完全發覺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獨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御嘴在浙江，臉在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顏色。」

這叫作藝術的概括，許多偉大的巨匠們都用過這方法，高爾基並且把這方法再三教給青年作家們過。不過這種概括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遺及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在他的任務。但倘有伊爾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筆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說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的豫想的不同起來。

放下筆太久，原來是不太好的，即使所寫的物不愈拼湊起來的，日子久了也會把握不切實。但這不是說絕對不能放下筆，縱然人物是拼湊起來的，倘如有一條評論時，倘要說了些要點，放下筆稍久一點也無妨。譬如魯迅寫「阿Q正傳」，世並不是「氣呵成的」，「阿Q正傳」在「開心話」上登出之後，每七天必須做一篇，孫伏園每星期到魯迅那裏去一回，笑嘻嘻的，一有機會便說：「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快排了。」於是只得做。這可見他是七天做一部的，這七天之中未必天天寫，或者總得停幾天，稍容就一天或數天寫一稿分出來吧。他那時雖然並不忙，但寫作的環境並不很好。他夜睡睡在做避跡的屋子裏，那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阿Q正傳」是在這樣一個粗陋的屋子裏出世的。「阿Q正傳」在「開心話」上登了十次又十次，後來竟漸漸的快些認真起來了，這就是說，大約在社會上引起反響，或者編者覺得並不是可以一笑了之的「開心話」完畢的了。所以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發表。這標「阿Q正傳」寫了大約兩個多月，照魯迅自己在「阿Q正傳」成因而「那篇文章裏所說的話看

來，我們可以知道，「阿Q正傳」在社會上引起恐慌，事情似乎嚴重起來了是真的，但同時也就確實給最報抓住不少讀者，所以編者的孫伏園是不太喜歡「阿Q正傳」收束的。正傳裏的「大團圓」魯迅雖然當初沒有預料到，但由於小說情節的發展，也並不是隨便到達的結果。他沒有到寫「大團圓」的時候，漸漸就把「大團圓」藏在心裏了，而阿Q也就漸漸向死路走。到「大團圓」送去排的時候，孫伏園恰巧不在，代孫伏園編副刊的是何作霖，據魯迅說，孫伏園倘在，也許會將「大團圓」壓下，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吧，但代庖的何作霖於阿Q素無愛憎，也便把「大團圓」登出來了，待到孫伏園回京，阿Q已槍斃一個多月了。

魯迅的創作怎樣發展到「阿Q正傳」

現在我想談一談「阿Q正傳」本身。不過在談到「阿Q正傳」本身以前，我們還不能不先說到「故鄉」。關於這篇「故鄉」，我們以前提起得很多了，我曾經指出過，說到在「故鄉」中，魯迅提到希望就害怕的一節，還留着他以往的思想痕跡，可是說到他認識希望並不是空想，必須由人來實現這點，他是比以前又跨進一步了。現在，我們在說到「阿Q正傳」之前，要大略指出，從「風波」過渡到「阿Q正傳」的魯迅在世界觀上以及創作上的變化，是怎樣反映在「故鄉」底創作態度上的。隨後，我們可以看到，「故鄉」，「知識即罪惡」與「阿Q正傳」之間的一個共同之點，從「狂人日記」一直到「風波」的魯迅底小說，（「一件小事」與「頭髮的故事」我們沒有把它歸類在小說裏）。其主題底中心性質，可說一貫地是反面的暴露。我們已經依次論列過從「狂人日記」，「孔乙己」到「藥」的發展，我們又指出了從「藥」發展到「風波」，魯迅底藝術手腕已經到了圓熟的地步，總之，從「狂人日記」一直到「風波」，我們可以找到魯迅在創作上的一系列往上的發展，而貫穿着這一系列的發展的，是魯迅對於現實社會的一貫的暴露與抨擊的態度。雖然這

態度裏包含着濃重的對弱者同情的成分，但從主要的意義上說，暴露是『風波』以前的魯迅底小說底主要精神。可是到了『故鄉』，無論從形式上說，從內容上說，這從『狂人日記』一直貫穿下來的魯迅小說中的主要精神是忽然呈現出變化了。在『故鄉』中佔着主要地位的，是對於閩土的正面的同情與熱烈的愛着，而對於楊二嫂以及其他黑暗面的揭露，現在僅佔有次要的地位了。這樣的內容上的變化，反映到形式上來，就使『故鄉』帶着溫情的面貌，作者底感傷，情熱以及憎惡都採取直接流露的形態，換言之，就是帶着很濃的抒情味了。這是『故鄉』在形式與內容上，都和魯迅以前的小說不同的地方。

可是我們知道，『阿Q正傳』中的主要精神却並不和『故鄉』一樣。顯然的，『阿Q正傳』底主要力量集中在暴露一點，因此，反映在它形式上的也是冷靜的外貌，這些都和『風波』以前的魯迅小說底特點相貫穿而不和『故鄉』一樣。那麼我們要問，假使沒有『故鄉』，魯迅的小說不是從『狂人日記』一直到『阿Q正傳』，或者更說得遠一點，從『懷舊』一直到『阿Q正傳』，不是在內容與形式上都找到發展的一貫性些麼？自然，我們不是說『故鄉』表現魯迅在創作上的發展是不統一的，但我們要問，爲什麼在『風波』與『阿Q正傳』之間的『故鄉』來了這個中間變化，使『風波』發展到『阿Q正傳』要兜一個圈子呢？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我們從這裏，可以對『阿Q正傳』得到更進一步的了解。從這個中間變化的性質上考察，我們知道，這個中間變化並不是偶然的。因爲第一，『故鄉』底內容與形式，全表明了作者對一定同情對象的積極態度。他從前的心情只隱藏在反面，現在擁到正面來了。那麼第二，爲什麼到現在才擁到正面來呢？我們一想起作者到寫『知識即罪惡』的時候才給他所同情的對象和當地確定了社會經濟的內容，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作者想從被榨取者中去尋求積極同情的對象而加以正面的表現，因而寫成『故鄉』是很自然的。這就是閩土。——我們不能用『故鄉』寫在『知識即罪惡』之前來非難這個

論據，因為文章只能是思想的表現，並不是思想的起點與發生。「知識即罪惡」中的思想，當然不是在寫「知識即罪惡」時發生的。魯迅同情弱者，要求改變的思想，本是由來已久，而魯迅把他所同情的弱者接近到在經濟上的被掠奪者也是由來已久的事，留下的顯然只不過是這個接近的明確化罷了，當然這個明確化的過程也不是突然的，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小私有者底立場接近革命的作家，大約都有這種變態吧？就是當我們底同情確定在那一方面的時候，我們都有一種慾望，想把我們同情的人物寫在創作裏，把我們同情心寄托在他身上。這種慾望，在初初對我們底同情對象有較為確定的認識的時候，來得特別強烈，所以「故鄉」不單產生也不遲延，而恰巧在魯迅對他同情對象的認識漸趨明確化的時候產生。可是小私有者接近革命，他所同情的對象假如不是在絕底生活掙扎的階級階級接近的，那麼他這時候要和在絕底創作中創造一個他同情的對象人物以寄托他底同情心，在他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們中頗以前有許多革命作家所寫的工人農民都好似木偶人一般沒有生命，這是一個很好底證明。魯迅新近的是「一條較為切實的路子」，就是這倫是沒有可能創造一個理想型的自己所同情的對象，就從過去生活的記憶中去摸索，尋求一個自己過去確實愛過而近似理想型的對象。這也是許多接近革命的知識份子大抵經驗過的。艾奇底「大澤河」——「我底親母」就是一個好例。「故鄉」中的閩士，便是魯迅過去所敬愛的人物，現在他把他描寫出來，一方面寄托他對於舊來的被剝奪者的熱烈的愛，另一方面寄托他對於鄉村，自然，及農民的愛。魯迅底現實主義裏，帶着很濃的積極的浪漫主義的血液，我們可以說，從「狂人日記」一直到「風波」的魯迅底小說都是現實主義的，從「狂人日記」一直到「風波」的發展，雖是魯迅底現實主義日益加強的發展。然而從「風波」發展到「阿Q正傳」之前，卻來了「故鄉」

的這篇中間變化，其積極的下面同精心帶着浪漫主義的感傷與熱切，其抒情帶着浪漫主義的美麗，這也許如高爾基批判巴爾扎克似的，是因為魯迅天天面對着貧乏的醜惡的現實感得厭倦了吧？

個現實主義者是常常要用浪漫主義來豐富他底生活的。不過和現實主義者結合的這種浪漫主義不是被動的，笨極的浪漫主義，而是積極的浪漫主義，魯迅底作品裏就常常帶有這種積極的浪漫主義色彩。不過佔支配地位的常是現實主義罷了。而『故鄉』裏却由浪漫主義佔着支配地位。但這只是一時的現象，待到魯迅寫『阿Q正傳』的時候，佔上風的又是現實主義了。我們知道，『阿Q正傳』是在魯迅底思想爲『再向前跨進而發生變化的時候寫的，我們以後要指出』『阿Q正傳』裏的這種思想變化所反映出來的痕跡，我們還要指出，魯迅雖然在每篇小說裏，對弱者都有熱切的同情心，但在『阿Q正傳』裏，這種同情心雖是在一種意在滑稽的打算下，雖是在一種現實主義一貫的冷雋風格下被限制着，也隱約可以看得見那似乎特別積極地跳動着的脈搏。而這種似乎特別積極地跳動着的脈搏，我們說到第三，在『故鄉』裏，已經得到註明了。

『阿Q正傳』

那麼，魯迅底思想爲的向前跨進而發生變化，在『阿Q正傳』中所反映出來的痕跡，到底是弄一些呢？這種痕跡是很微小的，可是仔細考察，就看得出來了，主要的表現在現實主義佔上風的冷雋風格（『阿Q正傳』爲了切合『開心話』的滑稽要求，特別加強了它那冷雋的外貌），與那『魯迅底思想跨進而特別積極跳動』的同情心有點不相調和的這一契機上。『阿Q正傳』裏現實主義的冷雋佔着上風，我們已經知道，是魯迅底現實主義的一貫發展，原也不是爲奇；而魯迅思想跨進的情形，我們上面也已經詳細說過。思想發生變化之初，對創作往往發生什麼消極作用，我們上面也已經說過了，我們並且還曾指明過，由於魯迅底思想變化能在他底獨特徑路上達成了前後的銜接，所以那種消極作用在魯迅底作品裏表現

得非常微小，在『阿Q正傳』裏，能找到的也是一些微小的破綻。原來『阿Q正傳』在冷薄的表皮之下，却燃燒着魯迅那因思想跨進而特別積極的熱情。怎麼叫作特別積極的熱情呢？就是魯迅在『知識即罪惡』裏的認識，使魯迅在『阿Q正傳』中的熱情，起了一種目的意識性的變化，這便是說，他不僅是單純地寄他底同情心於阿Q身上，並且想使他底同情心發生積極的合理作用，於是他便想從阿Q身上發掘革命的種子。出發於『爲人生』、『爲社會』的魯迅底寫作態度，本來是一出發就想處理社會生活最重要之一環的。以革命爲題材的小說，魯迅以前有『懷舊』和『藥』兩篇，而『風波』也是寫張勳復辟時反映於鄉村中的社會生活重要的環節。我們曾經就『懷舊』和『藥』兩篇小說指出過魯迅在『懷舊』中所處理的革命這方面的題材還只是街談巷議中的口頭傳說的革命，而『藥』中的革命，是革命者底血光所照耀的舊社會底反動，無知，自私的面貌，對革命這種題材的搏擊，是跨進一步了，但仍然不是正面描寫革命，沒有革命的形勢。至於在『風波』中，更主要的是處理反面的題材。『阿Q正傳』對於這類題材的把握，現在是比起『藥』又迫近一步了。『阿Q正傳』裏對於整個辛亥革命形勢的把握，（雖然仍舊還不是正面描寫的。）達到了可驚的成功，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說的。不僅如此，他還想追求革命的動力，由於他想使他底同情心發生積極的合理作用，他使到他所同情的負担着封建的歷史重担的中國農民阿Q身上去發掘。爲什麼魯迅不到閩土型的農民身上去發掘，而要到那帶有農村流氓無產者性的阿Q身上去發掘呢？這我想有三個原因：第一，作爲中國人底劣根性集中點，以盡暴露作用的阿Q本身，必然的同時具備有一種流氓無產者底弱點；第二，『工人殺惠略夫』是魯迅熟讀的作品，此外還有高爾基描寫流浪人的作品等。當魯迅底思想還只達於『知識即罪惡』的階段時，由於他底新起思想還不能有系統地清算舊有思想，是在尖銳的矛盾苦悶中，得不到確切的解決，『工人殺惠略夫』式的農民是很容易侵進來作爲革命動力之部分的說明的。阿Q身上，有工人殺惠略夫底真

液。第三，由於上述的原因，及魯迅在寫『阿Q正傳』時，爲了切合『開心』，力求滑稽，便也加強了阿Q底農村流氓無產者的性格。在這樣的條件下，魯迅想在阿Q身上發掘革命的這一企圖顯然的只得到部分的成功。阿Q革命的原因，分析起來有三點：一是覺得舉人老爺也該怕革命，頗爲快意，包含農民底報復心理；二是他可以翻身站在壓迫他的人們頭上了，也是報復心理，隱藏忿忿政權的內素；三是貪別人底東西，以爲乘機可以發財。這三點，都是消極的成分居多，而積極的成分少。農民傾向革命的心理，因素很複雜，能有積極認識的確實不多，尤其像阿Q傾向革命的一二兩點理由，可以說是農民傾向革命的普遍心理，但和第三點相結合，便全體都帶上濃厚的流氓無產者底色彩了。從這一點上看，阿Q和綏惠路夫有本質上的區別，他是道地的中國農民。所以阿Q傾向革命的這第三點理由，可以說是中國流氓無產者底特性，對阿Q本來有個別的適應性。只是『阿Q正傳』裏阿Q底報復心理並不像一般農民傾向革命的報復心理那樣充滿憤怒與仇恨，却被表現爲詼諧，與滑稽，這裏很明顯的現出了魯迅描寫革命的破綻，這就是說，阿Q底革命心理，顯然還欠真實性。這裏表現了魯迅根據他自己寫在『知識即罪惡』中的思想，了解農民傾向革命的心理，在感情上帶着憤怒與仇恨，在這一基礎上，他接受了阿爾基拔綏夫和高爾基等人底影響，同時又批判了工人綏惠路夫底極端報復主義，他同情這種報復，誰都知道，他又是非難這種報復的，他認爲這是可怕的结果。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之下，由於魯迅底思想還不能達於系統地認識革命形成過程的地步，便必然地忽視了農民底報復心理最高度的發展，（或者沒有估計這種最高發展的憤怒與報復之一時的可能性。）而助長這種忽視的，是他想用滑稽與諷刺作爲『阿Q正傳』底主要作風，阿Q底報復心理在此作風下被透露出來，就絕不可能帶上高度的憤激。因爲正面的憤激有嚴肅之感，與滑稽是不容易調和的。阿Q趨向革命的流於滑稽，不是由於魯迅對革命取旁觀的態度，而是因爲魯迅思想跨進了，他想使他底同情心發生積極的合理作用，而欲

在阿Q身上發掘革命的種子，然而對革命形骸過程的認識實嫌不謬，因而她底藝術形式較有跟着他底思想跨進而一同跨進，以求得適切的配合，而相反的爲了要切實「開心」二字，在她一貫的冷肅作風上加以滑稽，加強她扭扭了他那嚴肅形式的這種跨進，所以發生破綻。魯迅自己在「阿Q正傳」的成因一環也說：「因爲要切實「開心」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一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莫不相稱的」。這種粗率的態度，毫無藝術的虛心的自白，正是一個有良心的藝術家之所以能寫偉大作品的理由。其實，諷刺與滑稽，並不是絕對容不了嚴肅的激情，然而這需要思想上更明晰的清醒與堅定，是藝術士起進一涉的工夫了，到「故鄉」爲止的魯迅底藝術，並毀滑達到如此多方面的完成。我們知道，「風波」在藝術士的完成，已經達到被有破壞河哦了，但到「風波」爲止的魯迅底藝術所處理的還不是像這篇小說中所處理的多種情調的複雜體。他底每篇小說都和一切短篇小說一樣，是有一個自始至終的單一線貫穿着的。雖然在這零瑣裏有各種人物底感情相起伏，但作者自己底情調却有一個主要成分作爲支配力量貫穿着的。可是在「阿Q正傳」裏，作者底這種處理單一情調很純熟的藝術形式，顯然已經不够應付它底主題。原來作者由於思想跨進，想在阿Q身上發掘革命的種子，無形中使「阿Q正傳」所欲表達的主題複雜化了，而「阿Q正傳」中作者底情調專注在諷刺與滑稽上，因此，和這種情調不相容的別些情緒所包含的主題，便不得不被壓弱，模糊下去。這不是表明藝術的退步，而是表明思想的突進，這種突進，雖然可作爲藝術形式所一時趕不上，然而却可能使藝術底頹落者。

可是我們知道，阿Q類同革命的報復與流氓無產者底心理，雖然帶上滑稽的面貌，不仔細追究，是不能發覺出魯迅在這裏爲什麼把農民底革命心理寫滑稽了的，更不能據以爲魯迅底思想向前突進的痕跡。原來魯迅把阿Q寫成一個不可救藥的糊塗蟲，這實在也是「阿Q正傳」底一個大毛病。但這個大毛病恰巧和阿Q傾向革命的滑稽性相結托，而輕輕把那滑稽性所應得的不真實

擰了小尼姑底面，被蠱了，還怪小尼姑面上不該滑膩。第十是不懂得什麼叫愛，只知道性慾衝動了便跪在女人面前強求。第十一是空想發財，希望在路上拾得一注錢。第十二是完全和封建舊禮教一句出氣，一切思想觀念都和壓榨他的鄉村權貴一樣。他實際還是壓榨他的人們底應聲蟲。他要看見茂才公，趙司晨，趙白眼都將辮子盤在頂上了，他才也來盤辮子。他想女人的時候，完全也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話和迷信來給自己解嘲。「君子動口不動手」這完全是從封建權貴裏學來的怯漢底話。而概括地說，阿Q底上舉十二種中國人一般的弱點，誰本求源，都是生根在封建的士君子們身上的。「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和阿Q不同的，就是沒有阿Q那麼糊塗，其他一切方面，他都是阿Q底先生。他不准阿Q說是他底本家，這是阿Q式的自大。他看見阿Q有賊出賣，便忘了對阿Q的一切舊衍，把所謂禮教也丟在腦後了，這是想發意外之財的阿Q式的貪求。他等阿Q半日不到，便埋怨起別人來；他以為阿Q和賊盜為伍了，便不敢和阿Q結怨；他甚至駭怕革命便叫阿Q作老Q，這都是阿Q式的欺善怕惡。其餘如愛鬪，愛捧，會推諉，推諉一切於女人身上，因循苟且，隨波逐流，要討小老婆（阿Q式的性慾衝動）等一切，在中國士君子身上都是歷歷可見的，趙太爺身上也沒有一樣不多少存在。至於精神勝利法，那不但在中國人民底個人身上存在，而且在整個守舊派底公開輿論上也表現出來。所謂本位文化，就是精神勝利法的變態。此種精神勝利法，在產生「阿Q正傳」當時，曾盛極一時，簡直使人無以忍耐，當我們很顯然地落人背後的時候，中國紳士總以精神文明自誇，把古物搬出來和西歐的新文化相比，甚至把太極拳也搬出來從精神上打勝外國人。清末的許多大笑話，如義和團之類，實在都是精神勝利法的集中的表現。魯迅在「阿Q正傳」中，關於這一點，特開了兩章篇幅來描寫，是有很大的社會意義的。這類精神文明的自誇，倘是長遠繼續下去，中國簡直就難自救了，這是他以後數年中一直都認為痛心疾首的。魯迅從這樣的富有社會意義的觀點上去研究

中國的精神文明，而終於在「兒子打老子」的精神勝利法中得到說明，其觀察的深刻，頗足驚人！從這一點上，就充分說明了他是舊社會的激頭激尾的叛徒，是一個在社會鬥爭的觀點上，認真地從事文學工作，深刻地，無情的分析了舊社會的巨人。

假如以為「阿Q正傳」裏就只有一個阿Q，那是很大的錯誤。「阿Q正傳」裏不但趙太爺是阿Q，就是一切圍繞着阿Q的人都是阿Q。知道了阿Q底精神勝利法，就硬叫阿Q自己說出是人打畜生才肯放手的人們，和阿Q是一樣的，需要精神勝利者，不過他們底精神勝利和實際勝利時得到罷了。和阿Q一道賭博的人完全和阿Q一樣，不過他們不比阿Q胡塗，知道用吵架來搶走阿Q贏得的錢罷了。王爺顯然是個阿Q，酒店裏的人們看見阿Q欺尼姑，便也從旁得意，也是一班阿Q，小D是小阿Q。旁觀小D和阿Q相打，而從旁頌揚的人們也是一班阿Q。他們聽見阿Q說城裏稱長機爲條機等是缺點，說十幾歲的小孩都會又「麻將」，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裏十幾歲小孩手裏立刻就是「小鬼見閻王」等，都駭然了，這時他們底思想與情感，完全跟隨阿Q打旋，阿Q向東，他們就向東，阿Q向西，他們就向西，阿Q成了他們底大哥，這一羣人就是阿Q底弟弟。至於這些小阿Q尊重禮教，一切行動以封建道德爲依歸，那是不消說的。他們聽說阿Q自稱是趙太爺底本家，雖然知道阿Q挨了打，還格外尊敬他，據魯迅說，好像孔廟裏的太牢一般，雖然與豬羊一樣同是畜生，但既經聖人下箸便不同了，這是崇敬封建文化的阿Q底根本性格。吳媽被阿Q一跪便尋短見，自然是出發於封建道德的，也是阿Q。但這些人們都有一點是和阿Q完全不同的，那便是不和阿Q一樣糊塗。他們雖然在各方面都和阿Q一樣，但却精於計算，針針見血，要起命來，無微不至，要起錢來無孔不入，決不會像阿Q一樣糊塗，明知造反要殺頭也大嚷「造反」；熟知封建道德也不自覺跪求吳媽睡覺是觸犯封建道德，甚至弄得無處做工，無路可走，也不自覺；贏了錢又被別人搶去，弄得只留一條褲子沒有說掉。只有精於計算，無孔不入是中

國人一般的特性，而且這特性因資本主義的侵入，在日漸加強。所以我說阿Q底性格中，只有糊塗那一點是獨特的成分，沒有一般性。但正是這一點糊塗，使阿Q和另一些阿Q不同起來，加強了阿Q的滑稽之感了。而阿Q傾向革命的心理中不够嚴肅的憤怒與仇恨這點，也就與這種滑稽氣很相稱配，而輕輕地掩過了。

此外，作為魯迅思想跨進的痕跡，在「阿Q正傳」的藝術形式上露出微小破綻的處所還很多。最明顯的是第一章的序裏面，有許多地方作者底憤激鋒芒畢露，和全文中極力抑制着昂奮的冷靜與諷刺相對比，雖然恰巧點破了「阿Q正傳」底戰鬥性，但在藝術的統一與調和上說，到底不能不算是白璧之瑕。這也是因為魯迅底思想在事實教訓之下前進，而事實又刺激魯迅，魯迅到寫「阿Q正傳」的時候，已經很難阻止自己不憤慨了。在「阿Q正傳」裏的許多絃外之音，開始暴露出作為一個游勇的魯迅底情緒。

說到魯迅對阿Q的同情，無可置疑的，他並不是同情阿Q底這許多腐爛的弱點，而是同情阿Q那樣無知地負負着中國封建文化的全部遺產，作為中國許多無知的貧苦農民之一，被擄取着。阿Q一向就被看重的權貴們擄取着，剩下一把骨頭睡在土穀祠裏，而當他用那賤賤太爺討小老婆的辦法相彷彿的戀愛方法跪在吳媽面前鬧了事情之後，趙太爺便又趁機擄取他，不但要他典當衣服賣香燭送上趙府，而且逼去吳媽所得的工錢也擄沒了，連他放在趙府上忘了帶走的布衫也不准他去取回，被擄取去作為爛尿布。地保呢，他是封建權貴底爪牙，他也是要貧苦農民們供養的，他代表趙太爺來擄阿Q討下了五個擄取阿Q僅存幾件衣服的底條件，他底醜劣也要輪到阿Q負担，竟把阿Q底賤賤當作四百文的抵押拿去了。阿Q一直被擄取得只剩下一條褲子。這真是好比油瓶裏擄海一樣，不乾淨一滴清水也沒存，似非是不止的。這決不是誇張，而正是我們以前所說的那末滯東方式的落後殘酷性的擄取面目。而這種糾纏形式的這實擄奪，正是我們以前所說的魯迅

祇會經過情況這一特色而不再發展。代替阿Q工作的小D，也正是阿Q命運的繼承者。當我們看見那個又瘦又乏的被揮鞭者相互角鬥，四隻手拔着兩顆頭，勢均力敵地在錢家粉牆上映出一個藍色蚯蚓形的圖畫時，誰能不承認這是三副抗議人類殘酷地從事敵控的諷刺畫呢？當我們看見阿Q餓得跳入靜修庵偷蘿蔔，逃出來時辱罵老尼姑的那些天真的話，我們對阿Q的一切厭惡現在都一下消失，變成同情與憐愛了。魯迅對於這個被搾取的阿Q的同情，在一種淪落的外衣遮蓋下，表面似乎不大看得出，但仔細一看，卻馬上覺察到，那外衣下的熱情正如同火山下的火一樣，雖然被抑壓着，却是濃烈得任何岩石都融化了。魯迅到阿Q身上去發掘革命的因子，也從這一基礎上出發。我把魯迅底這種熱情，比作抑壓着的熱情。抑壓着魯迅底熱情的是什麼東西呢？是冷酷的現實中的醜惡面。沒有這種醜惡面，那種凝固在魯迅底熱情之外的寒冷就不會存在。在「阿Q正傳」裏，凝固在同情阿Q的熱情之外的是魯迅對於另外一些阿Q的憎惡。這就是以趙太爺為代表的那一流人。離開了這一流人，魯迅底尖刻的筆觸便不會存在。這些天的卑鄙醜惡，在魯迅筆下沒有一樣隱蔽得過去。他首先指出趙太爺不過是另外一種阿Q，把趙太爺一流人的貪吝，在「釋取阿Q的事實上」，在貪食阿Q廢廢物的事實上表現出來。他指出了趙太爺一流人的卑怯，在趙太爺那不敢結怨阿Q的「應酬裏」，在趙太爺喊阿Q作老Q的卑劣行狀中，刻骨地暴露出來。阿Q中與後，人們對阿Q的甜言相待，讓趙太爺底姓名犧牲了未莊所有的聽眾這一切盲目的勢利心，魯迅更是痛心疾首，因為這正是趙太爺所以成爲趙太爺的社會基礎。但對於那班盲目的羣衆，魯迅是從多方面來了解的。他們是太爺一流人的支持者，盲從者，但也是趙太爺一流人無言的敵人。魯迅底這種多方面的了解，在老莊人聽說趙家遭劫之後所感到的快意與恐慌一點上表現出來了。魯迅對這些盲目的羣衆雖然也用了冷酷的諷刺，同時却也分出同情阿Q的熱情加以憐惜。魯迅所最感到不能妥協的是那些像趙太爺一樣高高站在阿Q之上，站在像阿Q一樣的許多盲目羣衆之

上的榨取者，不勞而食的寄生蟲。魯迅是一開始他底創作生涯，就努力於分析並塑造這些寄生蟲的。我們知道，他在『狂人日記』裏，把這些寄生蟲當作一個社會集團來把握，達到了很好的成功，以後經過『孔乙己』、『藥』、『明天』，到了『風波』，他成就了塑造一個集中的寄生蟲典型趙七爺，而在『阿Q正傳』裏，魯迅發展了過去一切的這些成就，不但多方面的塑造了趙七爺，而且把『狂人日記』中還只止於抽象的當作一個集團的寄生蟲的各方面加以形象的浮現了。這些寄生蟲底無窮盡的卑鄙污穢，是瀰漫在全中國無孔不入的黑暗勢力，竟造成了中國幾次革新運動的不斷的流產，把魯迅底熱情冷壓下來了，在『阿Q正傳』裏也是如此，魯迅竟想去追求那作為一個被榨取者的阿Q傾向革命的那種比他以前更積極的同情心，是被一層寒冷的外壳緊緊地壓縮着的。

因此魯迅對阿Q的同情如何熱切，這種熱情畢竟是被壓縮着的內在的熱情。因為如此，所以這種熱情不是懸空的，變幻不定的浮表的熱情，而是在現實的冷酷下大無畏地流露着的毫不虛假的真情。這個觀點對『阿Q正傳』以及『孔乙己』、『藥』、『明天』、『風波』等都完全適用，因此，說明了『阿Q正傳』也是一篇現實主義的作品。『阿Q正傳』裏沒有一個人物，沒有一點一滴的情節不驚人地生動逼真，足以永遠作為中國作家的模楷。因為丈夫剪了一條辮，老婆要鹹三回井，現在似乎不足信了，然而在宣統年間是千真萬確的普遍現象。這一類事實如果只有中國人了解，那就是說明『阿Q正傳』刻骨地畫出了中國歷史的真實。雖然，我在上面曾經指摘過阿Q傾向革命的心理中不啻嚴肅的憤恨這一點毛病，但這最多只能說明魯迅在思想上有人進步，還沒有進步到能够在藝術方法上發揮進步思想所湧出的主題罷了，却絕對不能埋沒他在『阿Q正傳』中把握其他諸方面一般革命形勢的正確與逼真。白舉人與趙太爺聽聞革命的驚慌，趙太爺喊阿Q作老Q，假洋鬼子和秀才去革職修種那塊『皇帝萬歲萬歲萬歲』的龍牌的命，趙太爺一流

人的終於把辮子盤在腦頂上而又怕辮子被剪，不敢進城去討銀桃子，却叫假洋鬼子代他向白舉人進柿油黨這整個封建豪紳向革命投機的形貌是畫得維妙維肖，活靈活現的。阿Q自以爲革命了，而外在世界却並沒有如他所想像的崇敬他起來，因而丟向假洋鬼子要求加入革命。他去要求革命時的那個場面寫得真切逼人，而在腦子裏自己已革命以爲就是革命了，起初還不覺悟，直到外在世界對他仍然如故，他才漸漸明白過來，這也是一般的情形，甚至許多年青知識分子，恐怕都免不了有此毛病。最後，白舉人因爲沒有追贖，趙秀才因爲破費了二十千賞錢，辮子又被剪掉，兩家都號啕大哭了。對革命投機的這種損失，破滅了他們投機的幻影，到底只有他們底過去是黃金時代了，於是他們便發生了遺老味。遺老是這樣發生的。這的確是辛亥革命的一個主要的側面，這裏說明了辛亥革命在社會意義上的實質。袁世凱便是典型的代表。這些封建豪紳，官僚與軍閥向革命投機了，但革命是不見因爲他們投機而等於沒有革過命呢？倒並不見得，革命雖然上了他們的大當，但他們底辮子畢竟被剪掉了，現在漸起了許多力量，他們底特權不再有從前那麼發光，他們晦氣的機會畢竟也比從前多了，所以到了後來，革命終於使他們感到不愉快，這就說明了他們革命後的路。他們投機到革命這裏來，沒有得到革命的王冠，終究是新時代的遺老了，從這一點上看，魯迅對於辛亥革命的價值也是估計得很確切的。他認識辛亥革命的腐敗性，也認識辛亥革命的積極性。從『懷舊』以來，魯迅對於關係社會變革之重要一環的題材之搏擊，到這裏達到了可驚的成功。周作人說『阿Q正傳』是寄悲憤絕望於幽默，沒有一點光與空氣，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說法。『阿Q正傳』決不是一篇悲觀絕望的作品。而且從他發掘阿Q底革命性這一點上看，他已經在企圖超過辛亥革命時代的思想條件以外去理解革命了。

阿Q那些有一般性的許多特性，在『阿Q正傳』第六章以前，大致都被敘述出來了。阿Q底糊塗，自第六章到第九章加強地充塞着全篇幅。所以從阿Q底性格上說，前面五章就已敘述完了。

，但後面四章也並不是多餘的，後面四章從動的形勢上進一步把握阿Q底環境，加強了另外許多阿Q的生動與多面性，因此加強地反襯了第六章以前阿Q底許多特性。第六章以前，未莊，一切封建道德與榨，都還是穩定的，看不出多大破綻與腐潰的，自從阿Q中興，在未莊攪起一點小風波，未莊人的勢利，趙太爺的卑污貪吝都更刻骨地被表露出來了。到了發生革命，士君子底一切假面具才無情地暴露無餘，而最後，未莊社會以外當時革命的情況——拘審阿Q的那些場面，是多麼逼真的描寫了當時革命的人物與空氣呵！阿Q被鎗斃後，『機於革命的趙太爺之流終於露出原形，以及未莊人的議論，以為被鎗斃便是阿Q壞的證據，說『不壞又何至於被鎗斃呢？』等等也作為未莊底背景襯托出來了。這才將變革過程中的整個中國社會深刻地解剖出來，後半部的主要價值是在這裏。不過一個作者不爲了主人公，却爲了主人公底環境而去延長篇幅，那麼在此延長了的篇幅中，主人公是不是再成其爲主人公呢？在『阿Q正傳』裏，顯然阿Q是自始至終的主人公，只是活在第六章以後的『阿Q正傳』中的阿Q，大體上確只是『糊塗』這一性格的多方面的引伸，就是說阿Q傾向革命的報復與貪慾心理，也是以『糊塗』爲基調的，所以才現得和阿Q底全『糊塗』調和而生滑稽之感。這，『阿Q正傳』後半部的阿Q在性格上的貧弱，以其他許多阿Q的生動與逼真，以魯迅確切地把握了圍繞阿Q的環境的動態，完全補救過來了。這種事情在文學創作上是可能，然而却是危險而不易嘗試的。

未莊仍是魯鎮，這背景，和魯迅少年時的鄉間生活之密切，是和『風波』等篇中的背景關係魯迅少年時代的鄉鎮生活一樣的。『阿Q正傳』和魯迅其他的小說一樣，很透切靈活地把許多中國舊句子運用在裏面了。魯迅自己曾經聲明過，說他底習慣是如其生造別人所不懂的句法或形容辭，甯可用舊句子的。魯迅底這一種習慣，正如我們以前所說的，作爲詩人的魯迅，負担着迫切的鬥爭任務，目的在怎樣發揮他底思想內容，並不在於追求什麼文體。有些皮相的論客說他是文體

家 (Spirit)，恰巧是一個相反的錯誤。但我們並不否認魯迅創造新文學樣式的功績，相反的，他正是各種新文學樣式的領導人，然而我們說過，他對於這些新樣式的大膽的開墾，目的只在發揮他底戰鬥內容，一切以此為準繩，他底散文雜感的獨創風格，即其一例。從小說上看，一方面，魯迅運用舊句子的適當與貼切，足為我們今日利用舊形式的好榜樣。另一方面，魯迅底小說，無論那一篇都不是舊型的沒有獨創性的小說。從全體上看，魯迅底『阿Q正傳』顯然是受外國影響的成分多，夏目漱石底清淡，顯克微支底對民族的熱愛，對弱者的排憫深情，以及他底寫實與諷刺的手腕，阿爾志拔緩夫底憤恨，還有梭羅古勃底冷嘲，再加上魯迅自己對民族國家的熱愛與憤懣，對被榨取者的愛，便成了『阿Q正傳』底骨幹；只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魯迅並沒有脫離中國的血肉去接受許多外國小說的影響，『阿Q正傳』是一篇中國的東西，其中充滿着中國人底疾苦與掙扎，悲哀與願望，一切外國小說底影響不但融化在中華民族底生活的真實裏，並且也滲合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優點，從這一點上去理解，『阿Q正傳』及魯迅底其他一切作品，不僅是利
用舊文化遺產的頂好的榜樣，而且是融合古今中外藝術上的精華於一爐的獨創的皇皇巨製。

最後，關於阿Q的槍斃，我希望讀者回頭去翻開第四節，看一看魯迅在仙台醫學學校裏見了電影上許多中國人圍着一個中國人被梟首的情形吧。那種無知地冷酷的情形，曾經深深地觸動過魯迅，使他決心棄醫而從事文學運動，對於中國人的這種無知的冷酷，魯迅在『孔乙己』，在『明天』，在『風波』，『故鄉』，特別是在『藥』裏，都不曾放鬆過他底揭發力，然而在『阿Q正傳』裏，阿Q的槍斃，却恰好把他在仙台電影中看過的情形再現在他作品中了。自然，關於阿Q槍斃的描寫，我並不是說魯迅所根據的是電影而不是中國的事實，我是說，魯迅今天在『阿Q正傳』中是正面把中國人圍看殺人的那種近於野蠻的冷酷性示出來了，他也許以日本人給他的刺激作為教育，學着日本人的方法，但比日本人提出得更具體，更生動，更深刻。人們對於槍斃者的

批判，是說被槍斃便是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於被槍斃。這就是中國人底奴性的表現，是一種激頭激尾的訓服主人的邏輯，而跟着看阿Q槍斃的人呢，則因為槍斃並無殺頭好看，感覺很大的不滿足，他們痛恨阿Q游了那麼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果他們白跟了一種，——這不是對於麻木得可怕的國民的絕叫麼？假如不是平日對這種可怕的情形早有深刻的印像，那魯迅又怎能把它塑造成為藝術形像使我們見了也不覺要戰慄呢？光從這一點上看，我們也就知道，一個偉大藝術家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的了。

保衛新文化的魯迅底矛盾心境

「阿Q正傳」一發表，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影響，這點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那時雖然還很少有人猜得到「阿Q正傳」的作者已入就是魯迅，但「阿Q正傳」既經引人注意，它底真正的作者，終究是要被人發掘出來的。於是，全國的視線便集中在魯迅身上，當他帶着冷靜蒼白的面容走進北大去講中國小說史的時候，教室裏兩人一排的座位上，便總要擠滿四五個人，連門邊走廊都擠滿各種非正式的學生了。

這樣，魯迅便成了萬目所矚的人物。

但在當時，北京的文壇是寂寞的，魯迅底名聲，好比平地一聲雷，又把三兩年來寂寞荒涼的北京加重了文學上的重要性。晨報副刊雖介紹了一些作家如蹇先艾，許欽文等，然而也不是怎樣注重文藝創作的刊物，這時文壇上熱鬧的中心是上海，和魯迅底意氣比較相投的為人生而從事文學的文學研究會底重心固已在無形中漸向上海轉移，而當時標榜為文學而文學的，藝術至上的浪漫主義派創造社也正如旭日之東昇，漸漸在上海擴大影響、文學的真正的建設時期，在魯迅灌溉之下，要在上海開始開花了。這開花二字，如果是指的創造社的功績，那麼，這創造社的出現

雖然取着和文學研究會對立的形態，雖然取着仇視北京文壇的神氣，雖然他們從外國大畫地輸入浪漫主義的新的作風，但他們所以能在中國盛行起來，是不能不歸功於魯迅他們先打好了基礎，開好了路的。現在，在這架新文學的花正盛開的時候，面前正橫着新文學的真正的敵人，這便是趁着革新運動的退潮而漸漸集結起來的舊文化的殘存部隊，上海的國學派。如果說創造社底浪漫主義的反抗是代表帝國主義與封建反動勢力變層壓迫下的中國市民底苦悶的怒號，那麼，這種怒號，雖然誤以現實主義的魯迅為敵人，而魯迅却正是掩護着他們，打擊他們底真正敵人，使他們得以順利前進的保護人。因為，挺身與上海的國學家們相戰的，就正是這時集全國的視線於一身的魯迅呵。魯迅底筆尖始終集中在真正的敵人復古派身上，他底主要方向從來沒有錯過。

當時以張皇舊學問自居，而極力向新文化進攻的大本營是『學衡』雜誌。此外如『民心週報』，『經世報』，『亞洲學術雜誌』，『史地學報』，『文哲學報』，『湘君』，『長青』，『紅』，『快活』，『禮拜六』等都是和學衡雜誌意氣相通的刊物。雖然它們各自也有各自不同的旨趣和方式，但對新文化的仇視，固守封建思想的各種據點這些，大家都是共同的。『學衡』雜誌的中堅人物是梅光迪，吳宓，胡先驕等，魯迅在一九二二年所寫評論文的大部分是針對着這些反動刊物，特別是以國學為號召的『學衡』雜誌的。他底『估學衡』把『學衡』罵得狗屁不通。原來學衡張皇着舊學問，玩弄古董，魯迅就從舊學問上去駁掉它，證明『學衡』派連自己對國學也不通，他說：『夫子者，即使不能『載道』，却也應該『達意』，而不幸諸公雖然張皇國學，筆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他說國學派『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煞人！……』他又諷刺他們說，『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國學家用怪裏怪氣的古董來嚇唬做白話文的青年，表示國學是多麼艱深，青年所以要做白話

文，是因爲做不來文言，不懂文言的緣故。這是反對新文化的封建餘孽一貫的手段，但以前他們受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打擊，現在不過是猛烈地「土重來罷了。這一迴光反照的反攻，恐怕還要延長到相當長久，是長時間地伴隨中國文化的發展而忽衰忽強地漸次死滅下去的。我們以後還要再四再三遇到這個暗影，而沒有法子乾脆擺脫。魯迅底歷史，就是不絕地和這個暗影拼着命的一部門爭史。他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寫的那篇『以震其艱深』，就是出來替做白話文的青年應戰，將嘲笑青年不懂文言的國學來加以嘲笑的文章。

國學家還嘲笑新文學的譯音。上海報上說做新文學家的祕訣，是要用些『屠介納夫』『郭歌里』之類使人不懂的字眼，可是他們自己呢，却大鬧笑話，把日俄戰爭時的旅順敗將 Kurapatia 底廂相刊出來頂替克魯泡特金底面目；中國的反動文化方面的人物，實在說，他們鬧來鬧去，反正都只是臨終的哀叫，既然是沒有力量了，鬧笑話的可憐相時常表露出來是很平常的。魯迅在『不懂的音譯』這篇文章裏很沉痛的指出當時的國學家連古之和尙也不如，說我們底假國學家正在挪揄譯音以自詡舊學不凡的時候，真心研究國學的王國維却在用譯音，外國人却已經從甘肅，新疆的沙磧裏，將漢晉簡牘掘去做出書來，在真正地研研我國的國學了。上海的封建復古派，差不多九流三教，不問自己配不配，一概自命爲國學家，所以連那些『卿卿我我』『蝴蝶鴛鴦』的文章也挨進國學家的隊裏去。這真叫作醜態百出，所以魯迅不能不老實不客氣的說：『中國的國學不發達則已，萬一發達起來，則敢於恕我直言，可是斷不是洋場的自命爲國學家』所能顧足其間者也』的了。』

十一月三日，魯迅所寫的『一是之學說』，借吳宓自己底評論，把當時的反動刊物都做了一個簡單扼要的檢閱。不過，在這裏我們還不要忘記魯迅在思想上的發展。我們知道，魯迅已經能够把這個社會上所表現的多種多樣的外表形態都看穿過去而從中找到這些糾葛的根本的出發點，榨

者與被榨取者的對立關係了。因此，魯迅能嫺熟地從社會經濟的見地上去分析他所處的社會中一切奇形怪狀現象，是不足爲奇的。所以，他就在「所謂國學」一篇文章裏，來分析國學家們底社會經濟背景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那時國學的社會背景說：「一是商人遺老們翻印了幾十部舊書賺錢，二是洋場上的文豪又做了幾篇鴛鴦蝴蝶體小說出版。」

「商人遺老們的印書是書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書籍而在古董。遺老有錢，或者也不過聊以自娛罷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藉此獲利。還有茶商鹽販，本來不齒於「士林」的，現在也趁着新舊紛擾的時候，借刻書爲名，想揆進遺老遺少的「士林」裏去。……這就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他這樣的解剖了當時的國學，使我們看明了當時的「國學」原來是由這麼一種虛榮利慾的醜惡教育成的，那麼，這種「國家」的虛偽，不能與王國維他們那樣的真正國學相比是顯而易見的了。因此，他們才弄得句子也不通，錯誤百出，被魯迅嘲笑得一錢不值。所以魯迅抨擊上文，又把當時國學底面目畫出道：「然而巧妙商人可也決不肯放過學生們的錢的，便用壞紙惡墨別印什麼「善華」，什麼「大全」之類來搜括。定價並不大，但和紙墨一比較却是大價了。至於這些「國學」書的校勘，新學家不行，當然是出於上海的所謂「國學家」的了，然而錯字疊出，破句連篇（用的並不是新式圈點），簡直是拿少年來開玩笑。這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很够了，當時的國學是什麼，現在不用我們再來說了。很明白的，這是封建舊文化重振旗鼓向新文化進攻的一種社會基礎經已混亂而動搖了的沒有紀律的軍隊。但他們確曾大事強劫廣掠過，他們校勘的善華，大全之類，勢力深入到與窮鄉僻壤的私塾相呼應，在生民塗炭的中國內地到處泛濫。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受新文化嚴重的抵抗，畢竟難以復生的了。以西歐市民意識發揮民族苦悶的創造社在他們前面也有時伸伸拳頭，而魯迅領導着固有的新文化陣地，却是這樣不屈

不撓地正在揮舞着鋤頭向國學家們底頭上擡下去。

魯迅在北京向國學家們開砲的時候，北京城外的軍閥混戰的砲火也開始响了。這就是第一次奉直戰爭。原來直系軍閥聯合奉系把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的皖系軍閥推翻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就轉而把奉天張作霖利用作爲自己底走狗了，因此便和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新子手直系軍閥對立起來。我們知道，奉直聯合推翻皖系軍閥之後，奉直兩方雖曾一度取得均勢，但不久作爲傀儡的中央內閣便落入奉系手中，聯合日帝國主義利用過的老代理人皖系政客安福系來共同壓制英帝國主義代理人直系了。這傀儡內閣既然是由日本帝國主義在背後牽線的，所以在華盛頓會議時，討論到山東膠濟鐵路贖回的問題，作爲日本傀儡的梁士詒內閣便電駐華盛頓的我國代表，叫他把原來堅持着快將成功的自籌款項贖路的立場緩和，（藉口要與英美接洽後再說。）想借日款贖路，路上仍用日人，和日人訂共管條約。梁內閣的這個賣國行爲，不料被直系軍閥察覺了，並且獲得了證據，於是直系軍閥便獲得了攻擊梁內閣的口實，公開宣佈了梁內閣的罪狀，全國民衆及與奉皖二系沒有關係的其他軍閥政客也一致起來反對，於是奉直戰爭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爆發了。直系軍閥雖然有了攻擊奉系的大道理，但是他英帝國主義在中國代理人這一點，和奉系軍閥實在毫無二致，所以他們在真正從事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者看起來，同樣應該推翻。南方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勢力，就是以直系軍閥爲當面敵人的。他用近攻遠交的方法，連絡奉系與皖系實在不過是一種手段，他只求先除掉直系軍閥，奉系與皖系當然將來也是要作爲革命對象的。在奉直戰爭未爆發前，中山曾從桂林入湖北伐過，但因爲在後方爲中山籌軍餉的陳炯明暗與直系勾結，（當然由英帝國主義撮合），故意勸而不與，中山不得已，於四月十六日潛師回粵，到梧州，陳炯明才知道。陳底軍隊實力多在甯甯一帶，所以中山忽然潛師到了梧州，陳便沒有法子應付了，只得退走惠州。中山把後方弄好後，又於五月六日取道韶州誓師北伐。但北方的奉軍已於五月

敗軍糧城，北伐軍和奉軍夾攻直軍的計劃已不能成功了。不過中山仍不變更北伐計劃，照舊進兵，這就弄成六月十五日陳炯明圍攻總統府的大叛變，中山蒙難，在軍艦上與敵軍相持到八月，本期望北伐軍回師除陳的，奈北伐軍爲陳所阻，不能回粵，中山乃去滬，廣州暫時落入陳炯明手中。而在北方呢，自從奉軍戰敗後，直系軍閥便夢想武力統一，他們底眼中釘當然是孫中山，因此便藉口恢復法統，拾出黎元洪來做大總統，想使中山另立政府的理由不能成立，但正在直系軍閥做着武力統一的好夢時，直系軍閥內部的京保派（曹錕爲首）與洛派（吳佩孚爲首）也就發生糾葛，作爲傀儡的黎元洪雖已上台做了總統，另一個傀儡內閣却變換了數次，及到一九二二年底，洛派才算向京保派讓步，成立了張紹曾內閣。從此京保派得意非凡，曹混一心一意打算賄選做大總統了。然而正當張紹曾內閣成立的時候，南方與直系通聲氣的陳炯明却又站不穩了。中山指揮桂滇各軍從廣西南下，又指揮許崇智從福建入粵，英帝國主義想撮合南北兩走狗的幻夢也就要被中國人民底力量擊破了。

很明顯的，我們可以知道一九二二年的北京是在怎樣的寡圍氣裏了。這次奉直軍閥內戰之猛烈爲前所未有，而戰爭的場所又是在京畿附近，所以北京附近的人民又遭了一次流離失所的災難，這些情形，魯迅都是能親眼看見的。接着奉直戰爭之後，北京就演傀儡登台，豬仔議員爭飯盆，（當時有所謂民八民六議員，互相爭持合法地位。）爲軍閥捧場，甚至接受賄選的醜劇。那麼，魯迅生活在生民塗炭，烏烟瘴氣更甚的環境裏，是很明白的了。當時的所謂國學家在封建軍閥猖獗的混亂局面下也像沉在水底的渣滓一樣一齊浮泛起來向新文化進攻，魯迅是在這樣的環境裏爲着保衛新文化的發展與生長而挺身出來與國學家們作戰的。

不過，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隊伍，現在已經不在北京了。從前留下來的許多新文化種子，現在也已經各自分散，而新起的新文化勢力如創造社等也是各自爲政，和從前的新文化勢力不相爲謀

的。所以魯迅這時在北京的烏烟瘴氣和火藥氣味底下，跟國學家撐持苦戰，並不是有聲有勢的陣地戰。魯迅這時已作爲一個游勇——不過是一個有力量的游勇，不做着孤軍獨戰了。雖然，魯迅在客觀上是並不孤的，新文學之所以能戰勝舊勢力，就是因爲不孤的緣故。這時新文學各方面的勢力，雖然各不相謀，但他們在無形中，無疑是向一個方向前進。我們說魯迅在做着孤軍獨戰，是從他主觀上來着眼的。這點，在他底生活和作品裏，都能够找到充分的反映。他在寫「阿Q正傳」之後所寫的「端午節」，「血光」，「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以及「補天」這一系列作品的發展，證明他一方面有從客觀的刻畫走向抒情的傾向，另一方面從熱烈的同情走向身邊生活之藝術的纖細。當然我並不是說他走到相反的方向去，而只是說一般地，他後來的作品中，抒情與纖細地描寫身邊生活的成分有加多的傾向，而另一方面，他底客觀刻劃與熱烈的同情卻並沒有消失，只是漸漸退居於比重較小的地位罷了。這應該是說明他底創作的一個曲線發展，是一個從粗獷入於細緻的創作上的彎路。而他這時的生活亦正如此，是寓他底憤慨於低徊中的。他心裏覺得憤慨的時候，常常要喝兩盃酒，點起紙烟，就躺在床上看書。我們從「端午節」來看吧，這篇文章雖然用的第三人稱，實際却是一篇抒憤懣的文章。這篇文章裏的憤懣，在感情上，和「阿Q正傳」以前的文章並沒有很大的差別，但它把感情更直接的表现，而且帶着相當的頹喪氣，已經很和「阿Q正傳」不同了。原來「端午節」前半部方支綽所發的牢騷完全是採用直接敘述的方式的，而這種牢騷又明明白白是作者本人底牢騷；這比起「阿Q正傳」那樣完全刻劃動作，描寫故事，而作者底情感只在故事後面波動着，當然表現得直接得多了。其次，我們看「端午節」內，作者感情的本身吧。方支綽底心境很明顯的就是魯迅底心境。他處在那生民塗炭，烏烟瘴氣的北京，雖然一面還和國學家們戰鬥着，但軍閥們打來打去，世界似乎仍然在黑暗中，進步在那裏呢？他不覺悲觀消沉起來了。他覺得一切都「差不多」，青年罵官僚，但官僚也是青

年變的；兵打車夫，但車夫當了兵也是要打車夫的，異地則皆然。這很明顯的和魯迅寄忱痛於麻木的那種『忘却』方法是一樣的。可是，他又不能心死，他在用『差不多』來解除他看見許多黑暗現象的痛苦時，又不至疑心自己沒有和惡社會奮鬥的勇氣，近於無是非心，或者是昧了良心造出來的一條途路，這種矛盾心理，在當時的魯迅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魯迅在那時候還沒有獲得一種可以解釋當時中國事象的完備的思想武器，他雖然相信世界總是要進步的，他雖然早已知道歷史的進步是螺旋形的，然而中國的進步實在是太慢了，十餘年來，粗粗一看，只覺得是越來越壞。軍閥每打一次仗，都抬出許多美名，爭來嚷去，死了許多老百姓，積下了白骨，而第二個軍閥來還是一樣；改革的風潮來時似乎很有希望，而現在退去了，還不是封建餘孽在張牙舞爪。而且現在的國學家，倒反而比以前的更不如了，他要得出一切都『差不多』的結論，那是並不足以奇怪的。這就是因為他沒有更銳利的思想武器，如果我們說，以他藝術家的敏感，確能感覺到民眾在覺醒，封建的基礎到底一天天在動搖了，那麼，我們可能說，他不能用思想的語言來抓住這種感覺，他不能明確判斷他所處的環境，他四週的情況，因此他仍然是懷疑的，這說明他又疑心『差不多』的無是非心，想改除他底矛盾心理。因此，陷於這一苦悶中的魯迅，在『端午節』中所表現出來的感情本身又是帶頹喪氣的。這和『阿Q正傳』中的熱烈同情與憤懣相比較，也是很不同的地方。

『端午節』不能算是一篇整齊的小說，因為它前半部的直接發牢騷和後半部生動的對話是不相稱的。這也可以說是魯迅小說底一個特徵。由於魯迅主觀情感的強烈，就是作為魯氏傑作的『阿Q正傳』的開始，也有小部分充滿主觀牢騷的抒發，成了『阿Q正傳』形式上的小疵。此外如『頭髮的故事』，『社戲』等都有同樣的特徵。但『端午節』和『頭髮的故事』不同，這篇文章裏描寫舊式夫婦生活的逼真，遠非『頭髮的故事』那單純借口發牢騷的形式所能比擬，而且我們也決不能說方玄綽就完全是魯迅。不過『端午節』內的故事背景，我們知道也是真的事實；魯迅借方

玄紳的口來說話，也是可以斷定的；方玄綽底憤慨與處世的態度也可能是魯迅本人性格的部分表現，甚至有許多地方是魯迅對自己的無情解剖。然而在這性格裏，同時混雜着別的小職員生活。由於『端午節』內描寫舊式女人的逼真，我們知道了魯迅觀察舊式女人的生活經驗是很豐富的。『端午節』內的夫婦生活，可以說是他觀察舊式夫婦生活的具象化，光這一點，比起『頭髮的故事』就要多一層藝術創造上的價值了。

我們爲什麼要指出『端午節』內的故事背景是真的事實，而方玄綽底憤慨與處世態度也可能是魯迅本人性格的部分表現呢？因爲這樣，我們就可以透過『端午節』來了解魯迅當時生活的一個側面了。

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爲了相互內戰，雖是一面借了許多外債，一面儘量搜刮民脂民膏，但一切收入仍然不够應付戰爭，財政毫無辦法。所以那時北京的無論政府機關，或者學校，都是不發實薪，而且還要欠薪的。『端午節』內所記的所謂『索薪大會』就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的一個向政府或教育當局索欠薪的團體。我們看魯迅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所寫的『記發薪』裏面，有下面一段話，便可以知道，這並不是憑空的憶測了。『記發薪』裏說：

『親領問題的歷史，是起源頗古的，中華民國十一年，就因此引起過方玄綽的牢騷，我便將這寫了一篇『端午節』。』

『端午節』正是民國十一年六月寫的。看魯迅底這幾句自白，就可知道『端午節』內的故事背景，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可以沒有疑問了。這段話裏的所謂『親領問題』，就正是方玄綽在『端午節』內大發脾氣的親領問題。到了四五年後，魯迅在『記發薪』裏一提起這事，還仍然要發很多牢騷呢。怎麼叫作『親領』呢？原來索薪大會的許多驍將，晝夜奔走，當教員的一起去新華門前噪鬧，被所謂國軍打得頭破血出，倒也索到了一點薪。當官吏的或向國務院呼號，或向財政

部坐討，後來也索到了幾成薪水。但這些饒將一旦薪水到手，對於沒有一同去索薪的人的無功受祿，便心有不甘，於是說要親自去向他們領，好像是說，錢是我們討來的，你們現在要享現成福，得來看看我們底面孔了。魯迅是沒有去參加索薪的，這是魯迅底個性如此。他對於團體，一向很少參加，就是文學團體如文學研究會，他都沒有正式參加進去過，所以這並不是說他不同情索薪會，他其實對教員們罷課的議決案等，都是心悅誠服的遵守了的，政府說『上課才給錢』，他也很不高興，以為政府類乎用果子耍猴子；而對於大教育家和幾種報紙的譏笑索薪，魯迅都很少以為然，以為人要吃飯，飯要米做，米要錢買，就不能不索薪。魯迅所以沒有同索薪大會的驍將們一同去國務院呼號或到財政部索薪，沒有出席教員們的會議，這一方面說明他底個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他深於世故的緣故。再則他那時在文學上已有相當名聲，就是沒有名聲，堂堂的團體之類，外表好看，內容不易知道，即使知道了，其中份子也常常變，所謂良莠不齊，他是很知道小心地防備上當的。而別人索到薪水之後，他去領取，那是他自己底勞動結果，他倒也並不推却的。魯迅底這種防備上當，不加入團體的態度，可以說到了晚年也並沒有改變，他後來加入左聯，是因為他底世界觀已達到確定的地步，而這團體不但標幟明顯，而且和他底鬥爭方向完全一致，他當然是以全生命投入此種鬥爭的。但在這種鬥爭裏，他在處事對人上，也仍舊沒有放棄幾十年的世故經驗。而在一九三六年全國文藝家協會成立時，他爲了當時文壇的混亂，也曾聲明暫取旁觀的態度，是他世故很深的一貫表現。索薪大會的驍將們立出親領的辦法，要給沒有同去索薪的人一點小苦頭吃，魯迅當然是非常憤慨的，他借方玄綽底口，說出如下的一段話：

「哼，我明天不做官了。錢的支票是領來的了，可是索薪大會的代表不發放，先說是沒有同去的人都不發，後來又說是要到他們跟前親領。他們今天單捏着支票，就變了閻王臉了，我實在怕看見……我錢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這樣無限量的卑屈……」

「我想，還不如去親領罷，這算什麼呢。」方太太說。

「我不去！這是官俸，不是價錢，照例應該由會計科送來的。」這是陰歷初四，民國十一年，端午節前一天的事。後來親領一層倒也取消了，仍由會計科分送，魯迅在端午節的前一夜領到二成五的新棒錢，八十五元五角。

魯迅對於人
類的愛着

魯迅底生活情緒既然像表現在「端午節」中那樣的頹喪，那麼，他又爲什麼能有勇氣和當日猖獗一時的國學派相鬥爭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從熱風中的「無題」裏，可以得到說明。這篇「無題」記敘民國十一年春，北京私立學校在中央公園開游藝大會的時候，他和幾個朋友到中央公園去走了一趟回來，就路走進一個製糖公司裏去買朱古律糖，預備帶回家去給他家的子姪們吃。他買定了八盒 *Chocolate apricot sandwich*，付過錢，正想把糖裝進袋裏去的時候，忽然橫眼看見那賣糖的伙計揸開五個指頭，罩住了魯迅所未買的別一堆朱古律糖。魯迅看見了很不高興，覺得這好像是防備他偷竊，對他是個侮辱，他便失笑地拍着那伙計的肩頭說：

「不必的，我決不至於多拿一個——」

伙計忙答道：「那里，那里——」趕緊把手縮回去，似乎覺得很慚愧。

魯迅本以爲伙計要強辯的，現在看見伙計倒一點沒有抵抗，就把手縮回去，現出慚愧的樣子，於是他就覺得慚愧起來了。他自己說，他底這種慚愧，往往成爲他懷疑人類的頭上一滴冷水，於他是有損的。

我記得在魯迅底晚年，曾有許多人說魯迅多疑，以此爲攻擊他的藉口。關於這一點，好像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也曾出來辯解過。不過在我看來，「懷疑」並不能一概而論爲是惡德，問題是在

於懷疑這兩個字所包含的具體內容。如果是在一個合理的社會裏，人們都待我以誠，而我却偏多猜疑，那當然是惡德；但如果是在一個醜惡而陷阱處處的社会裏，懷疑便是少不了的武器。一般地說，忠厚是美德，但在我們今日的社會裏，忠厚却變成小滑頭嘲笑阿木林的代名辭了，忠厚還有什麼美德可言？好在魯迅生活着的社會，和我們今日的社會，並沒有相差得不可想像。諸位自己如果不是一個不肯隨便上當的忠厚老倌，便是天天想打別人主意的冒險家，不然，諸位是無法生存在這虎狼羣裏的。所以打開天窗說亮話，攻擊魯迅多疑的人，自己未必不是頂會找尋「形踪可疑」的能手。猜疑是今日的醜惡社會制度底下必然的產物。我無論如何不願承認魯迅性格是一個毫無創傷的性格，這從他底生活，從他底歷史上看起來，都是無可爭辯的。他受着生活的壓迫，他從小就過着許多暗淡的日子，而自從他追求希望，熱心於未來之後，他所得到的又是接二連三的失望。歷史將他數次壓倒，雖然他倒而後起，自強不息，然而這是用長期的苦悶與悲憤去換來的。魯迅常常自己在文章裏說他總覺得他底思想裏有毒似的（大意如此），叫青年不要學他，就是因為他明白他是在醜惡社會裏過着頂苦痛的生活，他底性格是未必各方面都照常態發展的。在這樣的醜惡社會中，一切意料之外的事情都可能發生，猜疑是惡德麼？所以我並不想隱藏魯迅底懷疑，但我却敢說，這是表明魯迅為人的厚道。因為他厚道，所以他上當的回數多，上當的回數一多，他就不能不小心將來，做人仔細一點。這不過說明魯迅在對人接物上所取的是一種忠厚慎重的態度，是一個老實老倌的態度罷了。

自然，在這醜惡的社會裏，並不是每個人都是惡的。正因為這樣，所以社會才有進步的希望。對這些不惡的人，魯迅始終保持親切的態度，不過在醜惡社會中雖然有坦白赤誠的人們，這些人們到底是和惡徒混在一道的，一見之下，從何辨識？況且善與惡又沒有絕對的界限，一個好人也可以變成壞人呢，所以在這社會裏，無論到什麼地方，好人有時也就不能不連帶受一些被猜疑

的冤枉了。魯迅對於這些人受冤枉所表示的警惕與懺悔，比他對醜惡所表示的疑忌更多。所以在「無題」裏敘述那伙計似乎慚愧之後，他也就慚愧了。他說這慚愧往往成爲他懷疑人類的頭上一滴冷水，就完全表明他對人類的愛着。當他感覺到這惡劣的社會使他對人類中的善良份子取着一種不公正態度的時候，他感到很大的痛苦，這說明他還不相信人類完全是惡人，他對人類始終沒有拋棄希望。

我們看他自述語：「夜間獨坐在一間屋子裏，離開人們至少也有一丈多遠了。嗅着分剩的『黃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幾葉託爾斯太底書，漸漸覺得我的週圍又遠遠地包着人類的希望。」

他所以能在哀愁，憤激，甚至頹喪起來的日子裏，還能和張牙舞爪的掛國學招牌的封建餘孽作鬥爭，保衛新文化的，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積極，悲憤，希望。魯迅和愛羅先珂，及其現實主義的抒情詩。

我們看見魯迅過着頹唐的生活，一面又能鼓着勇氣和國學家鬥爭，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魯迅在這同一時候的

另一面的積極生活吧。這便是他和愛羅先珂的關係。愛羅先珂大約是在這一年的春初到北京的。這一位盲詩人在日本受到驅逐出國的待遇，關於他被逐的情形，日本江口渙以寫過一篇文章登在『讀賣新聞』上，魯迅之所以知道這位盲詩人被逐的情形，就是因爲看見了這篇文章的緣故。魯迅以前並不知道這位盲詩人底姓名，是直到愛羅先珂被逐，魯迅看見了江口渙底文章，才翻譯起這位盲詩人底作品來的。江口渙底文章是同情愛羅先珂的，因此愛羅先珂底歷史，作品，和他被逐的情形在江口渙底筆下被描寫得相當詳盡，引起了魯迅很大的同情。他首先就把江口渙底這篇文章翻譯了出來，接着他就翻譯愛羅先珂底童話和劇本『桃色的雲』。魯迅著作生活的勤勞，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實在是值得我們吃驚的，那怕他個人常不免要喝點

酒，露出類聚的樣子，但只要從他著作生活的勤勞上，一看，就够說明他內心的積極熱力了。他一面要到北大和女師去教書，一面要編譯國小說史略，那時的魯迅也是很忙的。寫中國小說史略需要有點考證工夫，許多所謂古本和珍本都是少不的材料，這些書真得要命，魯迅那裏有錢買得起，因此他只得時常跑中央圖書館，跑通裕圖書館，跑教育部圖書館，去找書去，說史料，這是一種很麻煩而費時間的工作。他又要校精康集，文學和國學家們打仗，此外他還要寫小說，現在又來譯『愛羅先列童話集』和『綠色的云』，他工作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了。在這裏，我應該提醒讀者從多方面去了解魯迅，就是『魯迅自從寫狂人日記』的時候起，所謂從此便一瀉而不可收拾的，實在並非一句虛言，不管新青年社解體，新潮社和其他一切五四時代的新文化團體形隱沒，魯迅成了散兵，不管舊文化漸漸地要對新文化加緊進攻，不管軍閥的混戰如何塗炭生民，使魯迅看來看去，幾乎懷疑起來了，可是只要看到魯迅這種日益興奮的著作生輝，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中心的理解，就是魯迅在基本上，在內在生活的根本上，是一貫地積極的態度生活下來的，這是所謂再接再厲，隨時時刻在吞沒他底心房，而他時刻在努力着從暗中和靜處出來，這樣的，又挺着戰鬥的姿態生活下去。

當魯迅同情愛羅先列的被逐運動手譯愛氏作品的時候，愛羅先列也從日本到北京來了。他到北京，很受各界的歡迎，時常到各地去演講，並且還教過書，和魯迅過從甚密。愛羅先列在北京大約住了三兩個月，就回到俄國去了。他來北京的時候正在春天，大約是在春末夏初的時候，我出國去的。這正是魯迅一面教書，一面寫中國小說史略，一面寫小說，一面校精康集，一面譯愛氏作品的時候。魯迅在工作之餘，時常愛着愛氏，他和愛氏之間緣成了一種很親美的情誼。這種情誼不是很親切，也不是很疏遠，而是很純樸的一種共求真理的心絃的交響。關於這種情形，當愛氏去後，魯迅在十月所寫的『鴨的喜劇』裏，表現得非常明白。『鴨的喜劇』是一篇情緒非常柔美

，充滿着友愛和真摯的抒情詩。這篇文章抒寫愛氏在北京所感覺的寂寞；他住在位名叫仲密的人家裏，那很高的眉稜總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着，在想念他底舊游之地額甸。夏夜。他到北京的時候，還是春天，但在額甸已經普遍地都有昆蟲鳴叫的時候了；愛羅先珂是個瞎子，瞎子底聽覺是一定特別敏銳的，他需要那許多昆蟲聲，從房裏，草間，樹上傳出來，其間夾着蛇鳴，他以敏感的聽覺，愛好這些聲音的協和，覺得是神奇的音樂；而在北京，那時却什麼聲音也沒有，所以他感覺寂寞，他覺得北京連蛙鳴也沒有，後來魯迅告訴他說，夏天一來，北京是有蛙鳴的，對春末夏初的時候，愛羅先珂就去買些蝌蚪來，養在仲密家的窗外院子中央的小池裏，希望這些蝌蚪長大成爲蛙，奏音樂給他聽。這充分說明了作爲一位盲詩人的特殊的要求。這位盲詩人不但需要聽覺的熱鬧，而且他似乎是一個主張自食其力的田園詩人，所以他遇到很熱的友人，便勸誘他就在院子裏面種白菜，或者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等。由於他底真摯，他這種自食其力的主張，後來居然把仲密夫人感動了，於是便有了許多小雞在仲密家的院子裏飛跑起來。這樣，賣小雞的鄉下人便常到仲密家裏來，有一天，鄉下人帶來了小鴨，愛羅先珂摸着那松花黃的絨毛，覺得也很可愛，於是便買下了四隻，這位盲人對於生命所感覺的熱切的愛，從他對於昆蟲的鳴聲，對豬，雞，對小鴨的態度上是很明顯的可以給我們體會得到的。但後來喜劇發生了，這些小鴨跑到仲密家的窗外院子中央的小池裏，把愛羅先珂從前買來的蝌蚪全吃掉了。待到小鴨褪了黃毛的時候，愛羅先珂忽然渴念他底「俄羅斯母親」，匆匆離開北京，回到那已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而尚在苦痛鬥爭中的俄羅斯母親懷裏去了。他丟後不久，夏天就接着到來，北京四處也就有了蛙聲，而那四隻鴨則已經成長，能够「鴨鴨」的叫了。「鴨的喜劇」中所敘述的就是這些事情。魯迅抒寫愛羅先珂去後，一直就沒有消息，只有愛羅先珂想解除沙漠似的寂寞之感的遺痕——鴨——還留在沙漠上鴨鴨的叫。魯迅對於愛羅先珂底心情，可以說能體貼入微，在短短一篇

「鴨的喜劇」裏，把愛氏底個性與精神描寫得活靈活現。「鴨的喜劇」裏，不但描寫愛氏底個性與精神，而主要的還是描寫愛氏底感化力，人們對於愛羅先珂的親切之感。在愛氏底週圍差不多充滿着人間的愛，連一個蝌蚪，一株小草都是喜氣洋洋，互相愛慕的。一切充滿着生氣，天真與活潑。所以「鴨的喜劇」不但是描寫愛羅先珂的作品，而且是愛氏精神的縮影，愛氏本人底充滿生氣的童話的創造。這說明了魯迅和愛羅先珂之間的心弦的交響，魯迅對愛氏的親切的了解和友情的真摯。不過，我們應該注意，魯迅這篇「鴨的喜劇」，雖然因為友情的真摯和充滿着愛羅先珂底精神，而如同是愛氏本人底創造一般，但却並不是說魯迅和愛羅先珂的氣質完全一樣。「鴨的喜劇」裏儘管充滿着愛羅先珂底精神，儘管魯迅能把握着愛羅先珂底全人格，但魯迅和愛羅先珂畢竟還是不同的。這一點，我們研究魯迅到現在，如果不是白化時間，自然用不着多說明。我們這裏所必須指明白的，是就在「鴨的喜劇」裏，也表明出魯迅底氣質和愛羅先珂底不同。愛羅先珂以為北京寂寞，而魯迅卻以為北京只是曠野不休，他而且覺不到春和秋，只覺得冬末就是夏初，而夏去冬就來了。這是魯迅和愛羅先珂決然不同的地方。愛羅先珂和魯迅在慈善和溫情這一點上，在對於人類的愛與對人類的哀愁這點上是相同的，但魯迅却比愛羅先珂多一層鬥爭的嚴峻，這就是魯迅後日之所以不同於愛羅先珂而斷然回惡社會鬥爭的分歧點。可是這種分歧點，由於魯迅和愛羅先珂之間對人類的愛與哀愁，對生命的慈善與溫情這些共同的心弦之交響，反映在「鴨的喜劇」裏，使「鴨的喜劇」變成一種純樸友情的體貼，而畢竟把愛羅先珂底全人格浮離出來了。

這樣看來，「鴨的喜劇」當然是篇抒情的文章，而且是一篇很柔美的抒情的成分佔主要地位的文章了。我們前面說魯迅和封建舊文化的鬥爭，即使在客觀上他沒有孤立，但在主觀上，總不免有孤軍獨戰的感覺，這種感覺隨着北京各種新文化團體的日益離散，舊勢力的漸漸復活

而在他底生活與作品上也就日漸加濃。關於這種情形在魯迅生活上的表現，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了，我們還會說過，魯迅寫「阿Q正傳」之後所寫的「端午節」，「白光」，「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以及「補天」這一系列作品的發展，證明他一方面有從客觀的刻畫走向抒情的成分，另一方面從熱烈的同情走向身邊生活之藝術的纖細。我們也會說得過，這並不是說魯迅走到相反的方向去，而只是說明他在創作上的一個曲線的發展。這種發展情形是很普遍的現象，過去世界上的作家差不多可以說每人都是如此的。現在，我們說到「鴨的喜劇」，那麼我就要在這裏指明，「鴨的喜劇」和我們以前說過的「端午節」，就正證明了魯迅在創作上的這個發展傾向。「端午節」裏的感情還是抒真憤懣，但比起「端午節」以前的魯迅底小說「阿Q正傳」來，這憤懣是主要的直接抒發的，然而單是這篇小說還不能據以說明魯迅小說中的抒情成分的高揚，它只能是一個端緒，得要重新折回，經過我們以後要說明的「白光」的又是客觀的刻畫，再向前走，到「兔和貓」的身邊生活的描寫，然後才到「鴨的喜劇」這篇充滿友情的詩篇，才使我們能大膽說明魯迅小說中抒情成分的提高。

那麼，魯迅小說中的抒情成分的提高。有沒有否定魯迅小說中的現實主義精神呢？絕對沒有。「白光」不消說，不用我們以後說明也是很明白的，「兔和貓」中也沒有否定現實主義的精神，我們以後也要說明的，「端午節」中對舊式夫婦生活這一現實所把握，深刻，沒有現實主義的透切的觀察與分析，是絕對辦不到的事，雖然舊式夫婦生活的描寫，並不是「端午節」中一貫的內容。因此，很明顯的使我們看出了「端午節」前半部的直接發牢騷和後半部生動的對話不相稱；我前面說過，因為魯迅主觀感情的強烈，魯迅底冷雋刻劃的小說裏，總不免滲雜着主觀牢騷的直接抒發，這成了魯迅小說上的一個特徵；我會說過「阿Q正傳」有此特徵，而「端午節」中不過特別強烈罷了。「鴨的喜劇」裏也表現出這種特徵，這篇文章共分三節，只要我們仔細一

看，就知道第一節裏的感情比較的是直接抒發的成分多些，到第二、第五節，「鴨的喜劇」裏的抒情，才是真正透過客觀真實的描寫的。「端午節」裏舊式美婦的生活之描寫，也正是如此。到了後來，才漸漸凸現出來的。但無疑的，這後面兩所凸現出來的描寫舊式美婦生活的下部分，正如「鴨的喜劇」中的第二和第三節一樣，是「端午節」中的主要部分，因此，「端午節」裏佔主要作用的還是現實主義；「鴨的喜劇」裏的抒情之所以能達到把握對方愛羅先珂底全人格，也完全是現實主義底功勞。只有現實主義的精神，才能在主觀的抒情裏透出客觀的真實——愛羅先珂底人格，——同時，在客觀的真實裏透出魯迅對愛羅先珂的真實的友情。所以這感情與現實相互透透的抒情詩，才是現實主義的抒情詩，是現實主義的高底發展。「鴨的喜劇」裏現實主義的精神，不但表現在主觀的抒情裏透出客觀的真實這一點上，而且還表現在作者主觀氣質的真實性，並沒有因為不同於他主觀氣質的愛羅先珂底氣質而有且曲同。所以如果說「鴨的喜劇」是一篇抒情詩吧，那麼這篇抒情詩之所以比旁人底抒情詩更有價值的，就是因為這篇抒情詩裏既然發出了兩個偉偉大心弦的共響，而又透出兩個偉大人物底不同的真實面具的緣故。

所以在基本上，「端午節」和「鴨的喜劇」仍然還是現實主義的作品。魯迅底作品的發展，無論取着怎樣曲折的路，却始終沒有離開這個基本方向，也是我們看得很明白的。

愛羅先珂底覺得北京很寂寞，而魯迅却以為北京嘈雜，那麼，魯迅對愛羅先珂寂寞之感是否表同情呢？很明顯的，不管魯迅表明了與愛羅先珂不同的感覺，但他是能體會愛羅先珂底心境上的，這種體會，並不單純地體察在魯迅對愛羅先珂的真實的友情上，而是同時以魯迅和愛羅先珂在藝術上，在求真美諸點上的共同的心弦發出發點，因此，他對愛羅先珂底寂寞之感所表的同情，完全是內心的感染，不然，「鴨的喜劇」是決不能把愛羅先珂底人格滲透得出來的。如果要更切實地把這點加以證明，那麼，我們可以隨手拿出另一個旁證來，這便是魯迅在這年愛羅先珂來北京

之後所寫的『爲俄國歌劇團』。這篇文章，完全是響應愛羅先珂底寂寞之感的。那時是四月四日（一九二二）的夜間，俄國歌劇團在北京第一舞台開演的第二日，魯迅跑去看了。這歌劇團是俄國革命後的一個亡命的歌劇團，他們所演的當然是舊俄時代的歌劇。我們知道，舊俄時代的歌劇，是俄國文化藝術的歷史結晶，在藝術上是很有價值的，革命之後的蘇聯對這筆遺產並不輕視，只不過要加以批判地接受罷了。但那時的蘇聯，剛在革命之後，還沒有餘暇來顧到這些歌劇，更沒有餘暇來改造，來批判，來接受這些歌劇，因此，作爲亡命客的舊俄的地主貴族資本家們之羣裏的舊俄貴族資本家底侍奉者舞女歌人，一方面因爲他們本身是貴族資本家意識的傳教者，所以他們是同情貴族資本家的，也就不能不和貴族資本家一道亡命外國，另一方面，他們底亡命主人現在已經沒有足夠的錢來供養他們了，於是他們便不得不以他們歷史的富有價值的結晶品拿來廉價獻賣，博得一茶一飯了。可悲哀的是，他們雖以高價的藝術品來博取一茶一飯，在北京却並沒有賞識他們底藝術品的觀衆。魯迅走到第一舞台去看的那天，發現觀衆簡直寥寥無幾，樓下中央只有三十多人，旁邊是一大羣兵，只有樓上四五等座位中尙有三百多看客，這就是說，出賣者底藝術品雖高，却誰也不肯出高價，中央座位多數是空的，比起看梅蘭芳演劇的擁擠，不知道要寂寞多少倍了。所以魯迅不禁感慨道：『沒有花，沒有詩，沒有光，沒有熱，沒有藝術，而且沒有趣味，而且甚至於沒有好奇心。』這就是說，中國人即使不能領略俄國歌舞，但俄國歌劇畢竟是一件新奇的东西，然而看的人竟這麼少，表現了北京的人們連好奇心也沒有，這就難怪愛羅先珂喊寂寞，喊在沙漠裏了。這篇文章裏說：『有人初到北京，不久便說：我似乎住在沙漠裏了。』就是指的愛羅先珂，是決無疑問的。所以這篇文章，可以說完全是對愛羅先珂底心絃的反響。他爲那些歌人走錯了路而惋惜，因爲觀衆們很少是來看他們底藝術的，他們對這些歌人的唯一賞識，是因爲看見他們接吻，贊賞他們接很響很響的吻，於是便拍手了。魯迅很傷心的說道：『偏

使我是一個歌人，我的聲音怕要銷沉了罷。」他又說：「倘使我是一個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豎琴，沉默了我的帶聲罷；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

在這篇文章裏，魯迅毫無保留的贊同愛羅先珂底以爲北京是沙漠的意見。他說：「是的，沙漠在這裏。」……「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這裏。」這就是連好奇心也沒有的只會看接吻的人世。

像下面這一句話，我想是有雙關意義的。他說：「你們漂流轉徙的藝術者，在寂寞裏歌舞，怕已經有了歸心了罷。」這一面是指的俄國歌劇團，我想另一面怕也是指着愛羅先珂說的罷。而最值得吟味的是這句話預示了愛羅先珂渴念俄國的心境，把愛羅先珂要離北京回國的願望早就體會出來了。這是何等的親切！

果然，愛羅先珂想着他底「俄羅斯母親」，向赤塔去了。

愛羅先珂離去北京的前後，「桃」的雲」便在魯迅筆下被譯成中文了。這兩個真摯的心絃的交響是這樣的通過精神上的勞作，通過精神上的交響力（愛羅先珂的被逐）而產生的。

「桃色的雲」主要是根據日文翻譯的。日文的「桃色的雲」出版時，前述江口渙氏刊在「讀實新聞」上敘述愛羅先珂被逐情形的那篇文章也附印在內，可是已被檢査機關刪節去很多了，但魯迅先前所根據的「讀實新聞」上的江口氏底原文却並不會被刪節過，所以他根據「讀實新聞」上的原文譯的譯文是完全的，本亦可仿照日文文本的辦法，把這篇具有原文全貌的譯文附在中文本「桃色的雲」裏，可其他並沒有這麼做。關於這件小事，很值得我們來研究，據他自己說，是因爲其時他「又見了別一種情形，起了別一種意見，不想在中國人的憤火上，再添薪炭了。」（「墳」——雜憶。）所以才不把這篇譯文附在「桃色的雲」裏的。那麼他所說的別一種意見，到底是什麼意見呢？他爲什麼不想在中國人的憤火上再添薪炭了呢？

江口換氏的文章自然是一篇充滿憤慨與不平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有煽動性的，難道說魯迅這時忽然起了別一種穩健派的意見？以為甲種以積憤火在內，應該再燃燃時隱隱了。雖然，人固是很容易這樣軟弱的。但我們研究魯迅到現在，我們早已相信魯迅是魯迅，是魯迅是不可能的了。魯迅是魯迅，說這句「話的實在意義到底在那裏呢？」

我們還是用他自己底話來說明吧。魯迅在「雜感」裏說：「上述這句話以後，在明外祖爺裏這樣說。」

「孔老蒼生說過：『毋汝不如己者。』其實這樣勢利的眼睛，現在的世界裏還多得很。我們自己看看本國的時候，就可知道不會有什麼友人的了。魯迅也沒有友人，簡直天幸都會經過過仇敵。不過仇敵的時候，向乙等發公論，後來仇乙的時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互殺的看起來，倒也似乎並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敵。但怨敵總常有一個，因此每二兩年，被圍者總要敲鼓跳舞，對於敵人的怨與憤怒。」

「這也還現在極普通的事情，此國將與彼國為敵的時候，總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國民的敵愾心來，使他們一同去搏擊或攻擊。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國是」是強敵的。因為勇於收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強敵，以報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國民，則即使如何鼓舞，也不看會領強敵的決心，然而引起的憤火却在，仍不能不帶一個發洩的場所。這地方就是眼見得仇敵更弱的人，無論是同胞或是異族。」

「我覺得中國人所積蓄的怨憤已經太多了，自然要發洩的。所謂發洩的只是他倆和並不同強者反抗，而只在弱者身上發洩。這和誰不相愛？無情物老有狂動並發在誰之舌下就是最近便的證據。再驕傲地說，拍這河以證明這些人的非怯，非怯的人之即使有萬文的憤火，除弱章以外，又能發掉什麼呢？」

「或者說，我們現在要使人憤恨的是外敵，和國人不相干，無從受害。可是這轉移是極容易的事。雖則國人之籌借以渡慷慨時候，要與給無辜特暴的名稱，即可放心割刃。先前則有異端，妖人，新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對國賊，漢賊，三子，五子，漢狗，或漢奴。庚子年的義和團提在路人間可以任意指為敵徒，再據我親證是他的通眼，在那本報上，看出一個「七」字」。

原來他以為中國人有了憤火，只能尋更弱的人民洩洩，所以他不願再在憤火上澆薪炭，以為的少叫中國人民受些災難，他是從人民底利益出發，才起了這種新意見的。這就是那幾年軍閥底內戰所給他的結論：「願謂兵和匪不相爭，無槍的老百姓却並受兵匪之苦」。在那時候是很普通的事。軍閥的軍閥對峙，不但縱容了而且還加以連絡，成為己用，待土匪勢力長大了，就出名改編。軍閥和軍閥相爭，其實受苦的也只有老百姓，相互對戰的軍閥兩方的姨太太仍舊在一桌又麻雀，戰爭一畢，兩個軍閥也就握手言歡了。所以這些軍閥一有憤怒，就發洩，老百姓就上當，偷幸而他們不打算大規模發洩，不發動戰火，那麼，一點小怒，把人民加以種種名稱，如妖人，奸黨等，也就可以動刃人民，還不是人民吃苦？魯迅爲了使人民少受點災難，所以不把江口渙那篇充滿憤慨的文章附入「桃色的云」中，其用心是頗苦的。

但實在說，這也只能算是魯迅「時的悲憤」，不能作爲他底正當結論的。因爲很明白的，向人民洩憤的確實只是軍閥官僚，魯迅所指的也確實是他們，他們是中國人民的一份子，却不能代表全中國人民，不過魯迅在悲憤之餘，便因爲這些軍閥的不肖而懷疑起中國的民族性，這就使他悲觀，種種兩所在。要了解魯迅，不能從他對悲觀失望的對立與內心鬥爭中去理解，那是會失掉魯迅底人間的性，得到形而上學的結論的。魯迅怎樣解他自己底悲觀失望鬥爭呢？我們再看他自己接下去說罷：

「然而我們在「毋友不如己者」的世上，除了激發自己的國民，使他們發些火花，聊以應景

之外，又有什麼良法呢。可是我根據上述的理由，更進一步而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事業，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

不是麼，他從悲痛中又復掙扎出來，找到他前進的路子了。這路子就是「勇氣」和「理性」。魯迅之所以始終不被悲憤吞沒而能掙扎前進的，是因為他從悲憤中掙扎前進時，總是我着最近真理的路子向前走的緣故。他叫我們鼓舞民衆以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正是一條正確的路子，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值得我們作爲教訓的。他以為國民必須有智，有勇，單靠氣決不相干。我們現在的人，應該熟記這句話，從理知上去使國民得到正確的認識，那才能真正抵抗外侮。不肯從思想上去啓發民衆，單想用鼓動手段使民衆憑着感情而盲目地來一同抵禦，一同攻擊，即使能暫時支持一下，到底是不能經久的。

魯迅對於理知的這樣的重視，我們知道，是魯迅精神的基礎。魯迅底前途，魯迅底現實主義，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生長起來。他重視理知，所以當他陷在悲憤中，甚至感覺失望的時候，他也能放棄對於客觀現實冷靜的考慮，因而排除了感情上的悲痛而從客觀運動法則的研究中找出希望。這種研究的成果，雖然不能一朝一夕得到，而且直到現在，他也都沒有完全得到，可是，跟着悲憤與失望對他侵襲的加劇，他底這種研究成果也就日益加多，日益使他能憑藉着研究成果的具體化以與更多的黑暗現象相鬥爭，才能不被悲痛吞沒，反而把悲痛排除掉，能繼續鬥爭下去，直到他終於得到完全的研究成果，完全看明白了人類與社會的前途。所以魯迅底前途，完全是在重視理知，把理智作爲第一元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魯迅底現實主義也是一樣，因爲無論在那種場合，現實主義的基本根據，都是離不了理性的緣故。

「兔和貓」與「社戲」及「吶喊」的另一發展的側面。

我們前面說過「端午節」只能是魯迅底作品抒情成分高揚的一個端緒，還要重新折回，經過「白光」底又是客觀的冷靜刻劃，再向前走，到「兔和貓」，才走到「鴨的喜劇」那篇充滿友情的詩篇。那麼，可見「兔和貓」是「鴨的喜劇」底抒情成分高昂的先聲了。可是這麼解釋是不正確的。因為第一，「兔和貓」及「鴨的喜劇」寫在差不多的時候，兩者即使有先後之分，但相距的時間太近，不足以劃出時間上的變化；第二，從「兔和貓」及「鴨的喜劇」兩篇文章底內容看，無論在抒情上，無論在藝術的優美上，「鴨的喜劇」都並不表現比「兔和貓」更進一步，即是說，「鴨的喜劇」並不表現為「兔和貓」的一個發展。實際是這兩篇文章，同樣的都達到抒情文的最高點了，要機械地分出誰是誰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夠說，這兩篇文章，同樣都是從「端午節」經過「白光」過度來的。

如果要問「兔和貓」與「鴨的喜劇」有什麼不同，那麼從正面看，「兔和貓」是一篇更清談雅緻的抒情詩，其中充滿了對於生命的愛，充滿了人道主義的慈悲心，抗議造物對生命太濫的創造與毀滅。這篇抒情詩是一開始就從客觀的敘寫入手的，可是正如魯迅因感情太強烈而在其他作品中所發生的藝術上的不調和一樣，這篇文章雖然不是在開始，却在最後露出他在藝術上對以前的清談雅緻不調和的處所來了。我敢說，如果單從藝術的完美上着想，那這篇「兔和貓」頂好寫到「毀得太濫了」為止，就不再寫下去。從「啤的一聲」之後，情緒完全和以前兩樣了，如果說以前的情緒是清談和雅緻的，那從「啤的一聲」之後的情緒便是憤恨和包含敵意的了。到這裏，魯迅對自然界的鬥爭態度才完全露出表面。如果說魯迅以前是在向自然界低訴，那末他現在是開始抗議了，讀者諸君，請你把「兔和貓」去拿來看一看是很明白的。這種強烈的主觀感情，當從魯迅在藝術上的現實主義的冷蒿中衝出來破壞魯迅在藝術上的統一，我們已在魯迅底許多篇小說

中一一找出證據來了？當然我們現在已經明白，不過在這一篇『兔和貓』裏，這種強烈的主觀感情之衝出，除了再證明我們以前所說的魯迅小說中的『獨特』之外，我們還應該注意的是一一在『兔和貓』裏，這種強烈的主觀感情之衝出，雖在最後，和『鴨的喜劇』中那樣在最先，就以自我的強烈感情為出發點，只能是先後次序不同，絕對沒有任何根據藉此說明『鴨的喜劇』和『兔和貓』在發展上的差別；第二，由於這篇文章從開始以來所特有的淡雅，很有點類似周作人底『作風』，使我們得到另外一種暗示，就是：（一）魯迅和周作人及其他心地純良的作家一樣，有優美的情緒，特別是像『兔和貓』裏一樣，其筆鋒清淡的筆觸，決不弱於苦雨齋前面風吹樹動時的瀟灑景意，但是（二）魯迅之所以不同於周作人的，是魯迅除了有周作人那樣的優美情緒之外，他還有一種為周作人所沒有的東西，這便是他底澈底的鬥爭精神。在『兔和貓』裏，這點特別表現得明白，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魯迅在『兔和貓』的末尾的那種對自然界的鬥爭態度，正足以證却以他的『兔和貓』裏的淡雅成了明顯的對比，這雖然使『兔和貓』中淡雅的氛圍不能貫徹到底，但却明白地顯示出了魯迅底性格，使魯迅和周作人之間顯出了一條不能混同的分水界。這種魯迅底性格浸透在『兔和貓』裏的結果，雖是如擬了『兔和貓』中淡雅情緒的真澈到底，却增加了『兔和貓』底人類向自然抗爭的積極的社會價值，所以不但沒有減低『兔和貓』的評價，而且把『兔和貓』的評價，提高到普通科學文的標準以上了。

『兔和貓』的評價之所以被提高到普通科學文的標準以上，單以『兔和貓』裏浸透著魯迅底性格這點來說明，自然是不夠的，主要的還是在於『兔和貓』中的情緒原來是超過如浮彫一般的對於兔子和其他人物，景物的描寫而滲透出來的。這又是現實主義的『手個最大的勝利』。沒有著這底現實主義的手法提示出那所有甚物一樣玲瓏活潑得可愛的兔子來引起我們對生動物的好愛，我們就不會對三太太底殘免法感覺同情，就不會對兔子以及其他魯迅所說的諸生動物無聲無息的死去驚

整遺物界的悲感，而沒有這種悲感之感，我們又怎能跟着魯迅對自然界發生積極的鬥爭意念呢？所以如果說『兔和貓』的抒情獲得最大的成功，那是以『兔和貓』的寫實的戒功為前提的。而且，『兔和貓』的抒情，更因此得到普通水準以上的強烈與深切，使『兔和貓』能在我們心裏不但喚起悲哀與憫憐，不但喚起憤慨，並且喚起勇氣，這是十個劇作人都及不上的。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勝利。

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月中，魯迅寫了三個短篇小說。這是一種相當可驚的創造慾的盛旺。因為一月中要寫三個短篇小說是頗不容易的，況且這三個小說都是成功之作呢。我所指的就是上面已經說過的『鴨的喜劇』，『兔和貓』，及我就要來說的『社戲』了。『社戲』裏魯迅敘述他自己童年時代在外祖母家裏看社戲的情形，我們在說到魯迅底童年生活時候，都會講到過。這篇文章也有着魯迅在他底別一些小說中所具有的特點，即是，在魯迅說到『社戲』這個本文以前，他又把關係於他看社戲的他在北京看河回戲的情形說了一遍。這前面講北京看戲情形的一部分對後面講社戲的一部分，在小說結構上說，——如果把『社戲』作為小說的話——顯然是沒有多大必要的，不過，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社戲』這篇文章的另外一些特點，第一，魯迅底強烈的主觀感情衝入他底冷雋描繪中的情形在『社戲』裏，却不能和『鴨的喜劇』與『兔和貓』中的等量齊觀。這種情形在『社戲』中，對於『社戲』全體有相當的調和，這是由『社戲』本身敘述方法來決定的。我們考察『社戲』的敘敘方法，可以看出一條從平面到立體的漸次上升的綫，它開頭先敘述在北京看戲的情形，說他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過兩回中園戲，而這兩回都是在後十年中。第一回是他民國元年初到北京的時候，朋友對他說北京的戲最好，他便去看了。一進戲院，滿耳是鑼鑼錘錘的響，滿眼是人頭和台上的紅綠球，他找不到位置，後來舉一個茶房領他到了側面，指給他一條長凳，那長凳，據他說坐板比他底上腿板到四分之三，穩腳比他底下腿板過三分

之一，他先是沒有勇氣爬上去，接着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便走出來了。他一直是走，弄得和他一道去的朋友拼命在後面追，不明白什麼道理。這是他在二十年來第一回看中國戲的結果。第二回，他說忘記是那年了，是募集湖北水災捐的戲，那時候現在的梅蘭芳一撥時髦的譚叫天還沒有死，他買了兩元錢一張戲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戲，就算是捐款了，他當已說是對勸募人的事實，本不一定想去看戲的。但這次戲的扮演者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有好專家對他說了幾小叫天不可不看的話，於是又把他鼓動起來，使他忘了前一次失興而回的災難了。他這一次去還算有耐性，從九點多鐘看起，一直看到十二點鐘，然而竟還沒有等到小叫天出來，他這才忽然感覺到等不下去，站起身來就走。他這兩回看戲的行動，都不是在常人中所能夠得見的。第一回不洩脫，一看就知道是很奇怪的行徑了。第二回，假使在常人也不肯走的，因爲既已等到十二時了，何不索性多等些時，總要看見小叫天的。而他却不然，這說明他底生活毫不妥協，毫不苟且，當他一感覺厭惡時，他是一刻也不能忍耐的了。他底方法是乾乾脆脆一刀兩段，捧轉身就走。我相信他不僅對看戲如此，恐怕他對日常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有這種精神的，這決不是如一般詭譎作家者流所說的怪脾氣，而其實是要有不妥協的，戰鬥精神才能辦得到的。如果我們只把魯迅底這種行爲當作怪脾氣看，那麼我們便會得到兩種極端的傾向，其一是把魯迅底這種不苟且的生活付之一笑，看作毫無價值；其一是把魯迅底這種不苟且的精神當作藝術家底怪脾氣，當作裝模作樣，當作表現個性，當作自命不凡來看待，結果只學得了魯迅底皮毛。我們必須理解，魯迅對於中國戲的這種態度是貫徹他一生的不妥協的戰鬥精神的表現之一，我們不要單看見他底行爲出奇的表面，必須看到支持他這種行爲的始終不懈的那內在的精神。如果沒有這內在的精神，那最好是看一看革命陣綫內的叛徒，他們今天可以是最出奇的怪傑，明天就可以是和最平庸的官僚，政客，密探同流合污的走卒了。這就是那種單知道在外表上自命不凡而沒有

實際內容者底最好的說明。

魯迅第一回看中國戲時，爲什麼看了那狹板長脚的凳便會想起私刑拷打的刑具呢？這並不是說他已預感到了日後中國青年的痛苦命運，而是說明（一）中國沒有法律。民國元年以來，軍閥憲政大到處奔走，私刑是公開的祕密。（二）他對中國各朝君王維持統治地位的情況是頗有研究的，如張獻忠底兇暴，永樂皇底殘忍等，尤其是滿清皇帝維持政權的許多殘暴手段，是他們那一代受過滿清統治而又早想推翻滿清的人所共有的研究，我們在以前說到魯迅留日的生活時，不是說到過了麼？這種私刑的研究，也是魯迅在苦悶時研究古書的一部份，並且是痛恨統治者的無言的反抗。我以為研究酷刑史，是人類史中一個很重要的部門。我們要充分認識這種歷史，我們才會在快樂的時候忘記我們底艱苦的生長着的過去，才不會在苦痛的日子裏，誤以爲我們底痛苦是前所未有的受不了的痛苦。這是一部真正的人類戰鬥的血史。魯迅在這方面是很有研究的，他不會受過私刑拷打，然而他看見了那狹板高腳的凳子馬上聯想到私刑拷打而感覺很大的厭惡，這充分表明了他對當時統治者的憎惡之感了。現在我們再回頭去看看『社戲』的敘述方法，考察考察那條從平面到立體的漸次上升的軌吧：魯迅在『社戲』裏敘述了那兩次他在北京看戲的情形之後，再說到他在一本日文書上着見論中國戲的文章，使他想起少年時候看社戲的情況，然後敘述他每年要到外祖母家去去的情形，到這時便漸漸具體起來了，以後再說到他在外祖母家裏看社戲，這才漸漸展開場面，觀出立體的浮彫來。這種敘述方法，是從寬到緊，從敘述到描寫，從全體看，開始時的起腳點，對於上升總是自然的開場，所以就不能算是與全體不調和，或者說是與後面的立體場面不調和的平面敘述了。這和『鴨的喜劇』中的頭一節，和『兔和貓』中的末尾部分，不能說有什麼絕對的分別，可是因爲『鴨的喜劇』與『兔和貓』的主要部分更爲洗練，情調更爲美露，更爲詩意，所以『鴨的喜劇』中的頭一節和『兔和貓』中的末尾部分，更覺得突出而不

調和罷了，其實嚴格的說，『社戲』中敘述北京看戲的那部分情形，如果是在一個能相當抑制心中要說的話的作家，爲了顧全文體的整美，是也可以另想法子表達或刪改的，但這譯在魯迅却辦不到，因爲他寫『社戲』的本意是在指明日文書中的那句說中國戲道於在空曠地出演的話，所以是不能不把他在北京看戲的情形拿來比較的，他採用了這漸次由敘述到描寫的方法，可以說是成功了，達到他底意圖了。所以『社戲』的敘述方法，可以說是魯迅有意要這樣做的。這和『阿Q正傳』中的少數幾處就筆衝出來的囉嗦更是不相相比了。

『社戲』底第二個特點是對童年生活的直接回憶。從『狂人日記』，或者說得再遠點，從『懷舊』一直到『阿Q正傳』，魯迅底小說，在創作的構成上，有三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是搜集過去的生活經驗作爲依據，加以再組織，成爲一篇可以算得是經過嚴格意義的創作過程的小說。這一類小說多是白描而嚴整的。如『懷舊』，『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明天』，『風波』，『阿Q正傳』等都是。第二種是以過去不久的事像爲題材，並不怎樣嚴格的加以再組織的，如『頭髮的故事』便是。第三種是回憶過去的事情，如『一件小事』，或者回憶兒時的事情而直接加以敘述的，如『故鄉』便是。這三種創作構成上的類型，在『阿Q正傳』以前的魯迅底小說中雖然都有得存在，但佔着支配地位的是第一種類型，第二，第三種類型，在『阿Q正傳』以前，都還是偶發的現象，可是到了『端午節』，在『阿Q正傳』以前作爲偶發現象的第二種類型便再次出現了，其後雖然經過『白光』，又是第一種類型的再現，然則『兔和貓』及『鴨的喜劇』，却把那再次出現於『端午節』中的第二種類型又加以延長，而且發展成爲優秀的抒情詩，所以，自從『端午節』以後，第二種類型便不能再像在『阿Q正傳』以前一樣作爲單一的偶發現象，而應當看作是和『頭髮的故事』一脈相承的前後相貫的現象了。而爲了易於看明白起見，我們可以說，從『端午節』到『鴨的喜劇』是魯迅創作構成上的第二個類型表現得最突出的時期。『北

戲」則是繼承着「故鄉」中的第三種類型發展下來的，這就是所謂對童年生活的直接回憶的類型。我們自然並不能說「社戲」之後，就是魯迅在創作上的第三個類型發展的時期了，其實，我說從「端午節」到「鴨的喜劇」是魯迅在創作上的第二個類型表現得最突出的時期，也只是爲了便利於說明「吶喊」這一書中的小說之發展而劃分的。至於作爲第三類型的「社戲」中的特徵，我們現在如果是預先把魯迅日後要寫的「朝花夕拾」及「女吊」，「我的第一個師傅」等放在考慮中，那麼我們現在不妨斷定，魯迅創作中的這第三個類型也是一個先後聯貫的類型，而「社戲」不過是這先後聯貫的類型中的一環，牠繼承着「故鄉」，以後還要加以發展，這發展自然不是直線的，連續的，而是斷斷續續的，高高低低的，並且也不能以「社戲」爲發展的最高階段，關於這點，不如待以後來說吧。不過，我們縱觀全本「吶喊」，可以看出魯迅在創作上的一個傾向，就是自從「阿Q正傳」之後，他底素材經過嚴格意義的再組織的小說，在「吶喊」中就不佔支配地位了。「阿Q正傳」以後，在「吶喊」中佔支配地位的多是素材的直接敘寫，這表明了魯迅底創作素材開始現出貧乏，這大約是多在書室過生活的知識分子很難免的命運。我們前面說他在「阿Q正傳」之後，從「端午節」到「補天」的魯迅底一系列作品的發展，證明他一方面有從客觀的刻畫走向抒情的傾向，另一方面從熱烈的同情走向身邊生活之藝術的纖細，其原因雖然很多，我們前面已說了點，這裏再指明他素材的貧乏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就筆一寫，似乎把「吶喊」全體的發展情況又作了另一側面的敘述了。現在還是再回頭來看「社戲」本身直接回憶童年生活的所謂第三個類型的情形吧。

「社戲」在全體上說，也是抒情的。作者在「社戲」裏的主觀題目是寫出他童年時代在野外看社戲的如何神往，拿來和他在北京戲院裏看戲的情形相對比，以證明「本日文書裏說中國戲宜於在野外演的正確。可是當他敘述到他看社戲的那回情形，他已經不是單單敘述事實，而是立體

地浮彫事實了。這浮彫的生動與描寫兒童心裏的逼真，流露出了魯迅底無疵的赤子之心，抒寫出了魯迅底天真無猜的情懷。所以「社戲」是抒情的，而「社戲」裏的抒情也通過現實的正確描寫，這一點魯迅底現實主義的根本精神，在這裏仍舊沒有變動。從篇幅上說，浮彫魯迅童年時代看社戲的部分，在「社戲」裏也佔着絕對的多數，所以無論如何，在「社戲」裏，佔支配地位的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這一點，和魯迅以前的小說是一脈相承的。我希望讀者去把「社戲」找來看一看，其中描寫兒童生活的生動，決不是一句空言。魯迅那時和他底小朋友都最怕老旦，尤其怕他坐了下來唱，這不是我們今天的任何一個兒童都有同感而說不出的麼？而這，是只有在利慾社會中混了多年，而仍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會把握得住的看起來很平常的活的現實。像這類生動逼真的地方，在「社戲」裏差不多是充塞于魯迅底童年生活描寫中的，頂好希望讀者自己去看看「社戲」，我這裏只能抄出一段來看看，其餘的就不盡述了。

「珂珂，阿發，這邊是你家的，這邊是老六一家的，我們偷那邊的呢？」雙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說。

「我們也都跳上岸。阿發一面跳，一面說道，「且慢，讓我來看一看罷」。他於是往來的摸了一回（因為是在夜間——凡海），直起身來說道：「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一聲答應，大家便散開在阿發家的豆田裏，各摘了一大捧，拋入船艙中。雙喜以為再多偷，倘給阿發的娘知道是要哭罵的，於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裏又各偷了一大捧」。

像這樣天真，純潔，大公無私的兒童心理，是任何利慾熾心的人所能見透的麼？然而尤其可貴的是他並不陶醉於這種天真純樸中，冰冰心他們那樣。他決不忘記這些天真的兒童是生存在勢利的爭奪社會裏，所以他又寫出了雙喜想到阿發的娘要哭罵的事，這才不失為是一種現實主義精神真正的表露。否則，單只是看見兒童的天真純樸的一面而忘記了社會現實其他的諸方面，那

是只會走到冰心女子底牛角尖裏去的。

『白光』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白光』吧。

『白光』是在『端午節』之後，魯迅底創作構成上第一種類型，而依據過去的材料加以再組織的『明天』與『阿Q正傳』等所具有的類型的繼續。我們前面會一再提到過『白光』，說魯迅小說中抒情成分的高揚，是經過『端午節』，又由『白光』折回到客觀現實的冷雋的白描，才又繼續向前發展的，就是說明『白光』繼續這第一種類型的另一方面的說明。

『白光』描寫一個老童生醉心於功名及銀財的如癡如醉的狂情，他終至於神經錯亂，追求一種幻想中的地下的白銀而落在湖水裏死了。他底死並不是自殺，而是對於一種希望瘋狂追求的結果。他因為在幻想中看見西高峯有浩大的白光，爲的到西高峯去找銀子，因而在夜中失足落在湖裏淹死了。『白光』裏描寫陳士成的這種如痴如醉的熱切的狂情，是和『狂人日記』中描寫神經錯亂的情況一脈相承的。但這位陳士成並不是反抗迫害的狂人，而却是在功名與財慾之下犧牲的小人物。『白光』冷雋地寫出了這種小人物底絕望的掙扎，其冷雋的程度，比『藥』和『明天』尤甚，近於安斯退益夫斯基的拷問，帶着前所未有的暗鬱的色彩。所以如果說『白光』繼續了在『阿Q正傳』以前的魯迅小說中佔支配地位的冷刻白描的精神，那麼這種冷刻白描精神在『白光』裏亦有其獨特的色調。這色彩一面表現在包含於諷刺中的魯迅對陳士成的同情心，並沒有像魯迅在『白光』以前的小說中的那麼強烈，這是由『白光』底內容決定的，因為陳士成雖然是個可憐的小人物，但他畢竟是中國社會中的腐潰的渣滓，和代表中國社會大多數農民代表中國國民性的阿Q；和本身不再是士大夫的童生而却是封建豪紳底厭棄者，並淪爲一無所有的乞丐孔乙己，和代表革命勢力的豫兒；和充滿着破壞心情的狂人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此，另一方面就必

然表現出魯迅對這腐爛的渣滓塗毀般的憂鬱，遠過於魯迅在前此的諸小說中所吐露的悲哀。最後，在第三方面，發展到了現在的魯迅底冷峭白描的手法，已經達到了爛熟的地步，他底結構與文句，他對於人物心理及動作的把握，都達到了空前的結實。如果我們曾在魯迅底許多小說中指出魯迅因主觀感情的強烈，往往不能抑止住此種感情從他底冷靜描繪中衝出以致多少損傷了我曾經指摘過的魯迅某一些小說在結構上的調和，那麼，文篇『白莽』就是沒有這種多少表現着結構上的弱點的作品。這一點在寫作能力的進度上說，無疑是可喜的現象，不過，照文學史上一般的情形說，作家庭生活經驗如果落後於技術上的進度過甚，往往是創作生活上的一種危機。一個作家底創作生命底盛衰過程裏，大部分包含着對於這種危機的鬥爭過程。

『補天』和魯迅的歷史小說

一九二二年魯迅底最後一篇創作是『補天』，又名『不周山』。我們前面說過魯迅創作權處上的三個類型，第一個是根據過去的生活經驗，嚴格地加以再組織的類型，第二個是過去未久的身邊材料，較為直接地加以反映的類型，第三個是回憶童年生活，直接加以記錄的類型；但是現在說到『不周山』，我們看見他創作構成上的第四個類型了，這類型便是運用歷史上的材料來寫小說。運用歷史上的材料來寫小說，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反動的悲觀態度，如歐洲十九世紀初保守的浪漫主義者對於中世紀那封建貴族底黃金生活的留連，回憶，憑吊與神往，他們爲了對現在失望而依戀過去的生活，以過去的光榮作爲精神上的慰藉的。這是以眼淚洗臉的人們底哭訴。第二種是爲了使人們理解人類所過去，對人類過去的生活感到親切，爲了使人們具體知道歷史，學習歷史，而處理歷史的科學態度。這是現實主義的態度。魯迅利用歷史材料來寫小說，在原則上所取的是第二種態度，他在『故事新編』序言裏說：『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對歷史小說，則以爲博考文選

，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譏為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至於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倒無需怎樣的手腕；……」這就是魯迅寫作歷史小說的現實主義的態度。自然，魯迅在『故事新編』中的八篇取材於歷史的小說，其處理方法，是未必完全正確的，如『補天』要想以性的發動，創造和衰亡來解釋創造的緣起，所依據的是佛羅伊特學說，這學說在今天當然是不正確的，可是不管這一切，上面魯迅底幾句話，起馬說明了魯迅利用歷史材料寫小說的認真態度，這種認真態度滲透在魯迅底每一篇取材於歷史的小說裏，『補天』也是如此。『補天』裏絕對沒有留連過去，藉過去以充實現在的意思，單這一點就和上述的第一種態度截然不同了，何況在『補天』裏，對古人所取的還是批判的態度呢。『補天』裏對古人的批判正確與否且不必說，但對歷史取批判的態度這一點，是現實主義的根本精神，就足夠我們說明『補天』在原則上是一篇現實主義的歷史小說而無疑問了。

不過，我們只能說魯迅取材於歷史的小說在原則上是現實主義的，若是從細節節目上說，魯迅取材於歷史的小說，却沒有一篇足以作為現實主義的小說家處理歷史題材的完整的範型。關於這一點，魯迅自己也很明白的，他解釋他在『故事新編』中的八篇取材於歷史的小說道：『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却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為自己對於古人，不致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他這裏的所謂油滑，就是不認真的意思，就是不如他前面所說的『博考文獻，言必有據』；就是如他所說的『信口開河』的意思；這決不是魯迅自歎，因為我們知道，充滿着現實主義精神的魯迅，不但對外在世界取嚴峻的批判態度，就是對他自己的分析也是毫不留情的。魯迅對他自己的批判，是我們評斷魯迅最可靠的根據。我們看他自己對『補天』的批評吧，他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裏說：『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裏很不以為

然，於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這就是他所說的「油滑」之處，也就是他對古人，不及對今人誠敬的地方。在他以後的許多取材於歷史的小說中，因目前的憤懣而捏歪古人的地方差不多是每篇都有的，這也是因為他對古人，不及對今人誠敬的緣故。而對古人不能用公平的眼光，把魯迅作爲一個反對封建的戰士所處的歷史地位說起來，在魯迅疾恨舊文化，並對舊文化做着悠久的惡戰這歷史負荷看起來，都是很自然的情形，是我們意想中的事。同時，這也是我們以前所說的，魯迅底主觀感情之強烈，常常衝出他底冷靜的藝術形式之外來的這一特徵的一貫的發展。魯迅以後的許多歷史小說之所以都不能做到嚴格的現實主義者所應該做到的地步，根本原因是歷史條件還沒有具備有現實主義者寫歷史小說的明確的理論根據及成熟的創作先例，而魯迅對古人不及對今人誠敬也就是表明作爲現實主義者的魯迅在歷史條件的限制下，還不可能在所有的各方面，——此地是在對歷史的一方面，——都保持着嚴格意義的現實主義者底態度的情形之一。

那麼，要怎樣才能算是現實主義的小說家處理歷史材料的嚴格態度呢？簡單的說，就是考據歷史的真實，塑造歷史的真實，加以評判，吸取歷史的經驗，使人類或國家民族對他們的過去有正確而生動的深刻印象與認識，從過去中獲得前進的勇氣，經驗，與歡喜。

將來人類的全部歷史，都需要在這一基礎上改造成爲生動的現實主義的歷史小說，作爲更生動的歷史的藝術，以配合正確方寫成的歷史書。

現在，我們說回頭去，魯迅上面所說的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就是指胡夢華攻擊汪靜之底「蕙的風」那回事。「蕙的風」裏說過「一步一回頭，瞞我意中人」，及「一個和尚悔出家」等語，大受胡夢華的攻擊。胡夢華大約是一位道學家，他大罵汪靜之不道德，說汪靜之「毀壞了普天下的和尙，還說做詩是犯了『綺語戒』，無論道德或不道德都要受些孽報的最，後還

空捏造了歌德和雪萊底身世以詛贗詩人，還說要含淚哀求青年不要再寫那類文字。這樣的批評文章，自然是和尙道士的胡鬧，魯迅當即寫了一篇『反對含淚的批評』來反對這些道學的批評，現在這篇『反對含淚的批評』收在『熱風』裏，把這位胡夢華駁得一錢不值了，讀者自己可以去看，在這裏用不着贅述。不過，胡夢華底這篇文章登在報上被魯迅看見的時候，魯迅剛寫『補天』寫到一半，所以就如魯迅前面所說的，有一位小人物到女媧底兩腿之間來了。這就是在『補天』裏那位衣冠楚楚，頭上頂着長方板，站在女媧底赤裸的兩腿之下，仰頭背誦着『裸裡淫佚，失德蔑被敗度，禽獸行。國有常刑，惟禁！』之類的小丈夫。魯迅後來並且使這位小丈夫嗚嗚咽咽的哭起來，眼睛裏含着眼淚，很明顯的是隱喻胡夢華的底『含淚的批評』。這一篇描寫女媧補天的文章裏，忽然插入了這段瑣事，破壞了全文的宏大結構，魯迅自己已說過了。魯迅自己還說：「這是從認真陷入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而這油滑是因為歷史條件還沒有具備，現實主義的作家對歷史還不可能有堅定的正確態度，而使魯迅不能以公平態度看歷史所致的結果，我們前也說過了。只是在這裏，我們除了對這一段中國文學史上的插話感到很大的興味之外，我們應該立刻防止我們落下形式邏輯的泥坑。這就是說：第一、這一種『油滑』，魯迅自己也是很覺得不滿的，他自己比誰都明白些，這是創作的大敵，因此，我們不能說這種『油滑』在魯迅底小說中普遍存在。第二、胡夢華和魯迅素昧平生，他嘲罵胡夢華，只是因為在報上看見他底文章為聲張封建道德胡說八道，他對胡夢華個人決無任何恩怨，因此，我們絕對不能把『補天』中的那位小丈夫看作是影射胡夢華個人的。我們應該明白這是魯迅對整個封建舊文化道德的一種嘲笑，一種仇視。那位衣冠楚楚，頭頂長方板的小丈夫，也完全是中國歷史上的古代文化的保衛人，和胡夢華個人之間是毫無仇怨點的。根據這兩點理由，所以，假如有人以形式邏輯推論說，照『補天』看來，魯迅說他底小說決不致於影射個人那樣的話是不誠實的，那我

們是要堅決拒絕的

讀者如果看了「反對含淚的批評」那篇文章，一定會驚異於當時的文學界爲什麼竟容胡夢華這樣的批評家立足罷？其實當時有了批評這種東西在中國文學界存在，也還是幸運的事。那時以前，中國文壇上簡直看不見批評文章，可以這種批評在中國文壇上存在並算不得希奇。我們試翻開「熱風」裏那篇「對於批評家的希望」，看魯迅對批評家希望些什麼吧。他說：「我所希望的不過願其有一點常識，例如知道裸體畫和春畫的區別，接吻和性交的區別，屍體解剖和戮屍的區別，出洋留學和「放諸四夷」的區別，筍和竹的區別，貓和老鼠的區別，老虎和番菜的區別……更進一步，則批評以英美的老先生學說爲主；自然是悉聽尊便的，但猶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兩國，……」這些話更證明了道學先生也來做批評家是不足奇的，原來當時一講到批評，便有許多連常識也沒有的人亦來濫用批評了，在魯迅底這段話裏是看得很明白的。

「吶喊」第一版發行時，「補天」也收在裏面，現在，這篇「補天」收到「故事新編」裏來了。其實，這篇「補天」正寫在「吶喊」出第一版之前，「吶喊」自序都是在「補天」之後寫的，現在我們仍舊照時間的順序來論「補天」，而且爲了我們現在已經能夠看見魯迅後年寫在「故事新編」中的其他七篇取諸歷史材料的小說，所以知道他這以「補天」出現的取歷史材料寫小說的類型，是他底全部創作過程中的一個先後連貫的類型之一；他這個類型，和他第三個直接回憶少年時代的類型一樣。在魯迅，主要的是因爲材料的貧乏，同時，也和他底其他類型，特別是第三個類型一樣，是斷斷續續發展而不是一直線發展下去的。我們看「故事新編」裏下面的一段話吧：

「我決計不寫這樣的小說，當編印『吶喊』時，便將它附在卷末，算是一個開始，也就是『個收場。』」

這裏的所謂「這樣的小說」，便是指的「補天」，「吶喊」便是指的第一版「吶喊」。他爲什麼決計不寫這樣的小說呢？因爲他不滿意於自己在女媧底兩腿間放一個小人物那樣的他所說的「油滑」，可見他在寫成「補天」之後，是完全沒有想到以後會再寫「故事新編」中的另外其他七篇取材於歷史的這類小說的。可是，當時的魯迅雖然決計不寫這樣的小說，過了幾年，作爲魯迅創作上的這第四個類型，畢竟發展下去了。

從沉悶到徬徨

上面，我們把「補天」在內的第一版「吶喊」分析了之後，就知道魯迅在創作上的一個發展趨向了。我們指出了魯迅在創作上的四個類型的交錯的發展情況，而由於創作素材的貧乏，我們也指明過，在「吶喊」的後半部，第一個類型如何斷斷續續的被其他三個類型所漸次代替，這雖然並不說明魯迅創作力的下降，却的確表現素材的貧弱，應響了他底創作活動的發展。這一事實所發生的結果，自由不是絕對的，然而都可能發生一定時期的相對的結果。「吶喊」出版的一九二三年，魯迅在創作上的突然中止，部分地說明這一事實，部分地說明魯迅底創作方法，還不是一種自覺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這一事實，應響魯迅一生的創作命運至爲深巨。人們從積極方面去說明魯迅後來專寫雜文，是因爲中國歷史在前進上需要單刀直入的戰士，逼他不得不選擇最能發揮他底急迫的戰鬥任務的形式而放鬆了發揮戰鬥任務較緩的其他形式如小說等，固來是一部分真理，却没有說明魯迅爲什麼後來創作很少的全面的因素。這裏，魯迅不能克服他素材貧乏的困難，也是原因之一，而魯迅之所以不能克服他素材貧乏的困難，却是因爲一，他底環境和健康限制他底生活，使他過長期的書室和地下生活，把他拘圍在固定的生活圈內，而他底健康，又不容許他從原有的地下生活轉入別種生活或地下生活；二，歷史條件還沒有具備現實主義的自覺理論；三，我們在第五節以前，

曾經說到過魯迅在婚姻上，在文藝運動上所受的打擊，指出過他以後在創作中的悲鬱性之遠源，在第五節裏，我們並且在魯迅底美學興味中，也看見了這種悲鬱性。我們曾經指出，魯迅自己是完全明白這一點的，因此他常常有意壓抑此種悲鬱。這一點，我們也認定是作為進化論者，作為實際戰鬥者的魯迅底內心矛盾鬥爭之一。雖然魯迅對這種悲鬱成分的壓抑，在總的趨向上，是一步步佔勝利的，不過這種勝利的昇進極其曲折；五四運動之後，他底寫作中，生活中，我們主要的倒是看見魯迅底悲憤與呼號，魯迅底解剖刀在發揮揭露的作用；以後我們要說到「徬徨」，悲鬱的感傷又在他小說中相當的露出頭角來了；這以後，他底生活中還有一個長時期是悲哀的，我們以前，而且以後更要說明，他這種悲哀是帶有戰鬥性的孤傲之感的悲哀，然而無論如何，這終究使他底美學興味的全體中，相當的存在着閃避現實的成分，這對於他底現實主義也是一個矛盾的對立物。由於這個對立物在魯迅底生活中，有了攸久的根源，限制了魯迅克服他素材貧乏的困難。綜合這消極的素材貧乏的困難和上述那點積極的原因，在論述魯迅底創作生命一點上是非常重要的。關於魯迅底時代（即是在文學修養上，在創作實踐上，於他底創作態度有深刻作用的大半生世。）沒有現實主義的自覺理論而應響他底現實主義的自覺性一點，我這裏附帶的還要說一說他答北平雜誌社問的那封信。在這封信裏，他開頭就說：「來信的問題，是要請美國作家和中國上海教授們做的，他們滿肚子是『小說法程』和『小說作法。』」後來在第七條裏，他又說，「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話。」這麼看輕小說作法，在現實主義走到自覺的創作方法論以前，是很普通的現象。那個時代，全世界的小說家與理論家都沒有辦法正確地說明天才的存在因素，因此，對小說的創作也都有意無意帶着神祕的觀念，而特別是浪漫主義者，把 Inspiration 看得非常之重，實際上，那時候的小說作法之類，的確是毫無實際用處的。然而，我們應該要知道，魯迅這封信是在一九三一年寫的，以後，現實主義漸漸走上了自覺的道路，蘇聯的許多小說教

程之類也就陸續出版了。這些小說教程之類，不但教育了整千萬蘇聯的青年作家，而且也教育了很多中國青年，所以魯迅看輕小說教程之類，只是在魯迅那個時代是正確的，而在實際上，照自覺的現實主義的辦法，寫小說，是一件分析與研究的科學工作，他對於素材的處理，固來根本上離不了豐富的生活經驗，但除此之外，站在一定的生活基礎上，去搜集多方面的素材，加以全面的透視與有機的組織，也是自覺的現實主義的作家所不可少的工作。魯迅在他底許多小說中，曾經不自覺的做過這一工作了，但因為他所處的時代限制他不能在理論上明確地把握住這一工作，所以他也就沒有把這一工作發展，用科學的方法去搜集他底生活經驗所能聯系的更多的素材。因為個人的生活經驗是有限得很的，自覺的現實主義認為，如果不從本身的經驗以上去獲得更多的素材加以研究與分析，結果不但創作貧弱，而且也不容易得到在全體上是正確的敘述。過去的作家，如左拉，契訶夫都用過他們各自的方法，但那些方法，在魯迅的時代，只被人認為是個人的東西，並沒有人能正確地研究，分析，批判這些方法，直到蘇聯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理論之後，這些方法才被批判着，被綜合着付以新的生命。可惜的是這種現實主義的自覺的理論被提出之後，未經三年，這一理論還正在發育生長中，魯迅便死了。不然站在魯迅已有的豐富經驗與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我相信，假如有較長的餘裕來自覺地用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科學方法去搜集更多的素材加以研究是可能的，那麼，他能產生的作品，也許要更多一點吧。不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只能是他所以後來少創作，多寫雜文的素材貧乏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全部原因。如果用這一個原因來代替全部原因，那是非常錯誤的。其全部原因，是我們以上所說的兩點：一點積極的、和包括這一點原因在內的另一點消極的素材貧乏的原因。關於這些，我們以後如果說到他領導木刻運動，那是一定還有機會聯系刊他底美學興味上去說的。現在我們再回頭說到一九二三年的情形吧，根據現在可能得到的資料，魯迅這一年，除印了一本我們前已提到過的「桃色的

云」，印了一本「吶喊」，印了一本北大講中國小說的大綱「中國小說史略」上冊之外，便只做過兩篇並不能算是創作文章，一篇是「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的文章。一篇是「娜拉走後怎樣」，還是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裏的演講。此外或者就只有對於古籍的研究吧。我們前面說過魯迅底思想正在起着一種潛伏的變化，說魯迅在大革命後，思想上大變化的諸條件也是在軍閥混戰的沉悶局面中漸漸形成的，這活在魯迅寫作上最沉寂的一九二三年同樣適用。經過一九二三年的沉寂，到一九二四年，我們知道，他底文學活動是又要蓬蓬勃勃發揚起來，幾於恢復到新青年當時他底奮發狀態一樣的，雖然那種蓬勃氣，和新青年當時他底精神狀態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這些，我們現在暫時不說，我們現在所要說明的，是一九二三年魯迅的沉寂，正好比暴風將來之前的陰鬱天氣一樣，是魯迅底精神達於他創作上的到着點以後，正準備向更高階段發展的一種醞釀。這情形，和中國的歷史又是分割不開的。因為沒有中國的歷史，魯迅底這種精神上的發展情況就不可解釋，以過去的魯迅而論，他無時無刻不在力求獨自的最合理的道路，然而他的悲與歡，失望與興奮，沉默與進取等，却仍然還是由歷史條件來決定，他在歷史的諸道路中，總是一條最合於歷史推進的道路，也是在歷史條件所決定的他底沉默或進取狀態中尋找着的。一九二三年魯迅在寫作上的暫時沉寂，一方面固然是他創作發展上的可能趨勢，另一方面，也是沉鬱的歷史條件所決定下來的。原來一九二三年，是中國歷史上醞釀着根本變化的一年。一切新生的勢力，在一九二三年這一年裏，都趕快成長起來，在向着成熟的地步走了，而在表面上，却只看見一切惡勢力走到登峯造極的地步，似乎黑暗已經穩定了，起馬似乎是有穩定的可能性了，所以這是最陰鬱沉悶的年頭：吳佩孚武力統一的夢想，可以說正是做得又酣又濃的時候：一九二二年底，陳炯明被滇桂軍逼處惠州後，孫中山先生就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啓程南下，二十一日由香港入廣州了，這時於吳佩孚當然是一個武力統一的眼中釘，他於是唆使孫傳芳

奪取福建，以壓迫廣州；唆使沈鴻英奪取廣州，以直接危害孫中山的大元帥府；同時，和陳炯明當然更要加強勾結。在吳佩孚底眼中，他以為有了這三管齊下的佈置，廣州大元帥府是不難撲滅的。而撲滅了廣州大元帥府之後，皖系的殘餘他當然更容易對付，以後，他就只要專心對張就是了。所以，就使廣州有大元帥府成立，也並沒有削弱他正濃的夢想。自然，吳佩孚並不是空想家，他所以有這種夢想，起馬表明了他對自己底力量相當有把握。這就是說，他底夢想，是以封、舊勢力的穩定現象作為根據的。這是對國內而說，對國外，他底背後，有強大的英帝國主義者作為奧援，他和陳炯明，沈鴻英，孫傳芳勾結，也有英帝國主義在加強撮合，這更加使他沉迷到夢想中去。也因為如此，彌漫在中國空氣也更加陰鬱而沉悶。吳佩孚為了實現他底夢想，在北中國，尤其在北京，造就了一種卑污到使人難受的反動空氣，一九二三年北京的烏煙瘴氣，幾乎和袁世凱稱帝當時的情形一樣，這就是曹錕底賄選。曹錕是直系軍閥中的所謂津保派領袖，吳佩孚為了實現武力統一中國的夢想，不能不一心團結直系內部的力量，所以他一任曹錕去滿足他底虛榮，一九二三年的北京，簡直是惡臭紛紛到了極點的北京。開始是想盡方法來解散張紹曾的內閣，驅逐黎元洪總統，所謂逼宮和劫車索印的醜劇，就在北京上演起來了。暨後便是濁惡不堪的賄選潮浪，塞滿了國民真純的耳朵，一直到這年十月十日，竟把曹錕推上大總統的椅子，這又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一個大污點。這種污點的產生，是表明黑暗勢力於自鳴得意，表明他們相信本身力量的相當可靠，所以他們才想登黑暗之峯，造醜污之極。然而，我們要知道，這只不過是一些最容易看見的東西罷了，在我們所能看見的醜惡的底層裏，消滅醜惡的革命力量却同時也在生長，只是，這些生長着的革命力量，在當時是潛伏着的，不明顯的。×××

法鬥爭的歷史，一變而爲××××××翻封建軍閥的革命鬥爭的歷史了。

中國革命勢力的醞釀，不僅如上面所說的，以勞苦工人的覺醒，國民黨的進行改組爲主流，並且，還有以下的兩點，爲中華民國的歷史今後轉變到推翻封建軍的革命的鬥爭方面去的基因：

1. 由於十餘年的鬥爭，中國民衆已漸漸認清，如果不改變封建軍閥的本質，那無論用什麼樣的紙上條文，都是約束不住封建軍閥禍國殃民的勾當的，而封建軍閥的本質中最本質的一個通性，是勾結帝國主義；反帝反封建，本來是中華民族從事解放鬥爭中的一個傳統的內涵，但還內容，一直到現在，才漸漸被明確地加以認識，一步步普及到民衆裏面去。

2. 由於蘇聯革命的應響，歷史演進的規律性，已經漸漸被人研究。蘇聯文化，到這時候已漸漸對中國發生應響，孫中山領導他底國民黨，毅然對軍閥採取革命鬥爭的手段，固然是他研究蘇聯革命經驗的結果，而他採取這一手段，得到全國民衆的擁護，也完全說明了蘇聯革命的應響，如何深入中國的民間。這件事，在中國知識界特別表現得明白。——在文化水準很底的中國，知識份子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佔很大的作用——我們只要看一九二二年飛到北京時，受新潮社等十二個團體歡迎的熱烈情況便可以知道了。這開了中華民國國民外交的新紀元。從來沒有任何一國的外交代表受中國民衆如此熱烈歡迎過，在北京的英國公使館見了這種情況，聽說不勝眼紅，我想是不會虛傳的。茲錄：

幕的時候，他底腳下的暴風雨實在已經就在那裏東裝待發了，那麼，作爲人民喉舌，歷史觸角的藝術家魯迅，在過暴風雨行將到來的沉悶空氣下，是怎樣的呢？很明顯的，他底思想與認識，和那行將到來的暴風雨，完全取得一致的步調。這是因爲他追隨着歷史的演進以觀察實際情況，總是毫不畏懼，毫不猶豫的向真理接近，向他底時代容許他接近真理的最大可能去接近真理的緣故。這只要去看他那時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的講演『那拉走後怎樣』便可以知道了。這篇文章裏堅決要求中國改變，並且正面提出經濟問題；金錢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我們曾經一再見諸他底小說中，在以前我們是說過的，然而醒目的地在理論上被魯迅正面提出來的，這篇『那拉走後怎樣』却是第一次。他明白的認定，女子要得到真正的解放，除非經濟制度改變了，而如如果經濟制度還沒有改變，那麼，女子要想解放，必須先操着經濟權。他認定，這種要求經濟權的鬥爭是最困難的鬥爭。這種意見，是他以前的論文裏所不會有過的，然而到魯迅說這話的時候，這種所謂改變經濟制度的意見，却也並不是新奇的意見了，中國工人的覺醒和舊俄社會制度的改變，都是爲經濟制度的鬥爭，魯迅底這一醒目意見的提出，是完全和中國當時的歷史暗流不謀而合的。同時，當日中國的歷史條件却仍然限制着魯迅底認識超出一定界限之外去，他在『那拉走後怎樣』的最後，堅決要求中國改變；並且明確地認定，以爲中國要改變，非有鞭子從背上打下來不可，這是對於行將到來的革命的一種直接的敏感，可是這鞭子從什麼地方來，怎樣打下來，他說他就知道了，就是說，他到現在還不能超出限界以外去。也因爲如此，所以他還不能明確

地看清楚中國的前途，北京的醜劇和陰暗的反動壓力因此也就不免悲傷。當曹錕正以登峯造極之勢出演他底大總統夢的時候，魯迅底悲憤是無言的，那時他底窮困並不減于已往；我們說到他研究中國古小說的時候，曾經提起過他無力買書，怎樣廢寢輟食在各圖書館搜羅材料；在分析『端午節』的時候，我們也曾說明過，他在教育部的薪水名爲三百，其實是欠薪的，有時有得領，也只有二三成。有一次，魯迅甚至於把明抄的『立齋問錄』和別的兩本明抄本，及一部明刻的『宮闈祕典』拿去向一個藏書家賣錢果腹，後來因爲那藏書家出價太苛刻了，才沒有賣成的。他底窮困，一直繼續到他走出北京，沒有終止過，這在他過去的小說及以後的小說裏，都是很看得出來的。魯迅那時和周作人住在一道，那屋是周家用賣了紹興的古屋的錢買下來的八道灣的屋子，以前我們曾經說過的。那時掌理家政的是周作人底老婆，她消耗甚鉅，魯迅以其全部收入提供家用，仍然不敷開支，因此，周作人夫婦常誣魯爲蓄私，沒有盡其所得以供家用，這是魯迅和周作人之間所發生的經濟上的糾紛。那時又有謠言，說魯迅和他弟媳發生戀愛，于是他便又要搬一次家了。時在一九二三年八月，正是曹錕猛烈進行賄選的時候。

戀愛的謠言，周作人或者相當相信的，再加以經濟上的積惡，兩個人對社會的看法又漸漸分歧了，所以這一對在文學上均居要津的兄弟，就漸露破裂之端，這是中國歷史演進中的一段重要插話。魯迅遷出八道灣後，租住韋塔胡同六十一號，周作人叫張鳳舉來和魯迅說：你不要到八道灣去搬家具，你要家具我替你去拿好了。魯迅回答他說，周家的事毋須張姓過問，張鳳舉無可奈何，只得走了，魯迅就親自到八道灣屋內去取家具，周作人底老婆嚴加拒絕，至於動武，這才搬出一點家具來。他們兩兄弟感情上的不好，於此可見了。

魯迅搬出後，魯迅底母親仍和周作人同住。周作人有男女僕人甚夥，但仍然叫他母親自炊而食，他母親不能忍，便亦搬出八道灣來和魯迅住在一道。因此，魯迅便不得不另外設法買屋安頓

老母。他向許壽裳，齊壽山各借了四百元，購置了阜成門內西三條二十一號的房子，就一直住到一九二六年離開北京的時候。爲了買這屋，魯迅負了八百元的債，這債一直到魯迅在夏門大學教書，才漸漸抽出薪金償還清楚，作爲魯迅私人生活主要側面的經濟情況，從這裏就看見了。但一九二三年，魯迅還沒有遷入西三條的新買房子。這房子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才買成了，還要加以修理，到一九二四年，他才搬進去的。然而，這些瑣事的煩擾，並沒有妨礙他注意中國底命運，研究他底學問。上述『那拉走後怎樣』正是他在這年年底的講演，在這篇講演之前，他也寫了『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說明他研究中國舊小說的心得有如此之具體，生動。很明顯的，假如『中國小說史略』能够這麼具體的寫，那是非常動人的，可惜那只是一個大略，我們相信，親聽魯迅講述這部中國小說史略，那是一定很有生趣的。難怪魯迅描寫魯迅講書時那麼動人。不過，話說回頭來，在這裏，我要重新指明的，是這一切仍然說明兩點：一、魯迅對那地下的革命暗流已敏感到，可是二、他雖然敏感到，但仍然不能明確的看清楚，他對於黑暗，是無言的悲憤，對於未來也自覺未可逆料，甚至渺茫，這樣，除了他在思想上有了內在的變化之外，他在行動上並沒有表現出和以前有多大的差別。這是難怪的，因爲一九二三年的新力量的醞釀，還沒有在一般人面前拿出具體的顯明的輪廓來，而到了一九二四年，情形就不同了，在魯迅也是如此。魯迅因新力量的潛藏而潛藏，到一九二四年，新力量茁長，他也要振奮起他底生命力來了。我們都知道，一九二四年是有名的國民黨改組的民國十三年，這一年，把一九二三年積極醞釀成熟的革命力量表面化起來了。新年一開始，國民黨就正式改組，孫中山

魯迅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可以因此相信他對人類，對中國的希望沒有落空；他可以因此增

劇烈的決心。無疑的，這對於

強人類必定進步的自信力；而更重要的，是他對於革命暗流的敏感，現在可以明確起來，比較的更能實感得到些了。不過我們也要知道，到了現在的魯迅，已經是飽經世故的魯迅，他在北京，遠遠聽到廣東的好消息，卻並不會親眼看到，馬上要他全部相信是不可能的。所以國民黨改組這一事實對於魯迅的作用，也不能估計得太高。它鼓起了魯迅更多的熱情從事於寫作生活，使他在這一年，創生了四個短篇小說，產生了『野草』上的許多散文詩，產生了『華蓋集』的很多隨筆，雜感；但它却並不能在魯迅這些作品中，將魯迅底孤寂悲憤之感一掃而光。我們先來看看他底小說吧，『祝福』就是一篇感傷的氣氛很濃厚的作品，『在酒樓上』的感傷氣氛更嚴重，只有『幸福的家庭』較為活潑輕鬆，而『肥皂』也是帶感傷味的。就中『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肥皂』所描寫的都是城市知識份子，只有『祝福』是描寫一個鄉村的女人。『祝福』中所描寫的那被戕害的人物祥林嫂，還和孔乙己，阿Q有點相像，是魯迅所同情的人物；她是迷信的犧牲品，是魯迅小說中的被壓榨，虐待這類形象的另一方面的塑造。這故事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中國却是到處都有事實。她因為死了兩個丈夫，兒子被狼吃掉，起初還被人同情，到最後終於成爲嘲笑取樂的資料了；這和孔乙己的命運是一樣的。她又被目爲不祥的人物，不准她拿祭器，在迷信面前受到無言的威脅；而最後，由於一句毫無根據的話，更增加了他對於迷信的恐怖，這種戕害是看不見的，而她底生命終於在這種戕害之下完結了。這篇故事的中心內容，以祥林嫂的詢問靈魂的開始，材料非常新奇，但卻充滿着憂鬱，它不像『阿Q正傳』那麼潑刺，也不像『孔乙己』那麼明快，更不像『明天』那麼熱忱，它裏面夾雜了多量的第一人稱底冷漠情緒，使這篇故事變得很难苦重了。要把這第一人稱的情緒除掉，那除非把這篇小說重新加以組織，這是不可能的，那麼，這篇小說裏的憂鬱性也就很難矯正了。『在酒樓上』所寫的是一个額頰到了極點的知識份子，而這智識份子底頰唐，是他底社會環境造成的：他從前是拔神像鬚子的革命者，現在却仍然敬

子曰詩云，他在舊勢力的面前完全幻滅了。和他一起幻滅的，還有在舊婚姻制度下的阿順的死亡。如果說契珂夫的輕繫，在「祝福」裏並不存在，那麼，安特列夫與穆羅古勃的陰鬱，在「在酒樓上」是有跡可尋的，「祝福」和「在酒樓上」的人物，都因一句很無根據的話而斷送了性命，這並不是祥林嫂和阿順底神精過敏，而是像「項鍊」中的路娃裁夫人底悲劇一樣，是以實有其物的強大社會勢力作為背景的。「幸福的家庭」感傷氣較少，是一篇比較輕鬆的作品。它諷刺洋秀才們底幻想，那幻想，在無情的現實面前，現得非常可憐又可笑。然而這篇作品中的笑，也是帶着眼淚的苦笑。「肥皂」和「幸福的家庭」一樣，主要的是諷刺，「肥皂」是諷刺一個提倡過新學而終于腐朽的可憐的俗物。這篇諷刺小說裏，也滿是苦笑和哀愁，然而却是清淡的。從全體說，「祝福」和「在酒樓上」、如其說是熱情的喊叫，不如說是感傷的吁嘆；「幸福的家庭」和「肥皂」，如其說是露骨的諷刺，不如說是敦厚的諷示。很明顯的，在熱情上，是遠不如「吶喊」中的作品了。雖然「祝福」和「在酒樓上」仍舊是暴露舊社會的犧牲者，「幸福的家庭」和「肥皂」仍舊是嘲笑離開實際鬥爭的幻想家和投降舊社會的可憐蟲，然而魯迅畢竟是孤獨的，如果我們將以前所說過的魯迅在創作構成上的四個類型加以回想，以為在這四篇小說裏，第一二種類型又重新佔了支配的地位，作為魯迅底寫作發展的指標又往上升高的標示，而且認為這是廣東的國民黨改組所指出的中國的光明前途所產生的結果，那麼，我們要說，魯迅底孤獨與哀愁，並沒有因為廣東國民黨改組所指出的中國革命的曙光被驅散，相反的，我們以前所說，作為實際戰鬥者的魯迅性格中的對立物，那悲鬱的美學興味，自五四運動以來，數年之間，在魯迅心裏又擴大起來，而終于溢出了魯迅底制約力之外，傾瀉在「徬徨」裏的諸小說中了。他做了幾年的孤軍獨戰，現在仍舊是一個「上下其求索」的游勇。他自己說：「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指新青年——凡海）中伙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獲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走來走去，不過已

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只因爲成了遊勇，佈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際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却冷得不少。……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筭德」。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他自己底這些話，對收在筭德裏的小說，是非常中肯的說明。

他自己說技術比先前的好一些，也完全是不錯的。我們知道，收在『吶喊』裏的魯迅底小說，雖然因爲熱忱的豐富，比收在『筭德』裏的小說動人些，但『吶喊』裏的小說却很明顯的有嘗試各種不同風格的傾向，所以小說雖然有些生氣，年青些，技術上的缺點也多些。這些，我們前面都指出來過的，現在不重複了。但是收在『筭德』裏的我們上述的那四篇小說，在技術上的熟練，却都不下於『補天』，『鴨的喜劇』，『白光』等，已經看得出，經過收在『吶喊』中的諸小說的寫作過程，魯迅已經產生他自己底相當固定的風格了。沈着，堅實，細緻，低徊，是『祝福』，『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和『肥皂』底共同風格。這是魯迅在技術上進步的第一點。情景的變換，宜快的地方，使你卒不及妨，在一句話裏一下變過來了，其手腕之熟練，幾乎沒有一篇不是如此的，例如『祝福』裏的『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走了。』忽變點出作者底心境；『在酒樓上』的『約略料他走完了樓梯的時候，我便害怕似的抬頭，去看這無干的同伴，同時也就喫驚的站起來。』在一句裏把他看人而忽然認識了老朋友的這個轉換點出來了，這都不是技術上沒有相當長久的修養的人所能辦得到的，是魯迅底技術不但進步，而且熟練的第二點證明。文章活潑，宜細的地方一絲不漏，而且有條不紊，秩序井然，是上述四篇小說的又一個共同的優越點。我們拿『祝福』裏的下面一段話看看吧：

『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死了當家人，所以出來做工了。四叔敲了敲

眉，四嬸已經知道他的意思，是在討厭她是一個寡婦。但看她模樣還周正，手脚都壯大，又只是順着眼，不開一句口，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皺眉，將她留下了。」

這短短的三句話裏，把衛老婆子，四叔，四嬸和祥林嫂四個人底態度，形狀，心思，連對話都描寫進去了，文字的簡潔不消說，那筆尖的指揮自如，靈活如生，是使人吃驚的。再看「在酒樓上」的下面一段文字吧：

「可以眺望樓下的廢園。這園大概是不屬於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過許多回，有時也在雪天裏。但現在從慣於北方的眼睛看來，却很值得驚異了：幾株老梅竟鬥雪開着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爲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臨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我這時又忽地想到這里積雪的滋潤，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乾，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

這種寫境的文章，是多麼生動清鮮，他先寫眺望樓下，是一個廢園，一點也不忙亂地慢慢覓再寫出那廢園裏動人的景色，從老梅寫到倒塌的亭子邊的山茶樹，而最後，連雪花的滋潤也沒漏掉，細緻而不堆砌，簡明而又生動，秩序井然，却不呆板。這樣熟練的技術，真是談何容易！

我們再看「肥皂」裏的下面一段文字吧：

「於是這葵綠色的紙包被打開了，裏面還有一層很薄的紙，也是葵綠色，揭開薄紙，纔露出那東西的本身來，光滑堅緻，也是葵綠色，上面還有細簇簇的花紋，而薄紙原來却是米色的，似橄欖非橄欖的說不清的香味也來得更濃了。」

這一個句子裏，把一個肥皂描寫得多麼具體，細緻，然而是一絲不紊的。他先從葵綠色的紙包被打開說起，說到裏面「層薄紙，馬上就說到揭開薄紙以後的事，却按下薄紙不提，一直把肥皂的本身寫過了，然後再回頭寫那薄紙原來是米色，連這一點都不肯漏掉，最後才說到香氣，筆

觸的老練，是一點也不瞎吹的。凡這些，是證明魯迅在技術上達到怎樣熟練的第三點。

我們知道，魯迅曾經在『吶喊』裏的許多小說中滲進他底主觀上的某些觀念與情感，是做得不太巧妙的。如在『貓與兔』中，在『阿Q正傳』中，我們都會指明過，尤其是在『頭髮』的故事中，我甚至不把那篇文章算作小說。然而在『彷徨』裏的上述四篇小說中，魯迅却很能運用他底手腕來將他底某些強烈的觀念或感情滲透在他底小說中了。比方『在酒樓上』，呂緯甫口裏的蒼蠅，和『掘開來！』這三個有哲學意味的字眼，在『在酒樓上』都出現得非常自然；『幸福的家庭』中樞幻想和現實環境對照得針針見血，又一點沒有虛構之嫌，令人對於現實的無情，吃驚得無師自通，把一種平常的真理，如實地抓住，而且有聲有色；『肥皂』裏面，對於那些腐潰人物的諷刺，不能不說尖刻，然而却非常真實，毫無虛構之嫌，他寫出那些腐潰者底冷語，以為不能做詩，就不能算孝女，他寫出四銘因為學程吃去他底菜心，心理不高興，便大發『庭訓』，『拿出孝順的大帽子』。這都是令人難以相信的真實，只有魯迅才能抓住，才能使它自然如生地在他小說中出現吧？這是現實主義的威力之一。而最後，應該不要忘記的，是『頭髮』的故事『借別人底口以抒情懷，却變成一篇隨感式的獨白』，『在酒樓上』也是借呂緯甫底口以訴哀愁的，却被寫成一篇生動的對話，在這對話裏，包含兩個淒涼的故事，仍沒有使這對話顯得贅累，這是一前一後的很明顯的兩個對照。從上述的那些事實，和這對照裏，第四點證明了『彷徨』裏技術向上的發展。

可是，我們要知道，予人的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彷徨』裏的魯迅底作品，而是『吶喊』裏的重要力量，熱越多，作品底生命力越強。

魯迅底哀愁漸漸
漸露出向前衝的
戰鬥鋒芒。

上述「彷徨」裏的四篇小說，是魯迅在一九二四年二三兩個月寫成的。他在寫這四篇小說之前，還會寫過一篇「未有天才之前」和「望勿糾正」。『未有天才之前』是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北師大附中校友會的演講，評擊當時整理國故的胡適之一流的復古傾向，評擊厭惡翻譯，崇拜創作的藝術至上主義的傾向，和當時惡意的批評。（他在九月裏又有『又是古已有之』，也是諷刺惡意批評與復古傾向的）。那時也會有過要求天才的聲浪，但一面有整理國故的復古家把中國文化保持着作爲寶貝，不交給人民大眾，另一方面有藝術至上主義者輕視人民大眾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來培養天才，而最後第三方面，還有惡意的批評家在極力摧殘新作者，魯迅以爲這樣子，就是有天才也發展不起來的。這是非常切實的見解。而尤其可笑的，是當時整理國故的風氣應響所及，標改古書的風氣也很盛了，出了許多冒牌的國學家，這情形，我們以前也說過，知道是由來已久的。那些冒牌國學家，把古書標改得一塌糊塗，不但沒有把所謂『國故』整理出來，反而把國故戕塌了，魯迅底『望勿糾正』就是針對着此種情形而說的。這是一九二四年一月裏的事，之後，魯迅寫了收在『彷徨』裏的上述四篇小說，到五月，魯迅從甌塔胡同六十一號遷入西三條新購的房子，又開始校閱稽康集了，同時作了稽康集的校序，魯迅底『中國小說史略』下冊亦於此時出版。這正是廣東黃浦軍校開始創辦的時候。由於革命勢力的高漲，黑暗的軍閥勢力的臨死的掙扎也就更見得暴露，七月，魯迅往西安任暑期講師的時候，全中國軍閥與軍閥，軍閥與革命勢力之間的矛盾，正鬱結一團，廣東與奉系及皖系反直的三角聯盟既已形成，直系也勵兵秣馬，準備應戰。我們知道，直系是英帝國主義底走狗，但遠東小英吉利的香港面前却存在着廣東的革命政府，革命政府既爲反直三角聯盟的一份子，直系也就依靠英帝國主義和廣東內部的陳炯明聯合，以謀推倒革命政府。英帝國主義並指使廣東的商團陰謀推翻廣東大元帥府，所以廣東國民黨的改組，革命政府

的龐大，不但威脅廣東外部的軍閥，並且也在內部與一切封建殘餘，買辦商人發生激烈的鬥爭，所以，如果說國民黨的改組與黃浦軍校的成立，現出了中國的曙光的話，那麼也可以說，這也正是一九二七年以前，中國要重新生的陣痛最激烈的時候。無論那個帝國主義，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勢力，對於中國的自由，獨立，解放，都是一視同仁的反對的，但當革命勢力只威脅到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另一帝國主義並不會忘他和這一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廣東革命政府所直接威脅的是英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因此，日帝國主義仍不會忘記向英帝國主義爭奪他在華的利益，曹錕賄選，雖然是把封建軍閥底假面具最後一次撕毀了，民衆這時對於軍閥，無論是直系奉系，都已失了信仰，把視線一致集中到廣東去了，但這對於日帝國主義，仍然不失爲他攻擊英帝國主義在華代理人直系的好時機。反直三角聯盟的主要的幕後策動者，是日帝國主義底老走狗段祺瑞。廣東政府的加入此種聯盟，並不是受日帝國主義底利用。主要的是想先打倒眼前的敵人直系軍閥，以打擊直系的聯盟者陳炯明等。這些交互錯綜的矛盾，和國民黨的強大一起強大，和中國曙光的升高一起升高。八月，當魯迅從西安講學回到北京的時候，就真是人心惶惶，山雨欲來風滿樓了。果然，當江蘇的直系軍人齊燮元聯合福建的孫傳芳向浙江的盧永祥進兵的時候，奉系也就向關內進兵了，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因以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形式爆發了，廣東孫大元帥也在此時到韶關出師北伐，應響反直戰爭，同時，他也想把內部把持財政的，像楊希閔，劉震寰等封建軍閥的殘餘調出廣東，好叫廖仲凱統一財政。但結果是楊希閔等軍閥既不聽受調遣，廖仲凱統一財政的工作也未成功，而英帝國主義却爲了幫助他底直系走狗，竟發動商團，用行動來對付廣東政府了。所以廣東政府的北伐並沒有成功，北方戰火正濃的時候，廣東也只好忙着平定內亂了。幸虧廣東政府已有相當根基，商團事變得以平定。廣東政府經過這一次變亂之後，根基自

然更加穩固，同時楊，劉等封建軍閥底面目也就更加暴露出來了。那時楊，劉等看見黃埔裏有許

多蘇聯運來的槍械，還想去繳奪，該校校長 蔣介石便說：「你們有本事就來拿吧」，可見那時的黃埔已不可侮了。原來平定商團，黃埔學生也是主要的力量。他們原來是全國青年的精華，經過數月的集中訓練，在平定商團時得以小試其技，又繳獲了商團的許多槍械，他們的不可侮是意想中事。

廣東商團事變平定後，北方的奉直二次戰爭，也就以馮玉祥的倒戈結束了。馮玉祥的倒戈，是完全受南方革命勢力應響的結果，所以廣東北伐雖然沒有成功，但直系傾倒，却不能否認南方革命力量的強大。曹錕底大總統當然當不成了，吳佩孚也只得浮海南逃。直系的傀儡政權從此結束。

曹錕從他賄選的大總統椅上滾下來之後，中央政府一時產生不出來。因為直系的傾倒，既然是奉系皖系廣東的三角聯盟的力量，這個中央政權，表面上便不得顧全三方面的意見，而且那時直系和浙江盧永祥的戰爭因為是勝利的，所以，他們在江、浙、閩、皖，都還把持有實權，在兩湖也有實權，因此，中央政府的組織，還不能不顧全他們底意見。當時由黃郛臨時出來組織了一個攝政內閣，挨了二十餘日，直至十一月二十四，才由幕後策動奉直戰爭的段祺瑞來組織了一個臨時執政府，這就是第二次奉直戰爭後的日本指使下的中國中央政府，也就是日後三一八屠殺學生，為魯迅所深惡痛絕的所謂執政府，也就是魯迅所痛罵的正人君子之流如章士釗他們所擁護的執政府。執政府成立前，馮玉祥以為要請 孫中山北上商討一次，再正式決定辦法，張作霖，段祺瑞也表面贊成，拍電請 孫中山北上。孫中山因于十一月十三日起程北上，發表有名的北上宣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內除軍閥，外抗帝國主義。但日帝國主義所操作下的段祺瑞和張作霖，實際是沒有誠意請 孫中山北上的，所以十二月四日 孫中山到天津，段祺瑞已先就任為臨時執政府。他而且聲明承認和帝國主義所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和 中山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意見是

正相反對的。其時中山在天津得病，不能入京，聞此消息，非常憤怒，到十二月三十日，段氏又公佈了以各省封建軍閥底代表為基礎的善後會議條例，中山也是完全不贊成的。

執政府成立後，日帝國主義鑑於馮玉祥所領導的國民軍，有反帝國主義的傾向，便慫恿他底走狗奉系軍閥壓迫國民軍。所以自從執政府成立之後，國奉兩系就暗中鬥爭甚烈了。國民軍佔京漢路，豫，陝，甘三省發展，奉軍沿津浦路向南發展。奉系爲的要奉承日本主子底意志來排斥孫中山，鞏固段祺瑞底政權，就非先壓迫有民族意識，擁護 中山意見的國民軍不可。這是不但日帝國主義感覺必要，而且爲了對付共同的敵人，——要求自由獨立的中國民衆——英帝國主義也同樣感到除了壓迫廣東政府之外，有同時和日本帝國主義取共同行動，壓迫國民軍的必要，日後奉，直聯合壓迫國民軍的事實，從這裏就看得出端倪了。

但我們要知道，直系傾倒，中央政權雖然仍舊被帝國主義指使下的封建軍閥所把持；孫中山北上，雖然還是被段祺瑞所排擠，但馮玉祥的倒戈，無論如何是革命勢力高漲的表現；醜污的曹錕賄選政權的倒塌，無論如何表示了竊取權位的封建軍閥已經不能再欺蒙中國民衆，而且廣東政府的目的益堅強，孫中山的北上，應響民衆的無形力量是決不小的。中山每到一處，歡迎的都人山人海。中山到天津的時候，甚至引起帝國主義出來說話；段祺瑞公佈他底善後會議條例的第二天，中山先生由天津入京，歡迎中山先生的羣衆擠滿了車站內外，爲北京空前不會有的歡迎任何個人的盛況。這表示了中國人民到底是有眼睛的，他們知道辨別好醜，他們有無限潛藏的力量，平時雖然看不見，但只要有一種力量輕輕加以提領，他們馬上就會揭竿而起的。廣東政府對全國的應響，以及全國人心的傾向廣東，在這次孫中山北上的情形中，完全測驗出來了。從這裏，明若觀火的照出了中國的前途。所以到廣東去的風氣，在北京也就漸漸盛旺起來了，一九二六年魯迅的往廣東跑，也不是偶然的。而且就在眼前，一九二四年的這個很大的政局變化所顯示出來的

中國的希望，也帶給魯迅一種很大的刺激了。雖然，由於當時的北京政權仍然落在北洋軍閥手中，政局本身的混沌使魯迅照舊充滿着哀愁的情緒，然而這種哀愁畢竟緩慢的開始變質了。第一是這哀愁漸漸加強了戰鬥的氣氛，露出向前衝的勇氣來了。語絲敢手和正人君子們開始對立，主要的是由魯迅底這種精神支持着的，而一九二四年魯迅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下冊，却又把歷年以來的小說舊聞鈔的工作廢置一旁，也可指明他躍躍欲進的心懷，他所寫的『我的失戀』，『說不出』，『音樂』，都是富有戰鬥勇氣的明明的諷刺。『我的失戀』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說不出』諷刺當時抹煞一切的批評，『音樂』諷刺搬弄英詩格律的徐志摩底詩。魯迅對語絲在表面上僅僅是一個投稿者，但在實際上，魯迅對語絲是採取頗為積極的態度，這篇『音樂』和還有一篇『我來說相持的真相』，就是魯迅對語絲採取積極態度的一個說明。原來語絲並不歸魯迅編輯，但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是足以左右語絲前途的，因此，語絲在實際上就不能不以他底意志為意志。徐志摩向語絲投稿，發表了，魯迅做一篇『音樂』嘲笑徐志摩，語絲編者的孫伏園爲了語絲底生命，當然不敢退魯迅底稿子，結果是只好和徐志摩結仇了；錢玄同本來也是語絲底同人之一，但魯迅也做了『我來說相持中的真相』，把錢玄同嘲笑了一番，而語絲的編者也不敢退他底稿子，結果錢玄同當然也疏遠了。從這里看起來，可以明白，魯迅雖然只是語絲的一個投稿者，但他却是左右語絲的真正的靈魂，而他所以終於成爲左右語絲的真正靈魂，完全是由於他對語絲採取積極的態度，將語絲中許多和他不同的意見加以打擊的結果。所以『我的失戀』，『說不出』，『音樂』除了是一種明明的諷刺，表明魯迅底戰鬥的勇氣之外，『音樂』還表明魯迅這種戰鬥的勇氣底另一個具體內容，所以我們說魯迅底哀愁漸漸加強了戰鬥的氣氛，露出向前衝的勇氣來了。第二是由於全國革命情緒的高漲，魯迅底哀愁裏的悲涼孤傲之感，此時愈益加強了。爲什麼全國革命情緒高漲，魯迅底哀愁裏反而加強了悲涼孤傲之感呢？這是因爲一九二四年中國政治

局面的變化，已明白顯示出暴風雨將要到了，而在這暴風雨將到的前夜，魯迅還沒有找到戰友，他是孤獨的，但雖然孤獨，希望却要求他迎着暴風雨出陣戰鬥，爲了他底孤獨，他是悲涼的，但總了鼓起他底孤軍獨戰的勇氣，他就不能不用孤傲來藐視四面八方的敵人，所以魯迅底哀愁裏的悲涼孤傲之感，這時又特別加強，是魯迅要開始戰鬥的，游勇上陣的另一方面的表現。我們看他『臘葉』裏記載的他自己底行動吧：

『……深秋。繁霜夜降，木葉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楓樹也變成紅色了。我會繞樹徘徊，細看葉片的顏色，當他青蔥的時候是從沒有這麼注意的。他也並非全樹通紅，最多的是淺綠，有幾片則在緋紅地上，還帶着幾團濃綠。一片獨有一點蛙孔，鑲着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我自念：這是病葉呵！便將他摘了下來，夾在剛才買到的『雁門集』裏。大概是願使這將墜的被蝕而斑斕的顏色，暫得保存，不即與羣葉一同飄散罷。』這是何等淒清的一種生活。他在九月十五日所寫的『秋夜』，抒盡了他對宇宙的悲涼的情懷；九月二十四日他所寫的『影的告別』，可以說是他分析他底心境的最好的說明。在這篇短短的文章裏，他明白預示了暴風雨的將要到來。但是，他雖然說『朋友，時候近了』，却接着說，『我將向黑暗徬徨於無地』。爲什麼呢？因爲他要『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指影——凡海），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子在黑暗裏。只有我被黑暗沈沒，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這很明顯的是一種孤軍獨戰的自慰之辭。同日，他所寫的『求乞者』，也表明他底心境虛涼，這就是他所說的『無所爲』和『虛無』，他要用這些作爲武器，來向世界求乞，這就是他對於世界，將什麼也不求，所以實際上，這是一種孤傲。而這『無所爲』和『虛無』，正是他在思想上得不到穩確結論的暫時避難所。他不贊成虛無主義，我們知道他仕『知識即罪惡』裏就會說明過，但他因爲受過莊周韓非的塵響，所以當他在預感着暴風雨行將到來的前夜而自己在思想與行動上又尙無所憑藉的時候，莊周韓非就

成爲了實際戰鬥者魯迅底對立物——帶着孤傲的悲鬱底憑藉了。而最重要的是他在語絲第二期上發表的那篇『記楊樹達君的襲來』，把他自己底這副姿態相當逼真的描寫出來了。我們爲了知道得更具體一點，現在把這篇文章裏的第一人稱改爲第三人稱，節錄在下面：

……早晨，其實時候是已經不早了。魯迅還睡着，女工將他叫了醒來，說：『有一個師範大學的楊先生，楊樹達，要來見你。』他雖然還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楊遇夫君，他名樹達，曾經因爲邀魯迅講書的事，訪過魯迅一次的。魯迅一面起來，一面對女工說：『略等一等，就請罷。』

魯迅起來看鐘，是九點二十分。女工也就請客去了。不久，客就進來，但魯迅一看很愕然，因爲他並非魯迅所熟悉的楊樹達君，他是一個方臉，淡赭色臉皮，大眼睛長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歲的學生風的青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愛國布（？）長衫，時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頂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圍帶；還有一個采色鉛筆氈匣，但聽那搖動的聲音，裏面最多不過是兩支很短的鉛筆。

『你是誰？』魯迅詫異的問，疑心先前聽錯了。

『我就是楊樹達。』

魯迅想：原來是一個和教員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學生，但也許寫法並不一樣。

『現在是上課時間，你怎麼出來的？』

『我不樂意上課！』

魯迅想：『原來是一個孤行己意隨隨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樣如此傲慢。』

『你們明天放假罷！』

『沒有，爲什麼？』

「我這裏可是有通知的——」魯迅一面說，一面想，他連自己學校裏的紀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見是已經沒有上課，或者也許不過是一個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蕩者罷。

「拿通知給我看。」

「我團掉了。」魯迅說。

「拿團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誰拿出去的？」

魯迅想：這奇怪，怎麼態度如此無禮？然而他似乎是山東口音，那邊的人多是率直的，況且年青的人思想簡單……或者他知道魯迅不拘這些禮節：這不足為奇。

「你是我的學生麼？」魯迅終於疑惑了。

「哈哈，怎麼不是。」

「那麼你今天來找我幹什麼？」

「要錢呀，要錢！」

魯迅想：那麼他簡直是游蕩者，蕩蕩了，各處亂鑽。

「你要錢什麼用？」他問。

「窮呀，要吃飯不是總要錢嗎？我沒有飯吃了！」他手舞足蹈起來。

「你怎麼問我來要錢呢？」

「因為你有錢呀。你教書，做文章，送來的錢多得很多。」他說着，臉上做出兇相，手在身上摸。

魯迅想：這少年大約在報章上看了些什麼上海的恐嚇團的記事，竟模仿起來了，還是防着點

罷。他就將他的坐位略略移動。預備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錢是沒有。」魯迅決定的說。

「說謊！哈哈，你錢多得很。」

女工端進一杯茶來。

「他不是很有錢麼？」這少年便問女工，指着魯迅。

女工很惶窘了，但終於很怕的回答：「沒有。」

「哈哈，你也說謊！」

女工逃出去了。他換了一個坐位，指着茶的熱氣說：

「多麼涼。」

魯迅想：這意思大概是譏刺他，猶言不肯將錢助人，是涼血動物。

「拿錢來！」楊樹達忽而發出大聲，手脚也愈加舞蹈起來，不給錢是不走的！」

「沒有錢！」魯迅仍然照先的說。

「沒有錢？你怎麼吃飯？我也要吃飯。哈哈哈哈。」

「我有我吃飯的錢，沒有給你的錢。你自己去掙去。」

「我的小說賣不出去。哈哈！」

魯迅想：他或者投了幾回稿，沒有登出，氣昏了。然而爲什麼向魯迅爲誰呢？大概是反對他的作風的，或者是有些神經病的罷。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出，送許多錢，還說沒有，哈哈哈哈。晨報館的錢已經送來了罷，哈哈。什麼東西！周作人、錢玄同；周樹人就是魯迅，做小說的，對不對？孫伏園；馬裕藻就是馬幼漁，對不對？陳通伯，郁達夫。什麼東西！Tolstoj, Andreev 張三，什

麼東西！哈哈，馮玉祥，吳佩孚，哈哈哈。」

「你是爲了我不再向晨報館投稿的事而來的麼？」但魯迅又即刻感覺到他的推測有些不確了，因爲他沒有見過楊遇夫馬幼漁在晨報館副刊上做過文章，不至於拉在一起；況且他的譯稿的稿費至今還沒有着落，他該不至於來說反話的。

「不給錢是不走的。什麼東西，還要找！還要找陳通伯去。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魯迅想：他連他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復滅族法之意思了，的確古人的凶心都遺傳在現在的青年中。他同時又覺得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來。

「你不舒服罷？」他忽然問。

「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爲你罵得不中肯。」

「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來，向後窗立着說。

魯迅想：這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他忽而在魯迅床上躺下了。魯迅扯開窗幔，使他的佳客的臉顯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見他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動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角和嘴角都顫抖起來，以顯示兇相和瘋相，但每一抖都很費力，所以不到十抖，臉上也就不靜了。

魯迅想：這近於瘋人的神經性痙攣，然而顫動何以如此不調勻，牽連的範圍又何以如此之大，並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裝出來的。

魯迅對於這楊樹達君的納罕和相當的尊重，忽然都消失了，接着就湧起要嘔吐和沾了齷齪東西似的感情來，原來他先前的推測，都太近於理想的了。初見時他以爲簡率的口調，他的意思不過是裝瘋，以熱茶爲冷，以北爲南的話，也不過是裝瘋；從前的言語舉動綜合起來，其本意無非

是用了無賴和狂人的混合狀態，先向魯迅加以侮辱和恫嚇，希圖由此害到別個，使魯迅和他所提出的人們都不敢再做辯論或別樣的文章。而萬一自己遇到困難的時候，則就用『神經病』這一個盾牌來減輕自己的責任。但當時不知怎樣，魯迅對於他裝瘋技術的拙劣，就是其拙至於使魯迅在先覺不出他是瘋人，後來漸漸覺到有些瘋意，而又立刻露出破綻的事，尤其抱着特別的反感了。

楊樹達躺着唱起歌來，但魯迅於他已經毫不感到興味，一面想，自己竟受了這樣淺薄卑劣的欺騙了，一面却照了他的歌調吹着口笛，藉此噓出他心中的厭惡來。

『哈哈！』他翹起一足，指着自己鞋尖大笑。那是玄色的深梁的布鞋，襪是西式的，全體是一個時髦的學生。

魯迅知道，他是在嘲笑他的鞋尖已破，但已經毫不感到什麼興味了。

楊樹達忽然起來，走出房外去，兩面一看，極靈敏他找着了廁所，小解了。魯迅跟在他後面，也陪着他小解了。

他們仍然回到房裏。

『嚇！什麼東西！……』楊樹達又要開始。

魯迅可是有些不耐煩了，但仍然懇切地對他說：

『你可以停止了。我已經知道你的瘋是裝出來的。你此來也另外還藏着別的意思，如果是人，見人就可以明白的說，無須裝怪相。還是說真話罷，否則，白費許多工夫，毫無用處的。』

他貌如不聽見，兩手攙着褲襠，大約是扣釦子，眼睛卻注視着壁上的一張水彩畫，過了一會，就用第二個指頭指着那畫大笑：

『哈哈！』

這些單調的動作和照例的笑聲，魯迅本已早經覺得枯燥的了，而況且是假裝的，又如此拙劣，便愈加看得煩厭。他側立在魯迅的前面，魯迅坐着，便用了曾被譏笑的破的鞋尖一觸他的脛骨說：

「已經知道是假的了，還裝甚麼呢？還不如直說出你的本意來。」

但他貌如不聽見，徘徊之間，突然取了帽和鉛筆匣，向外走去了。這一着棋是又出于魯迅的意外的，因為還希望他是一個可以理喻，能知慚愧的青年。他身體很強壯，相貌很端正的，*Tolsoloi Andreev*發音也還正。

魯迅追到風門前，拉住他的手，說道，「何必就走，還是自己說出本意來罷，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卻一手亂搖，終于閉了眼睛，拚兩手向魯迅一擋，手掌很平的正對着魯迅，他大概是懂得一點國粹的拳術的。

他又往外走，魯迅一直送到大門口，仍然用前說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掙，終于掙出大門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從容地，

這樣子，楊樹達君就遠了。

魯迅回進來，纔向女工問他進來時候的情形。

「他說了名字之後，我問他要名片，他在衣袋裏掏了一會，說道，「阿，名片忘了，還是你去說一聲罷。」，笑嘻嘻，一點不像瘋的」。女工說。

魯迅愈覺得要嘔吐了。

看了這篇記事中的描寫，使我想起了「浮士德」裏面的浮士德和麥士斐爾特的糾旋。魯迅底悲涼孤傲的戰鬥態度，其實也像浮士德表現了市民意識的覺醒一樣，是中國革命到了高潮的結果。這篇記事中的楊樹達，後來事實證明果然是發瘋了，魯迅把他當作假裝的瘋子看待，雖然是

一種誤會，但當時的情形，使魯迅發生這種誤會是極其自然的。楊樹達的突然襲來，對於魯迅是一個猛不提防的意外，而一個人底潛伏的情緒，勇猛，悲哀，也還是懦怯，卑劣，在平常的生活中不隨便表現，在一種意外的突變中，是很容易暴露出來的。魯迅那個人獨自徬徨的游勇者底姿態，在這篇文章中是很看得明白，而且具體的。這一點，在魯迅與語絲的關係中也看得出來。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魯迅對語絲的積極態度了。原來語絲是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辦的，這大約是在魯迅從西安回京，第二次奉直戰爭正要開始的時候。魯迅在到西安去之前，繼『補天』之後的他底寫歷史小說的心思會又跳動過，他想寫一個長篇歷史小說敘述唐明皇一生的事績，所以到西安去看唐代的遺跡，也可以說是他到西安去的一個目的。但他所看見的現存的遺跡完全不是古藉上所見的那麼回事，只不過是一些黃土碎石，雜草，因此，他想寫唐明皇一生的事蹟與趣反而因此索然了。他回到北京後，也就沒有再去實現這個長篇歷史小說的計劃，却助孫伏園辦起語絲來了。那時是孫伏園在晨報館辦晨報副刊，恰巧徐志摩從外洋歸國，徐志摩和晨報館有點親戚關係，加以有幾個平時忌恨魯迅在晨報副刊上登文章的人，或者就是日後的『正人君子』吧，願意做徐志摩的後台，聽說還教徐志摩看法郎士等入底小說，把孫伏園從晨報副刊裏擠出來了。導火線是魯迅用假名寫的一篇『我的失戀』孫伏園本來已把它編進晨報副刊裏去了，但徐志摩却趁孫伏園外出時到排字房裏去把這篇文章抽掉了，因此，逼得孫伏園只好辭職。有一夜，孫伏園去訪魯迅，見面後的第一句話便是：『我辭職了，可惡！』

孫伏園在晨報館受外洋歸國的徐志摩的排擠，原來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所以他的辭職，魯迅並不覺得驚奇，後來魯迅問起他辭職的原因，知道了是由于徐志摩抽掉他底『我的失戀』的緣故，倒覺得抱歉起來，雖然魯迅並不看重那首詩，他自己以為那首詩是看見當時的『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的盛行，而故意做一首由『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玩笑的，況且他

所用的又是一個新鮮的假名，勢利的眼睛裏容不了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當然也是常事，然而魯迅底心上總似乎壓了一塊沈重的石塊似的，覺得抱歉。這樣的幾天之後，孫伏園提議要自辦刊物了，魯迅答應願意歛力「吶喊」。此外還有一些投稿者，共十五六人，也是孫伏園獨力邀來的，如顧頡剛，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俞平伯，馮文炳等，而李小峯，就是後來北新書局的老板，也是當時的中堅份子之一。大約印廣告，張貼廣告，跑印刷廠，校對，疊摺，開初時甚至拿到大眾聚集之處去兜售，都是李小峯，川島自己動手的。這樣，大約一星期之後，一張小小的週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北大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

「語絲」這個名字，據說是由幾個人任意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即此可知這個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或什麼立場，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他們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有的開初只在敷衍孫伏園的交情，投了兩三回稿便離遠了，有的如我們前面所說，由於後來魯迅在「語絲」中的積極作用，自自然然使有些不同意見態度的人走開了，所以結果便只剩了五六人，同時也在無意中顯出特色來了。那便是無所顧忌的任意而談，想催促新的產生，對有害于新的舊物，胆敢在可能範圍內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在「語絲」裏還是始終沒有明白表示的。

「語絲」的出版，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魯迅也在開初時付了十元，但「語絲」的銷路日見增加，不久便收支足以相抵，後來並且有贏餘了，李小峯是從這裏先做起老板來的。於是「語絲」每月要請一回客，市場中的茶居或飯舖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看得見掛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本牌了，常能聽到的是錢玄同底又快又響的談吐。但魯迅是不太喜歡參加宴會的，所以「語絲」社裏的請客，他也不曾參加過。從魯迅和「語絲」在北京的這些關係看起來，可以知道魯迅對「語絲」的態度是外涼而內熱的。就這說，如果有人以為他對「語絲」的表面的態度是消極而

孤離的話，就應該理解，這種態度實際上是他底戰鬥的精神之另一方面的表現。

魯迅底戰鬥精神，我們知道了他以後的歷史，就會了解他這樣的表面的形式，正是他底性格上的以退爲進的特長。因此，他底戰鬥，就是到他有了明確的目的意識的時候，也往往是不露聲色而實際效力却很驚人的。

『語絲』錯路一好，風行了之後，擠掉孫伏園的晨報館似乎受了點打擊，曾經和孫伏園去說過和，沒有成功。因爲孫伏園已去另就京報副刊編輯的職務了。京報副刊於這年十二月五日出創刊號，七日，自京報副刊的第三號起，便開始刊載魯迅底譯文，這就是『出了象牙之塔』的一些片斷。從此，在魯迅這一方面，『語絲』和京報副刊是發表文章的地方，而晨報副刊則顯然因爲（一）孫伏園的舊衍，（二）徐志摩投稿『語絲』，又被魯迅底『音樂』所嘲笑，所以和『語絲』京報副刊都是對立的了。因此，一九二五年的現代評論派，晨報副刊與『語絲』，京報副刊對壘的兩個陣營，在一九二四年底，就在無形中快要形成了。然而最能得利的是李小峯，他底北新書局，就是以『語絲』作爲基礎發展起來的。

『野草』裏的一部分文章也是魯迅在給『語絲』投稿的時候寫的。他收在『野草』裏的一九二四年的這幾篇文章，特別露骨的他底哀愁裏的悲涼與孤傲的成分之加強。其強烈的程度，可以使不從多方面去考察魯迅的人，可以看不見這悲涼與孤傲之感裏的戰鬥性。上面，我們既然把他那尙不明顯的戰鬥性，從他底悲涼與孤傲中分析過了，現在，我們不妨再來看一看遮掩着他底戰鬥性的那層厚厚的外衣，除了感情上的悲涼與孤傲之外，在思想方式上，又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混合物呢？

要說明這一點，魯迅在一九二四年十月所翻譯的『苦悶的象徵』對於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苦悶的象徵」是對於資本主義的一種反抗，它認為藝術是因兩種力量的衝突而發生的一種苦悶，所謂兩種能力者，可有兩種形式出現，一為社會的壓抑與純然的生命力，一為生命力本身的兩層人格。由這兩種力的衝突，於是才有藝術。「象徵」就是純然的生命力之自由創造的一種具象的顯在內容，是作為潛在內容的生命力的改裝。

兩種力量的衝突，也呼作鬥爭，他以為生命存在一天，就必須鬥爭一天，而生命則不斷的受外在世界的壓抑，它說：「我們為要在稱為『社會』這一個大的有機體中，作為一份子而生活着，便只好必然地服從那強大的機制。使我們在從自己內面迫來的個性的要求，即創造創作的慾望之上，總不能不甘受一些什麼壓迫和強制。尤其是近代社會似的制度法律軍備警察之類的強制機關都完備了，別一面，又有着所謂生活難的恐嚇，我們就有意地或無意地，總難以脫離這壓抑。在減削個人自由的國家至上主義面前低頭，在抹殺創造創作生活的資本萬能主義下下跪，倘不將這些看作尋常茶飯的事，就實情而論，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這明明是對於資本主義機構的一種抗議。原來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弊害都已經完全露面了，日本的資本主義也是一樣，廚川氏對資本主義所感覺的這種壓迫，是很自然的。兩種力量衝突的第二種形式是生命力本身和二層人格，他「以為所謂人的性格上有矛盾，究竟就可以用這人格的分裂，二重人格的方法來解釋。就是一面雖然有着罪惡性，而平日總被壓抑作用禁在無意識中，不現於意識的表面。」他說：「我們有獸性和惡魔性，但一起也有着神性，有利己主義的慾求，但一起也有着愛他主義的慾求。如果稱那一種為生命力，則這一種也確是生命力的發現。這樣子，精神和物質，靈和肉，理想和現實之間，有着不絕的不調和，不斷的衝突和糾葛。」

沒有鬥爭，不但沒有藝術，並且連生命也沒有吧。所以說兩種力量的衝突產生藝術，原來也並不是怎樣錯誤的，假如以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則廚川氏所分述的那兩種力量相衝突的不同的兩

種形態，實在都可歸併爲一個形態，那就是社會集團的鬥爭。受外在世界之壓抑的固來不是全社會的人，所以感覺到外在世界之壓抑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也只是社會之中的一個 *Class*，而人格的分裂，實在也就是這種集團之間的利益分裂的反映。所以我們看，所謂兩種力量的衝突，是社會集團之間的客觀的存在，而廚川氏則把它解釋爲生命力與外在世界，靈與肉的衝突了，因此，他所捕到的兩種力量的衝突這一現象雖然並不錯，但他解釋這一現象的方法，却是二元論的，從這種二元論的方法中，所得出來的是一種神祕主義的結論。他雖然認爲文藝有預知未來的力量，但卻沒有說明白爲什麼有預知未來的力量，只舉了些例，把它當作是天才的靈感罷了，所以歸到結論，他以爲「文藝是純然的生命力的表現；是能够全然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制，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表現出個性來的唯一的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隸根性，從一切羈絆束縛解放下來，這纔能成爲文藝上的創作。」

這些，可以說是「苦悶的象徵」中的中心思想。作者所根據的是伯格森一流的以生命的進行不息爲人類根本的哲學，和佛羅伊特一流的潛意識心裏學。不過，我們得要說明，伯格森底哲學，在廚川白村底著作裏所表現的反資本主義傾向，如其說是法西斯性的，倒不如說是小私有者底哀叫，他不過想在生活的苦悶中去求得另一個自我的小世界罷了。

那麼，魯迅底思想和「苦悶的象徵」中的這些思想，有什麼共同之點呢？很明顯的，在他翻譯這本書時，這書裏的許多地方是能和他共鳴的。

第一，魯迅底思想雖然和尼采並不一樣，但魯迅和尼采接近過，到這時爲止的魯迅底思想內容，根本上仍然還受着達爾文底束縛，所以在「苦悶的象徵」裏引用伯格森，以生命的進行不息爲藝術的根源這點，是很能引起魯迅共鳴的。

第二，誰都知道，魯迅是個戰士，生活就是鬥爭，在他是毫不成問題的。「苦悶的象徵」以

爲文藝是兩種力量衝突的結果，這在魯迅也是認爲當然的。至於這兩種力量相衝突，發生的是苦悶，因而也是文藝，就是說，文藝又只是一種潛在內容的苦悶和顯在內容的象徵的結合物，這點，恰巧迎合着魯迅當時的悲涼的情緒。很明顯的，由於大時代的行將到來與他本身所感覺的孤獨，他當時感覺苦悶是不能否認的。廚川白村底這種思想，不但使魯迅發生共鳴，並且還應響了魯迅底創作實踐。「野草」裏的大部分文章，所用的都是象徵的手法，雖然廚川氏把象徵二字，定評爲一切文藝上的表現，就是含義並不和象徵主義那麼狹隘，但在實際上，他並沒有從象徵這二字所包含的「改裝」這意味中擺脫出來，他對於白表純淨，黑表死與悲哀，黃表權力與榮耀等等的象徵手法，並不會予以適當的估價，反而是無條件承認的。所以「野草」裏的一部分散文詩，可以說是「苦悶的象徵」的實踐。

第三，苦悶的象徵裏雖然無條件的承認象徵的手法，然而不反對具體的形象，相反的，廚川氏認爲「唯其創作家有了竭力忠實地將客觀的事象照樣地再現出來的態度，這纔從作家的無意識心理的底裏，毫不勉強地，渾然地，不失本來地表現出他那自我和個性來。」因此，廚川氏底藝術論，和魯迅底現實主義還並不是沒有相通之點，這也是使魯迅接近「苦悶的象徵」的原因，「苦悶的象徵」裏認爲藝術的最後目的是表現出自我和個性來，這和魯迅當時還沒有完全擺脫的個人主義思想，也是並不衝突的。

但是我們也要說明，魯迅的譯書，據他自己說，並不一定要自己底見解和他所要譯的書中的見解完全一樣，他才來譯。「苦悶的象徵」裏的思想，雖然有許多能使魯迅發生共鳴，像上面所已經說明的，但魯迅底思想，當時也未必完全和「苦悶的象徵」一樣。廚川氏認爲藝術是生命力的顯現，而生命力的顯現，「是超絕了利害的念頭，離了善惡邪正的估價，脫却道德的批評和因襲的束縛而帶着一意只要飛躍和突進的傾向；這些地方就是特徵」。所以在「苦悶的象徵」裏

很濃厚的帶着爲藝術而藝術的傾向，雖然它以爲藝術可以預言未來，但預言未來的根據，却僅在描寫現在，這和魯迅以藝術爲改造社會的工具的一貫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因爲藝術要改造社會，單是描寫現在就不夠，必須批判現在，藝術中對於未來的預言，這時也成爲批判現在的結果了。從這裏出發，假如再進一步考究，那麼，改造社會的藝術，顯然是社會中某種力量的對立物，這對立物也應該有它自己底伙伴，假如僅僅是個人內在的生命力之苦悶的解決，那怎麼能對社會發生強有力的作用呢？更談不上改造社會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當時的魯迅並沒有能够這樣追溯下去，如果是這樣追溯下去，得到上述和魯迅底一貫見解完全對立的明確結論，那魯迅便不會翻譯這本書了。魯迅當時的思想，正在醞釀着一個決定的變化，還在一種大混雜的狀態中。他正和『苦悶的象徵』一樣，知道文藝可以預言將來，但到底預言怎樣的將來，將來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他仍然不免苦悶。他只知道，像『苦悶的象徵』中所說的，『除了不耐這苦悶，或者絕望之極，否定了人生，至於自殺之外，人們總無不想設些什麼法，脫離這苦境，通過這障礙而突進的。於是我們的生命力，便宛如給盤石擋着的奔流一般，不得不成澀成溪，取一種迂迴曲折的行路。或則不得不嘗那立馬陣頭，一面殺退幾百幾千的敵手，一面勇往猛進的戰士一樣酸辛。在這裏，即有着要活的努力，而一起也就生出人生的興味來。要創造較好，較高，較自由生活的人，是繼續不斷的努力的。』魯迅所走的正是這條路，這正是魯迅底生活，也就是魯迅所尙明確自覺到的思想。因此，他對於『苦悶的象徵』，只能渾然地當作意氣尙有多處相投的東西來接近，愛好，至於分折『苦悶的象徵』，那就因爲他當時連自己在思想上也把握不住一定的方法，沒有法子辦到了。毋寧說，他這時對『苦悶的象徵』中的那種以藝術爲超絕了利害念頭的意見，是反而因情緒的悲涼，在思想上不免雜亂，而表示退讓的。

第九節 孤軍獨戰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八月底出京：四五——四六——

可是，「苦悶的象徵」還沒有出版，正在醞釀着決定的變化的魯迅底思想，已經漸漸露出端倪來了，這便是我們在本章的標題上所寫的所謂奴隸意識，或奴隸思想。讀者或者說，奴隸意識是罵人的話，怎麼真的會有奴隸意識或奴隸思想呢？是的，這是我杜撰的名辭，但這是最能夠說明魯迅底思想意識的名辭。普通我們在口頭上的奴隸意識，是說的那種善於對上服從陪笑，對下作威作福的意識，我們以前說它是奴性，有過詳細的說明，已經知道，和我所說的奴隸意識是並不一樣的了。我所說的奴隸意識，是正面的解釋，就是被壓迫者底思想意識。被壓迫者有種種色色，魯迅底思想意識，一貫地就是代表這種種色色的被壓迫者底思想意識的；他底思想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民族意識，是因為中華民族做了帝國主義者底奴隸之故。他一貫的同情女人，小孩子，是因為中國的女人和小孩子，是男人和大人底奴隸底緣故。他為青年人辯護，不要命的攻擊反動復古，是因為為青年人要解救作為奴隸的中華民族，而反動復古派是幫助奴隸的中華民族，而反對復古派是幫助奴隸底主人來壓迫奴隸蘇生，阻止奴隸進步的緣故。他苦痛，他悲哀，是因為他感覺到戰勝主人的遙遙無期。所以也在『花邊文學』序言裏說，他『原是奴隸出身』，『華蓋集』的『忽然想到』三裏說：『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晚年他而且還主編奴隸叢書，這是他自覺到本身思想意識的證據。不過，他底奴隸意識，雖然是自始就，或者毋寧說，自他十數歲以後就在。他底血液中存在着了，但這種存在

，我們一直跟蹤着，起初是模糊的，不定形的，以後通過種種形式，經過種種變化，漸漸接近合理的歸着點，中途又忽然把這歸着點消失了，而他却不失望，以爲失望之爲虛妄與希望同，雖是苦悶，雖是悲哀，仍然前進不息，一直到現在，才漸漸有走向明確化，奴隸思想系統化的端倪。

要了解魯迅底奴隸思想明確化，系統化的端倪，我們必須先記起我們前面所說的魯迅底哀愁裏的戰鬥性，和悲涼孤傲之感的增強。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這是魯迅在暴風雨將到的前夜態度漸趨積極而仍然不免孤獨的緣故。然而他終不免孤軍一戰，雖然，他一向來，就在獨力和復古反動派，封建舊社會的一切文化殘餘戰鬥着，可是激烈的肉搏，却實在到一千九百二十五年才正式開始，而這種肉搏之先的前哨戰，因這年二月十日，魯迅寫了『咬文嚼字』和『青年必讀書』，便似乎要開始接觸了。

不過，因『咬文嚼字』和『青年必讀書』而發生的前哨戰，還不是促成肉搏的直接原因。促成肉搏的直接原因是章士釗底『整頓學風』。

所謂整頓學風，也並不是章士釗底獨創，是北洋軍閥看見五四運動後，全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學生常常要對國事說幾句話，不讓軍閥輕易的就把國寶得掉，所以使軍閥們常常忘不了要收拾北京的學生一下。而意欲討好於軍閥的官僚政客們，也就常常想找機會進攻學生，以向軍閥討功了。數年前的彭允彝當教育總長時，就會欲小試其技過，沒有成功。而這回，章士釗奉段執政底命令來整頓學風，不過是繼過去軍閥未竟的遺志罷了。

但章士釗之所以一定要整頓學風，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革命勢力的高漲。中山先生到北京時，在火車站受羣衆空前的熱烈歡迎，已經表現出召集國民會議，內除軍閥，外斥帝國主義並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國民黨底革命主張是如何受國民歡迎了，尤以學生爲甚。這一點，段政府是看見，而不能不日夜感覺不安的。中山先生住在北京，國民黨當然更形活躍，是

當然的。這對於段政府是一個無形中的威脅。當時段政府正在準備開善後會議，中山先生對於善後會議所提出的兩個條件中的一個，就是要以民衆團體的代表加入善後會議。這是和當時民衆的傾向革命相互照應的。段祺瑞也沒有敢容納中山先生底這一要求，只答應聘民衆團體代表爲專門委員，以敷衍中山先生，國民黨因於一月三十日決定不參加善後會議。二月一日，善後會議開幕，國民黨遂通電反對。從此，廣東革命政府和軍閥操持下段政權之間的貌合神離的關係又告破裂，而段政府也就不加緊對革命勢力進攻了。

軍閥對革命勢力的進攻，是以帝國主義爲依歸的。這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英帝國主義向廣東的革命政府進攻，而日帝國主義也和英帝國主義採一致的步驟唆使他底走狗奉系軍閥壓迫他們共同的敵人，北方的革命武力國民軍了。而在日帝國主義底手狗中最軟弱的一隻，段祺瑞政府，對手無寸鐵的民衆與學生羣衆，却還是可以盡欺騙與壓迫的能事的。善後會議，就是對民衆的欺騙。而所謂「整頓學風」，也就是對學生羣衆所進行的統制與壓迫。可是當他們還才開始以女子師範大學小試其技，就遇到羣衆力量底無情答覆了。段政府一立穩脚跟，馬上就把女師大的校長換掉，新來的校長就是楊蔭榆女士，一位陳西濤教授底親戚，可憐的章士釗如意算盤的犧牲者。她奉命到女師大當校長之後，學生方面，贊成的，反對的都有。也有很多是取旁觀態度的。楊女士假如是一個光明正大的辦教育者，倒也並不見得不能上台；不幸的是她來做校長斬負的使命是進攻或統制學坐，因此，她自己先就心虛，駭怕學生了，於是捕風捉影，教育未辦，先就要一套官僚政客的把戲，用出種種卑污的手段來收買學生，用留學，留堂，（畢業後留校工作）爲學生謀優良位置等去餌釣動搖，意志薄弱的異己學生站到自已這邊來，以企圖穩固她自己底地位。這些手段，似乎也收了點效果，而同時也就捆了她自己底墳墓了。因爲意志薄弱的學生，固來被她收買了一些，但有許多中立的學生，看見她這種行爲，却反而看不起她，厭惡她來當校長了，所

以她收買了少數意志薄弱的學生，却得到了十倍於這些被收買學生的反對者，唾棄者了。她代表軍閥政客的面目，本來還可遮掩一時，她這麼一弄，却反而在羣衆面前把自己完全暴露了。而在革命情緒正高的羣衆面前暴露了猙獰面目，要想存在是頗不容易的。然而楊女士自恃背後靠山大，而章士釗一流正人君子也願意極力支持她，女師大的風潮便終於要發生了。

女師大風潮表面化以後，便在全北京社會上引起贊成和反對兩方面的對壘，而這種對壘，已實際上不僅局限於女師大的問題，不過以女師大爲契機，發展爲革命羣衆與軍閥復古派的遭遇戰罷了。而在這次遭遇戰中，魯迅是衝鋒陷陣的惟一闖將。

但在女師大的風潮還沒有緊迫，楊蔭榆一流人底醜態還沒有十分露骨，其社會意識還不十分嚴重的時候，魯迅也並沒有馬上被捲入旋渦。而却是以「咬文嚼字」，「青年必讀書」和其他的文章，在繼續着他和復古派一貫的戰鬥。他被女師大風潮卷入旋渦，僅不過是他的這種戰鬥不能不接觸到當前最緊急的問題，而當此問題擴大於全社會分野時，爲此問題的魯迅底戰鬥也就是魯迅一貫的戰鬥本身了。

「咬文嚼字」發表在一月初，反對譯外國人名，受傳統思想束縛，用輕飄飄廢字樣譯女性底名字，這對於傳統思想，其實是很細微的攻擊。但配合着段政府對民衆的攻勢，北京守舊的文化營壘自然也動員起來，報章雜誌上反改革的空氣，漸漸更趨濃厚了，所以他們也沒有放過魯迅這篇反傳統的文章，羣起責難，和魯迅筆戰到二月初，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青年必讀書」的問題又發生了，「青年必讀書」是京報副刊徵求的答案。魯迅底答案饒有興味，現在抄錄如下，以供讀者參考。而且這答案，是到今天也還是可以平心靜氣地全部接受的：

青年必
讀書

從來沒有留心過，
所以現在說不出。

附

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年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做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註

這可不和「咬文嚼字」那樣只是翻譯的問題了。這樣的答案，恐怕在今天，假如還是第一次出現，也要被人認為是憤激之談吧？不然，就一定大受攻擊。這答案對中國舊文化，暫時加以全體的否定，在需要澈底破壞傳統思想的當時，完全是正確的。然而正企圖抱着中國的舊殭屍來攻擊民衆，反對進步與改革的當時北京的統治者及復古守舊派，那裏容得下這種針鋒相對的敵對者呢？於是一聲鼓響，就四面圍剿起來了，有些一知半解的青年，只知道國家民族的表面意義，不懂得單抱住殭屍反對進步，對國家民族反是一劑毒藥，看見魯迅這種否定一切舊文物的意見，也有誤認是他否定一切民族文化的，便也為頑舊份子所利用，攻擊起魯迅來。有一位青年甚至寫信

給魯迅，叫他搬出中國去。有一位警官高等學校的姓柯的人，甚至公開寫文章罵魯迅賣國。爲了『青年必讀書』和『咬文嚼字』，魯迅收到很多署名或匿名的罵信，也收到一些贊同的信。這些罵信的人未必個個有意爲舊文化保鏢，如果他們都是純潔的青年，或者不了解舊文化的惡毒，或者單根據直覺，愛惜自己底文化，那也就可想見，羣衆的無知是如何容易被反動者底甜言蜜語所利用！魯迅繼續着他抨擊舊文化的一貫態度，在這同時，寫了『看鏡有感』，是反復古的，寫了『忽然想到』一至四，是反封建，反對非科學，諷罵軍閥賣國和復古派的，寫了三月十二及二十九日的通訊，是痛恨國粹，當時盛行的反改革空氣與祖傳；老例等，堅持改革主張，痛陳守舊的社會阻止進步的毒計的。寫了『犧牲謨』諷刺精神文明，紳士們底自私自利。寫了『戰士和蒼蠅』，則熱潮社會上那些攻擊革命戰士的人們，極力爲革命戰士辯護，然而這些文章，只有『看鏡有感』是寫在『咬文嚼字』與『青年必讀書』之前的，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及到寫了『咬文嚼字』與『青年必讀書』，這才和舊社會發生激烈的哨兵戰，算是這年魯迅將要和舊社會正式肉搏的序曲。上述除了『看鏡有感』以外的文章，都寫在『咬文嚼字』和『青年必讀書』以後，可以說是因這兩篇文章而發生的戰鬥的魯迅底側翼兵團。及至三月下旬，和『犧牲謨』等文同時寫的『論辯的魂靈』就是直接參加『青年必讀書』的戰鬥，對那些反對他底意見的，守舊派底詭辯所做的無情的揭露。這次哨兵戰就這樣延伸下去，一直擴大成爲魯迅對舊社會的肉搏戰。

沒有疑問，魯迅對於中山先生底革命精神和人格，對於中山先生的在京和國民黨的活動，是敬佩而崇仰的。不幸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竟在北京逝世了，這在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眼裏是一件大可舉手相慶的喜事，而在北京的民衆，却是多麼悲哀。北京的民衆用極盛大的葬儀，表示了他極大的悲哀，這時於軍閥政府，又是一個很大的難堪，然而民衆畢竟失了中山先生了，軍閥政府在民衆面前表示了他們那虛偽的悲哀之後，接着就更凶暴地向民衆進攻了。在北京的國民黨

言論機關都接着大受段政府底壓迫，而段政府門下的文人墨客却開始來明明暗暗毀謗中山先生了。魯迅在三月二十二日所寫的『戰士和蒼蠅』，正是爲中山先生及民元前後殉國的先烈們表示崇敬，而針對着這些段祺瑞門下的文人墨客所發的投槍。

中山先生死後，軍閥們同時也更無忌憚了。國民黨看穿了段政府底假面具，態度日漸堅決，而奉軍也就更其加緊地向國民黨壓迫了。三月末，國民黨胡景翼取得豫督地位後，奉軍也就一方面迫段祺瑞令張宗昌督魯，以鞏固據點，準備再向浙江伸展勢力，一方面進兵爭取京畿地區，壓迫國民黨。在奉系軍閥勢力的扶持下，北京的反動勢力更形猖獗，當是意料中事，然而日趨覺醒的民衆，對於更趨猖獗的反動勢力，是只會更其強烈地感受壓迫的，魯迅底哨兵戰，因此也就號召到了願意和他共同戰鬥的友人。關於這點，我們要得以後去一一敘述，現在單從文藝出版物上看，北京站在進步這一方面的，除了『語絲』等舊有的刊物及副刊之外，『猛進』也在北大出版了。魯迅三月廿九日的通訊（刊華蓋集）就是痛陳守舊社會阻止進步的毒計，對『猛進』貢獻戰鬥意見的。我們說他孤軍獨戰，只不過是說，戰鬥的主要支持者是他，而他還沒有大規模的有力的友軍來和他相呼應，或者甚至對他的作戰有支持或配合的力量罷了。也因為他並不是嚴格意義的孤獨，革命的暗潮帶這些戰友來使他得到更大的戰鬥的勇氣，而同時，也就不不得不把他底哨兵戰展延出去，擴大出去，投入社會的大戰鬥裏了。

魯迅先生在怎樣
的情緒下戰鬥

現在，我們再來看魯迅是在怎樣的一種情緒與思想意識之下來從事於這類戰鬥的吧。一般的說，他和從前並沒有兩樣，就如『野草』中的『希望』所表現的，還和從前差不多，是哀愁，失望，而又不甘放棄希望的舉筆蒼懷，但把魯迅在這時所寫的小說放入考慮中，和他在『野草』中的散文詩，和他那搭摩反

動復古派的離感聯系起來，當作一個戰鬥的整體的他來看，那麼，我們就看得出這時的魯迅那哀愁情緒中的悲涼孤傲之感，因他底戰鬥之展延而更形發展了。這表現在一，我們前面說過的魯迅創作構成上的第三個類型，即回憶童年生活，直接加以記錄的類型，自從一九二二年寫了『社戲』之後，隔了兩年到現在，重新在『野草』中出現。這就是『風箏』和『好的故事』。『風箏』所回憶的是童年生活，而『好的故事』所回憶的是田園景色。這類回憶是大大都在魯迅底心景蒼淡與寒涼的時候出土的。二，『雪』的寒槍與孤獨之感，特別是『過客』的傲然而前走的態度；他說：『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裏去，就沒有了一處沒有名目，沒有一處沒有地主，沒有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有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有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恨他們，我不同轉去！……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已磨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因此，我的血不多了；我，喝些血。但血在那裏呢？可是我也不願意喝無論誰的血。我只得喝些水來補充我的血。……』這種態度，在『影的告別』和『求乞者』裏也包含有的，但『影的告別』裏的孤傲和悲感，沒有『過客』裏『長明燈』向前的志望。『求乞者』裏的孤傲，更和空虛的心境上顯影自憐之感交織成一體，只有『過客』裏的孤傲明顯地與魯迅底戰鬥迥相呼應，是魯迅底原有的孤傲之感的進一步的發展。三，表現在創作上，『櫻看』似乎不明顯，只要和以上兩點配合着看就知道的。這便是『長明燈』的主人公為傳統所迫害，如其說近於『祝福』似的感傷，毋甯說近於『狂人日記』的悲憤。而『示衆』所描寫的社會一角，也近乎『阿Q正傳』，其諷刺明快而冷峭，比起『肥皂』，『幸福的家庭』，『在酒樓上』，『祝福』，感傷氣都要少些。這證明什麼？證明因戰鬥的展延，他底悲涼孤傲之感的進一步的發展，發展成為魯迅底戰鬥本身底特性之一。但從全體上看，『長明燈』和『示衆』在創作上並沒有表現比『櫻看』中的以前的小說有什麼很遠的差別，毋甯說，在創作態度，創作方法上，都

還是「仍『徬徨』前四篇小說之舊貫的。然而由於革命潮流的澎湃，北京羣衆對於京畿附近的國民軍所持的熱望，而尤其是對廣東的革命政府，對上海，漢口的工人運動之擴大等所受的影響，堅決了他們底態度，正和那決意壓制革命民衆的段政府及其頑固派復古分子做一個正面的對照，激烈的鬥爭似乎越逼越近，兩方都在着着準備了，魯迅日益被捲入此種鬥爭情緒中，寫作的熱情就愈益提高了。他這一年所寫的東西，比起以前的任何一年，起馬都要多五倍以上，而在這樣忙碌的鬥爭與寫作生活中，算到他這年的小說，也有七篇之多。魯迅底文章，到這時才真的又和五四時代一樣噴泉似的傾瀉了。可是這種傾瀉，和五四時候的他底傾瀉相比，已經不大相同了。五四時代的他底噴泉之傾瀉，是欣喜而奮發，不可抑止地擁出來的，現在，他底噴泉是大半由黑暗來擠壓着，不管死活地四傾出來，憤慨而悲涼的。這種壓力，自中山先生死後，以女師大風潮的漸趨表面化爲導線，要向魯迅推進了。

魯迅和景宋等青年的關係及其奴隸史觀。兩個營壘的大體輪廓。

這裏，我們先要介紹一位因女師大風潮之媒介而和魯迅結合成爲終生戰友的景宋女士。景宋女士在這時，同時也是推動魯迅更積極些向前進的人物之一。

景宋又名許廣平，廣東人，秉性豪直剛強，年幼時頗受影響於她底一位鼓吹種族思想的長兄，爾後，她也想從事於革命行動，似乎很受過一點阻難的。因此，她雖然比不上魯迅底世故之深，世故却也不淺的。同時，她也和魯迅一樣喜歡談話，性子雖然剛強，有時却愛靜，不善於做刻板而枯燥無味的事，如起草章程之類。她到底還是一個接近文學的性格，這性格有許多和魯迅相象的地方。她和魯迅最不同的一點，是她做事沒有魯迅那樣細心。這是因魯迅做過多年抄寫校勘，整理的小字工夫，是決非一個平常人所能隨便趕得上的。

那時景宋底思想也並沒有明確的定型，大約和魯迅差不多，是一個憎惡腐敗的舊社會，雖然不知明確的目標，却以為前進總是好，對革命總是非常嚮往的。不過她比魯迅年輕得多，她還是在女師大聽魯迅講中國小說史的一個學生。她是一個苦學生，生活很堅苦，每天上了課之後，還要跑到校外去另兼工作以自奉，在校外工作完了，就返校拚命用功，每晚都要到午夜才睡。她底血氣正旺，她有滿腔抑止不住的熱忱，各地革命的消息給她以非常的興奮，但她眼前的阻力却是那麼大，她底世故雖然也不淺，但她沒有能像魯迅那樣沉着，冷靜，魯迅教她鏖戰，而她却恨不得做一個撲燈的蛾。對於女師大更換校長的事，她本來也是一個中立者，但後來她看見楊蔭榆那方面對學生許多威脅利誘的黑暗情形，她也怒髮衝冠了。她雖然同時還懷疑驅楊的那方面未必沒有色彩，然而她覺得不妨單獨出馬。支持楊蔭榆的官僚政客看見女師大的事長久不能解決，大有出馬助戰之勢，當景宋用化名寫文章單獨出馬談論女師大問題時，『現代評論』上也就跳出『女讀者』來論『女師大的風潮』了；景宋便又用『正言』的筆名對這女讀者底議論加以大膽的駁論，這樣，景宋實際上便成爲一個反對楊蔭榆的學生，而且必然地她在行動上也是要表現出來的。那時候，女師大的風潮暗流，已漸漸表面化了。楊蔭榆因爲不受學生歡迎，一直沒有到校。她的校長是偏安在校外，校內的事，由薛教務長在維持。薛教務長自然是代表楊蔭榆在校內衝鋒陷陣的，他也就不能不配合着教育當局的德政，對學生要種種手段，而他底手段是越要越露面，越難伸縮，終於只好提出辭職了。他辭職時，要把五個學生也同時開除，景宋怕也是在這五個學生之內的。這在景宋看來，認爲是幾位想拿學生和他一同玉石俱焚，心地非常卑鄙。所以當薛教務長發表他底辭職宣言時，那五個學生也就發表他們辭解的信，女師大的風潮於是露出表面來了。

不過薛先生底辭職信只發給各班，是專對學生辭的，實際上他並不想走，只想開除五個學生。教育部自然是幫楊蔭榆的，表面上却裝裝作啞，派人調查囉，問反對的不是多數囉，一面裝

着另請校長，他們去說過章太炎，章太炎不來，却另薦了兩人，一個也不來，另一個則教育部不肯去請。女師大的風潮就這樣不死不活的拖着。他們派楊蔭榆來當校長，爲的是進攻學生，想統制學生，現在楊一來，學生不歡迎，如果就由學生，那不是反給學生一個騷張猖獗的機會麼？這是他們所決不能容許的。所以他們底什麼調查啦，另請校長啦，都不是出於真心的。如果說他們非要楊蔭榆做校長不可，倒毋庸說，他們非將學生壓制下去不可。或者到壓制了學生下去之後，那時再另請校長，說不定他們可以甘心吧。中國人的辦教育一向如此，他們不是學生底底師，而是學生底仇敵。他們知道反對楊蔭榆的是多數，要硬對付頗不容易，這種遷延不決的辦法，正是老辣陰毒的軟攻戰略，想把意志薄弱的學生軟化，消極下去，終於將學生底攻勢無形打消。這對於血氣方剛的學生像景宋那樣的人，恰巧是一個攻不破的橡皮陣，再在這橡皮陣前面，動員許多鬼鬼祟祟的正人君子底流言和風涼話，把空氣充滿毒素，窒息着剛銳的勇士。景宋在這樣的窒息下，有力也無處用，陷入了非常猛烈的苦悶中。她這時正在和魯迅通訊，便向魯迅傾瀉了她滿腔的牢騷。她在通訊中，向魯迅控訴，慫恿魯迅挺身出來。恰好魯迅這時候因爲『咬文嚼字』和『青年必讀書』的哨兵戰，正在趁勢培養着舊社會，反動復古派，而在大時代的激流之下，有些能和魯迅接近的熱血青年也都躍躍欲試，魯迅家裏這時有了更多的男女青年出入了，大都是愛好文藝的他底學生，台靜農，韋素圓兄弟，日後主持狂飈社的高長虹一流人，北大，女師大的其他許多學生，還有景宋，董秋芳，向培良，從新潮社和京報副刊出世的作家，從這些人裏，魯迅開始找求可共戰鬥的人們了，而這些被魯迅找來的人們，也就和景宋慫恿魯迅一樣，成了推動魯迅的希望，熱情和勇氣的積極條件之一了。

許多人，像景宋也是一樣，雖然很希望魯迅站出來做一點事，魯迅自己也知道這些人對他的希望，但魯迅底態度，到現在照樣一仍舊貫，做他自己本來打算做的事。他對女師大的風潮，雖

可能保持沉默，而對於中國民族的劣根性，舊黨，則決心加以有計劃的攻擊。他說，『我對於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爲，現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効，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由我想來，——這只是如此感到，說不出理由——目下的壓制和黑暗還要增加，但因此也許可以發生較激烈的反抗與不平的新分子，爲將來的新的變動的萌芽。』他底這種預感是不久果然就要說中了的。而魯迅就在這種預感下，決心斗胆找些有反抗和攻擊之筆的新分子來對壓制與黑暗試一試了。因此，除了未名社的那些願意用自己底生命去培植花木的獻身者團結在魯迅週圍之外，現在『莽原週刊』又在醞釀中了。

未名社使我們有機會來談一談魯迅在新書業方面的工作。我們在前面把他底寫作生活，及與此相關聯的他底思想與精神的進展，他對舊社會的戰鬥等都說過了，却險些兒忘記了與他底寫作戰鬥爭生活分不開的他底出版活動。關於這事，我們在以前說到語絲的產生經過的時候，曾經接下它的伏線，現在，我們再回頭去看一看吧：語絲底銷路一天天增加，後來有了贏餘，李小峯被尊爲老板之後，每月化點錢請一回客，而北新書局就因此在北京翠花胡同成立起來了。北新書局的成立與發展，李小峯夫婦底努力自然不能否認，但主要的，還是靠魯迅底書和魯迅底指導。魯迅底書初在北新出版，照例不取版稅，而以版稅所得另印別的書，這是魯迅對北新的一種經濟上的直接扶助。其次，魯迅底書因爲很受讀者歡迎，以魯迅底書爲基礎開起書店來，書店是沒有不發達的。魯迅對新書業的指導，現在我們可以知道的是書型的新款；賣書用實價，以北新書局和新潮社爲創始人。這如果不是出於魯迅個人的指導，便是出於和魯迅接近的朋友與魯迅共同的意思吧。但商人馮唯利是圖的，李小峯後來也終于成爲唯恐剝削壓榨之不力的樞台老闆了，現在只能够在少數書店的舊書堆中找得出兩本『而已集』，『三閑集』之類魯迅底原本著作，還留有很闊的空邊，毛邊不切，其裝璜足以令我們現在的人見之汗顏。但魯迅的這類印書的指導也好

，費用雖體也好，究竟極目的，是爲了文化與讀者，當然和書商底賤賄利益，未必完全一致，比方費用寬假，就是書商所極不願意的。空邊多，裝璜好，本錢就大，賺錢就少，也是書商所不喜歡的，因此魯迅對蘇畫業指導的這些方案，只爲的在社會上已經發生效力，現在的書商都只恐抹煞取消之不成了。可是當日的北新書局受魯迅的這些指導，却並不是賠本，而是發了財的。因爲北新書局不但有魯迅底能够暢銷的著作爲內容，而且有了特具一色的書籍外形與不用虛作的光明態度作爲標記，立刻吸引了顧客底注意，取得了讀者底同情而發達起來了。魯迅還給北新書局編印兩種小叢書，一種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種是「未名叢書」，專收翻譯；後來李霽野，韋素園，韋叢燕，曹靖華這一班青年和魯迅認識了，他們都願意介紹外文學到中國來，這本來是魯迅底素志，他對於這方面的工作，並不是到編未名叢刊才算開始，我們知道，他在日本留學時，就曾印行過「域外小說集」的。但對於這些介紹工作，在中國偏偏一直都非常冷落，要得到志同道合的人更難，現在既然有這些青年願意來和他合夥，那在魯迅當然是件很值得高興的事。他便和李小峯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北新書局，由這班青年和他合夥同辦。李老板答應，於是未名叢書便和北新書局脫離，成立了未名社。他們自己都是能够自譯稿子的，只另籌了一筆印費，就算開始了。

未名社裏主要的支撐者，除魯迅以來，就要算韋素園了。他生着相當厲害的肺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這就天然的輪着他坐在那屋子又破又小的未名社裏辦事了。他是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笑影很少，認真地死釘着文學，研究外國文學的書。他似乎沈默，却很激烈，他帶着病工作，到他不能起床的時候，仍然不肯放鬆，伏在枕上翻譯戈郭里底「外套」。

這些願意用自己底生命去培植花木的青年團結在魯迅周圍，成立了未名社不久，那有反抗和攻擊之筆的新分子也漸漸地在魯迅身邊出現，而且被魯迅找着了。這就是後來狂瀾社裏的一流人

物。這些人以魯迅爲中心，自然就和未名社的人合成一條戰線了。這就產生「莽原」。

魯迅呢，他在組織着這些戰線以前，本來就已和社會上的舊勢力鬥爭了許多年了，現在他既然有意識地下了決心要攻打中華民族的病根，他既然預測到壓制和黑暗還要增加，因此還可能發生較激烈的反抗與不平的新分子，那麼，爲了抵制那還要增加的黑暗，爲了應該有較激烈的反抗，他雖然是已經在組織着新分子了，但他又爲什麼要等待于那反抗的陣線之組成才再來攻擊，再來反抗呢？他本來是作游勇慣了的，他就不妨先自一個人出陣吧。而這對於他底決心仍舊是毫無妨礙的。當「莽原週刊」尚在組織中，他底「忽然想到」五，六，就是非常露骨地反對保存國粹的。尤其是在「六」裏面，他底口氣不但是消極側擊，而且是積極地苦口相助，正面反駁的。他底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主張，也在這時提出來了。四月二十邊，他所寫的「春末閒談」，就不客氣的攻擊着統治者身上去，把學者，教育家，闊人，一並作爲「治者」一流人物，拿來和被治者對立起來。他認爲治者和被治者的對立，治者壓迫被治者，是沒有華夷之分，全世界一樣的。這裏，露出他觀察人類社會的國際性的新見解來了。在這新見解之下，他又寫了「死火」，表示他對治者不兩立的態度，願意捨身以煽動反對中國黑暗統治者的時潮；他寫「狗的駁詰」，罵人類的勢利，連狗也不如。「莽原週刊」是在他寫這些尖銳的文章時組織起來的。魯迅組織「莽原」時，也曾忙過一陣，在正忙着的時候，他籌辦「莽原」的消息不料先漏了出去，在報館裏做事的他底朋友不得他底同意，就把「莽原」的廣告先登出來了，這就逼得他不得不趕快把「莽原」弄出來問世，就隨京報附送，身以守五百份零售。「莽原」的作者，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是未名社和未來狂魔社裏的人物，這些人有的善於翻譯，有的善於創作，但能寫魯迅一樣匕首似的短文的人却不多。魯迅對於這一點，是還感覺不滿足的。因爲他最希望的是多幾支能够攻擊民族病根的筆，雖然如此，莽原到底帶着魯迅底特色，其委曲宛轉很饒有弦外之音的態度，是

很和語絲相像的。綜計當時在北京出版的刊物，出色的有「猛進」，「民衆之藝」，「孤軍」，「語絲」，「現代評論」，「莽原」，「婦女週刊」等七八種了。其中「現代評論」當初雖然並不露面，後來終於表現出是代表黑暗，專替當時的統治軍閥，反動復古派說話的。「婦女週刊」較爲灰色。此外的許多刊物，差不多都是團結在魯迅週圍的。這裏「猛進」，「孤軍」偏重政治，可以從正面向舊社會挺進，「語絲」和「莽原」則文藝性較重，接觸的範圍也較寬，可以從側面奇襲。此外魯迅還可以伸他底筆到京報副刊，世界日報和國民黨的報紙國民新報等報紙上去，（那時國民新報的副刊是魯迅編）進步革命勢力的生長，這是很看得明白的。而在這種客觀情勢下，魯迅底活躍也就進展到數年以來所罕有的景況了。

這裏，我們應該不要忘記指出站在「現代評論」背後的孤桐（章士釗）派正人君子，不僅包含反動的復古學者，而且還有熱通 *Young* 的洋紳士，這就是日後新月派的前身。新月派的主將是徐志摩，這位在正人君子指導下，從晨報館擠出孫伏園，而後來又投稿「語絲」，被魯迅開了玩笑而不敢來的詩人，我們知道是早已和魯迅結下仇了。「新月」的名字，就因爲這時候印度的一位詩人泰戈爾到中國來了，他開壇講演，人們替他擺一張琴，燒一爐香在面前，徐志摩就會和林長民各戴印度帽站在泰戈爾的左右來捧場過，因爲這位詩人和太戈爾有這樣一度良緣，而恰好泰戈爾做過一本「新月集」，日後的「新月」派與「新月」書店的名字，就是在這時候伏下遠緣的。現在，我們單知道「現代評論」背後的正人君子匯合着中華民族兩種不同形式的受害者於一爐，那兩種呢？一種是中國的封建餘孽，他們和帝國主義勾結着，作爲帝國主義義在中國的代理人，用復古，保存國粹等美名來束縛中華民族長大；一種是帝國主義文化的盲目崇拜者，他們在洋化教育裏長大，養成很深的洋奴性，是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宣傳者，他們實際上做了帝國主義底傳教士，直接向中華民族底獨立自主精神進攻。這兩種人，在外表上，似乎是各不相謀的，而其

實，他們都在同一個主人翁底氣息之下。他們所幹的工作各異，而目的則一，相互配合，一個專司綱縛，一個專司攻打，恰巧是帝國主義底代理人軍閥統治下的左右兩臂。中國的社會黑暗，他們不但不需要反對，而且是他們底托庇之所。這種情形，魯迅是看得頂明白的。他不但看明白事情的本身，而且，由於他一貫的不把事物孤立看的現實主義的精神，由於他在思想的荊棘中不斷的摸索，與大無畏的前進，他現在知道他目前的事象，並不是偶然的不可解的什麼國民性問題，而是可以在人類生活的法則中，在歷史的法則中找解答的問題了。他底『春末閒談』，就是想從人類生活的國際性中，去分別壓制者與被壓制者，治者與被治者，黑暗與反對黑暗者的。而他底『燈下漫筆』，則試着來看壓制者與被壓制者在歷史上的形貌了。

他在『燈下漫筆』裏，把歷代的中國人民，分成一，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即亂世——凡海）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即所謂太平天下——凡海）這裏，他把中國歷史的循環事象，用奴隸二字說出來了。×××

觀，和他底『春末閒談』聯系着一看，就很明白的看得出來，是一種從社會集團的鬥爭關係上，從剝削關係上出發的歷史觀。他在這篇文章裏所說的『人肉筵席』比『狂人日記』中所說的歪歪斜斜寫着兩個大字『吃人』的內包意義，已經又透進一步了。他不但指出了中國歷史過去的循環性（用術語說是封建時代的循環性），並且斷定，歷史的進化法則，決不能是永遠循環的。做奴隸而不可得，和做穩奴隸的悲慘時代，可以用奴隸自己底力量來結束，蘇聯革命的教訓，魯迅是看見了的。他說：『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於古已有之的時代麼？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意現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自然，也不滿意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青年的使命』。這是魯迅在思想認識上的決然的進步。他雖然還不能完全脫出進化論的羈絆而反過來駕制它，

但他實際上已經決定地對社會主義接近了。他狡猾地翻主反翁的曙光，他已看得清清楚楚，斷然無礙了。『掃蕩這些貪人者，掀掉這筵席（指人肉筵席）！』（凡集）『毀壞這廚房！』（即是現在青年的使命。）『……』

又 又 又

北京新舊兩社會勢力鬥爭的具體形態

女師大的風潮仍舊纏延不決。學生遲呈無數，而教育部方面則老是調查。薛教務長乃舊顏回校，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走的決心。學生方面自然是不願承認他回校的，只因爲四年級學生畢業在即，他們先承認了，這就挽回了薛教務長不能回校的命運。但到五月初，自教育部另請一位『繆先生』來當校長，而『繆先生』不來之後，校方和學生的衝突便急轉直下，突然緊逼起來了。因爲女師大的校長雖由教育部一再另請，但另請了而不來，這塊別人不敢啃的骨頭，楊蔭榆仍舊不肯放手。五七國恥日，校內演講，楊蔭榆到校，直接和學生衝突起來。同日，章宅也遭學生攻打。因爲五·七正是廿一條的國恥紀念日，在『整頓學風』的名義下遭受壓迫的愛國青年，在記起國難，記起帝國主義的仇恨的同時，他們久壓在胸中的怒火，現在噴吹到和帝國主義勾結的這些陰險的政客，官僚復古派身上去了。民衆是最明白真像的，保存國粹的美名蒙不住他們底眼睛去看穿國粹派赤裸裸的醜惡面目。現在這就是青年學生對他們的一個答覆。於是壓迫也就更來得厲害了，打章宅的事，有的被捕，有的失蹤，有的被打死，而楊蔭榆也就趕快到校外去請客開會，五月九日，

她以評議會名義開除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景宋亦在內——的牌示也就掛出來，楊蔭楹「致全體學生公啓」也發表了。由是全校譁然，遂堅決拒絕楊蔭楹長校，派學生把守校門，不準校長入內。但校方自然也另有更嚴厲的辦法的。校方和學生從此各走極端。

在高壓之下，反抗亦愈強，於是請願，於是又碰到機關槍，同時，胆小的分子也就會發生動搖，這是弱點，而壓迫者也就利用羣衆底此種弱點，以寄托他們勝利的希望。然而此種希望很微，反抗是更強，更堅決了。痛痛快快的衝突，比起纏延不決，起馬景宋是覺得更痛快一點的。

這樣，火勢就蔓延開來了。楊蔭楹自然要對學生開火，不時發表言論，教育部的人員，及與教育部有關係的官僚政客，文人墨客也接連向女師大學生開火，而女師大的學生，也就不得不挺身向前，或者另求支援了。這裏，爲女師大的學生所找求到的有名的支援者，是還具有良心的所謂「七教員」。魯迅也是「七教員」中的一員。

在「七教員」沒有露面以前，魯迅實際上已按捺不住，先就感慨系之了。這就是「忽然想到『七與九，及『碰壁之後』」。忽然想到『七與九裏的感慨，比較的還是淡淡的，話也從側面說，到了他『碰壁之後』，說話就不再留情了。所謂『碰壁』是這樣的：教育當局對五月七日學生底反抗行爲，一面採取更嚴厲的高壓手段，開除學生，逮捕學生，其目的自然是要壓制學生，使之就範。所以一方面對女師大的風潮自然也不放棄一貫的拖延延延，軟化學生的辦法，仍以補高壓之不足。女師大自學生六人被開除後，學生對學校的態度亦更堅決，學校當局也不肯讓步，便造成了僵持的局面。僵持就僵持，學校當局反正也願意拖延延延，這樣校務便無形停頓。這在熱心求學，愛惜光陰的學生，自然不能不焦急，於是他們去向教員求援了，就發信請求教員，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到校開一個會，出來維持校務。魯迅也接到邀請，於是日四時半到女師大去。但是這天開了會，沒有什麼具體的結果，魯迅在那裏倒反看到另一些擁護楊蔭楹的教員底面目，並且

一不小心，面前出現了一張楊蔭檢駁斥學生召集校務維持會，另定是日下午七時在太平湖飯店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開校務緊急會議的印刷品。魯迅不過是一個兼任教員，這印刷品當然不是要請他開會，但爲什麼要偷偷摸摸趁他不備放到他面前去呢？魯迅對於這些現象和擁楊的教員底面目，印象非常惡劣。『碰壁之後』就是他從女師大回來後，當晚在盛怒之下揮筆寫成這些惡劣印象，和他對楊蔭檢的正面的嘲罵。從此，魯迅攻擊舊社會的戰鬥，便和女師大風潮這一個在當時實際上已無形反映新舊兩種社會勢力鬥爭的分野揉成一體，同時自魯迅底鬥爭正式接觸到這一分野之後，這一分野的鬥爭也就急激擴大，而成爲當時新舊兩種勢力互相鬥爭的焦點了。

他在華蓋集題記裏說，『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這實在是魯迅自歎，而社會不察，對於華蓋集的一般批評，也常以爲魯迅氣量不大，蕩事都要爭個勝利才肯罷休，這是最庸俗的淺膚之見。因爲他們並不知道這些『小事情』是當時新舊兩種社會勢力各爲其社會集團的重要利益而鬥爭的具體形態。

在北京領導青年學生
攻擊黑暗的魯迅
日常生活及其心境

楊蔭檢在太平湖飯店召集校務緊急會議之前，早已想好另一種進攻學生的新方法了：發信給學生家屬。這方法很毒辣。利用學生底家庭來控制學生，或把他們底子弟召回家鄉，便可以把學生底力量大大削弱，

末了剩下學生不多，他們就容易對付了。魯迅對於這毒辣的方法，甚覺憤怒，因爲中國家庭有尊重師長的傳統，師長說學生不對，學生是決無辯解餘地的。要拯救學生這一個嚴重的打擊，魯迅認爲教員之類，應該有一番宣言來說明事情的真相。以師長底話來反駁師長底話，那才能在中國家長面前發生點效力，使他們不昧於一面之辭。魯迅以爲這在女師大教員是責無旁貸的，雖然女師大教員有許多是楊蔭檢那一方面的人，他們決無此種義務之感，但他以爲女師大如果全是這一

類的人，竟少數幾個願意來說這話的教員也沒有，那麼，即使校長竟去，被開除學生底學籍恢復，這學校仍是沒有人的學校，學生不如還是乾脆走了罷。所以我們知道，魯迅在寫『碰壁之後』以前，已經有決心出來為學生說話的了。他底寫『碰壁之後』，決不是一時的意氣。他在五月十八日（碰壁前數日）寫給景宋的信裏說：『我現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不是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他們即使怎麼樣無理，事實上都着着得勝，然而世界上豈真不過如此麼？我要反抗，試他一試。』

於是魯迅就挺身出來說話了。

接着楊蔭榆寄給學生家屬的信之後，五月廿七日，七教員宣言也就在報上出現。這對於楊蔭榆是一個無情的答覆，一個强有力的打擊。為了抵禦學生方面的這個有力的攻勢，楊蔭榆底固有陣勢，已經不足以應付新局面了，於是，以前躲在黑暗中為楊蔭榆撐腰的正人君子，現在不得不調遣陳西澹補充出來，出面說『閑話』。『閑話』發表在五月卅日發行的『現代評論』上，先幾段裝作是並未看見七教員宣言以前寫好了的，評女師大是『臭毛廁』，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隨後，評七教員宣言，說他聽到流言，女師大的風潮，有北京教育界某籍某系的人暗中挑剔，這就是隱約指着魯迅的。魯迅也就予以答覆，寫了『並非閑話』；隨後又寫了『我的籍和系』，把陳西澹一流的正人君子罵得體無完膚，同時正人君子那方面也學七教員宣言的榜樣，在晨報發表了該校教系教員兼代主任汪懋祖底意見書，向女師大學生側擊，女師大的風潮，因此遂成為社會注意的中心，把新舊兩方的勢力吸引於這一點來戰鬥了。這戰鬥從各方面展開來，其猛烈的程度，竟使原前刊載學生方面言論的京報也誠惶誠恐，表示不再刊載雙方文字，態度曖昧起來。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一九二五年五月末，六月初的時候。可是正當北京的新舊兩種勢力扭作一團的這個當兒，一件奴隸反抗主人的驚天動地的激變發生了。這件事，正當魯迅答覆陳源底『閑話』的時

候，也就傳到了北京，應響到北京新舊兩種勢力的鬥爭範圍，一方面更加擴大，政治性質更見濃厚，一方面也就漸漸匯合政治、社會、文化、軍事各方面的鬥爭於一爐，匯合北京這一地的革命勢力於全國規模的革命高潮中，形成翌年兩種勢力的決死戰。可是在這裏，我們還有關於魯迅的一二件似乎不甚重要，却頗有意味的事，不能不先加敘述，關於那驚天動地的激變，還得暫且按下，等會再說。

魯迅這樣質直，坦白，猛勇的幫助青年學生，使著意「整頓學風」的正人君子們措手不及，幾乎動員了他們所有的力量來應付，仍不能，感覺弄火的手難逃被燒之險。這一方面固然是青年學生革命情緒高漲，民衆與輿論雖受威脅，壓迫，畢竟是站在學生這一方面，而作為正人君子之鼻山的軍閥受着革命勢力高漲的壓迫，如國民軍對奉軍的威脅，郭松齡的倒戈等，及軍閥與軍閥之間的矛盾，如奉直兩系的互相衝突等，而因陣地並不能穩固的結果；但同時也由於魯迅的奮不顧身，不管同儕是否一致行動，單身匹馬也衝鋒陷陣，如入無人之境，而且酣戰不懈，這才使守舊派底堡壘迅速動搖，混亂，全然陷入麻痺無能的狀態，而醜貌更不可遮掩了。這當然不得不使青年學生對魯迅發生無限的愛戴與敬愛之情。可是在這裏，我們不能不鄭重補充說明，我們以前說魯迅底奴隸思想漸露明確化的端倪，決不是說魯迅已壓根兒從他過去的感情，思想，意識中飛躍起來。我們說他底思想漸漸明確化，只是一種端倪，這種端倪仍然被魯迅舊有的血肉包圍着。這在他這一時期的作品裏也是充分流露出來的。

首先，我們不怕重複的確定他對反動復古派的鬥爭，一貫的反臉在他底作品中。他為女師大風潮對正人君子的筆伐，自然是在女師大風潮這一具體問題上對反動復古派作戰所表現的一面。除了這一面之外，他對反動復古派作戰，還有另外兩方面的表現。即一，使不爲了女師大風潮這一具體問題，他對反動復古派的仇視與攻擊，仍然會從他所有的短文中透露出來。這在我們說

過了的女師大風潮以前的他底短文就是明證。現在我們可以引證「長城」，「雜感」，「北京通訊」，「忽然想到」五，六，「導師」，「編完寫起」等，所有他寫在對女師大風潮發牢騷以前，而爲我們所不會提到過的新文章來證明。二，是在他創作上的表現。這也是我們以前引證得很多的，但現在他有一篇小說「高老夫子」却是特別露骨地針對着國粹派的。高老夫子正是國粹家底一副縮影。他要扮麻將，要想着女學生，無知得近於愚蠢，却寫起「論中華國民皆有整理國史之義務」，「中國國粹義務論」等文章來，而且居然被推崇爲要作少年人們底座右銘。然而他自己對國史的知識真的如何呢？他對東晉之興亡這一點教科書裏的記載都要記了又記，到講台上還說不出，給女學生嘲笑，便惱羞成怒，說女學堂真不知道要鬧成什麼樣子。「高老夫子」中的另外一位國學家呢，是和乩仙蕊珠仙子唱和的專家。這就是國學家底真面目。這類國學家在中國大，中，小學校裏滿佈着，到處都是。他們對國學其實一無所知，知道的是賭，嫖，烟，酒，國學只不過是他們掩飾自己的無知，用以摧殘進步，高壓青年的口實。「高老夫子」底技術，是久已在中國燴炙人口了的，但對於「高老夫子」代表中國社會那一種型的人物，我還不會看見過適切的說明。可是現在，我們看見魯迅在和反動復古派正嘶殺作一團的時候，寫了「高老夫子」，却很容易地看得出「高老夫子」底真正社會意義，和魯迅自己底主觀企圖了。他對於反動復古派，對國粹家的深惡痛絕，在這篇小說裏是如火如荼一樣炙手可熱的。

但魯迅對反動復古派如此仇視，並且和他們作不妥協的鬥爭，如今在女師大風潮這一具體問題上，甚致於奮不顧身，那麼，這到底是什麼東西使魯迅如此堅定，如此勇猛呢？是不是我們前面說過，魯迅底思想已露明確化的端倪之故？一點都不對。這端倪現在加強了魯迅不少的鬥爭熱情，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但就是到現在，它也決不是魯迅底鬥爭熱情底唯一支持者。魯迅底鬥爭情緒裏充滿着悲哀，搖曳不定的成分。達爾文主義，人道主義，奴隸意識，還相當殘留着的個人

主義揉作一團，互相起伏消長，還是魯迅從專門爭的思想上的焦藉。雖然從這許多互相消長的思想矛盾中，魯迅底奴隸思想正在生長，漸漸佔着主要地位，露出明確化的端倪，然而這端倪離開對魯迅底思想確保支配作用的時候還相當遠，我們看魯迅下面的一些自白吧：

「北京通訊」，收在「華蓋集」裏，是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之夜寫的，他告訴當時也團結在他的周圍的未來狂熱社之一份子的向培良說：「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意力不從心，因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說得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荆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塗，我就該有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終於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爲別人設計的話，就是：『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以下，他接着說明，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然後他就把中國教人有活的古訓加以諷嘲，又展開他反對中國精神文明的戰鬥。

從魯迅底這些話裏，我們可以知道，他底思想雖然日漸向真理接近，可是他還並不能把握住他底思想上的發展，加以確信。因此，他不敢叫別人也走他一樣的路。他所敢於確信的，仍然只能停留在「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進化論的老觀點上。這說明他底思想正在矛盾中發展，就是所謂站在歧路上，他不能將這歧路上，即矛盾中的思想告訴別人是當然的。然而他並不因

思想的矛盾而停止他底戰鬥，那怕他對多種多樣的前途，幾乎難於舉足，可是他對那把一切前途都遮斷了的障礙物是看得明明白白的。所以儘管他內心自有苦痛，敵人是誰，他是並沒有認錯，也決不肯放鬆的。他寫給景宋的信裏，有好些地方，對這點都有明白的說明。現在，我們把他說得最明快的一處抄下來看看：

『——至於「還要反抗」，倒是眞的，但我知道這「所以反抗之故」，與小鬼（指景宋——凡海）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爲了希望光明的到來罷？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其實，我的意見原也一時不容易了然，因爲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已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爲別人，有時却爲自己玩玩，有時則竟因爲希望生命從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此外或者還有什麼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

我們再看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廿八日寫給景宋的信吧。他說，『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爲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因爲那時豫料是活不久的。後來豫料並不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把魯迅底這些血肉顯示出來，讀者不覺可怕麼？但這裏，我們也就看見了偉大魯迅底瘡痍滿目的肉體。水晶體，或石膏像似的偉人，只在想像中存在，在現實世界裏是沒有的。魯迅簡直常常過着一種慢性自殺的生活。假如他並不摧毀他自己，他也許可以活到蕭伯納一樣的高齡。

在悲鬱的時候，魯迅除了拚命的做，以消磨他底生命之外，他還有喝酒的習慣，一天要吸許多烟。這時的魯迅，已經是有着肺結核在身的了，而酒烟是最容易助長肺結核的發展，傷害身體的。正人君子用種種流言來給他們以卑劣的誣陷，使魯迅悲憤得不眠不食，長時期縱起酒來。經醫生診看之後，也曾警告過他，說服藥而同時吸烟，肺病不會好的。平時他對酒並不豪飲。他底

父親很愛飲酒，醉了常發脾氣，這給幼年的魯迅一個很深的印象，覺得酒醉並不好。所以他飲酒到了差不多的時候，就會自己約束，無論如何勸進，都沒有效果，如果有職務要做，他第一要守時刻，更不會多飲了。但到了現在這樣悲憤的時候，他就會放任豪飲，有時甚至半夜裏起來喝許多酒。平時他底飲酒，大約和他底飲茶一樣，如果工作不太忙，是要喝了一口，合上眼睛，細細品味的。他喝茶也很多，泡在一隻有蓋的舊式茶杯裏，一定是清茶，泡得很濃，普通的人飲了會覺得有點苦味。他房裏有一隻痰盂，經常容納他杯子裏的茶滓。他把茶滓倒入痰盂之後，就在書架上的罐子裏取些茶葉，自己跑到廚房裏去泡開水，決不要別人代勞。他飲得最厲害的，實在是烟。他吸的總是廉價烟，這正如他喜歡吃糖，而買的總是廉價品一樣，他底生活是克苦而儉樸的。倘有朋友送好烟給他，他也不肯獨享，要分贈一些給別人，共同享受。他每天吸烟總在五十支左右，差不多是一支接一支，沒有中斷的。他工作越忙，越是手不停烟，這時候，一半吸掉，一半是燒掉的。他爲了女師大的風潮，和正人君子們揉打着，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爲了與黑暗搗亂，而他底思想，却正陷在許多矛盾中。對前途他似乎也預測到一點，這是我們前面也說過的，但黑暗如此的漫無邊際，即說如我們前所說的，他底哀愁裏加強了戰鬥的成分與孤傲之感，而哀愁的仍然十分濃烈，則是不能否認的。他常不免縱酒，也是不足奇的事。可是我們前面說過的，當魯迅還不會爲女師大風潮說話以前，他已經在有意識地要擴大他對黑暗的反抗，在找着戰友，組織他底戰線了。因此，當他爲女師大風潮這一具體問題而和正人君子混戰的時候，他已成爲他所組織的陣線中的一個英勇無比的先鋒，一個領導者了。不管他自已個人底感情，仍舊和他底哀愁分割不開，可是和他同陣線的人們是不能不敬愛他，是不能不以他底摧毀自己的行動爲痛苦的。他們決定要請魯迅戒烟戒酒，這裏面，尤其景宋是最熱心的戒烟酒的督促者。這些青年人們，現在要來管理老師了，因爲他們愛他們底老師。

青年們常常出入的魯迅底家，是一所三開間，包括一個前院和後園的新修的屋子。這屋子，我們前面說過，在西城宮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是魯迅借錢購買，加以修葺的屋子。屋子的南面是一堵平屋，算是會客室。那時他很窮，這會客室裏只有一張桌子，客人來了，纔臨時由女僕從臥室裏搬兩三張凳來。只有頂生的客人才在這會客室裏見魯迅，稍微熟識一點的，大約都一直跑到他底臥室兼工作室裏去。所以實際上，他底臥室反變成會客室了，而他底會客室則有名而無實。從這會客室進去就是院子，靠院子之東是女用室，西是廚房，北面的北京人就叫北屋，北屋的東邊房子裏，住着魯迅底母親，西邊房子裏住着魯迅的舊式夫人朱氏，當中的就是一間魯迅底書齋兼臥室的方形小房子。這房子因為是隔了一間過道房子進門的，所以門口顯得陰暗，左右也不十分光亮，獨有北面牆上，是一片闊大的玻璃窗，光線相當充足。室內陳設簡單，靠北的玻璃窗下，是兩條木凳架成的一張赤露的木板牀，靠東邊壁下，放一張長方形的木桌，桌前比較惹人注目的是一把藤椅。靠桌的壁上掛着兩個照片，一個是魯迅自己，一個就是魯迅在東京舉醫時最爲敬愛的教師藤野嚴九郎。玻璃窗外就是後園，窗下有兩株棗樹，魯迅在「野草」第一頁第一行裏就會提到這裏樹過，正是這個。魯迅在這小天地裏，或埋頭工作，或負手徘徊俯仰，或躺在藤椅裏吸烟，隨着縷縷的烟絲曲折升騰而靜思默想，或走入後園中仰視天空，悲蟲鳴草死，造物無常，或繞後院中小楓樹徘徊，哀黑夜之茫茫。也就是在這小天地裏，沒有休止，沒有妥協地產生了許多使正人君子，復動復古派，國粹家痛心疾首的文字；而許多熱血青年，他們都決心爲中國求進步，要跟隨魯迅之後，一道向依附帝國主義的封建軍閥，官僚，復古派做困苦的戰鬥，經常的出入於這個小天地中。他們十分敬愛魯迅，因此他們反對魯迅那種因自己「特殊經歷而來的悲哀，他們相約禁止魯迅吃酒，甚至頑皮到派人監視他吸烟的數量。但在魯迅禁酒還可，禁烟則萬難做到。有一位住在魯迅家裏的同鄉，曾和景宋商量一同去勸魯迅過，用了一整夜反覆

申辯的工夫，總算把魯迅勸過來了，答應照醫生底話，好好把病醫好。可是二個大底習性，那裏是只要幾個友好善意的說話，就能够輕易改了的？他底思想情緒，如果在根本上沒有改變，這種敦勸即使能收一時的效果，但他們又怎能永遠監視他呢？這只不過表現了青年學生對他的愛罷了。然而這種愛甚至連一時的效果也不易收到。魯迅是不容易冒犯的，有一次，爲了人們強他節制吸烟，他發了氣了。事後魯迅覺得很不安，對不住人的好意。但我相信，他底吸烟的程度，怕是未必因此壓低的。他自己已並不想活得很久，不過他也不願意如他底敵人所望的馬上就死去，爲此，他又靈活，也想自制一些，在這動機下，他飲酒的情形，確實改善了不少，尤其是革命的曙光漸露，而景宋對他的感情漸漸足以慰安他的此後的日子裏。一九二六年，當他從北京逃到廈門，孤寂蒼涼之夜，想到起碼還有一個人是他底伴侶，他底生活意志便又強烈起來了。

魯迅底生活，精神勝於物質。他日常起床很遲，多在十一時餘，午餐大抵吃不下，這樣便開始工作，有時直到吃夜飯纔用膳，也不過兩三種菜，杯把酒。素來他不大吃，隔夜的菜他也不喜歡吃，他喜歡吃火腿，頂愛吃辣椒，魚却懶得吃，因爲細骨頭多。他覺得把時間用來細心對付骨頭是不經濟的。晚飯之後，他又繼續工作，照例每夜要到二時左右始入睡。有時寫興正濃，放下筆，也會一直寫到東方發白。他沒西洋作家那樣定出一定時間來寫作的習慣，他那時以爲寫小說是不能够休息的，過了一夜，那個創造的人底脾氣也許兩樣，寫出來的就不像預料的一樣了。他這種創作態度，相當受浪漫主義的應響，是很明顯的。他還不能用古典主義者那樣的相當科學的方法來處理題材，他認爲寫文章的人，生活無法調整，而且他底生活態度，我們這裏應該提明，他還受着健康的應響，加以他在冷酷的黑暗中，悲哀而憤怒，他底生活之起居無時，是毫不足奇的。他囚着垢面，穿一件褪色的布大褂，滿身補釘，鞋也滿是補釘，一團漆黑的長髮直豎起來，大約有兩寸長，粗而且硬，上髭又濃又黑，鼻泡眼腫，面色慘白，身子瘦小，恰像是吃大烟的

乞丐頭。但是他拚命工作，而且不太喜歡勞別人幫忙，一切大小瑣事，都願自己動手，倦了就倒在床上打一個盹兒，衣服也不脫，甚至被也不蓋，像士兵伏在戰壕裏休息一樣，翻過身醒了，抽一支烟，起來泡杯濃清茶，有時吃點糖菓點心，便又寫作了。『野草』的大部分就是這樣產生的。他很少娛樂，尤其不喜歡趕入多的熱鬧場所。他晚年在上海，雖然常去看電影，但在北京的時候却很少去。這或者因為那時的學校和教育部都是欠薪，他一直負債的緣故。看京戲，我們知道，他上過兩回堂，後來便不去看了。他最常去走走玩玩的地方，僅僅是中央公園。但有時也是不去玩，而是去做事。他底『小約翰』，就是在中央公園和朋友共譯出來的。

他雖然囚首垢面，可是他處理他底書籍文具，却有點近於潔癖。這是單看見他底衣着身貌的人所絕對想像不到的。他書架上的書非常整齊，一切文具用品，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許亂放。他常說『東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來便當，譬如醫藥瓶子，換了地方，藥劑師是會犯錯配藥的危險的。』無論怎樣忙，他寫完字之後，一定要把桌面收理好，然後才去做別的事。他底抽屜也同樣有秩序，不願意別人搬弄。他那小小的工作室，因為同時是會客室，凡他覺得惹目，可愛，容易引人搬弄的東西，他都把它收藏在較不注意的地方。非萬不得已，他不願意借書給人家，甯願買一本送人倒是可以的。人家送他的定期刊物，叢書等，他一看完，就分類按照他們各自的次序包起來，每包五六冊，『紮好，寫上書名和第幾期至第幾期，以便檢查』。景宋記述道：『凡是他包過的書，那方正緊湊，拆卸之後，我是再也不能照樣包好的。他不但包得好，對於紮的繩子也很留意，如果是好些的書或線裝本，紮時一定揀那些有漿質棉線做的繩子，免得紮的地方日久，留一條線痕。就是這扁平的棉繩，紮時也要攤平，線頭的結，一定要打在書的邊緣，省得將來壓着一個結的痕跡』。人們送給他的定期刊物，如偶然收到一本裝訂不整齊的，他一定要另外托人再買一本較好的換過。他自己印好的書，也要首先揀出兩部保存起來。對於線裝書，他還能夠拆

散，修理，裝訂完好，和原來的一樣的齊正。而訂的雙線也一定使他平行，絕不肯由他絞纏一起。太舊的古書，如果兩頭都被塵埃染黑了，他會一手緊壓，一手用浮水石把它磨乾淨，使之煥然一新。洋裝書如果時常用到的，他就先給它包一張書皮，省得弄髒。

我們前面說過，他很克己儉樸。他在日常生活中很惜物的。「每於包裹的東西拆開之後」，景宋說：（『新中國文藝叢刊』第三輯：「魯迅的日常生活」）不但紙張攤平，放好，留待應用，而且更把繩子捲好，集在一起，預備要用的時候，可以選擇其長短粗細，適當地用」。他以為隨時隨地可省得省，應該留有的金錢做些於人類社會有益的事。他助人甚慷慨，大部分的錢都用在印訂書籍上。以他區區的收入，假如不處處惜物，那裏能有餘款做別些事呢。他就用拆下來的包物紙來做信封，有時把朋友寄來的信封翻轉面，另做一個信封，非常之齊正勻稱。他做得而且很快，純熟而又敏捷，一下子能做一大批。

但雖然這時候已經覺得他以前只反對年老的人，而作惡的青年其實也並不少，他對青年也要打擊了；而其實呢，他對青年的幫助，仍然唯恐出力不大。他一生的時間，差不多有二分之一是費在給別人改稿，校稿，閱稿上面的。他會不憚煩的幾天幾夜替不認識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創作，校正譯稿，其仔細和少心，遠過於一位私塾的教師。他曾經跟鄭振鐸說過，有一位不認識的青年寄一篇稿子來請求他改，他仔細改了多回，那青年却寫信來罵他一頓，說被改塗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來，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這一次的回信，卻責備他改得太少。青年人生活感覺困難，他也盡力予以經濟上的援助。尤其是他覺得有希望的青年，甚至不但不把魯迅底好意放在心上，常常以怨報德，魯迅也總是愛惜得不忍立即拂棄。他反對黑暗的當局之勇猛，博得了許多青年底信任，來請教他的客人，差不多是川流不息的。許多青年，想盡千方百計去接近他。由於工作的繁忙，加以來客的衆多，更使他底生活起居無常了。他平均每天要到夜晚上至十

二時才散客，有時甚至錯過了吃飯的時間來陪客，他底許多工作，是在夜十二時以後做的。他待客人而且非常殷勤，連學生來也常請他吃糖菓。他在『馬上日記之二』裏，有一段記他待客的情形，很是有味，現在摘在下面：

『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只得將寶藏着的擦嘴角生瘡有勁的柿霜糖裝在碟子裏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喫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往往吃得澈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喫，又須出去買來。於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勁，總是吃得不多，既然喫不多，我便開始教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喫落花生如識芳之流，至於因此逡巡逃走』。這花生政策，是魯迅這年夏天發明的，但對密斯，却仍然不執行此項政策，因為他們吃得很客氣，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殼剩下一角，魯迅照舊用糖菓來優待她們。不過他也並不一律如此，對於新疏的客人，他起初大抵不免抱着戒心，我們看景宋下面的一段敘述罷：

『在北平時，東城有一家德國點心舖，算是那時首屈一指的了，很難得的機會，他纔從收到的有限的稿費裏買兩塊錢蛋糕來喫，而且也喜歡請我們。有時我怪問他爲什麼剛纔不拿出來請客，他却嘆息地說：「你是不曉得的，有些少爺真難弄，喫了有時反而會說我鬧氣，經常喫這樣點心，不會相信我是偶然的」。這可見他的隨處小心，一面我也疑心到他的過慮，但事實是：有時他知道某一位的艱困，請他們喫便飯，結果會說是他用酒食賄賂的呢，有的人就能够在這樣出奇，也難怪他的過慮。即使如此過慮，也還不免於毀謗的到來，所以有時他的舉動，如果不是社會上受到多方的經驗，是不大容易了解的，至少我自己覺得越一天越加深地了解他』。

他和人談話很少笑容，對生疏的客人，他底說話尤少。但他底談吐遲緩而有力。『漸漸的談下去』，鄭振鐸描寫道：『在那裏面你便可以發見其可愛的眞摯，熱情的鼓勵與親切的友誼。他

雖不笑，他底話却能引你笑。和他底兄弟啓明先生一樣，他是最可談，最能談的朋友，你可以坐在他客廳裏，他那間書室（兼臥室）裏，坐上半天，不覺得一點拘束，一點不舒服。什麼話都談，但他底話頭卻總是那末有力。他底見解往往總是那麼正確。你有什麼懷疑，不安，由於他底幾句話也許便可以解決你底問題，鼓起你底勇氣」。

他底房裏有兩把刀，一把就放在牀褥下面。景宋和魯迅的感情日洽，她從魯迅底一位同鄉口裏聽到了這消息，不勝驚奇，有一天，她頑皮地去搜查他底書架和牀褥，果然發現了兩把明晃晃的匕首。人們傳說他自殺，這是蠢話。只要了解魯迅的人，誰都會知道，魯迅可以死在敵人底刀下，是決不會用自己底刀來殺他自己的。魯迅的存在，使正人君子，反動復古派要想進行他們底陰謀，感覺非常棘手，爲了事務上的方便，中國的陰謀家用野蠻手段慣了，他們可以用任何丟臉的方法來除去他們底阻礙，這種想頭完全正確，因爲不久以後，尤其是翌年三二八，以通緝教授爲名，而行搶奪肥缺之實，以及以後的許許多多事實，都是證明。可憐的魯迅，以一介平民與當時手握生殺大權惡勢力爲敵，用以隨身自衛的，僅不過堪與強敵短兵一戰的兩把匕首罷了。

五卅還「可中魯迅底 現實主義的戰鬥」

我們前面說過的一件奴隸反抗主人的落天動地的激變，到底是什麼呢？這就是五卅慘案。關於這件慘案的經過，是隨便那本中國近代史上都說得很詳細的，現在不用我來贅述。我現在需要說明的是正當中國的革命高潮向上漲的時候，五卅慘案更普遍地激起了全國反對帝國主義的潮流，喚下了翌年北伐勝利的基礎。五卅慘案，是一個民族解放的運動，同時，更是中國的工人覺醒，表現他們底偉大力量的運動。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的鐵路工人覺醒的運動，報告了中國工人覺醒的第一聲，他們雖然隨即被直系軍閥壓倒了，可是軍閥們却阻止不了他們底生長，他們要登上中國歷史舞台上來爭一個主要腳色了，他們實際上已用他們自己底政黨參加着中國的革命運動，分担中國的命運。而

他們也就在這政黨領導之下，團結並擴大他們底力量。因五卅慘案而引起的上海工人的罷工，就是工人羣衆對帝國主義屠殺顧正洪的一個答覆。工人羣衆對帝國主義的這個答覆，正在全國民衆憤恨封鎖軍閥及帝國主義底黑暗統治，敢怒不敢言的時候，所以他們立刻就得到全國各階層的應響，擴大上海的罷工爲罷市，罷課，以至於擴大成爲全國的罷工，罷市，罷課，而五卅運動也就成爲一個民族解放運動，成爲一個全民一致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的運動了。這一運動的深入與普遍，奠定了翌年北伐的基礎。

五月卅日上海的民衆對帝國主義的堅決的反抗，不久就應響到北京來了。六月初，北京民衆也游行示威，萬人空巷。景宋也和女師大同學一道參加了此次游行，她走至一條大街，迎面看見楊蔭榆乘車笑迷眼着游行的大隊，景宋登時無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楊蔭榆，驅逐楊蔭榆的口號。左近的同學聞聲應響，羞得楊蔭榆驅車直竄，一直到她底車走離了女師大的學生，喊聲才止。這也實在是楊蔭榆的晦氣。

女師大風潮雖然鬧了數月，校長雖偏安校外，校內仍然上課。這就是我前面所說過的當局對女師大學生的軟攻，就是緩緩拖的政策所致的。五月七日章士釗遭打，楊蔭榆遭學生不客氣的拒絕入校，教育當局便轉而用急緩的方法雙管齊下，於是逮捕，開除，發信告訴學生家屬等都來了，可是校內的課務仍然勉強維持這是緩緩拖辦法的繼續，同時也爲的顧忌學生方面的校務維持會吧；學生方面對這種緩急齊下的進攻，也給予了強硬的答覆，我們以前都一說過了。及到五卅慘案應響到北京之後，這種局勢可是也不能不在此應響之下變化。首先是北京學生爲了響應上海學生，全體罷課，四出講演，募捐宣傳，女師大的課務便不得不停，而在教育當局方面呢，他們所以不把課務停掉，爲的是希望在此拖局中用所謂評議會，校務聯席會議等等來解決風潮，而他們遭了學生方面的抵抗及社會上有正義感的人們底斥責，後來評議會與校務聯席會議的旗鼓也就

不振了，現在課務既然不得不停，那麼一方面的希望就索性拖棄，在他們想來，學生方面的校務維持會，這時當然也不可能出來維持什麼校務了。輟幹的可能既去，現在便只有硬幹一途了。於是校方便走上更極端破壞的道路，積極拆學生方面的台。教務長和總務長相繼辭職，黑幕中的人們爲了準備更見不得人的硬幹勾當，先把孔遮掩起來了。

不久楊蔭榆在新平路十一號租辦專處，積極準備另招新生，楊氏另立女子大學的計謀，這時就見端倪，而教育當局武裝到校，解散文理二預科，再開除學生八人或十二人之說，也就盛極一時了。這些野蠻舉動的傳說，不久果然成爲事實。

五卅運動發生，應響到了全國，震起了全國的人心。儘管北京的正人君子善於趁風轉舵，並沒有絲毫放鬆對學生青年的進攻，北京革命羣衆底視線到底從女師大風潮這一問題上漸漸被吸引開去，這就是說，正人君子一面對青年學生進攻，不肯放鬆，而革命學生一面却有放鬆女師大問題之勢，這單從女師大學生方面看，是一個危機；可是從全面觀察，恰巧是北京學生運動從個別問題集中到政治的中心問題上去，集中到推翻軍閥與帝國主義統治問題上去的表現。這一點，在翌年的三一八慘案中表現出來。而現在，這一趨勢，正在跟着中國政治情況的演進而演進。

我們知道，南方的國民黨正在日夜長大，養精蓄銳的時候，北方以奉，直，國三系的對立暫時維持着均勢。段祺瑞底傀儡戲，就是在這均勢之下扮演的。自從四月二十一日善後會議閉幕之後，段祺瑞便公佈什麼國民代表會議，軍事善後會議，財政善後會議等條例，國民代表會議籌備處條例，國憲起草委員會條例等，準備大作其起草憲法，選舉國民代表的欺騙民衆的傀儡戲。可是段祺瑞扮演的這些戲，既遭廣東國民政府的反對，不能蒙蔽民衆，民衆既不注意，而互相對立，暫時維持均勢的北方各派握有實力的軍人，對段祺瑞所扮演的戲也不屑一顧。他們沒有把什麼憲法，國民代表會議放在眼裏，自願他們互相窺伺，都想找尋機會，吞滅別人，發展自己。五卅

慘案爆發，負責保護上海民衆的奉，直兩系軍閥，誰也不想向帝國主義有所非議，相反的，奉系軍閥却趁此機會，藉口要去維持上海的治安，派兵駐紮上海，把上海置諸自己底勢力範圍之下，同時幫助英，日帝國皇帝來鎮壓上海的愛國民衆。這是六月初的事。浙江的直系軍閥孫傳芳聞奉系一面派兵駐上海，把上海的財源奪入手中，企圖進窺浙江，驅逐孫傳芳，一面挾制在他羽翼之下的段祺瑞傀儡政府，要他任命奉系軍人去擷取安徽，江，浙等省的地盤，所以不管段祺瑞傀儡做做如何像煞有介事，却粉飾不出和平與統一，軍閥的混戰又要爆發了。

一方面軍閥甘心受帝國主義底制用，互相傾軋，貪慾無厭，惟恐出賣祖國之不力，壓迫民衆之不足，另一方面是如火如荼的民衆要求解放，反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怒潮。這兩種力量的對立，現在已經到了決鬥的前夜。五卅運動很快的就擴大到了全國，差不多沒有一個小城市不發生罷工罷學的民衆底怒潮，其中最大的是漢口慘案與省港罷工。省港罷工近十萬人，支持了一年半之久，傾刻之間就把遠東的大英帝國香港變成一個死港了。

五卅的怒潮，使魯迅好像突然間看見亮光一閃似的，在悲哀中得到一點安慰。他觀察事物的那冷雋的現實主義精神，雖然使他對五卅不發生任何過度的幻想，他甚至不相信五卅會有什麼結果，他在六月十三日寫給景宋的信裏說：「上海的風潮也出于意料之外。可是今年的學生的動作，據我看來是比前幾回進步了。不過這些表示，真所謂就是這麼一回事！試想：北京全體（？）學生而不能去一韋士劍，女師大大多數學生而不能去一楊蔭榆，何況英國和日本」。但他畢竟也以爲今年學生底動作，比前幾回進步了，這是他覺得歡喜的。他以為學生應該仿一個不好的結果，「就是白用了許多犧牲，而反爲巧人取得自利的機會。這種事在中國是常有的。但在學生方面也愁不得這些，只好憑良心做去，可是要緩而韌，不要急而猛」。這是他底一貫的態度，他要想到它底反面，推測它底將來，這就使他底興奮和關心服從於他冷雋的理智了。自五卅運動傳蕩到北

京來之後，魯迅寫文章的熱力更高了，他差不多每天都寫一篇文章，然而他底文章卻並不是殺呀，死呀一類的所謂狂號，都是外表上冷冰冰而熱力深藏於內的關切的警告，確切的指示。他愛五卅運動，所以他就找尋這一運動的缺陷與錯誤，盡力指責，針砭，以防它的流產。那時的青年瘋狂一般，宣傳是相當的廣泛了，甚至歐美各國同情中國民衆，有正義感的人士，如各國無黨無派知識份子所組織的國際工人後援會，也發表他們底『救中國國民宣言』，蕭伯訥和巴比賽都是署名的人。但魯迅却以爲專門鼓動民氣，單事宣傳，還是不夠，那時連文學青年也不太喊風花雪月，而代以血和鐵的贊頌了。他以爲這不是夠的。六月十一日，他寫了『忽然想到』十，說我們除了鼓動民氣之外，還要磨練實力，他指出那時有三點危機，足以破滅五卅運動的持續，就是一，日夜偏重於表面的宣傳，鄙棄他事；二，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爲國賊，爲洋奴；三，是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這裏面第一點最不明顯，而爲害實最大。所以他在十六日寫的『雜憶』，就專門來針砭這一個毛病了。他不覺嘆喟往事，回溯辛亥革命以前，中國人如何努力宣傳，鼓吹，雖是把民國成立起來了，而『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的活動和遺老的謬舉，……有袁世凱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惡加甚，有陰謀家的狡計而省界又被利用，並且此後還要增長起來！』他以爲『對於羣衆，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沈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他說，『我以爲國民沒有智，沒有勇，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着手於較爲堅實的工作了』。否則，他說：『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則即使如何鼓舞，也不會有面臨強敵的決心；然而引起的憤火卻在，仍不能不尋一個發洩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眼見得比他們更弱的人民……』早在那時候，就能提出如此正確的指示的，不是只有魯迅麼？而中國的青年，實際上，直到一九二八年以後，才算差強人意地覺悟到這一

點。而真正地確能如魯迅底指示以救國的風氣，實在到今天也還沒有普遍養成。

五卅運動的第二個大毛病，如每次愛國運動一樣，既然排外，便拿出中國固有底精神文明來自豪了。這一點毛病，據魯迅底意思，就是單只鼓吹民氣而不從理智上講求實力的另一方面的表現。換句話說，這就是一種民氣的盲目的表現。一聞排外，於是瓜皮帽，長衫，雙梁鞋，水烟筒都搬出來作爲愛國標誌了，而這些所謂固有的文明，正是毫不費力都可以拿得出來的，正表現中國人一遇實行的事，便只選輕易的做，而結果一切鼓吹宣傳便都不過是白費的精力。關於這點，魯迅在「莽原」的「補白」裏，加酷烈的指斥；國粹家底陰謀，漏不過他底眼睛；作爲復古派底不妥協的敵人的他，就是在疾呼着一致對外的時候，同肉底這些蟲豸底肺腑，他仍然是看得很透的。那怕他們化裝成形形色色的面貌，却瞞不過魯迅底眼睛。他在「忽然想到」十一裏，諷刺昨天反天主教，一見五卅流血，便出去向羅馬教皇訴苦，佩服教士對上海事件公正的人；他警告人民一心對外時，不要忘記防備自己底人趁機取巧，而奉系的藉五卅之口，駐兵上海，正是如此；他提醒喊着「同胞，同胞」的學生，說：「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爲「排貨」復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國人！」他要他們無庸掩飾，看看各色各樣的同胞。他痛望斷指疊倒那樣的精神文明不再發生；他提醒青年喊着到民間去，如其虛有其表，反而分散力量，不如大家一同在北京大叫更爲有力。他把精神文明罵得一錢不值。他在「莽原」「補白二」裏畫出那些頑固派底面貌，指明他們反對進步時，可以冠進步以種種惡名目，偶遇進步成功，他們便會搖身一變，也是同志了，而以後，他們還是會反過來反對進步的。這就是頑固派底狐鼠行徑。是不是魯迅單只看到這些黑暗面孔呢？並不是的，他在「補白三」裏再三鼓勵學生，要他們「報」。他爲學生辯護，痛斥那些嘲笑學生只有五分鐘熱度的本國民衆，有權者，袖手旁觀者們。他勸告真誠的學生們說：

「但是，別有所圖的聰明人又作別論，便是真誠的學生，我以為自身却有一個頗大的錯誤，就是正如旁觀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樣：開首太自以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飛得太高，墜在現實上的時候，傷就格外沈重了；力氣用得太驟，歇下來的時候，身體就難于動彈了。為一般計，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過是「人力」，倒較為切實可靠罷。現在從讀書以至「尋異性朋友講情話」，似乎都為有些志者所詬病了。但我想，責人太嚴，也正是「五分熱」的一個病源。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例如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奧妙，其一是「不恥最後」，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目標。」

魯迅底這許許多多正確的指示，正表現了他底現實主義的不苟精神。可以說是他底現實主義的另一面的表現。而給他底現實主義以正面說明的，是他收在「墳」裏的「論睜了眼看」。他說「中國人向來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鬪將！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贊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着。」他歷舉中國「非理勿視」，要人口裏的「並無其事」，「舊文學中的『奉旨成婚』」，「作善隆祥」，命定封神，增加忠烈等等祖傳的欺騙瞞自己，粉飾缺陷的事實，然後歸到上述的堅決結論。但他底現實主義發展至此，却並不是一個單

只報導客觀事實的旁觀主義者，我們必須要把他底奴隸思想放在觀念中，我們決不能忽視他對五卅的關心，尤其不能忘記他是作爲一個戰士向反動復古派鬥爭的。他寫『論睜了眼』的前幾日，寫了『論他媽的』，痛陳社會的不平等，鞭撻階層的差別，正是這篇『論睜了眼』底腳注。他是一個戰鬥的現實主義者，而他底戰鬥，爲的是推翻一切虛偽，欺騙，退化，殘暴與野蠻，他要推動現實的發展，助長現實發展的法則，因此他底戰鬥正和現實一致。所以他是現實主義者，同時也實是現實的改造者。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的特殊的典型。

五卅以後，在六，七兩個月裏，他差不多是天天有文章要寫的。除了上述這些論據明確，針貶五卅運動的毛病的文章之外，他還寫了像『田園思想』一樣的解釋以謂他所以說不用報導師的道理等較爲次要的通訊，和許多因爲難於直說，而隱約其辭的所謂散文詩，收在『野草』裏，如『失掉的好地獄』，『墓碣文』，『頹敗殘的顫動』，『立論』，『死後』等，都是這時候寫的。這些散文詩，有的諷刺當權者，有的拷問人生本味，有的悲訴人生，有的嘲笑中庸，有的冷諷正人君子及其同類。這些文章，抒寫他底感情，表現了他底內在生活的一面。這就是說，作爲詩人的他，跟着五卅運動的潮流，大聲警告人們小心這運動中的毛病，加以指導，雖是盡了一個戰士的任務，而追求人生，不斷的想接近真理，哀憤人類的情懷，也由他用筆寫在他底詩篇裏了。把這些詩篇和他底那些爲五卅而寫的文章全面的放在觀念中，才看得見魯迅底全人生；研究他底全體作品，他底人格才是具象而活靈活現的。

這時女師大既已停止課務，楊蔭榆雖在新平路另租辦事處，力謀給女師大學生以新的有力打擊，但他們也還不能不先有一番準備，而學生方面也一時沒有新辦法，曾請四主任出面親到教育部催促早日解決校事，一面另行呈文執政處，請其從速選人到教育部負責，然後解決校事。因爲那時章士釗躲起來了，宣稱要辭職。其實這都不過是躲躲閃閃的辦法。學生方面的這些催促當然

不會發生什麼效果的，這些天真的學生還不明白他們要想教育當局放鬆他們，還早得很呢。但魯迅對於這些「鼠們」底心似乎看得透的，他雖然寫了許多文章都是關係五卅的，然而他却並沒有放鬆這班「鼠」，向參加五卅運動的青年疾呼，叫他們提防這班「鼠」，雖然他在這時的文章裏並不正面提起正人君子底名字，似乎也少寫到女師大的問題，可是我們要知道，女師大問題也好，五卅問題也好，魯迅底戰鬥方向永遠不變，這就是攻擊反動，抵住黑暗的圍門，爲一切進步辯護。女師大學生，和一切參加五卅運動的愛國學生，都在他愛護之例，只要他看見這些問題，他底筆便不會離開這些問題，某個時期停留於這點，某個時期停留於那點，這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當女師大問題成爲新舊兩種勢力鬥爭的焦點時，他便跳入女師大問題中，而當這一問題和五卅問題暫時匯合，他底筆便落在五卅問題上。雖然女師大問題仍然有他自己底獨立性，它不久仍然又會變成北京新舊兩種勢力鬥爭的焦點，可是很明白的，它們終于要向政治的中心問題集中去。

我們只要一看『野草』裏面『失掉的好地獄』，『墓碣文』，『頹敗殘的顫動』，和『死後』，便知道魯迅是如何悲切。他們似乎仍然常常縱酒。正如五卅的興奮，不能使他忘記「鼠們」底狡計，脫却他底悲哀一樣，五卅所給他的愉快，掩不了他所得的苦痛。他這時的精神仍舊非常不好。他好比一個受傷的困鬥之獸，一面撫着他底創傷，却仍然毫不後退，毫不示弱，也不想休息，奮身以進，一刻也沒有鬆懈下來。

女師大風潮的頂點和
軍閥間均勢的破裂

當五卅運動使北京各大學之一的女師大停課，同時把學生底注意力從女師大學潮吸開去的時候，教育當局却正在準備對女師大學生的積極進攻。這一點，我們從教務長與總務長的相繼辭職，楊蔭榆在新平路十一號租辦事處語話上，看得很明白，而六月底盛傳以來的楊蔭榆武裝到校，開除學生十八

人到二十人的消息，八月一日，果然成爲事實了。楊蔭榆率領武裝入校，將學生加以毒打侮辱，並強拖出校，於是，因五卅而暫時沈寂了的女師大風潮，遂又由賢明的教育當局準備已久的攻勢之開始而復趨緊張，而且由於教育當局所用方法之卑劣，霎時間就又吸住了全社會的注意力，把北京新舊兩勢力鬥爭的焦點，雖然並不是復歸于女師大風潮的問題上，却畢竟又向女師大的問題移近些了。

幾天之後，楊蔭榆武裝入校的事情，便以三個相反的啓事來向全社會提出供詞了：一是『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底供詞，二是『楊蔭榆』底供詞，三是單叫作『女師大』底供詞。據這三個啓事看，楊蔭榆帶武裝入校以前，還會用過別的許多方法，謀以逼迫學生離校，如停止供給學生飲食茶水，使學生在生活上感受種種不便等，大約是因為學生堅持不肯離校，才使楊女士最後出此一計的吧。學生自治會底啓事裏說：『楊蔭榆突以武裝入校，勒令同學全體即刻離校，嗣後復命令軍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楊蔭榆及女師大底啓事則極力說學生『肆行滋擾』，『任情謾罵，極端侮辱』，想把楊蔭榆底暴行加以辯護。這正是新舊兩種社會勢力互相交綏時的宣傳戰。陳西滢說得好：『現在一部分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大風潮佔去了。』現在大部分愛國運動的青年的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大風潮佔去了。』雖然他自己裝作局外人，似乎是諷刺別人把女師大風潮小題大作，而其實，他自己正參加在女師大風潮的一面。學生問題，一向來是全國最高學府的北京新舊兩勢力相互鬥爭的轉捩點。

女師大學生被楊蔭榆毒打強拖出校之後，繼續抵抗教育當局的壓迫，並不屈服。他們在宗帽胡同另外租屋，就由同情她們的教員給他們上課，魯迅自然是其中之一。他指摘五卅運動底缺點，就根本不會忘記過復古派底陰謀，現在，他不過再又和這些復古派的正人君子，在女師大這一具體問題上扭打罷了。章士釗免了魯迅教育部旁事職，在地位上給魯迅以打擊，樂得守舊的一班

文人舉士手舞足蹈。劉百昭並且在部務會議上提議不發欠薪，想叫魯迅沒有欠薪好領，不但攤了官，而且不能在北京生活。封建軍閥底文人墨客對魯迅的進攻，不可謂不毒辣。可是魯迅並不駭怕，他一方面在平政院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一方面仍舊毫不退讓的做文章撻擊正人君子們。八月五日，他寫了『流言和謊話』，八月六日，他寫了『女校長的男女夢』，八月二十日他『答K·S君』的通訊，九月十五日，他寫的『碰壁之餘』，九月十九日，他寫的『並非閒話』，都是毫不留情的向正人君子們迎面擊去的。儘管正人君子用種種方法壓迫他，甚至上海的正人君子唐有壬投稿到上海鼎報裏去，說魯迅幫助女師大學生是得了腐布，受莫斯科的命令，這些儘管使他悲憤萬分，可是壓不倒他，相反的却使他愈益奮勇，精神愈益旺盛。因此，在這時期，他即使在悲憤交集，在和正人君子扭打中，他也還寫了收在『徬徨』中的最後四篇小說。而收在『墳』裏面的『從癩髮說到牙齒』，也正是一篇因十月二十七日北京羣衆爲關稅自主游行示威而引起的抒情文。從章士釗免魯迅底職，和劉百昭底提議等看來，就可以知道教育當局對女師大風潮的鬥爭，已經把目標相當集中在魯迅身上了，現在從這篇文章裏，更證明了他們簡直千方百計，無微不至的在找尋攻擊魯迅的據點。唐有壬底造謠中傷即是一例。十月二十七日那天，北京國民爲關稅自主游行示威，被巡警斷絕交通，至於發生衝突，雙方互有死傷。這天北京民衆再把章士釗先生底寒家予以搗毀。後來據正人君子說，章士釗先生底滿床滿地滿桌的藏書，本來是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的大學圖書館都比不上的，都在這一次搗毀中散失掉了。後來魯迅發感慨道：『在幼小的時候會有一個老子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湊出息的担子或攤子爲難，他自己摔了，却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正人君子說章士釗散失了這許多藏書是否是『賴』且不去管，總之我們知道章士釗又受了一次虛驚。然而那時候有權勢的遺孀章士釗，因此第二天，社會日報，世界日報，輿論報，益世報，順天時報等就異口同聲的發表了一則新聞，說魯迅被打傷，脫落

了兩個門牙。其實，魯迅這天因為身體不舒服，整天躺在大玻璃窗下的床上，並沒有出去，這類新聞，無疑的又是教育當局造的謠。他們想藉此奚弄魯迅，因而從旁快意，像是說：「哼，你們打章士釗的不用快意，章士釗沒有打倒，却先把魯迅底門牙弄掉兩個了。」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精神勝利法，同時，魯迅當時實際上成了羣衆底領袖，於此可見。可是却弄得關心魯迅的許多朋友，面問函問，倒大忙了一番。這實在也是中國歷史舞台上新舊兩種社會勢力相互鬥爭的頗爲富有諷刺意味的諧談。

段祺瑞底傀儡政府，一面對愛國民衆與學生，是如此的施行壓迫，一面却還是拼命的在扮戲欺騙民衆，公佈什麼國民代表會議選舉日期令，規定八月十六至卅一爲初選期，九月一日至二十日爲複選期。八月三日，國務起草委員會並舉行開會式，選林長民爲委員長。可是我們前面說過，段執政底這些把戲，既不爲民衆所關心，亦不爲軍閥所重視。張作霖籍口五卅慘案派兵駐扎上海，準備奪取孫傳芳底地盤，另一方面強迫段祺瑞任命楊宇霆，姜登選督蘇，督皖，以便包圍浙江。段祺瑞當初深恐這變一來，暴露了他傀儡的面目，不好再做戲法，因此不肯答應。可是張作霖堅持不允，後來盧永祥到北京去調停也不成功，段祺瑞不得已，只得應允奉系底要求，同時命馮玉祥以西北邊防督辦兼任甘肅督軍，命孫岳爲陝西督辦，算是敷衍國民軍。這些命令發表後，楊宇霆、姜登選即于九月中赴任。孫傳芳當然不甘心被別人三面包圍，束手待斃，因此，楊，姜一赴任，孫傳芳沒有等他們立穩腳，便于十月十日以檢閱爲名調集大軍，十五日他自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分五路進攻楊，姜。當十月二十七日，北京民衆爲關稅自主而遊行示威，並使段政府得以趁機奚落魯迅打落門牙的時候，奉，直兩系軍閥也正在混戰中。軍閥們一心一意爲他們各自底主子爭勢力範圍，而帝國主義也就趁這個時候出來想把他們久已頭痛了的五卅慘案趕快結束。他們用公使團組織了一個什麼調查團來滬，出了七萬五千元撫卹金，叫總巡捕麥克洋，捕頭愛活

生辭職，就算把五卅的命案償清了。

然而不幸的是五卅慘案的解決，並不能解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危運。省港罷工還在堅持中，全國反帝的怒潮並未鬆懈，而奉，直兩軍閥的混戰，却正把建立在他們相互間的均勢之上的段氏傀儡政府推倒了，這不能不說是北京女師大學生底好命運，因為這樣，在段氏直接庇護下的復古派如章士釗之流不能不暫時失勢，而女師大的學生才得喘一口氣，雖然不多一會，他們又照舊被捲土重來的這些復古派正人君子壓倒了，然而也就是在這樣反來覆去的相互扭打中，北京和全國的學生與民衆才終於把中國領到今天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中來的。事實上，這些學生與民衆，不久就要拿出他們底力量來，使這些軍閥知道利害了。

『徬徨』中的最後四篇小說。

『徬徨』中的最後四篇小說『孤獨者』，『傷逝』，『兄弟』，『離婚』，是在十月的後半月和十一月的前半月寫的。其中要算『傷逝』最好。我記得李長之著的『魯迅批評』裏，說『徬徨』中的小說，要算『傷逝』

『最壞，（其詳細的意見我不記得了，大意如此）。這真不知是從何說起的。但是我相信，和李長之抱同一見解的人一定不少，因為戀愛小說而和『傷逝』一樣的，不但在『傷逝』產生當時幾乎絕無僅有，就是在今天，和『傷逝』一樣的戀愛小說恐怕也不太找得出。一九二五年當時以創造社爲首的浪漫主義方與未艾，那時支配全青年界的公認的戀愛觀，沒有不是以盲目的熱情爲基準的。郭沫若底小說與詩，鼓吹以愛犧牲一切，郁達夫鼓吹釘棺，上愛迷，張資平滿口是三角戀愛的肉慾愛，蔣光慈一流人則寫着革命青年遇到非凡的少女，沒有不是把戀愛看得很高，就是寫到戀愛與革命衝突的時候，也必定想出種種法子來肯定戀愛，總之，戀愛近于神不可侵犯，對戀愛取着批判態度的，在當時可以說絕無僅有。這種風尚，在當時有一種革命的性質，那便是要

求人性，利用狂熱的愛來否定一切封建道德。因此，就是到了今天，這種風尚仍然繼續存在。不過由於事實的要求，正如魯迅所希望的，要解放中國，除了熱情與勇敢之外，還必須要有深沉的理性，新中國脫化過程中的直到今天的不斷的挫折，訓練了中國青年用冷靜的頭腦去認識一切，戀愛的盲目熱情就在這一趨勢下漸漸的不被置重了，然而就是到今天，對戀愛的某種主要的中國型提出批判的，仍舊還不會看見過。如果有，就是早在一九二五年就被魯迅提出了的『傷逝』。

『傷逝』裏的子君是一個依賴性很重的女性。這女人在戀愛的時候，是一個程氣，天真，富有勇氣的少女，她頭腦也很清醒，能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卜生，談雪萊。當她底愛人有所顧忌的時候，她倒反是大無畏的，能安慰，並且鼓勵男人的。不幸的是她和愛人同住之後，却並不能和男的一同奮鬥，她只會管家務，搥着男人底衣角，連書也不看，頭腦也遲鈍了。她忙着養雞，專心愛狗，而當男的一遇到打擊時，她再也沒有從前那種大無畏的精神了。她畏懼，頹唐，並且因為男的受了打擊，不能滿足她底慾望，她甚至還要埋怨，這種女性，在今天也無疑的是中國新女性中的大多數，是一個普通的典型。盲目的愛情結合了此種女性，正不知鬧了多少悲劇。而且在魯迅看來，悲劇是非關不可的。他說：『向着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搥着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那麼要怎樣子才能從這『一同滅亡』的悲局中掙扎出來呢？那便是把那盲目的愛情加以否定。『傷逝』裏的男主人公涓生寫道：『待到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纔覺得大半年來，只爲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須活着，愛纔有所附屬。世界上並非沒有爲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我也還未忘却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頹唐得多——』。當那爲了盲目的愛而忘記扇動的翅子復求扇動時，再溫習往日的情話，顯示溫存

時，已經是寫在心上的虛偽的草稿了。如果再要兩人同住下去，就只有繼續的啣安于虛偽，過着難於忍受的虛空的生活。否則，就只有說出真實，而她，這樣的一個經已挺着別人衣角麻木了，懦怯了的女性卻負不起真實的重担，然而既然有過盲目的愛，爲了不同滅亡，她就非負這重担不可，這就是以她個人的滅亡來代替一同滅亡，雖是悲劇的範圍縮小了，仍舊是悲劇。而這悲劇範圍之所以能縮小，是因為涓生能及早否定這戀愛的緣故。不然，否定這戀愛的將必然是更大的悲劇。

「只要能高飛遠走，生路還寬廣得很」。涓生說：「我要向新的生路跨邁第一步去——」通觀『徬徨』全冊，再沒有第二篇文章能像『傷逝』這樣積極而且意志堅定的了。雖然我們只要一問這意志是什麼意志，就會明白，仍舊是魯迅的一貫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達爾文的意志，但即使這種意志，也有充分的力量來批評當時流行症一般的全中國盲目的戀愛，並且具有至今仍然輝煌不滅的社會價值，而別的人卻從來沒有寫出一篇這樣堅定的小說來批評過，對於這樣傑出的作品如果也沒有認識，那便是着迷於盲目的熱情愛吧。

魯迅很少寫戀愛小說，『傷逝』幾乎是唯一的作品。這是一篇手記體的作品，我希望中國的青年男女務須找來讀一讀。從這裏，我們可以了解魯底戀愛觀是多麼堅實。從『風波』，『端午節』，『肥皂』，及最後『離婚』等文裏的舊式女性，到『傷逝』裏的否定的新女性子君，旁及於『明天』，『祝福』中的被蹂躪的女性，我們可以看見魯迅了解中國女性的豐富。他對於盲目戀愛的否定，正是從了解中國女性各種類型，以獲得了理解子君這類女性的豐富性中得出來的。

見諸魯迅底論文中的奴隸思想的端倪，在魯迅底小說中還找不到痕跡。而且由於這種思想在魯迅底腦子裏一時不能與進化論的思想統一，而他外在的環境又十分惡劣，因此，只要他不是抓緊進化論思想時，反而會落入虛空，『兄弟』和『離婚』裏面的社會價值比起『徬徨』中其他各

篇小說底社會價值更爲稀薄，簡直被抽取得少到了零的緣故就在於此。這就叫做『沖淡』。的確，『沖淡』是『徬徨』底最大特色。要不沖淡，就是感傷，或者否定的諷刺，像『傷逝』這樣以生的意志爲主題的，在『徬徨』中是絕無僅有的一篇文章。如果說『沖淡』到了極端的代表是『兄弟』，那麼『孤獨者』就是感傷到了極端的代表。『孤獨者』裏的悲憤，到了窒人的程度，很明顯的，混雜着寫此小說當時魯迅自己底悲憤。這裏面，第一人稱的作者，與第三人稱的魏連受，在情感與性格上完全混爲一體，難以分辨的。由於魏連受喜歡發表文章，發些沒有顧忌的議論，學界上對魏連受引起流言，這和幾個紳士所辦的『學理週報』開始攻擊第一人稱的作者，說他挑剔學潮，正是分作兩個人來承担的同一的命運。實際就是魯迅當時的真實的遭遇。『孤獨者』可以說是作者憤懣的結晶。如果我們記得他在『狂人日記』裏喊過救救孩子，那麼我們現在却發現他就是對孩子也失望了。這是魯迅悲憤到了極點的情懷。和『在酒樓上』的主人公一樣，魏連受早年也是富有熱情，有志於改革的人，但『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後來的齟齬，只不過是一個階級隨便，無可無不可的人物，正是魯迅底徬徨的形態，現在的魏連受卻終於變成一個暴戾驕恣，一意要同社會報復的緩惠略夫了。這是一種自暴自棄的當時魯迅先生受正人君子種種無理的侮罵；所發生的深不可測的悲憤的情懷，雖然堅強的意志，冷靜切實的思考習慣，常把他從失望裏救出來繼續前進，但在感情上，這種情懷的暫時存在，在魯迅實在毫不希奇，『孤獨者』正是這種情懷的留影。對人世全醜惡加以輕蔑，玩世不恭，自暴自棄，以至於死滅。像這樣的可怕的留影，在魯迅所有的小說裏簡直是罕有的。就是『藥』，也還有一個花園作爲笑影。爲什麼魯迅在這時候寫下這樣空前未有的悲哀與失望的故事呢？是不是他底思想走到了極端黑暗的地步？不，後『孤獨者』四天前所完成的『傷逝』就是一個證明。『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涓生說：『我約略知道，也間或依稀看見，覺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裏去的第一步的方法』。這正是魯迅自己

。他間或依稀看見新的生路，覺得就在面前，然而正因為他不知道跨進那裏去的第一步的方法，他對於新的生路結果只能間或依稀看見，而並不能把握確定，雖然如此，他絕對用不着像魏連生一樣的自暴自棄，以死為輕蔑醜惡的武器，因此他仍然還有意於戒酒戒烟，甚至吃魚肝油。不過，要他明確地拿定堅決的主意，他馬上能拿出來，而且言之有物的，仍舊還只能是可以發揮進化論的，如在『傷逝』中的場合罷了。『孤獨者』的產生，只能說明他當時受章士釗集中目標的攻擊，悲憤到了極點，才空前未有的把那霎時間的情懷不加修飾的傾吐出來罷了。因此，像『孤獨者』這樣失望到極點的作品，在魯迅底全作品中，也是罕見的，一時的。

徬徨的這最後四篇小說，在技巧上的熟練，現在當然不用再贅述了。如果要下一個比較，要算『兄弟』差一點。『兄弟』底素材不免令人有貧乏之感，秦益堂底同一內容的對話的反覆便是證明。『離婚』在組織上最為嚴整，『孤獨者』是一篇悲哀的詩，一氣傾瀉，可是並比不上『傷逝』那樣簡練，情緒穩實。從內容與形式的全體上說，『傷逝』還是第一篇。

魯迅的打落水狗及其雜文

現在，我還要回頭來把孫傳芳和奉系的戰爭接着敘述下去。原來楊宇霆和姜登選到江蘇安徽來上任，立足還沒有穩，被孫傳芳先發制人的打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只得節節敗退，一面向山東的張宗昌急求援兵，到十一月七日，奉軍失了徐州，才算由張宗昌底援兵阻止了直系孫軍底前進，其實是孫軍也不打算再越過徐州北進了，他——孫傳芳——現在已經能確保自己底勢力範圍，居然成為直系的中興盟主。

當孫傳芳正向徐州進兵的時候，一向受奉奉系壓迫的國民軍，以為有機可乘，便也向魯西，大名，保定等處移動軍隊，幾於和奉系開了火。張宗昌，所以不能如心所欲的援助楊宇霆等，這也是原因之一。不但張宗昌，就是整個奉系，現在也因為正與孫傳芳打仗，對國民軍也只好讓

步一點，所以經過段祺瑞出來一調解，奉軍也就答應讓京漢線國民軍於十一月十八日進駐到保定來了。

可是事情並不能就這樣容易的平安了結。國民軍一面移動軍隊，一面早已和奉軍內部的郭松齡領導的精銳部隊連絡好了，準備同時發動，進攻奉軍。這種連絡的成功，完全說明當時革命勢力的高漲。國民軍進駐保定後不及一星期，郭松齡的倒戈就出現了。郭原素奉軍中的新派，爲張學良所倚重，奉軍精銳幾乎全在郭氏手中，所以郭氏一倒戈，便勢如破竹，所向無敵。嗣後郭軍又得國民軍宋哲元部在熱河援助，無後顧之憂，其勢益猛，而到十二月初旬，國民軍索性老實不客氣的向直隸進攻了。

這裏，平日曖昧不明的軍閥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就要暴露出來了。奉系是日本帝國主義底走狗，日本帝國主義當然不能坐視他自已底走狗護郭松齡和國民軍攻倒，所以到十二月中旬，郭軍右翼到達營口，瀋陽震動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就出面干涉了。日軍有一師團之衆，穿上奉軍服裝，用近代裝備加入奉軍作戰，十二月廿三日與郭軍激戰於巨流河，郭軍大敗，夫婦均遭逮捕，次日即被槍決。這日本帝國主義豢養的奉系走狗，至此，方始轉危爲安。然而奉系在關內的地盤卻被國民軍趁機擄奪去了。這不能不說是軍閥底一個損失，無論對於直系或奉系。因爲華北不但是一軍閥壟斷政府的所在地，而且是北洋軍閥底巢穴，如果讓代表當時革命武力的國民軍擄取天津的海口，在華北與奉直二系軍閥分庭抗禮，以響應廣東的國民革命軍，那在軍閥統治，實在是致命的危險。這一點，奉直二系軍閥固然明白，而豢養奉，直二系軍閥的主人翁，英，日二帝國主義更是早就敏感到了。因此，郭松齡一倒戈，吳佩孚立即發電張作霖表示諒解，大意說：以前馮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現在郭松齡倒戈，想必你亦痛心。我平生最恨這些反覆無常的人，現在我願意援助你。同時吳佩孚即令靳雲鵬入魯，秘密資助張宗昌抵抗國民軍。國民軍有鑑於此，知道郭

松齡失敗，奉軍反攻，就在三面包圍之下，處境非常危險，馮玉祥因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通電解職出洋，並取消國民軍名義，將所佔地盤分與部屬，向政府推荐任命。這時段執政完全在國民軍掌握中，當然不敢不唯唯聽命。很明顯的，當奉系軍閥一敗於孫傳芳，二敗於郭松齡，受到國民軍壓迫的時候，北京的革命民衆，情緒自然是非常高漲的。這一樣來，平時敢怒而不敢言的人，現在也來說公平話了，反動的北京教育當局整頓學風的野心，因此不得不遭到輿論更大的抵抗。他們正幻想用最後的手段來打擊女師大風潮，幻想集中目標攻倒魯迅，也就不幸而於郭松齡倒戈期中腰骨一軟，堅持不下去了。但他們硬，魯迅固然要抵抗，他們軟，魯迅也不會馬上放鬆。這就是我們以後要說的魯迅底打落水狗的態度。他在『十四年的讀經』裏，（十一月十八日寫）就主張撲殺這類主張讀經的廢料，正是主張打落水狗的徹底態度。同日他又寫了『評心雕龍』，將復古派加以嘲笑。他在『堅壁清野主義』裏反對教育當局禁錮女生去游藝場與公園的命令，在『寡婦主義』裏巧妙地對楊蔭榆加以毒辣的嘲笑，在『並非閒話』（三）裏，毒罵陳西澣，在『我觀北大』裏帶便又把章士釗踢了一腳；在這同時，他也寫了『這樣的戰士』及四節『這個與那個』，前者以散文詩的形式寫出一個戰士的戰鬥姿態，可以說是描寫他自己的一生，後者則在直接攻擊以外，又正面提了一些建設的積極主張；他勸人不必讀經讀史，硬要讀的話，則不如讀史，而且頂好是野史；他勸人採用不恥最後的極的戰鬥方法；勸人不要壓殺未成熟的作品，應該加以扶掖。這些意見，大體他以前也提過的，現在又來提，可見這時需要此類意見的客觀情勢仍然存在。特別是『這個與那個』（四），他叫人不要壓殺未成熟的作品這意見，與他那『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講完全是同一意見，可見壓殺未成熟作品，要求一出馬就是天才的風氣，在中國當時停留了一個相當長久的時期，這主要的常常以天才自命的文學家底作風；除了這大體與以前的魯迅底意見相同的幾點之外，『這個與那個』裏，也提了另外一些新意見，比方勸人不要捧，還是

挖的好便是。從全體說，所謂直接攻擊正人君子的文章和提出積極建議的文章，其實不過是各有所偏罷了，事實上，直接攻擊正人君子的文章裏，魯迅總是以新的積極意見來和正人君子底大政方針相對立的；比方在『堅壁清野主義』裏，魯迅就提議『要風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卻不是禁錮所能辦得到的；在『寡婦主義』裏，他就主張青年應當天真爛漫，應當有朝氣，敢作敢為；另一方面，所謂他提出積極建議的正面文章，也還是以時弊為對象的，所以同時是攻擊的文章，比方四則『這個與那個』裏的意見，無論勸人讀史也好，勸人不要壓殺未成熟作品也好，勸人勸的戰鬥也好，勸人挖而不捧也好，很明顯的都是應當時的客觀情勢的需要，換句話說，就是當時因為有好捧，嘲笑未成熟作品，讀經讀史，戰鬥不能持久等等的時弊，魯迅才來提出這些建設意見的。所以這時的建設意見，同時又是攻擊，是批判的。並且，被攻擊與批判的對象裏，也常常躲藏着正人君子底靈魂在裏面。比方讀經讀史，就很明顯的是正人君子底靈魂。甚至散文詩『這樣的戰士』裏也描寫着正人君子底面貌。可以說，他甚至努力於文學創作的時候，也同時打擊正人君子的。他和正人君子戰得愈酣的時候，他底創作熱情愈高，其理在此。正人君子們在他底不斷攻擊之下，加以北洋軍閥勢力受國民軍的壓迫，因之益受輿論的壓迫，雖說是簡直支持不住對女師大學生的鬥爭了，但他們仍以最後的掙扎來抵抗輿論。原來自從章士釗非法解散女師大，司長劉百照僱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以來，教育當局就急忙另外掛上女子大學的招牌以便掩人耳目，由胡敦復任女子大學校長。女師大學生方面也不示弱，我們已經說過，幾個有正義感的教員仍舊支持女師大的校務維持會，而且團結得愈益堅固，給女師大學生在宗帽胡同上課。到支持章士釗一流政客在北洋軍閥的勢力受國民軍壓迫時，這些政客知道沒有靠山來幫他們壓迫輿論，而魯迅又不放鬆他們，後來章士釗在輿論壓迫之下被免職，照舊去躲在『甲寅週刊』裏，魯迅却反而復了教育部拿事的職，女師大學生從宗帽胡同歸壩們被佔的本校，

他們立刻感覺到危險迫在眼前，不得不起來做一度輿論上的掙扎了。但輿論到那裏去求呢？民衆與青年都不贊成他們，他們所能尋求得到的還是他們自己嘴裏的輿論。現在，他們再不能裝作各不相顧的樣子各自隱匿着了。這些城狐社鼠，爲了最後的掙扎，他們不得不大家合攏來擺一個陣勢，這就是十二月十四日，晚六時在攝英茶館產生的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從這會又變出一個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發表了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說女師大附和暴徒，而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爲伍。這聲勢非常浩大。而且這個公理維持會的會員都是些名流學者教授之類，他們自以爲該是能够給當時的輿論一個迎頭痛擊的。可是不幸得很，響應這些大學教授底公理的，恐怕只有日本人舉了中國人口氣的順天時報最爲出力，其他就是正人君子們支使下的報紙，也不大敢明目張胆來拂逆衆意，所以到十八日晨報上所載的該後援會開會的記事，就連發言人底名姓也不敢登了。魯迅寫了一篇『公理的把戲』，一下就把他底醜態全部暴露出來了。他們滿以爲合攏來擺一個陣勢，可以打一場勝利的明鎗明劍的，却不料一出場就感覺到沒有把握。於是這些城狐社鼠立刻現出了原形，又只敢在背後用暗箭，再不敢拿出坦白的態度來，似乎對自己底姓名也覺得害羞了。

女師大從宗帽胡同遷回被佔的本校，恢復了舊觀以後，往日校務維持會的教員以爲責任已盡，便陸續引退。至此，女師大學生幾乎可以說趁着國民軍一時的勝利，總算也取得暫時的勝利，暫時把摧殘窒息青年的教育當局底大政方針給了一個打擊。魯迅在教育部的僉事被復了職，雖然還沒有就去上任，但對於那些以魯迅免官爲快意的正人君子也實在是一個不舒服。然而這種勝利，正如國民軍勝利一樣，不久就又翻倒在軍閥底鐵蹄之下了。不過當時也算出了口氣，教正人君子們氣得不得了。他們既然不敢將他們在女子大學後援會自己底發言承認在自己名下，在背後弄暗箭的故技是一定要出現的。於是中傷流言等等又發生了。他們以女師大學生遷回她們被佔的本

校爲例，說張鬍子（那時張鬍子正在東三省和郭松齡打架，所以他們敢這樣舉輕蔑他的例，待到後來張鬍子到了北京，他們就要叫張大師了。）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學生把二三千學生的北大佔據了去。意思就是說女師大學生以一二百人把女師大強佔了去。這叫作牛頭不對馬嘴，因爲張鬍子並沒有率領一二百學生而至於被章士釗拖出北大來過，現在女師大學生是回本校，張鬍子從何處來了什麼被章士釗從北大拖出的一二百學生，現在要回北大呢？正人君子們弄出了這種比附，充分暴露了他們心勞日拙，魯迅在『碎話』裏嘲笑了他們一頓。陳西滢教授又在『現代評論』五五期『閒話』裏，根據女子大學學生宣言，大發感慨，說女師大學生只有二十個，別的都進了女大了，於是發問道：『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樣？難道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招了幾個新生也去恢復麼？我們不免要奇怪那維持會維持的究竟是誰呢？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這回又是魯迅來給他答覆。他在『這回是多數的把戲』裏，給了他一個無情的駁斥。一句話，就是聶人君子敗退，他也決不因此即以爲勝利了，他知道這是暫時的勝利，舊社會沒有根本推翻，寄生這些惡勢力底牙床還肥沃得很，他們縱然暫時躲到黑暗裏去，其實還是要出來的，而且再出來時比以前還要厲害也說不定。所以魯迅以爲要打擊他們就要追跡窮殺，決不因爲一時的勝利而大意。這種打落水狗的思想，這時在魯迅胸中漸漸成熟，我們毋須得任何解釋，就知道是勢所必然的了。經林語堂在語絲五十七期上一講起費厄瀆賴（Fair Play），於是魯迅底這種思想便具體地在紙上寫了出來。這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事，其時恰巧是『一九二五年的年底。這篇文章，名字叫作『費厄瀆賴應該緩行』。在寫這篇文章之先，他還寫了『聰明人和傻子』，是一篇富有才氣的美麗的諷刺詩，用短短的一篇對話，把中國人底奴才根性和紳士的偽善描寫得淋漓盡致。此外他還寫了『臆』，又低訴了他底哀涼。『出了象牙之塔』是他這一年有空暇時陸續讀出，陸續發表的，也在這一年底讓他譯完了。

「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篇文章揭出來的魯迅底人格簡直像火一樣炙手可熱。這篇文章令人百讀不厭，表現魯迅是一個激頭潑尾的惡勢力底敵人，是一個不妥協的戰鬥者。他嫉惡如仇，因此他才是真正的愛善若渴的。

爲什麼要打落水狗呢？他底理由實在令人痛心。現在抄一部分在下面：

「現在的官僚和紳士或洋紳士，只要不合己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共產；民國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說康黨，後是說革黨，甚至手到官裏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染紅頂子」之意。可是革命終于起來了，一羣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惶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革命黨也一派新氣，——紳士們先前所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得可以；說是「咸與維新」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祇憑牠們爬上來罷。於是他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着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沈入黑暗裏，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麼多。這就因爲先烈的好心，對於鬼域的慈悲，使他們繁殖起來，而此後的明白青年，爲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的氣力和生命。」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後暫時稱爲「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來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於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志：王金發。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爲她報仇。然而終于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爲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却被袁世凱的走狗鎗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這些思想，以前在魯迅底作品裏也多少有得透露過，不過沒有這麼具體罷了。這裏還有更其重要的魯迅底思想值得指明的；就是他底奴隸思想在這篇文章裏又擴有了另一個側面，尖銳而明

確地展開了。他確認了道德的二重性，雖然沒有說出這道德二層性的社會根源，然而他却大膽地說主與奴，男與女，都有不同的道德。如學者們所說的那種普遍妥當的公理，在魯迅底眼裏，已經是不存在的了。在這裏，他以奴隸思想底立場，又進一步捉住了思想的黨派性。他說：

「仁人們或者要問：那麼，我們竟不要『費厄潑賴』麼？我可以立刻回答：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這就是『請君入彀』法。雖然仁人們未必肯用，但我們還可以言之成理。士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不能適用麼？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却對他『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喫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並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牠也『費厄』了，然後再與牠講『費厄』不遲。

「這似乎很有主張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為倘不如此，中國將不能有較好的路。中國現在有許多二重道德，主與奴，男與女，都有不圓的道德，還沒有劃一。要是對『落水狗』和『落水人』，獨獨一視同仁，實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紳士們之所謂自由平等並非不好，在中國却微嫌太早一樣。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費厄潑賴』精神，我們至少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後。但現在自然也非絕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說：要看清對手。而且還要有等差，即『費厄』必視對手之如何而施，無論其怎樣落水，爲人也則幫之，爲狗也則不幫之，攘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

「滿心『婆理』而滿口『公理』的紳士們的名言暫且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現在的中國，也還不能救助好人，甚至於反而保護壞人。因為當壞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時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決不聽從，叫喊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時，好人或稍稍蹶起，則壞人本該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論者又『勿報復』呀，『仁恕』呀，『勿

以惡抗惡」呀……的大嚷起來。這一次却發生實效，並非空嘆了；好人正以為然，而壞人於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後，無非以為佔了便宜，何嘗改悔；並且因為是早已贊就三窟，又善于鑽謀的，所以不多時，也就依然聲勢赫奕，作惡又如先前一樣。這時候，公理論者自然又要大叫，但這回他却不聽你了。

從這裏看得出來，魯迅是反對「費厄攬賴」的。林語堂後年所提倡的幽默，其實也就是這種「費厄攬賴」精神。魯迅在這時候早就認為在陳國來談還不是時候了，後年的魯迅之所以反對林語堂的幽默，早在這時候就已經給我們說明了。他說：

「——『費厄攬賴』尤其有流弊，甚至守可以變我弱點，反給惡勢力佔便宜。例如劉百昭殿曳女師大學生，現代評論上連屁也不放，一到女師大恢復，陳西滢鼓動女大學生佔據校舍時，却道『要是他們不肯走便怎樣呢？你們總不好意思用強力和她們的東西搬走了吧？』殿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劉百昭的先例的，何以這一面獨獨『不好意思？』這就因為給他嗅到了女師大這一面有些『費厄』氣味之故。但鑑『費厄』却又變成弱點，遂而給人利用了來替章士釵的『遺澤』保鏢。」

章士釵底遺澤是什麼？是正人君子們底行徑。正人君子們和章士釵又是什麼呢？我想讀者一定可以無師自通。正是當時的『落水狗』。因此，魯迅在寫這篇文章時，又帶便打他們一棍。

寫了這篇文章的第三夜，是一九二五年的最後一夜了。魯迅收集了他這三年的雜感，成爲一個集子，寫了題記就是『華蓋集』。我們以前說過的魯迅和反動復古派的正人君子們交綏的雜感，大部分收藏在這個集子裏。我相信，參照我敘述至此的中國那時的歷史，尤其是魯迅與黑鬍鬚爭的歷史，去讀這本『華蓋集』，一定可以覺得有生趣得多了。

不過我們還要說明，『華蓋集』是魯迅底一本空前的雜感集。收在這集子裏的雜感，比起他

以前收在「熱風」裏的短評與收在「野草」裏的散文詩，都完全是不同的另一種短文。這短文，我以為是魯迅爲了發揮他底戰鬥的內容而創造的作爲詩人的魯迅底詩，在魯迅以後的寫作生活中，一直被使用着，被當作一種最有效的尖利的匕首來和舊社會戰鬥，並且在中國文學史上，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至今仍然被許多文學青年所使用着，學習着，熱愛着。因此，我想趁魯迅收集這第一本雜感集的機會來指明在魯迅底雜感中具有決定作用的幾個主要的因素，對讀者決不是毫無益處約。

從形式上來說，魯迅底雜感底特點，已經有很多人說過了。比方說，理論的形象化，語彙的豐富和運用的適當，造句的靈活，修辭的特別，或者是歷史材料的靈活運用，再或者是一切旁人認爲嚴重的事，如錢，如官，雖是屬於他自己的，他都抱滿不在乎的態度，諸如此類。我相信都不是根本底特點，別的人或者可以說出另外的「一大堆來，我想用不着我在這裏化許多篇幅。我試着想找出魯迅底雜感如上諸特點底決定的因素。這件事情，也許有待於後來的人們繼續努力。我所能指出的有三點：第一是魯迅底意識，第二點是魯迅底思想方法，第三是魯迅底抒情。比方說，魯迅雜感語彙的豐富和運用的適當，造句的靈活修辭的特別，或者歷史材料的靈活運用等，都根原於他底學識豐富；理論的形象化等，根因於他底思想方法；一切旁人認爲嚴重的事，他能抱滿不在乎的態度等，就再以說與他底情緒有關。不過事實上這三個因素也並不是分開來各不相顧的，毋庸說，他們相互綜合，錯綜地決定了魯迅底雜感文底諸特點。比方理論的形象化，與思想方法固來有關係，但是與學識，感情也有關係的；語彙的豐富和運用的適當等，與學識固來有關係，與思想方法及感情亦有關係；其他亦然。總之魯迅底雜感文之一切特性，依我看，都和這三個因素密切相關。魯迅底所有雜感文，我可以說沒有不受這三個因素支配的。而且大抵都同時受這三個因素支配，只有極少數的短文，比較的抒情成分不太露骨。這就是說，魯迅底雜感文，魯

底雜感文之所以能够壓倒一切，如反對他底人們所說的，直說直有理，橫說橫有理，而一般庸俗的市儈或學者便說是因爲他底辯才或者文筆好。這不過是表明他們對魯迅毫無理解；張着一雙驚奇的眼睛，不過是把魯迅當作一個出色的文人墨客，並不能看出魯迅和律師事務所裏的那些雄辯家有什麼不同罷了。這就教那些仇恨魯迅的人們，能够不費思索地冠魯迅以紹興師爺的惡諷。可是我們却看得很清楚，魯迅之所以能够寫出壓倒一切的雄辯的雜感文，爲了說明的便利起見，我們可以分開來說：「一、因爲一切僞善與欺騙的遮眼法瞞不了他。我們爲了省得抄寫，就回頭去看我們剛才摘錄過的『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裏，從『滿心婆理而滿口公理』到『但這回他却不聽你了』一段文字吧。這一段文字教我想起最近的一些國際事變。當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訂結時，許多紳士們也曾濫用過和平等字眼來說蘇聯放棄和平政策了，甚至於說蘇芬戰爭是蘇聯侵略芬蘭，許多中了形式邏輯之毒的人，他們似乎忘記了英法和德國所爭執的也不過是殖民地，而把英法對德的形式看成是一成不變的保障和平的形式了，所以一旦英法對德的力量一解體，便認爲是和平解了體；他們把形式上的強國打小國都叫作侵略，而把英法美意諸帝國主義企圖藉芬蘭以進攻蘇聯的事實的本質置之不顧。這是形式邏輯的國際的典型，然而這等法術既欺騙不了擁有辯證的思想方法的蘇聯人民與各國進步的民衆，也不能欺騙十數年，甚至二十幾年以前的魯迅。魯迅對任何美名，比方『仁恕呀』，『勿報復呀』等，能從它底含義的相對性上來抓住其內在的真正的利害關係，他能從人和人的利害關係中來剷除事物的外表而洞察其本質。因此，他對任何一個問題，都是把它放在互相關聯的許多關係，特別是人和人的社會關係的錯綜中來理解的；而且他從來沒有把問題扯離過發展狀態去思索。所以他決不爲問題而想問題，他所思索的東西，從來沒有一次離開過和問題相關聯的諸多方面，從來沒有從它來脈去路中割離出來過。這就是我們開始分析他底思想的時候就早經指明了的一貫存在於他底精神中的所謂現實主義的精神，這種精

神，經過連張起伏的曲折發展，漸漸的成熟，並且完美起來，當他底奴隸意識發展成爲一種思想端倪的時候，就變爲脫離詩的這種觀念主義精神的，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要鄭重補充出來。當魯迅底奴隸思想一有了端倪，我們就再也無法挽回，就是用一系列的平射砲也阻止不住魯迅底思想到達於成熟的辯證法了。這種辯證法思想之帶上醒目的黨派性質，已在「費厄廉頑應該緩行」中大露頭角，不過還不是醒目的。只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二、魯迅之所以能够寫出顛倒一切雜辯的雜感文，還由於他學問的淵博，因此他不但能操縱他底筆桿，指揮自如，而且他有足夠的材料來供給他底思想方法驅使，無論是過去的，現在的，社會的，自然界的，外國的，中國的。他懂得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微妙關係，他有豐富的人生經驗，他諳熟中國歷史上的事故；有一個外國作家，他底名字我記不得了，也許是史沫得萊吧，或者是羅果夫，他說他非常驚異於魯迅家裏有那麼多的各國的藏書，並且他隨便抽出那本來，和魯迅談起，魯迅都會通讀過的。有許多外國的書，魯迅有好幾國的版本，差不多是經過詳細研究了的。魯迅收藏各種外國的名畫集，他對於中國和世界各國的藝術方面的知識，差不多沒有人可以和他匹比。所以，他底雜感文差不多是無所不包的。他一生的雜感文所接觸的方面多極了，然而，愈是平常人以爲棘手問題，愈顯出了他底學識能够應付裕餘。首先，當時的君主太子們就在這一點上吃了魯迅的苦，他們無論弄什麼花樣，引用什麼典故，或者推出什麼大人物來，他都是熟透了的，他們考不倒他，所以也就駭不倒他。比方五五君子利用叔本華底「婦人論」以攻擊女師大學生，魯迅就在「碎話」裏照樣用叔本華底「讀書和書籍」來攻打他們，諸如此類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至於他用淵博的國學知識來攻打國學家，護衛了新聞文化的發達，這已經是衆所周知的事了。最後，三、魯迅底雜感文，我敢說，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可以算到抒情詩一類裏去。這與他底顛倒一切的雄辯力，讀者也許以爲沒有什麼關係吧？其實不然。這正是他底雄辯力的主要的因素之一，而且由於這

個因素起作用，使他底雜感文突然地變成是訴諸羣衆底公評的宣言，而和一般庸人俗子所附會的刀筆，詭辯意味的辯才劃開了一條明顯的鴻溝。這就是說，如果用魯迅寫雜感的風味來寫辯辭狀，我包你未敢無疑。因爲那些飽食終日不願用心的法官們會看不終卷，把這類辯辭狀捺掉的。然而社會的讀者羣却愛讀魯迅底雜感文，爲的是魯迅底雜感文有熱，這熱抓住了讀者，使讀者和他一道呼吸，把同情放在他一面。但這並不是說魯迅善於賣弄情感，用情感來籠絡人。假如這樣理解，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因爲世界上的是非歸根結底，誰都知道，決不是任何情感所籠絡得住的。我們要了解魯迅底情感之所以抓住讀者，幫助了他雄辯的原因，就先要了解魯迅底感情和世界上的是非有什麼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們來看一看「寫在墳後面」魯迅自己底說話吧：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爲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他未嘗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這段話是兒金正確的，他底雜感文爲了顧忌當時的環境，的確有不少含糊，轉彎抹角的地方，就是所謂「未嘗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然而除了保留這一點之外，我們曉得魯迅這一段文字是完全承認他底文字說真話的。現在，我在這裏要補充一句，就是他不但說真話，而且說真的感情。一句話，他存的是坦白無私，問心無愧的態度與心靈。他有的是真摯的人格，他沒有虛偽。他身上的每一個血球，每一個細胞都是「真」。因此，他底感情本身也就是真理。他只要信筆直書，發抒胸臆，也就是說出「真理」，他一生所以能在任何歷史條件下都站在最可能的接近真理的距離點，就因爲他有這種真摯的人格，與坦白無私，問心無愧的心靈，而同時，最可能的接近真理的那距離點，更使他這種心靈愈益清醒。將一切虛偽，武斷，陰謀，詭計，都在魯迅底真話與真摯照耀之下，顯出本來面目了。所以

魯迅要反駁他底敵人，一點也用不着焦思苦慮去找求理由，他只要以他坦白的心懷寫出他對他敵人的一點感觸，也就是一個反駁了；他底雜感文之所以常常夾雜許多曲曲折折的情節，打着大圈子，不惜自畫招供，然後才又回到原點的，其理在此。有人說他底這種筆法是剗筍式，其實這只是單從論駁的觀點出發的看法，如果着眼於魯迅底雜感文底抒情的因素，那麼我們可以說，魯迅底全人格，甚至於他底自畫招供也對他敵人是一個反駁。他底轉彎抹角的敘述，如其說是窮追理由，毋甯說是暢抒胸臆。就以這坦白無私的胸臆，他吐瀉出來壓倒了他底敵人。加以他底思想方法能分析得出他敵入底真正的企圖，他底學識能使他底思想舒展裕餘，能使他底情懷自由抒發，這樣，就成了一把銳利的匕首，制了他敵入底死命。

那麼讀者也許要問，假如他底敵人沒有虛偽，也是坦白無私的呢？我底回答是魯迅從來不會有過這種敵人。如果魯迅對這種人起了一時的誤會，到末了他會毫不躊躇的和他言歸於好。比方楊樹達襲來事件的辯證，就是一個例子。而且縱然是誤會，對魯迅在主觀上坦白無私仍然不會有傷害的。

綜合上述決定魯迅雜感文的三點因素，魯迅底雜感文成了一面照妖鏡，我們就知道，這鏡所要照的當然是假作人形的妖了。也只有偽裝的妖才被照。

魯迅對於正人君子的追擊及其最近有作上的類型

話要說回去。過了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初正人君子們雖然照舊受輿論壓迫，不得不繼續躲在黑暗中，然而事實上，說他們是「落水狗」，還未免形容過度。因為他們實在算不得落水，只要看他們在「一九二六年初跟魯迅繼續招架的形勢並不見銳減，就可以知道了。他們和魯迅的戰鬥其實照舊在繼續進行，未嘗中斷。如其說他們有了退勢，倒毋甯說他們在輿論約束之下，比較的不敢放肆妄為，不敢隨便

濫用政治權力，採用卑劣橫暴的手段，而却想裝腔作勢，來奪取魯迅所應以為己的筆業底同情心罷了。而且正人君子們底這種收斂凶牙，爪的時期，為時也非常短暫，這就是我們以前說過的「舊社會沒有根本推翻，寄生這些惡勢力的牙床邊肥沃得很，他們縱然暫時躲到黑暗裏去，其實還是要出來的。果然，一等對國民軍完全敗退，惡勢便立刻張牙舞爪起來了，而段祺瑞執政政府總其大成，集中了這些惡勢力，在三月十八日暴露了它最猙獰的面目。

在三一八以前，這些正人君子怎樣裝腔作勢呢？首先是陳西滢宣佈從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起，不再管閒事了。第二是陳西滢宣傳要做學問，說就是一個小小的題目也得參考百十種書，「短短的一部四書，五經果細細的研究起來，就得用幾百幾千種參考書。」說要領會四書的真正意義，不得不研究宋，明，清，甚至於漢人的四書註疏或理論。第三是我們前面說過的，陳西滢宣傳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其藏書還不及他們私人的多。而他們裏面，博義先生底教師莊士敦先生要數第一，第二就是章士釗先生，而章士釗先生底藏書，可惜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當章士釗底寒家被民衆搗毀時，說是都散失掉了，因此私人只有莊士敦，而公却又要輪到南池子的政治學會圖書館了。據說該館因為時局關係，去年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這照正人君子底邏輯，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是中國學術界「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脚。」第四是劉百昭司長要做駢文，似乎也要僱武修文了。第五是晨報副刊上說：那位「閒話先生正在從容的從事他那完工的佛拭（The finishing touch）」，一待到這班出鋒頭的人們脫盡了銳氣，那時他就「笑吟吟的擎着他那支從鐵質磨成的鏘針，諷刺我們情急是多麼不經濟的一個態度，反面說只有無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憑證」（晨報副刊「四二三」）。第六是風傳陶孟和教授要寫一部書，在「現代評論」上先發表幾節，全部完工發表，都要等到二〇二五年，以至於我們現在和十數年後的人都不要夢想看到，其偉大與可怕，由此可見。第七是自從章士釗先生下台之後，甲寅週刊也繼

着漸漸有生氣了，不讀古書，由諺仍是做不時的弄四以煮的濫調，二道運是被繼續着。綜觀馮驩裝貌作樣的姿態，表面上似乎表現了一個失敗者悲哀嗚，或者以精神的曠野，以從容的應付。百年後的大著作來吓唬「這班出鋒頭的人」，表示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他們的。而其實，這只是外表，內骨子裏却還是居心相當險惡的，這就是誘騙青年去使聽讀書，鑽進研究室，成爲調弄，任軍閥宰割，等到他們想要走出研究室，却早已兩腿衰弱疲倦，不能僱用，或者已經老死當了。

魯迅一貫他打巴兒狗的精神，自然不會放鬆正人君子這些獵腔作勢的標靶，所隱藏着的毒計。一九二六年初的頭一個月，可以說是魯迅對正人君子追擊的姿態呈現得最明顯的一個時期。陳西滢宣佈從一九二六年起要不管閒事，用「力壓權權」了，魯迅却還是要來嚇與他，二月三日就寫了「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一月十四日，他又寫了「有趣的消息」，把對百師司長的假麻文頓，陶孟和教授要在二〇二五年發表的大著作，以及陳西滢要把錢櫃櫃成針的天才的憑證嘲笑了。一月二十四日，他寫了「學界的三魂」，又把章士鈞罵了一陣，然後，他松松地寫了「古書與白話」，就一下子把正君子們裝腔作勢的姿態下所隱藏的毒計暴露出來了。他同日又寫了「一騎比喻」，更刻骨的把正人君子們虛作用描寫了出來，比他們是山羊，他們之所以要管軍閥裝得溫順的像綿羊一樣，爲的是使山羊領帶着走到主子底廚房裏去，以供主子蒸燻。魯迅選擇子的一陣緊似一陣的追殺，真是太不懂得適可而止的紳士道法了，還終於敢宣佈不管閒事的陳西滢，不得不取消了謔言，再管起「閒事」來。這便出現了「西滢致志摩」的信，在信裏把魯迅大罵了一通。原來魯迅在上述幾篇文章裏太把西滢一流正人君子弄得不能忍耐了，有好幾處大大地觸痛了他們底傷疤，於是除陳西滢在給志摩的信裏一一回擊之外，「北大教授兼京師圖書館館長月蘊五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先生也來大鑿其明，否認有這麼多月薪，說是只有二百五十元，另外二百五十元捐給「圖書館買各種書籍」了。一月三十日的晨報副刊，當時有人稱爲「攻庸專號」，差不

多可以說是紳士們又一次大排陣勢。于是大戰又開始了。魯迅底「不是信」，就是一篇應戰的文章。紳士們大大的攻打了魯迅一番之後，過不了二三日，便就趕快在晨報附刊上宣佈道：「帶住」，聲明以後不再登載對人攻擊的文字了，這就是紳士底本色，頂好別人讓他們罵了便完事，他們便可以趕快恢復紳士的尊嚴的假面具了。但是魯迅並不讓他們帶住，在「我還不能帶住」裏，魯迅把他們底紳士面目加以嘲弄之後，告訴他們說：「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要他們不要擺臭架子，敢拿出真面目來，他就可以帶住。但紳士們倒底不敢拿真面目，所以他就決不放鬆他們。「我還不能帶住」是二月三日寫的，此後他又寫了三篇雜感，一篇「華蓋集」裏「校訖後記」，可以說，只有「談皇帝」一篇雜感是諷嘲一般儒家的，其他的文章，儘都有西先生所說的或者「冷箭」，或者明箭，向正人君子們放射過去。甚至魯迅在二月廿一日所寫的一篇懷舊的散文裏也暗示到了正人君子。

在三一八以前，魯迅寫了兩篇懷舊的散文，這就是收在「朝華夕拾」裏的「狗，貓，鼠」和「阿長的山海經」。關於這些文章，我們在第一章裏曾經盡量引用過了，現在教我們記起了我們以前所說過魯迅創作構成上的四種類型：第一是根據過去的生活經驗，嚴格地加以再組織的類型，第二是過去未久的身邊材料，較為直接地加以反映的類型，第三是回憶童年生活，直接加以記錄的類型，第四是運用歷史材料來寫作品的類型。這四種類型的創作構成，在魯迅底創作發展中如何交互錯綜，此起彼落，我們在論吶喊的時候，比較的說得相當詳細，現在我們即須補加說明，在寫「徬徨」的時期裏，雖是魯迅底深切的悲憤在他底創作中表現成爲感傷的諷嘲低訴，希望裏是帶有戰鬥的孤傲之感的，他在精神上的振奮正不減於爲「吶喊」的當年，「徬徨」可以說是「二」兩種類型交互着發展的時期，而在「吶喊」裏一時出現過的「三」，「四」兩種類型，在「徬徨」

的時期，也僅第三個類型以「風箏」與「好的故事」與第四個類型以未曾實現的唐明皇歷史長篇小說輕輕閃了一閃。然而這也就是說，這第三四個類型，雖然一直來都還是只在魯迅底創作構成中佔了不重要的地位，却是一脈相傳，未嘗中斷過的，現在，這第三種類型要抬頭了，就是我們上述的兩篇懷舊的散文。自然，我們是把魯迅底這些散文，也歸入魯迅底創作一類去的。但這並不是說，這第三個類型的抬頭，是表示魯迅底創作熱情已經衰退，相反的，魯迅這時也正在戰鬥中，熱情實在也正旺，不過，一篇創作的產生，並不是單憑熱情的，材料也是一個主要的條件。正因為他需要創作，而在材料上說，他到這裏，確是遇到困難時期了，所以他才只得從童年生活中去發掘，去傾瀉他底創作熱情。

三一八之後的 恐怖的北京

接着三一八就來了。

以上是魯迅在三一八以前的生活。可是三一八將魯迅戰勝了敵人的暫時成功打得粉碎，從此又把他推入悲憤交集的風波更多的生活中去。

但我們在說到三一八之前，還得要補充，當魯迅寫着上述的一些文章追擊正人君子，並且寫起了懷舊的散文時，正在混戰着的當時的奉、國、直各軍的戰局到底如何推移，以至應響到北京的政治環境呢？因為，說到北京的政治環境，無論從段政府的穩固或動搖，以至應響到正人君子底處境，因而應響到魯迅這點說，無論從北京的民衆，尤其是進步學生底革命情緒的漲退，以至應到魯迅底情緒這點上說，都和魯迅有分割不開的關係。

我們一定還記得，段祺瑞底政府是站在奉、直、國、三派實力的均勢之上的一個接近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政府。這傀儡政府演的是翻憲，選舉國民代表會議等的傀儡戲，而在這傀儡戲的掩護下，使它壓迫青年，壓迫民衆的帝國主義及奉系軍閥的幫凶工作。它如何幫凶法，我

們已經藉着魯迅對章士釗一流正人君子的戰鬥，說得很多了。現在，我們再來說它演傀儡戲的一面。我們以前說到段祺瑞底國憲起草委員會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舉行過開會式，選舉了林長民爲委員長。可是這位委員長自己也沒有把段祺瑞底鬼把戲放在眼裏，他並沒有在北京研究憲法，當郭松齡倒戈的時候，他却在郭松齡軍幕裏，其時正是十二月裏，北京却在鬧着通過憲法案了。段祺瑞知道，他自己是日本帝國主義底老代理人，而在京畿則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新代理人奉系軍閥保護他，可是當他把憲法案案通過的時候，奉系軍閥正爲郭松齡所敗，而國民黨也在北京和李景林爭奪起直隸省來了；段政府知道單是憲法案保不住他底寶座，有斷危急，便轉而向國民黨討好。幸而那時國民黨軍還顧不到這些，國民黨底領袖馮玉祥並不表示反對段氏，這叫段祺瑞樂得不可開交，便立刻要想裝進步模樣來迎合民衆，尤其是當時的國民黨了。於是決定加設責任內閣，想拉攏于佑任、易培基、馬君武等國民黨人入閣，以許世英作內閣總理，這才真是像陳西滢所說的臨時抱佛腳，後代人看了他面色如此變得快，不知是爲他害羞也還是佩服他精神之偉大？國民黨人當然不受愚弄，許世英亦不敢就任內閣總理，後來是由賈德耀以陸軍總長代任了內閣總理，幸而國民黨軍底勝利只是曇花一現，直系軍閥已經由英、日二帝國主義之撮合，和奉系聯合進攻國民黨了，郭松齡一敗，國民黨底大勢便眼看去了，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馮玉祥辭職出國，五日張作霖電覆吳佩孚表示諒解，於是奉、直二系合攻國民黨的形勢便正式結成了。可憐段執政真是收之東隅，失之桑隅，他還才向國民黨寬弄風情，瞬息間，天下又變成奉，直軍底了。迫得他不得不又忙着去勾結老主顧奉系軍閥。被羣衆所迫，只得下台去使「甲寅」有了生氣的章士釗，大約也是此時又上台做了臨時執政府祕書長的。奉軍打敗郭松齡進駐灤州時，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聯軍也在日本帝國主義幫助之下向直隸進攻。當時國民黨軍在天津以南奮力把直魯聯軍打敗，於是日帝國主義又像對付郭松齡一樣，親自出馬來對付國民黨了，三月十二日，日艦二艘駛入

大活口，用砲來轟擊國民軍以助直，魯聯軍作戰。國民軍也不客氣，向日本軍艦還擊。日本帝國主義用武力壓迫中國革命勢力尙嫌不夠的時候，還有外交力量可以使用。爲的是國民軍還擊他們，他們在三月十三日向中國提出抗議了。帝國主義總是一鑊的，十六日，英、美、日、德、意、荷、比、西八國公使又聯合向我國提出嚴重通牒，中國人民如果沒有死盡，對這樣的侮辱還能忍耐麼？他們一用軍閥來蹂躪中國，二用武力直接撲滅反軍閥的郭松齡，三用武力直接砲擊國民軍，國民軍只不過還擊一下，他們便做出這樣的凶勢樣子來，實在說，北京的民衆已經早就忍無可忍，怒不可遏了。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數千人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提出抗議。會後舉行遊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段祺瑞，驅逐八國公使等口號。隊伍行至國務院時，段祺瑞便命衛隊開槍，射擊羣衆，當場死二十六人，重傷二百餘人，在醫院因傷致命的二十餘人。其時李守常也在示威羣衆裏面，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什麼人，答道是「做生意的」。兵道：「那麼，到這裏來幹什麼？滾你的罷！」把他一推，算是逃了性命。（見「南腔北調集」：「守常全集題記」）

三一八慘案，分明是政府佈成的羅網。次日，通緝了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同時，傳說執政府還要另再通緝五十餘人，沒有發表。執政府底這種暴行，在魯迅底心裏真叫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叫魯迅憤怒極了。傳說執政府打算另再通緝的五十餘人中，魯迅顯然也是其中之一，照執政府如今所暴露了的凶暴的本相及魯迅和執政府之間所積的仇恨而說，用暴力來對付魯迅，在執政府的秘書長章士釗底腦子裏，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三一八不但叫魯迅怒不可遏，而且也叫魯迅底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他不能不提心吊膽，必要時避居別處，隨時防備外來的暴力。然而魯迅並不怕，却反而更猛烈的攻擊起執政府來。這可以歸納成爲一種現象，就是他底生活達到了空前緊張的地步。就在八一三這天，他在「無花的蔷薇之二」裏，仍然諷嘲陳西

機和章士釗，攻擊英國紳士與基督教徒。他把這一天稱作「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對臨時執政府毫不留情的抗辯道：「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陰狠的行爲，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姑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青年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他詛咒這些虐殺青年的劊子手將來一定也要得到滅亡的結果，他們底子孫要操最下賤的生涯。他預言這是一筆血債，是一件事情的開頭，而不是一件事的結束，將來是也要用血來償還的。

這裏看出了魯迅不屈不撓的真正的戰鬥精神。即使血的恐怖，也不能迫他畏縮，在他底字典裏似乎找不到妥協這類的字眼似的。可是幫助段執政的正人君子一流的論客們怎麼說法呢？他們公然評論三一八事件說是學生被人利用，不應該自蹈死地。魯迅在三月二十五日，便又寫了「死地」來駁斥這些公論，沈痛地勸學生以後可不要請願，輕易地把性命犧牲了，因為中國有的是主持這類公論的國民，決不會有什麼好處的。他憤然到了極點的警告屠殺者說，死的恐怖阻止不了先仆後繼的改革者，未經死之恐怖的後繼者，是不會受死之恐怖所懾的。次日，他又在「可慘與可笑」裏，帶嘲弄的口氣，指出了章士釗和段祺瑞陰謀中的一個卑鄙的副作用，那便是徐謙等五人的通緝，同時還是趕走了徐謙等五人所佔的優美差缺。魯迅報告道：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就是李煜瀛，中俄大學校長，就是徐謙，北京大學教授就是李大釗，北京大學

教務長是顧兆熊，女師大校長是易培基，其中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的委員，一共可以空出九個好差缺來。沒有比這樣的攻擊再無情的了。關於執政府底通緝名單怎樣和奪取差缺，佔個別機關等有關係，我希望讀者去看『而已集』的附錄，名叫『大衍發微』，這是魯迅研究三月二十六日京報上所發表的執政府擬將通緝的五十人名單所窺見的幾點秘密，頗饒興趣。這文章，現在人突然看起來已經不太能了然了，但明白了我們上述的情形，就不難籍以洞察段祺瑞與正人君子一流復古派底肺腑。雖然這通緝名單並未實行，却到底仍不失為段執政與章士釗一流國粹家底鏡子，可以照出他們底真面目來。

二十五日女師大爲三一八被慘殺的學生劉和珍、楊德羣開追悼會時，魯迅也到場了，他在四月一日寫的『紀念劉和珍君』，簡直悲痛欲絕。據魯迅底記載，這位劉和珍也是去年爲楊蔭榆開除的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之一，起初魯迅是不認識的，後來有人指給他看，他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接起來。在宗帽胡同賃屋授課時，劉和珍才去聽他底講義，始終微笑着，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遷回舊日地址，在宗帽胡同授課的教員以爲責任已盡，準備引退時，她慮及母校的前途，曾至黯然淚下。三一八那天，子彈從她背部射入，斜穿心肺，可是沒有即死，『同去的張靜淑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羣又想去扶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傷右而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這是三一八屠殺時的一點凶殘的寫照，但是只要這一點寫照，也够叫我們後人見了怒髮衝冠。魯迅這篇『紀念劉和珍君』的沈痛，實不禁令我們想起他後日所寫的『爲了忘却的紀念。』隨後他便在『空談』裏再三叮囑地勸告青年不要赤膊上陣，不要浪費生命，應該懂得以儘可能少的犧牲，去換取較大的代價。我們應該加深注意，三一八所給與魯迅底悲哀，和以前各種事故所給與魯迅底悲哀都不同，其不同之點，就是悲痛激烈，而希望亦最大。就如在『無花的蔷薇之二』裏，他所斷言的

血債要用血還，決不是單純的憤激之辭，而是預見歷史後果的咒語。這一種希望極殿的悲痛，在紀念劉和 兩文章裏也是很明白的，他說他去年以來，目睹了中國女子辦事的幹練堅決，百折百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爲之感嘆，這回又看見女子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而不恤的事實，證明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滅亡。這就可以窺見三一八的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他說『苟活而在淡紅的血色，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在『空談』裏，他勸人不再赤膊上陣之後，也說道『爲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勳，是在撕去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這也是說，三一八的犧牲，並不是毫無代價的，改革者並不因此死盡，繼續來的戰鬥者以後是還有的。四月六日，他所寫的『如此討赤』裏，雖然只是諷刺政府藉『討赤』爲名在京津間與國軍大戰，三一八殘殺青年，同時再度指明了政府通緝徐謙等，出缺了兩俄款委員會委員後，教育界爭奪這肥缺的醜態，並沒有表現什麼積極的冀望，可是在這同時，他寫起來收在『野草』裏的『淡淡的血痕中』，却仍然是斷言叛逆的猛士要站出來，使『天地在猛士的眼中於是變色的。而『一覺』則描寫了他在萬分悲痛中，結果還是想起了青年底靈魂，寄沈痛於後代，開手編校那歷來積壓在他那裏青年作者底文稿了，他似乎如實的親見了青年跳躍着的心靈一般。在這時的魯迅這些痛苦中的熱望，以上面我們所說的看來，很明白的簡直不是五四運動當時的魯迅底熱望所可比擬了。在五四運動當時，魯迅奉 將令作戰，大家都好像很有希望，而他不過是不願意給別人以失望，也在臉上裝點些笑容罷了。他那時作戰的勇猛，如其說出于他自己底自信，毋甯說是分担了他自認爲應有的責任。而現在，他經過了多年的孤軍獨戰，而仍然從種種悲哀，失望與痛苦中看見將來，這將來是比他越看越清楚，所以就越來越結實了，這一點，只要我們把他底奴隸思想露出端倪的過程，他戰鬥的漸漸帶上醒目的黨派背景，他底雜感文的思想方法等置於觀念中，我們就不

難明白。更何況那時革命勢力的澎湃已經愈益明顯，五卅慘案之後，反帝怒潮普遍全國，而廣東的國民政府整理內部工作，如逐陳炯光，消滅劉、楊，平定商團事變，統一財政等也卓著成效，基礎日漸穩固，只要時機一到，革命即可爆發，這類前景，那時的魯迅想來也不難敏感到。而且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想得到，國民黨在北京的祕密活動，三一八前後，一定到了高潮的地步，魯迅一定直接，然而大部分是間接地和國民黨人過從甚密，在進歩力量底強烈應響之下。不幸的是北方的國民軍在帝國主義直接幫助奉系的壓迫之下被迫退走。當時帝國主義和軍閥一鼻孔出氣，說國民軍赤化，他們是算討赤，甚且幾次用飛機來轟炸國民軍尚未退出的北京。而軍閥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即復古守舊派也異口同聲誣陷三一八意在援助外交的游行民衆，青年學生，一切進歩分子爲受人利用，其意即謂他們受俄國利用，受盧布收買，雖然還是一套老把戲，而大規模的屠殺也就是藉口於這些理由的。四月，國民軍正式敗退了，但國民軍尚未退出北京，段氏意欲勾結奉系以自存的陰謀，就爲國民軍所覺察了。因此，四月九日，鹿鍾麟包圍了執政府，駭得段氏只得躲到東交民巷去。十五日，國民軍無力支持，只得全部向西北退却，扼守南口，於是段祺瑞便又出洞來了。他還捨不得那把執政的椅子，趕於四月十九日派人去迎接張學良，不料張學良鄙視他向國民軍失過身，曾欲拉國民黨人組閣，不够貞操，算不得一心一意的奴才妾婦，竟拒不理他。我們給段祺瑞想，真是够羞辱的了，如果他真是半老徐娘，我們是不難想像到他底鼻子哭得如何紅化了。然而薄命女，從前花轎拾進，現在也只得挾着包袱往後門走了。吳光新給她踉蹌，纏她於四月二十日通過直魯聯軍的防線，扭扭妮妮下台到天津去了，章士釗也跟着一同下台。段祺瑞雖然走掉了，但奉、直軍閥來統治北京，真叫作以暴易暴，更何況較爲接近民衆的國民軍已從北京敗退，可以說，北方的革命力量受了一個打擊，反動官僚與復古派立刻從段祺瑞腳下轉到張作霖、吳佩孚腳下去更益囂張起來了。現在北京的革命勢力已經沒有任何武力可以掩護

，他們便積極向革命進攻了起來。張作霖不但繼承了段祺瑞通緝進步份子的二貫功業，並且變本加厲，好似一切進步份子都是與國民軍有關的，同時也就是赤化分子了。這時期，北方的恐怖，也是中國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凡到北方去的青年稍一不供不對，即被格殺，而出關外的人，是不懂關外話，就決難保全性命的。北京從此成了更黑暗的恐怖世界。而革命勢力也在北京暫時消沉下去了。

可是，爲了張作霖底歷史，我要警告甘爲帝國主義走狗的一切人們，要知道張作霖代替日本帝國主義執行劍子手的任務，殺了成子成萬的同胞，雖是由骨堆積如山，成績很可觀了，然而到頭來，帝國主義要拋掉他的時候，有沒有把他賣得比一隻破草鞋更重些呢？

不幸的是，當英、日、美帝國主義撮合他們底直、奉軍閥共同把北方的革命勢力擊退的時候，南方的革命力量已站穩，奔出來要和軍閥拚個你死我活了。而擊敗國民軍，因此也就成了奉直系軍閥最後的一次幸運。

廣東國民政府在未北伐前，國民黨系軍人唐生智先在湖南取得了省長地位，他就設法籠絡着中軍閥勢力，於是葉開鑫走依吳佩孚，引起了直系軍隊入湘，這是促成廣東政府出師北伐的導火線。北伐本來是廣東國民政府底決策，而且內部整理完畢，也是本想早日實現的。湖南唐生智的事一發生，廣東國民政府便於六月六日任命蔣介石先生爲北伐總司令。蔣於七月九日就職，即日下令動員，出師北伐。其時，直、奉二軍正在合力進攻南方的國民軍。

不過廣東國民革命軍即便開始北伐，也打不到北京，況且國民革命軍剛起，才開始北伐，而奉軍實際四月就進京了。從四月北京革命力量遭受打擊，北京入於恐怖世界以來，魯迅底處境，當然也就更加危險。段祺瑞手裏就風傳的五十人的通緝名單，張作霖決不因爲是段祺瑞做的，事就取消它。而相反的，張作霖是要繼承段祺瑞底一切反動的大業，而充其是這通緝名單的張家

兵初入北京坐天下的時候，真是所謂風聲鶴唳，連普通商人等等老百姓都恐怕朝不保夕了似的，在門口掛起外國旗來，魯迅他們風傳要通緝的五十人，這時也不得不小心點防備意外。魯迅和他底朋友十餘人，便避居到法國醫院的二間堆積房，和一個木匠房等地去躲了若干日。然而他就是在這樣流離失所的亡命生活中，工作也不稍懈。他收在「朝花夕拾」裏的「二十四孝圖」，「五猖會」和「無常」就都是在流離失所中寫的。同時在這一時期，他也照舊的沒有因為流離失所放鬆了或者畏懼了他一向來搭擊着的敵人。他在這時所寫的雜感文，如「無花的薔薇之三」，「新的薔薇」，「再來一次」，「為半農題何典後作」等，沒有一篇不是攻擊照舊得勢的正人君子和暫時下台的章士釗的。因為當北京的改革者受打擊逃性命的時候，也就是北京的舊勢力得意洋洋的日子。他們嘲笑被通緝的人怕得要逃，另外改一種口氣說三一八被害的學生是受教員慫恿，用嘲弄的口氣說那些直接間接用蘇俄金錢的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自己可以換餓，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飯呵！」然而他們自己呢，却還在爲了俄款委員會委員的出缺，在爭奪着蘇俄底金錢，魯迅還他們嘲笑道：雖然這批盧布和那批盧布却不一樣，但也許還是因爲「老婆子女」之故罷。我近日發見了一件可怕的真理，就是反對白話，贊美文言的愛古家，都是些受教育非常欠缺的人物。這種人物，以現在年齡二十以外的人居多，他們因爲各自底落後環境，曾受過一度私塾的教育，啣呀呀呀過幾年，但是一知半解，把腦子倒弄鈍了，於是，或者從此就不再升過學的，或者升學而成績惡劣的，自己覺得對於各方面的知識都大不如人，僅能够寫幾句差強人意的文言信，於是便只得以國學家自居了，反對起一切進步與改革來，然而却有一種很好聽的招牌，曰尊孔，曰保存國粹。這真理，也許可以說是我最近的比較具體的發見，使我好像還是初聞此事似的詫異於魯迅一直和國學家鬥爭至今，不斷地揭露國學家對國學無知的事實之正確。即如章士釗這種身居教育要津過的有名守舊家，也還是國學的無知者。人們硬說魯迅罵章士釗，是因爲章士釗革去了

他底僉事，其實是還在「一九二三年九月，魯迅就奚落過章士釗把『二桃殺三士』錯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的醜態了，那時魯迅和章士釗還毫無睚眦之怨，只因爲他要保護文言，所以魯迅才叫他出醜的，譚麴章士釗竟敢在『甲寅』上辯起來道：這不過是小事。魯迅在五月二十四日寫的『再來一次』，就是再出章士釗底這些舊醜的。可憐這些文人學者却總是把持着教育青年的職位，自命爲青年導師，卽如那時武漢大學的教授們，可憐聚於一堂，閉了會也說不清當時的『莽原』是什麼性質的刊物，却瞎猜之爲宣傳社會主義的，這還不也是丟大學教授之大醜麼？

吳佩孚的入京 和魯迅的出京

革命的怒潮是被鎮壓着了。現在張鬍子和吳玉帥兩位偉人底兵正在合攻南口，而這兩位偉人自己也就要在北京會面了。張作霖大約先在北京等他，吳玉帥後來。這位吳玉帥到北京後，在宴會席上發表他底學說，說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爲「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卽「赤尤」，而「赤尤」卽爲「赤化之尤」的意思。（見『華蓋集』：『馬上日記』）他對於赤化的學識如此豐富，當然很能了解赤化之弊，所以難怪是要討赤了。他本、於六月二十七日入京的，但他自保定啓程後，張其鍾爲吳卜了一個卦，說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以爲然，這樣，便遲於二十八日入京。當他入京，坐着汽車威風凜凜經過北京街上的時候，魯迅正在街上買藥。原來魯迅在端午節前收到幾文稿費，買東西吃，吃得太多，不能消化，就又胃病復發了。到六月底尙未痊癒。那時大約通緝的風聲略好一點了吧，他已回到家裏，便親自去街上去買藥，正是吳玉帥入京的一天。魯迅只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

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拉車沒有了。」（『馬上日記』）魯迅才和別的老百姓一樣漸漸溜出胡同，軍警也不做聲。他時常這樣子一個人走去買藥，順路就去看朋友，或者去走走書肆。在這些日子裏，他因為身體不好，精神也不太佳，什麼事也不願做，在家裏翻翻書，晚間常在暗中默坐。然而他也未嘗自甘閒暇，仍然為語絲等刊物撰稿，他底『馬上日記』，就是為劉半農新近去主編的『世界日報』副刊寫的，『馬上日記』便是為語絲寫的，在這些文章裏，他仍然一有機會就順筆對正人君子射幾箭，決沒有干顧罷休。尤其是在『記發薪』裏，他嘲罵章立鈞，又把中國官廳的一副陰暗相襯托出來了。只是那時候一切被壓抑着，暫時沒有什麼新的事故發生，所以題目少，議論也暫時沉寂了。他那時和他底知友齊壽山約定時間，天天到中央公園去會面，一道商酌着翻譯『小約翰』，同時，他在一九二四年廢置了的『小說舊聞鈔』的積稿，據他自己說，是到了一九二六年春，『有所觸，更發舊稿，雜案頭』了。許廣平女士幫助他整理，大約在七月裏整理好了。魯迅於八月一日寫了『小說舊聞鈔序言』。那時，因為北京的環境到底不好，張作霖和吳佩孚雖然沒有立刻實行段祺瑞所擬通緝的五十人，然而革命青年與進步份子却只是悄悄的被迫害着，被謀殺着，這種危險，隨時有侵到魯迅身上的可能，因此朋友們都勸魯迅離開北京，替魯迅想法子到別處去。廈門大學打了電報來，聘魯迅做教授，魯迅就答應了。景宋在『魯迅和青年們』（見『文藝陣地』二卷一期）一文中說：『一九二六年八月，先生往廈門大學任教職。如果不是和段章之流大門，致列於幾十位被捕者之林，和另外的原因，大約未必會離開北平的。北平已幾狂了十五年了，可以靜下來研究學問，有好圖書館，這是先生時常所懷念的。政治的壓迫，個人生活的出糞，驅使着他。尤其是沒有半年可以支持的生活費，一旦遇到打擊，那是很危險的，我們約好：希望在比較清明的情境之下，分頭苦幹兩年，一方回為人，一方自己已稍可支持，不致於餓着肚皮餓鬥，減低了銳氣。』從這段記載裏，我們可以看得魯迅

在未去京之前是如何躊躇，如何被人規勸，如何仔細考慮了的。他決定了到廈門去的兩年計劃，上述景宋文中的「苦幹兩年」，大約就是指此而說的。關於這點，我們在下一節自然還要說到。只是他在出京以前，雖然思慮繁重，工作仍然未嘗中厥。他那時還在校閱着初版的「工人綏惠略夫」，想要再印。他說他當然並不希望中國也有「綏惠略夫」，然而這樣破壞一切的人，在中國却還沒有，我想他底意思是還在於促中國人反省的。魯迅於八月二十六日出京，前四日，即同月二十二日，女師大舉行毀校紀念的時候，魯迅還出席演說過，而在他出席演說的前一晚，他却正在校閱「工人綏惠略夫」，睡得很遲。他在紀念會上又痛快淋漓的嘲罵了章士釗和楊蔭榆一頓，但是他底結論却是這樣的：「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謊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屬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他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魯迅當時的心懷，如此可見。

其時奉，直二系軍閥在政治上已經另外弄了一個以杜錫珪為海軍總長兼代國務總理攝政的傀儡政府了，在軍事上已經合力將南口攻下。然而同時，廣東的國民革命運動却又叫吳佩孚焦頭爛額了。他們已經深入湘境，攻到了岳州，平江一帶。

第十節 沈默而不可得

一九二六年八月底——一九二七年初：四六歲——四七歲

廈門的烏烟瘴氣
與魯迅的奮發

我們望之而覺不安呵！

這一次和他一道南下的，不是他過去的家庭，却是和他一道抱着「分頭苦幹」精神的他未來的妻子景宋女士及其他的人。她由於北京女師大的風潮，崇拜魯迅，而終至於成爲魯迅底愛侶了。在北京時，女師大風潮發生，莽原社也就以未名社爲基礎，加入些新人，成立起來了，當景宋常出入於魯迅門下的時候，也就是莽原社的諸青年出入於魯迅門下的時候。其時莽原社中有一位魯迅新認識的朋友，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很受尼采底影響，做文章很不錯。這就是高長虹，莽原辦起的時候，他奔走最力。但他底意見未必盡與魯迅底相同。他袋裏藏有「狂飈運動」的草案，一旦自己有了力量或別有機會，是便要趁機面出的。他曾經先自印過幾期週刊，那「狂飈」運動的宣言，就會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間發表於京報副刊過。這位安那其主義者是否很傾慕景宋底才幹，我們不敢斷定，但是在「兩地書」裏有一段很有趣的插話，我想不妨抄在下面：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從韋激園的信裏才知道的。他說，由沈鐘社裏聽來，長虹的

想起他護送紹興的蒙眷坐津浦車到北京去，至今已經又是七年了。八月二十六日，他離京，再來坐津浦車南下，七年來，還是第一次。這七年來，魯迅生活的變化，如今只要再一回顧，便覺得是多麼深遠，甚至於令

拼命攻擊我是爲了一個女性，「狂魔」上有一首詩，太陽是self，我是夜，月是她。他還問我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點詳細。我還才明白長虹原來在害「單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這裏來的原因，他並不是爲「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對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敵對的態度，直待我到了說門，才從我背後罵得我一個莫明有妙。——」

因爲在這一節裏，我們免不了要在幾處地方提到「狂魔」社的長虹攻擊廈門的魯迅，並且和莽原社裏的章激園這些人鬧架的情形。我希望高長虹底狂魔運動之所以要用魯迅祭旗，主要的頂好是基因於長虹底安那其精神不能與魯迅相容，「兩地書」上的這段插話，我由衷希望真的只是「流言」。然而我抄錄了這種「流言」，因此我更希望這不過是表明我看問題，除了把較爲冠冕堂皇的因素估計進去以外，還喜歡纏來一些次要的小掌故進去，壞脾氣罷了。不僅如此，我既經肯定了長虹和魯迅破裂這一事實之後，依我所知道的範圍，「莽原」壓下了向培良底劇本不登，使「狂魔」社人和「莽原」交惡益深，而「狂魔」社人要求魯迅出來說話，魯迅又置之不理，我想，或者也該是助長兩方惡感的推動力之一。這是後話，現在，我還是從基本的理由上來說：狂魔是大革命前，浪漫主義思潮的一個支流，當以市民的浪漫主義爲內容的創造社在革命前夜漸次轉向於新的工人勞動者的時候，也僅止於蔣光慈所顯示的最明白的小私有者底工人革命觀點，而狂魔社只不過是小私有者底空想帶得更濃厚的一個集團。儘管魯迅那時的文學觀點並沒有帶上什麼標幟，然而却早已是帶有很濃厚的改造社會的實踐色彩，以觀察現實的深刻性爲創作基準的了。這態度，也就是莽原社裏的原先屬於未名社的一部分人底態度，抱有這態度的人之不能與狂魔社中人自命不凡的引頸高歌的態度相容，我想，這才是最不可免的歧異點。

魯迅坐津浦車到南京，當夜就乘京滬車到了上海。他在上海住孟淵旅館，也只停留了天把兩天，便上船到廈門去了。然而會幾何時，往日北京女師大學生用血淚爭持了近一年的校長問題，

幸而勝利了，得以國民黨的易培基爲校長，轉瞬間，易培基被通緝，如今魯迅也離京南下。當他到上海的時候，却從日報上看見了北京女師大已經改爲女子學院的師範部，教育總長任何可派魯迅爲院長，以林素園做師範部的學長了。這很有點像是黑暗與進步的撞鐵戰。此種拉鋸戰，恐怕在中國到處，甚至在每件小事上都要演的。女師大的拉鋸戰，此後當然也要墜下去。但因爲它對社會的重要性，已經比不上配合以魯迅所組織的文學上的陣勢而吸住整個舊勢力的當日，所以我們以後也不詳細去談，只簡單的報告一些女師大的消息便罷了。

九月一日夜半，旅館裏的茶房和魯迅底朋友克士送魯迅上了輪船。三日晨七時開船。在未上船前，克士和魯迅談了許多話。魯迅才知道，原來孫俊國已經把魯迅和景宋的關係宣傳出去了，還做了些演說。所以上海的有些人，見了景宋和魯迅同車到滬，便都深信伏園之說爲真了。只是魯迅在上海下船時，景宋並沒有陪送，她另自坐輪船到廣州去了。在船上，她想到魯迅一個人在船上，不知有沒有別人陪送，當心的了不得。那時國民革命軍已經逼近武漢，以至於在景宋坐的輪船上也有人起來演說北伐的必要，而且開起會來討論北伐。景宋也參加了這次的集會，把北京的黑暗情形向大家報告了一些。

景宋到廣州去是擔任女子師範底教職，兼任訓育。廖仲愷底妹子廖冰筠就是該校校長。

九月四日午後一時，魯迅到了廈門。他暫時住入客寓，打電話去通知林語堂，林語堂便來接他了。當晚，他們坐小船搬入學校，一陣風浪甚大，幸虧魯迅是自小坐船與小船慣了的，所以也不覺得什麼。魯迅進廈大的這天，也就是北京教育當局再用武力接受女師大的一天，其時距離前一年章士釗用兵拖出女師大學生的日子，恰巧一年一月有三月。魯迅在他底「記談話」附記中說：「原來剛一週年，又看見用兵了。」言下不勝感慨。後來是學生又發宣言，教員的一部分又助學生，教育當局又認助學生的教員爲赤化，爲圖自己底飯盤，真可以算得是再來一次了。但前次

有國民軍的暫時勝利助女師大學生獲得暫時的勝利，這次學生都不見得能勝利了。聽說後來是女師大的教員都換了男師大的教員。

廈門的氣候是海洋性的，但也帶點近於熱帶的味兒。白天雖暖，夜間涼涼。風是天天都有的，白天而且有時還有霧。蚊子差不多一年到頭都有，也許是因爲地近熱帶的緣故吧，各種蟲類也很多，螞蟥凶極了，有大有小，幾乎無處不至，吃的點心想教過夜就很難。廈門大學背山面海，風景絕佳。只可惜四面都是荒地，住民極少，雜市面有十里之遙，買普通用品也不方便。而且那裏的人都說廈門土話，很敬生。魯迅到校時，暫住在當作陳列室的一間大洋房的三層樓上。這樓就在海邊，魯迅收在『毒蓋集續編』裏的『廈門通訊』中說：『日夜被海風呼呼的吹着。海邊有些貝殼，檢了幾回，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四圍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舖，只有一家，賣點罐頭食品 and 糕餅，掌櫃的是一個女人，看年紀大概可以比我長一輩。』這店裏的人能說幾句普通話，然而魯迅却懂不到一半，他們稱魯迅是北人，所以賣東西是很貴的。

離魯迅底這住處不遠，有一道古城牆，據說這是鄭成功築的。除了台灣，這是中國抵抗滿人的最後一道堡壘的遺跡了。魯迅到了廈門，便念念不忘於這個遺跡，心裏感觸頗深。『然而鄭成功的城却很寂寞，』魯迅說道：『聽說城腳的沙，遠被盜運去賣給對面鼓浪嶼的誰，快要危及城基了。有一天，我清早望見許多小船，輿水很重，都張着帆駛向鼓浪嶼去，大約那便是賣沙的同胞。』

學校要在九月二十才開學。所以魯迅到校還有幾天好閒空。我相信他和景宋的感情有很大的關係，他到廈門，一心想使生活有規律，把身體弄好。到這時候，他才是真的想戒絕一些刺激品了，他連青椒也改用胡椒來代替，吃魚肝油等藥品也似乎很認真。我們在兩湖地書裏可以看得見

魯迅是經常把他健康狀態報告給景雲的。固然，魯迅曾經說過，他吃魚肝油，也爲了給他底敵人在這世界上增加一點不痛快，這話我能相信並不是一句憤激之辭，正是因爲有這種戰鬥精神，魯迅才活到現在的。但是很明顯的，魯迅底這種精神，現在是由愛情鼓勵得更其奮發了。他打算到廈門致獻兩年的工夫於學問的研究，一面可以把身體弄好點，其著作則由這大學付款出版。他預定來廈門担任的是國學院的中國文學講座，國學院的主任是他底朋友林語堂。魯迅底這些打算，也會和林語堂講過，由林語堂轉爲向學校當局接洽，學校當局是滿口答應的。他希望起馬能將他先前所集成的「漢畫僚考」及「古小說鈞沉」即出。做搜集漢畫僚的工作，我們曾經說到過，是在民國初年，他驅除寂寞時的工作（用他自己底話，是消磨生命。）成績；「古小說鈞沉」的工作，依我想，是他在北大講中國小說史時，「中國小說史略」的副產物。鄭振鐸也有這同樣的意見。這兩部書，印費浩大，又因爲是專書，看的人一定不會多，所以私人既沒有力量印，書店也不歡迎，本來由廈大來印是頂好的。可惜廈大後來沒有實行諾言。但魯迅初到廈門時，還是滿懷這種希望的，到廈門，雖然什麼都不便，校內的飯又不能吃，雖然後來大家合僱了一個廚子做飯菜，飯仍然不好，可是他底體眼情況却還是漸漸良好起來了，每餐可以吃一大碗飯。他給景雲寫信寫得很詳細，他差不多每天都在籌着景宋底來信，有時說不定一天要到他附近的廈門大學郵政代辦所去走好幾回。在他一生裏，我相信，這是他比較的與外界隔絕，而生活並不寂寞頹喪的時期。因此，他到廈門十餘日之後，便又寫好一篇回憶童年生活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了。學校請他講六小時功課，但此外却還有許多繁雜的職務，如爲學校及國學院的季刊做文，指導編輯書目，指導並審查研究員等。六點鐘功課中，兩點是小說史，兩點是專書研究，兩點是須編講義的中國文學史。後來兩點鐘專書研究無人選，便改教五點鐘功課了。魯迅對於這些繁雜的職務，起初雖然有點担心，然而對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是他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之一。他會

經理想有一個讀書的環境，頂好是能譯在搜集參考書較便的北京，來下幾年工夫寫這一本書。他以為由他來做這個工夫，對中國是有益的。但可惜他後來的生活都在迫害中，未能完成此書，對中國文學是一個損失。的講議，却還是很想認真來編的，而且還從上海買了一百元書來。可是不久，到了學校快要開學的前後，魯迅就漸漸明白廈門大學的環境對他並不適合了。校長林文慶博士是一個英國籍的中國人，開口閉口不離孔子，還做過一本講孔教的書，據說他還有一本英文的自傳，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時他正在做『人種問題』。這地方還是一個守舊的幾乎不與外面相通的孤島，除了廈大，只有一個集美中學。集美中學有師大舊生五人，他們會于魯迅到時請吃飯過，表示歡迎，是主張早已通行的白話文的，在這裏卻很孤立。而國學院裏，除了新到的兼士，孫伏園，林語堂這些人還有點新思想之外，只有一個魯迅先前往西安時所認識的教員較好，其餘仍不外乎是一些把國學當作守舊工具的人物，和要求終身聘書，要求十年二十年後由學校付給養老金終身，想在廈大養老並繁衍子孫的人物。兼士錯收了一位胡適之底信徒朱山根，這人而且又是『現代評論』，尤其是陳源底崇拜者。依魯迅說，這人無孔不入，淺薄得可以，很叫他討厭。他來就荐了三人，兼士收了，那三人之中的一人又另荐了二人，兼士又收了，結果廈大布滿了朱山根一流人底黨羽。這些人恰巧和尊孔的校長是合得來的，便和魯迅，林語堂他們底希望為起難來。魯迅尤其討厭林語堂底襄理白果，這人還兼別的事，曾在女師大當過職員，善于與風作浪，浮而不實，滿口是油滑話，而對子較小的職員，則氣餒不可當。魯迅會親聞他密語林語堂誰怎麼不好等等，因此就更看不起他了。然而這些人在廈大却日漸得志。這是叫魯迅最不痛快的。加以生活不便，而學校當局眼光非常短淺，似乎既已用重金聘了教授，就應該極力榨取，對教授的日常待遇，很是吝嗇，而且今天問履歷，明天問著作，後天問計劃，問什麼年底可有成績發表沒有等等，問得魯迅都心煩了。

開學之後不久，魯迅住的那原是作為陳列室的洋樓，現在要陳列物品了，便叫魯迅搬遷。學校對教員如何的吝嗇，我們只要看看魯迅寫給景宋的信裏關於這事的記載，便可以知道了。他說：

「我原住的房屋，要陳列物品了，我就須搬。而學校之辦法甚奇，一面催我們，却並不指出搬到那里，教員宿舍已經人滿，而附近又無客棧，真是無法可想。後來總算指給我一間了，但器具毫無，而他們要，則南果北菜，特別刁難起來，（不知何意，此人大概是有喜歡給別人吃點小苦頭的脾氣的）。要我開賬簽名具領，于是就給碰了一個釘子而又大發其怒。大發其怒之後，器具就有了，還格外添了一把躺椅，總務長親自監督搬運。因為本堂邀請我一場，我本想做點事，現在看來，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難說。所以我已決計將工作範圍縮小，希圖在短時日中，可以有點小成績，不算來騙別人的錢。」

「此校用錢並不少，也很不掙節，而有許多怪吝舉動，令人難耐。即如今天我搬房時，就有一件。房中原有兩個電燈，我當然只用一個的，而有電機匠來，必要取去其一個我搗也，止之不可。其實對於一個教員，薪水已經化了這許多了，多點一個電燈或少一個，又何必如此計較呢？」

各方面的情形，叫魯迅漸漸灰心起來。他想縮小工作範圍，辭掉指導研究生的職務。林語堂因此急得一夜的睡不着，結果他還是辭不掉。

雙十節國學院開展覽會的情形，把這學校底價值和對教員的無禮，尤其表現得明白。現在再把魯迅自己底信抄出來看：

「這裏的學校當局，雖出重資聘請教員，而未免聘教員如變把戲者，要他空拳赤手，顯出本領來。即如這回開展覽會，我就吃苦不少。當開會之前，兼士海我的簿獨拓片去陳列，我答應了

。但我只有一張小書桌和小方桌，不夠用，只得攤在地上，伏着，一一遞出。及至拿到會場去時，則除孫伏園自告奮勇，同去陳列之外，沒有第二人幫忙，尋校役也尋不到，於是只得二人陳列，高處則須桌上放一椅子，由我站上去。弄至中，途白果又硬將孫伏園叫去了，因為他是襄理（玉堂的），有叫孫伏園去之權力。兼士看不過去，便自來幫我，他已喝了一點酒，這回跳上跳下，晚上就大吐了一通」。

至于這國學展覽會是怎樣的國學展覽會呢？魯迅說：「一點泥人和一點拓片便開展覽會，你以為可笑麼？還有可笑的呢。田千頃並將他所照的照片陳列起來，幾張古壁畫的照片，還可以說是與考古相關，然而還有什麼「牡丹花」，「夜的北京」，「北京的括風」，「葦子」……。倘使我是主任，就非令撤去不可，但這裏却沒有一個人覺得可笑，可見在此也唯有田千頃們相宜。又國學院從商科借了一套歷代古錢來，我一看，大半是假的，主張不陳列，沒有通過。我說，那麼，應該寫作「古錢標本」。後來也不實行，聽說是恐怕商科生氣。後來結果如何呢？結果是看這假古錢的人們最多」。

其實是到十月裏，還有點志氣的都想走了。這地方既然小，加以落後，無知，而又由淺薄之徒任意跳樑。沈兼士堅決的要回北京去，孫伏園到廣東去了，廣東並且有電報來請魯迅，兼士，玉堂也到中山大學去。但雖然如此，魯迅因為玉堂底兄弟和太太都很爲他底生活操心，尤其玉堂想爲家鄉服務的一片熱情，學生對魯迅的好意，叫魯迅決不定馬上就走。他打算，如果沒有什麼太下不去的事，即使不能照原先兩年的計劃，也要講一年書。學生對魯迅好極了，他們只怕他住不慣，有幾個本地人，甚至於星期六不回家，預備星期日魯迅若到市上去玩，他們好同去做翻譯。還有幾個人歡迎他先開口攻擊本地社會，他們好跟着來開槍。學生差不多不久就個個都認得他了，新聞記者之類也來訪他，或希望他提倡白話文，或希望他和舊社會鬧一通。但魯迅都沒有照

他們底希望做。只有些學生想辦文藝刊物的，魯迅幫他們看看稿。在廈門，研究文藝的空氣，也因為魯迅到的緣故，有點熱鬧起來了。來聽魯迅演講的人也漸漸多了起來。他現在，似乎還是不能安靜，因為他厭惡他底環境，而青年們對他的一片真誠又使他不忍釋手，這種矛盾使他接到廣州請他去教書的電報時，覺得到校不久，不好意思開口辭職。然而他創作構成上的第三個類型，可以說，這時發展到了它底最高點。這樣幾乎與世隔絕的環境，是適合于他寫這類作品的。因為他那時不想站出來對不太熱知的社會上的事發什麼議論，而他所處的環境，却雖然小也並不簡單，使他所憎也有所愛，左右為難，而他底生命却正有着生氣，有着愛，有着革命勝利的歡喜。他需要有所抒發。他忙着學校的工作，整理『華蓋集續編』，並不能使他覺得就可以休息了，他底精神這時反而是相當飽滿的。他連續着寫了『父親的病』，『瑣記』，和『滕野先生』這些很長的回憶童年生活的作品。這就是說，他所寫的，這時雖然與當前社會稍微隔遠了點，然而他底筆並沒有停。他底精力在一個靜的環境中的奮發，正表現他生命中的新鮮氣象。而廈門大學的烏煙瘴氣，終于是關閉不住這富有生命力的心靈了。

廈大的妾婦之爭與躍躍欲動的哀愁的魯迅

魯迅新搬的住處是在圖書館的樓上。但這間的洋樓比前回的洋樓離地低一點了，他前回住的洋樓，要走七十二級扶梯方能到達平地，這間的只要走二十四級了，大約是二樓，在樓上已經望不到海面了，只能看見輪船的烟囪。這作為圖書館的洋樓上，一共住着三個人，魯迅，魯迅底隔壁住着張願教授和孫伏園，另一面是釘書作場。後來張願教授因感不便，住到他朋友那裏去，孫伏園去了廣州，便只剩魯迅一個人了。雖然白天還有館員，閱書的學生，釘書匠，但到了夜九時以後，一切星散，那所很大的洋樓裏，除魯迅以外，便另無別人。好在他是寂寞慣的，一個人反可以靜觀默想

，並未覺得什麼。房子有兩個窗，在夜的寂靜中，可以望見「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塚；一點燦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窗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裏」。——「怎麼寫」收「三閑集」——這「樓下的後面有一片花園，用有刺的鐵絲攔着」，魯迅在「兩地書」裏寫道：「我因為要看它有怎樣的攔阻力，前幾天跳了一回試試。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給了我兩個小傷，一殷上，一膝旁，可是並不深，至多不過一分。——這裏頗多小蛇，常見被打死着，頸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沒有什麼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去走，連夜間小解也不下樓去，就用磁的唾壺裝着，看夜半無人時，即從窗口潑下去。這雖然近于無賴，但學校的設備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白天，他到小解的地方去，必定經過郵政代辦處，就在那裏看看有沒有景宋寄來的信，他一天走過三四回，總要看三四回，到天一黑，他就不到小解所去了，在樓下的草地上了事。魯迅這時的孤獨生活，近似他在古槐書屋裏抄古書當年的情況。那學校裏，有的是我們上面所說過的，一些希望養老終生的妾婦們，「還有希望得愛，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員的老外國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結婚，三月復離的青年教授；有以異性爲玩意兒，每年一定和一個人往來，先引之而終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聽糖果所在，羣往吃之的無恥之徒」——（兩地書）這些人們和學校當局，對魯迅都視若鬼神而遠之，讓他一個人孤單單的在大洋樓裏，到十月末，銀士也竟然走了，剩下的便只有林語堂一家人和他還來往，而林語堂其實和他還並不是深交，林語堂底費爾潑賴的脾氣，他就是不太能合得來的。他那時之所以和活埋的古槐書屋裏的時候不同的最大處所，是在於他有精神上的伴侶。他在兩地書裏寫道：「我自從僱了一個工人之後，比較的便當得多。至於工作，其實也並不多，閒工夫儘有，但我總不做什麼事，拿本無聊的書玩的時候多，偷連編三四點鐘講義，便覺響于睡眠，不容易睡着，所以我講義也編得很慢，而且遇有來催我做文章的，大抵置之不理，做事沒有上半年那麼急進了，這似

乎是退步，但從別一面看，倒是進步也難說」。很明顯的，在我們今天的人看，是認為他進步的，從這裏看出了他和活埋在古槐書屋裏的時候不同。他現在不是爲的消磨生命而自甘寂寞，却是爲的不致於「減低銳氣」，養精蓄銳來增強他底生命，準備繼續奮鬥。這種區別不容絲毫混淆，也因爲如此，這時的寂寞，捺在他心曠上的，不是當年有意的麻醉，而却是淡淡的哀愁。他在「怎麼寫」裏寫他晚上住在圖書館樓上的情形說道：「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彷彿有無景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牠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會經想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沈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閉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二點「世界苦惱」麼？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牠，但我愈想，牠却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見，僅只我獨自倚着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然而他終究寫了。因爲這樣的淡淡的哀愁，既不可能把他埋在古紙堆裏，他就要穿過隔絕這孤島的海洋與荒地，朝當前的社會看。歷史小說是他創作構成中的第四種類型，這二類型，現在要繼承「補天」而和第三個類型平行發展。可是講到歷史小說，我們在批評「補天」的時候，曾經指明：魯迅由於他底歷史負荷，一，他對古人不及對今人來得誠心，所以二，他對歷史小說的態度還不可能嚴格的現實主義的，因此，他底歷史小說，一面比起嚴格的現實主義的積極與冷靜態度是不夠的，而另一面，比起庸俗的鋪陳典古的演義家與逃避現實的多快先生，却是戰鬥的，而從他所處的歷史時代來說，後二點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所以他的寫，所用的材料雖然都是古代的，却指明了淡淡的哀愁不可能把他埋在古紙堆裏。關於這一點，他在「故事新編」序言裏有最好的說明，他說：「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裏，對着大海，翻着古書，

四近無生人氣，心裏空空洞洞。而北京未名社，却不絕的來信，催促雜誌的文章。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於是回憶在心裏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華夕拾』，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預備成八則『故事新編』。這裏還有兩點，須先加以注明，提起讀者注意：就是，一，八篇『故事新編』雖然並不在某一時期連續寫成，但材料是這時全部預備好了的。二，這裏所謂寫了十篇『朝華夕拾』，並不是說十篇『朝華夕拾』都寫于廈門，其實一半是在北京寫的。註明已畢，然後我們說，『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其實就是說，想到目前他就難過，或者目前的事不堪設想，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絕的來催稿，因此他就寫出了他底哀愁，因而他底哀愁是和『目前』相關的，而回憶與古代傳說之在心中出土，只不過把他底哀愁加以沖淡，而這沖淡了的哀愁，也還是和目前的社會分不開的。這表現在一，『朝華夕拾』有一半寫在北京。這就是說，回憶不但當他孤寂地被供在廈門圖書館時，在他心中出土，而且當他和段祺瑞，張作霖鬥爭的最激烈時，也在他心中出土。所以如其把『我願意想到目前』理解作魯迅逃避了現實，遠不如理解作魯迅深的仇恨了醜惡的現狀，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魯迅底回憶在心中出土，及拾取古代傳說，是在與醜惡的現狀對立的，而並不是在取對立的基礎上產生的了。二，在『故事新編』序言中，魯迅自己對八篇歷史小說有一致的解釋，說：『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却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為自己的對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這就是說，他不自禁的要爲了今人把古人捏歪。他底寫古人，決不是爲了寫古人而寫古人。所以他在十月寫的『鑄劍』裏，就筆寫來，總免不了對今人的諷刺，而在十一月十八日所寫的『范愛農』，充滿了對辛亥革命底哀訴。爲了對魯迅的更多方面的生動的理解，我們再來看魯迅底自畫招供吧：十一月三十日，大風之夜，魯迅在廈門得到朋友來信，知道他底什文集『墳』印成一半了，便爲『墳』寫了題記，那裏面有這樣一段話：『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

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他在吃藥方面的這種戰鬥態度，我們以前也說過了的，但我們在這裏，却可以注意到了另外一個要點：那就是「倒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大大半……」這話。這話的反面其實就是承認了他吃藥，大大半爲了敵人，也有小半是爲了愛人的。所以景來看「墳」之後，不覺大吃一驚，寫給魯迅的信裏便說道：「但「墳」的題記，你執筆可真是放恣了起來，你在北京時，就斷不肯寫出「倒不盡是爲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爲了我的敵人」這樣的句子，有一次做文章，寫了似乎是「……的人」，也終於改了才送出去的。這一回可是放恣了！」——這小半爲了愛人的成分，使他底戰鬥態度放出異彩。但是我們再看景宋接下去的說話罷：「至於「寫在救後面」說的「人生多辛苦，而人們有時卻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帶些孤獨的悲哀呢」這話，就是你「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的本意麼？你之對於「來者」，所抱的是傳施于衆，而非獨自求得的心情麼？末段真太凄楚了。你是在鑿台，爲的是要從上面跌下來麼？我想，那一定是有人在推你，那是你的對頭，也就是「梟蛇鬼怪」，但絕不是你的「朋友」，希望你小心防制牠！恐怕牠也明知要傷害你的，然而就是你的對頭，於是就無法捨棄這一個敵手。總之，你這篇文章的後半，許多話是在自畫招供了，是在自己走出壕壘來了，我看了感到一種危機，覺得不久就要爆發，因爲都是反抗的脾氣，不被攻擊固然要做，被攻擊就愈要做的」。這是景宋對魯迅「自畫招供」的嚴重警告。請讀者去觀看魯迅十一月十一日寫的「寫在「墳」後面」，雖然魯迅底難感文，差不多沒有一篇不是自畫招供的，但這一篇却的確是更嚴重的自畫招供。我們這裏可惜沒有篇幅全部轉載，現在我先把他寫這招供當時的景圍抄一點：「今夜週圍是這麼寂靜，屋後面的山脚下騰起野燒的微光；南普陀寺還在做牽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鑼鼓聲，每一間隔中，就更加顯得寂靜。電燈自然是輝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

愁來襲擊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後悔印行我底雜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後悔；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還沒有深知道所謂悔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這心情也隨即逝去，雜文當然仍在印行，只爲想驅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還要說幾句話。」其次，我們再把景宋所抗議的魯迅底原文抄出來看：

「不過我會經嘗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却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管些孤獨的悲哀呢？——然而我至今終於不明白我一向在做什麼。比方做土工罷，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築台呢還在掘坑。所知道是即使是築台，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面跌下來或者顯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還是埋掉自己。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讓如此，但也爲我所十分甘願的」。

把魯迅底自畫招供和景宋底警告相互參閱，我們除了更具體的了解我們以前所說的一，魯迅底淡淡的哀愁，仍然是正視着社會的，二，在這正視社會的哀愁裏，茁長着新的生命力等等之外，我們還看見了他試想再進一步接近真理的猛力的撲擊。他所說的「逝去，逝去」這類的感傷的語句，不過是說，他忽而抓住其理由，如奴隸思想，如思想意識的黨派性，如在同一「寫在一塊」後面「裏所表現的所謂力量能够支撐」總給來人的希望以些宋安慰的集體意識，和了解一己底力量不過是進化鏈上的中間的這事所表現的在流動過程中看事物的方法，及在過程中了解自己的一種羣策羣力始克有效的意識這等等；然而真理被他抓住時也常常立即滑開，所以他苦悶不安，担憂起了說道：「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憂樂，所以我說話常不覺含糊，中止，心裏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

者最好不如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而其實不然。他並不肯中止，爲了顧忌環境而含糊，或者會有，然而特意對青年含糊的時候却確實很少。比起紳士或正人君子底說話來，他真的可以說算是全露出血肉來了，正如他自己所說：「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雖然如此，他總是攔不住他自以爲可以引導別人的東西，他只揚悲涼的說：「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特點，就是：填。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景宋底眼光一點也不錯，這正是一種危機，不久就要爆發的。不被攻擊固然要做，被攻擊就愈要做了。這宛如提說中了他在九二七與九二八年之後的思想與生活上的大變似的。而就在這時候，他正在準備『做』。他想和創造社聯合，共同來攻擊紳士舊社會。十一月七日，他寫給景宋的信裏說到他想和廣州去的打算中，有一處道：「其實我也還有『點點』，也想到廣州後，對『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並不在意。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誰能說他底『做』是無有的，專爲個人的呢？這是再期首不過的他行動有計算的證據。可憐他底理想後來不但沒有實現，而且竟是他自己和創造社扭打起來了。不過這是後事，那時候，魯迅還沒有到廣州，和創造社聯合，僅只是一種打算，而在他自己，也一面『做』而不息，然而出乎他打算之外的後果，倒在一『做』裏面埋伏下了。這便是他和『卷蕪』的關係。

現在我們又得抄書，並且我喜歡先抄一段關聯到『卷蕪』的，關於魯迅的工作情形。這是十一月十二日，魯迅寫給景宋的信。他說：

「你說我受學生的歡迎，足以自慰麼？不，我對於他們不大敢有希望，我覺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沒有。但我做事是還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見面的人們；或者如你所說：『不要認真』。我其實毫不懈怠，『面發牢騷』，一面編好『華蓋集續編』，做完『舊事重提』，『編好』『爭自由的波

浪」(董秋芳譯小說)，看完「卷施」，都分頭寄出去。至于還有人和我同道，那自然足以自慰的，並且因此使我自勉，但我有時總還慮他爲我而犧牲。而「推及一二以至無窮，我也不能够。有這樣多的麼？我倒不要這樣多，有一個就好了。」這裏一則又指明了他和廈門學生的關係，二則他負着淡淡的哀愁，然而却怎樣努力工作，說得更明白了。三則我要解釋一句，「舊事重提」即「朝花夕拾」，當時發表是用「舊事重提」，這總名稱的。四則是越來越明白了，我們看見了他生命中的新的閃光。然後，我們再看他接下去寫到「卷施」吧。

「提起『卷施』，又想到了一件事。這是王品青送來的，淫女士所做，共四篇，皆在「創造」上發表過。這回送來要印入「烏合叢書」，據我看來，是因爲創造社不徵作者同意，將這些印成小叢書，自行發賣，所以這邊也謀低制的。凡未在那邊發表過的，一篇都不在內，我要求再添幾篇新的，品青也不肯。創造社量狹而多疑，一定要以爲我在和他們搗亂，結果是成仿吾借別的事來罵一通。但我給她編定了，不添就不添吧，要罵就罵去罷。」

他底「危機」，其實是這時就在「爆發」中了。或者還不如說，他在北京大「爆」其「發」，到廈門其實並未中斷，仍舊繼續在「爆發」，而且一直「爆發」下去。不過這時範圍縮小了點，緊張的程度減低了點罷了。具體的情形已如我們上述，現在，不過我們更趨感了。他和創造社之間伏下了未來的大戰，雖然我們知道一九二八年後，許多前進的文學團體與魯迅之間的激戰，主要的是因爲當時魯迅對文學與政治的見解還是在和真理的搏鬥中，並沒有確切把握，所以反映了他對文學藝術的各種問題也都免不了「仍舊貫的」不「免含胡」，這「不「免含胡」，在他主觀上看，我以爲從他所處的歷史環境，特產是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實在不能放在他頭上，因爲從他思想的發展上說，從他一貫攻舊扶新的明確立場上說，從他做人的坦白，說話的率直上說，他都不負「不「免含胡」之責，可是一九二八年的情形却又不同。那時恰在慘痛的革命經驗之後，中國的

社會各勢力之間的力量，在激變的政治環境中推進着重新新的配比，所以，文學界不但要求有什麼說什麼的『不含糊』，而且以求明確的政治立場，戰鬥是站在熟一面的，而且要求，單是站在抗舊扶新的一面還不夠，主要的應該表明你所扶的是那種性質的新，由於魯迅是一個有名的戰鬥者，所以大家對他的要求也特別急切。然而也正因為他是戰鬥者，在一九二六年以前，他的歷史止於浪漫主義爲主的創造社和以寫實主義爲主的文學研究會之間，免不了有些敵視，而作爲寫實主義大師的魯迅，自然也在敵視之列，從這裏，我們看見了魯迅和創造社日後大戰的一些次要的根源。『卷旆』的事，正是這些次要根源的具體事例之一。二，他和狂飈社的接觸開始了。如我們在本書開始時所說的，『莽原』壓下了向培良底劇本不登，十月二十三日，魯迅寫給景宋的信裏說：『長虹在和草漱園吵鬧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飈上大罵，又登了一封給我的信，要我說幾句話。這真是吃得饑空，然而我却不要意奉陪了，這幾年來，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決計置之不理』。而在十月二十八日魯迅寫給景宋的信裏，就憤慨得簡直想把『莽原』停刊了，他說：『沒有了刊物，看大家還爭持了些什麼。』後來是狂飈社在文字上也大罵起魯迅，而且越罵越厲害的樣子，這時期，魯迅寫給景宋的信裏，差不多每封都表現了他很大的哀憤的。十一月二十日，魯迅寫給景宋的信裏，表示他再也不能容忍了，要拳來拳對，刀來刀當，先對『新女性』上狂飈社底廣告來一個啓事，揭穿狂飈社假借他底名義，混稱『合辦』的真相。他跟景宋說，自信這一個啓事要比長虹嘮嘮叨叨的長文要利害得多，這就是如今收在『華蓋集』續編裏的『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現在，我們只要一看，就知道這啓事是怎樣厲害的了。因爲經魯迅這一揭穿，狂飈社的廣告就成了騙局，這對於狂飈社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其次，廈門的環境，逼得他在日常生活上也幾乎忍受不下去，要『爆發』了。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浙陳儀獨立，馮玉祥通電加入國民黨，商震反戈攻張家口，國民黨軍將至滬關，恽至攻福

建的國民革命軍也取得了泉州等等北伐的各種順利消息雖然從各處傳來，但廈大的國民黨員僅三十左右，而且不少是新加入的，幼稚得很，連殺法取得學生會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開一開會，只空談一通，徒令當局者因此注意，不禁叫魯迅喊起『奈何』來。而他們開會的時候，反國民黨的職員却在門外竊聽。雖然廈門的報紙有點國民黨色彩，雖然因為魯迅的應響，廈門又添了一種期刊，日報上添了文藝週刊，然而同時却在歡迎太虛和尙與馬寅初博士，並且還硬要拉魯迅也去陪大虛和尙，說他不去，便是廈大看不起太虛了。而廈大內部呢，那些妾婦們既已趕走了沈兼士，攻倒林玉堂的可能更大了，他們所顧忌的現在只有魯迅。魯迅在陪太虛之後，從一個教員口裏聞知了這些情形，不禁感慨道：「這學校就如一部『三國演義』，你槍我刀，好看煞人。北京的學界在都市中擠軋，這里是在小島上擠軋，地點雖異，擠軋則同——我于這裏毫無留戀，吃苦的還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情，還不到可以向他說明這些事情的程度，即使說了，他是否相信，也難說的。我所以只好一聲不響，自做我的事，他們想攻倒我，一時也很難，我在這裏到底或明年，看我自己的高興。至于玉堂，我大概是愛莫能助的了。」

這些妾婦們一面想攻倒魯迅，然後奪過林語堂手裏的國學院，而魯迅在廈門的生活，其實是不痛快極了。他爲了吃飯，僱工人呀，包飯呀，三天，兩天，工人又不做了，或者飯又包不成了，而魯迅又不懂福建話，要應付一口飯也弄得頭大腦裂。校方還要三天兩天查成績，弄得魯迅憤然對校長說：『我原已輯好了古小說十本，只須略加整理，學校既如此着急，月內便去付印就是了。』然而校長一開真有稿子，便不再有下文了。他其實並不真的準備付印魯迅底稿子。十一月初，伏園從廣州回來，他帶來些吃的東西和許多廣州的消消息，聽了這些消息，魯迅恐怕廣州和北京也差不多，對於去廣州教書的事，他躊躇了起來。中大的聘書，伏園到廈門不久就寄到魯迅手裏，那時魯迅仍然決斷不下。使魯迅斷然厭棄廈大的，倒是那些妾婦們一面又拚命拍校長的馬屁

，卑鄙得太使他難受了，他們在懇親會裏公然稱起校長爲父親來。魯迅氣得立刻要跳起來，幸虧另一教員向前駁斥了，然而還有些人却以駁斥爲不然，說在西洋父子和朋友沒有兩樣，所以倘說誰和誰如父子，也就是說誰和誰如朋友的意思。爲了這些奴顏婢膝的教員如此奉承校長，魯迅竟做了一番兒子，這是魯迅所萬料不到的。他也從沒有想到做教員就是做人底兒子，這使他悲憤到了極點，便不顧到廈大來一心想使身體好起來的願望，痛飲起酒來了。回到寢屋，就靠在椅上抽着烟捲兒睡了過去。醒來時覺得熱烘烘的限前一團火，原來是他身上的棉袍被香烟頭引着了，撲滅之後，燒了有七八寸直徑的一大塊。魯迅底悲痛於此可見。做教員原來是如此卑鄙的，使得他對於做教員也厭惡起來了。從此，魯迅便決定最遲在學期末離開廈門到中大去。而且想忠告林玉堂一番，勸他也離開。

事實上，林玉堂也漸漸的站不住了。廈大正是妾婦們用武之地，他們底工夫大約相當湊了效，學校要縮減國學院底經費了，林玉堂力爭，校長便說：「只要你們有稿子來，立刻可以印，逼得魯迅終于將『古小說鈞沈』的稿子拿了出去。據魯迅說：『放了大約至多十分鐘罷，拿回來了，從此沒有後文。這結果不過證明了我確有稿子，並不欺騙。』然而林玉堂的爭持仍然無效，他只得辭職，幸魯迅在校長談話會中提出強硬抗議，校長才又答應了不縮減經費。這樣一來，魯迅想去職的主意，倒又有點動搖了，因爲校長既已答應了要求，他便不好開口辭職。然而廈大的環境，叫他勉強也勉強不住，過了幾天，他離開廈大的決心，照舊又恢復了。

所幸的是魯迅雖是氣悶，縱使純感傷地看，也還有一個人和他同道，這人體貼着魯迅底寒暖，備極關切，由於天氣漸漸寒冷了，她正在廣州爲他織毛線背心，並且定購了一塊刻上『魯迅』二字的金星石的印章，捲在織好的背心裏，一並寄給魯迅。

魯迅的離開廈門
和狂飈社的求和

魯迅從信上預知了景宋在給他刻這塊圖章，便特地到上海去定購了印油。其時是十二月初，魯迅寫了『阿Q正傳的成因』，此文我們在詳『阿Q正傳』時，曾一再說到過；『阿Q正傳』的英譯本也在此時出版，『桃色的云』也出了再版，到十二月中旬的光景，印油從上海寄到了，魯迅第一次用這印油將景宋給他刻的圖章印在『桃色的云』上面，和新出版的『莽原』一同寄給景宋。

孫伏園是到十二月中旬，交到廣州去了。那時候，魯迅到廣州去的心已不再有什麼動搖，他決定無論到廣州有無生活辦法，也要離開廈門到廣州去走一趟。這樣一決定之後，他倒心平氣和了，就把伏園帶來的火腿吃了。吃了一大鍋，喝起從杭州買到的每斤二元的茶葉來，學校裏對他的吝嗇刻薄，他也不在乎了些。比方孫伏園走後，庶務科就叫魯迅搬到孫伏園底住處去，魯迅便和氣的回答他說，一定可以，請求他們緩他一個多月的樣子，那時一定搬。庶務科的人便滿意的去了。吃飯的不便，依然如舊，天天在變動。然而別一些妾婦們却一天得意一天。白果到北京去把家小帶來了，一妻，四孩，二用人，四十件行李，宛如要到廈門來過老的樣子。魯迅和長虹筆戰，我們前面說過，有人謠傳是爲景宋的流言，也由白果帶到廈門來了。因此在廈門也就很快的傳佈了對魯迅的謠言攻勢。魯迅雖然心平氣和了，但對於長虹他們的悲憤，自然還是一樣的。他寫給景宋的信裏，經常的有關於長虹的嘮叨，其憤慨的程度，不下當年對正人君子的情形，我們可以隨手抄一段來看看：

『我來廈門，雖是爲了暫避軍閥官僚「正人君子」們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幾時，及有些準備，不料有些人遽以爲我被奪掉筆墨了，不再有開口的可能，便即翻臉攻擊，想踏着死屍站上來，以顯他的英雄，并報他自己心造的仇恨。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聞者相似，且云長虹之拚命攻擊我，乃爲此。這真出我意外，但無論如何，用這樣的手段想來征服我，是不行的』

，我先前對於青年的唯唯聽命，乃是退讓，何嘗是無力戰鬥。現既逼迫不完，我就遍又出來做些事，而且偏在廣州，住得更近點，（意謂和景宋住得更近點——凡海，）看他們躲在黑暗裏的講公其奈我何。然而這也許是適逢其會的藉口，其實即使並無他們的閒話，我也還是要到廣州的。」

『奔月』就寫於此時。魯迅寫給景宋的信裏轉告了長虹寄單相思的消息之後，『那時就做了一篇小說，和他開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我想，魯迅這裏所說的『小說』大約就是這篇『奔月』。如果是真的話，那麼我對於這小說中『開一些小玩笑』處的理解，是和理解『補天』中的那位小丈夫之產生一樣，並不認為是小說主題的。這不過是如魯迅自己所說的對古人不及對今人誠心的他那種歷史小說創作態度的在所不免的副產品。

由於魯迅對長虹的還擊，『狂魔』站不住了，便來向魯迅求和。向培良要魯迅替他痊廈門或廣州尋地方，尙錢要將小說編入烏合說書，謂前係誤罵，後當停止，附寄未發表的罵魯迅的文章，請他看畢燒去。魯迅當然不會受愚弄，對他們決定置之不理，說：『我想，我先前的種種不客氣，大抵施之于同年輩或地位相同者，而對於青年則必退讓，或默然甘受損失。不料他們竟以為可欺，或糾纏，或奴役，或責罵，或誣毀，得步進步，鬧個不完。我常嘆中國無「好事之徒」，所以什麼也沒有管，現在看來，做「好事之徒」實在也大不容易，我略管閒事，就弄得這麼麻煩。現在是方針改變了，地方也不尋，叢書也不編，文稿也不看，也不燒，回信也不寫，關門大吉，自己看書，吸煙，睡覺。』後來『狂魔』終於停刊了。常燕生在北京『每日評論』上做了一篇『輓狂魔』，魯迅在『二心集』裏的『做文和做好人的祕訣』裏說『狂魔停刊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發表，大意說『狂魔』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願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板，加以迫害？』的話，大約就是指的常燕生這篇文章。這文章在『三閑集』的

「弔與賀」裏有得轉錄，依魯迅說，是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的。

不過「狂飈」雖停，狂飈社的活動並未因此中止，此後還繼續了若干年，一直和浪漫主義之變態的革命與戀愛等同時並存到左聯支配了文學思潮的主流時，才漸漸無形消滅。

十二月二十二日，魯迅又得到廣東中山大學來信聘他爲正教授（即主任。）但他對於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一向作不大來，所以並不想做主任，只願教點書。廈大要到一月十五號才開始考試，他預計一月二十左右可開卷完畢，以後只要等新水支到，便可以動身到廣州去了。林語堂也自覺立不住脚，曾在給伏「餞行的時候，表示有意活動，惟有他太太仍不以爲然，以爲帶着兩個孩子常常搬家，如何是好。但語堂自己仍甚憤激，很有點離開廈大的衝動。

十二月三十一日，魯迅請病假，正式提出辭職書。截至當日止，辭去一切職務。

魯迅不走，固然忍不下，然而一辭職，問題又來了。學校當局爲虛名計，想挽留魯迅，爲乾淨省事計，又願放他走，所以很有點苦悶。學生方面呢，有許多人來向魯迅訴苦了，說他們是看了廈門大學革新新的消息而來的，現在不到半年，今天這個走，明天那個走，叫他們怎麼辦？然而廈門大學要革新的廣告是學校當局登的，魯迅怎麼能負責。他底決心已定，無可挽回。學生會也派代表去挽留過，然而也無效。

挽留既然無效，便是送別了，於是赴會，演說，照相，吃飯，又叫魯迅忙了一通。請吃飯的，蓄意種種不同。校長給魯迅餞行了兩次，連白果也去辦起酒席來，還請魯迅爲「吾師」呢。餞行忙還不要緊，要緊的是問題並不這麼簡單。許多學生因魯迅的去職，惱怒起學校當局來了，便由挽留運動一變而爲改良學校運動，首先提出的，就要求校長罷免大學祕書劉樹杞博士。于是被學生遷怒攻擊的一些妾婦式的教職員，便不得不出而自衛。自衛之法唯何？就是竭力要把魯迅說壞些，以減輕自己的傷害。因此，許多謠言便發生了。有說魯迅到廈門，原是來搗亂，並非要在

廈門教書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還沒有辭掉；有說魯迅之所以要到廣州去，是因為愛人不在廈門，所以住不下。甚至王附近別的學校鬧風潮，也說是魯迅來挑剔的。原來集美學校曾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請魯迅去講演過。關於這事，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夜，魯迅在離開廈門的船上寫的『海上通訊』（收『華蓋集續編』）裏有這樣的記載：

『新近還聽到我的一件罪案，是關於集美學校的。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都是秘密世界，外人大抵不知道。現在因為反對校長，鬧了風潮了。先前，那校長叶淵定要請國學院的人去演說，于是分爲六組，每星期一組，凡兩人。第一次是我和語堂。那招待法也很隆重，前一夜就有秘書來迎接。此公和我談起，校長的意思是以為學生應該專門埋頭讀書的。我就說，那麼我却以為也應該留心世事，和校長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罷。他却道不妨，也可以說說。于是第二天去了，校長實在沈驚得很，毀勸我吃飯。我却一面吃，一面想。心裏想，先給我演說就好了，聽得討厭，就可以不請我吃飯；現在飯已下肚，倘使說話有背謬之處，適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後講演，我說的是照例的聰明人不能做事，因為他想來想去，終于什麼也做不成等類的話。那時校長坐在我背後，我看不見。直到前幾天，才聽說這位叶淵校長也說集美學校的鬧風潮，都是我不好，對青年人說話，那裏可以說人是不必想來想去的呢。當我說到這裏的時候，他還在後面搖搖頭。』

此外，還有一種麻煩。就是有許多學生是因魯迅到廈門來，才跟着魯迅到廈門來的。其中竟有因魯迅而從河南中州大學轉學而來的學生，現在魯迅一走，埋怨的自然埋怨，有的看見魯迅到廣州去，却又要跟魯迅到廣州去了。這裏面恐怕有幾個學生，後來到廣州去忽然自己也莫明其妙的把腦袋也失掉了，很叫魯迅感覺得他們跟着他求學，弄得性命也沒有，非常痛苦過的。然而這是後話，現在，魯迅欣然往廣州去了，其時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和魯迅同時動身，同船往

廣州去的就有三個學生。此外還有廈大當局所派的一個偵探性的學生也跟着魯迅，目的是探聽消息。因為廈大的風潮鬧個不休，學校當局狼狽得半夜貼放假佈告，也不料當即被學生發覺，撕掉了，沒有成功。當局很怕魯迅幫助學生在廣州活動，所以派一個偵探跟着他，可惜這當偵探的學生手段不高明，被魯迅發覺了。魯迅在船上用種種方法拒斥他，至於惡聲厲色，令他難堪，但他仍不肯走，還是要跟着。魯迅只得通知其他三個學生一律戒嚴。雖然魯迅和其他三位學生並不懷挾什麼祕密，然而這實在也是很討厭的一個東西。而不幸的是，本書也由這一個討厭的東西來收場。



魯迅的書

每冊實價拾肆圓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歐陽凡海
發行人	夏雪清
發行所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文獻出版社
經售處	各大書店
印刷者	科學印刷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月初版

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字第一五二號

100



7

38.00 40.00